

毛澤東的理論家

MAO ZEDONG'S THEORIST :
ZHANG CHUNQI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張春橋與「文革」(上)



文革的喉舌，毛主席的擁護者
極左理論家，革命紅秀才

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是明確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們一
邊。你們有個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

——張春橋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毛澤東的理論家

MAO ZEDONG'S THEORIST :
ZHANG CHUNQI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張春橋與「文革」(上)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代表專程前來北京祝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省五個省市革命委員會代表團講話。（高宏 攝影，《人民畫報》1967年第7期）



張春橋在會議上



周恩來、張春橋宴請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6年1月25日，張春橋(右一)會見緬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德欽巴登頂。(《人民畫報》1976年第5期)



1976年9月12日凌晨，張春橋（左一）等人肅立在毛澤東遺體前。



張春橋在法庭上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¹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¹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²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³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²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³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⁴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⁵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

⁴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⁵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⁶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⁶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⁷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⁷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⁸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案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⁸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⁹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¹⁰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¹¹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¹²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⁹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¹⁰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¹¹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¹²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¹³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¹⁴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¹⁵。《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¹³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⁴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⁵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目次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9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3
體例說明.....	019

025 | 1966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027
張春橋接見學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8.1.）.....	028
張春橋接見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來京同學時的談話 （1966.8.6.）.....	030
張春橋接見北京天津紅衛兵時的談話（1966.8.27.）.....	036
張春橋、關鋒在接見福建部分赴京同學時的講話（1966.10.7.）.....	037
周恩來、張春橋接見清華大學八個組織的代表座談紀要（1966.10.9.）.....	044
張春橋在西北地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6.10.14.）.....	049
張春橋關於長征問題的講話（1966.10.28.）.....	051
張春橋接見「浙江金華北上控告團」時的講話（1966.10.29.）.....	052
張春橋、戚本禹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摘要（1966.11.1.）.....	058
周恩來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電話指示及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 （1966.11.2.）.....	060
張春橋、戚本禹與北航「紅旗」五名戰士談話（1966.11.11.）.....	067
張春橋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團代表的講話 （1966.11.13.）.....	068
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的座談講話（1966.11.13.）.....	070
張春橋接見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全體戰士時的講話（1966.11.15.）.....	074
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 （1966.11.16.）.....	076

張春橋接見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團的講話 (1966.11.21.)	084
張春橋接見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時的講話 (1966.11.22.)	092
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講話 (1966.12.6.)	096
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講話 (1966.12.9.)	100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北京廣播學院學生代表時的談話 (1966.12.10.)	105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 (1966.12.11.)	106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中央廣播事業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1966.12.13.)	111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紅色造反團」的談話 (1966.12.15.)	113
張春橋等在接見部分歸僑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時的講話 (1966.12.18.)	115
張春橋接見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及工人代表時的談話 (1966.12.23.)	119

129 | 1967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 (1967.1.9.)	131
張春橋、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駐滬聯絡站人員座談 (1967.1.11.)	134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1.11.)	139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 (1967.1.12.)	142
張春橋談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鬥爭 (1967.1.18.)	145
張春橋在接見上海革命造反派會議上的講話 (1967.1.20.)	146
本月	148
張春橋對上海目前形勢的幾點看法 (1967.1.)	148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講話摘錄 (1967.1.)	149
張春橋、姚文元談上海高校「紅革會」 (1967.2.1.)	151
張春橋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2.5.)	153
張春橋、姚文元與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等談話摘要 (1967.2.10.)	157
張春橋、姚文元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7.2.24.)	160
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7.2.24.)	195
張春橋與華東局革命造反派座談記要 (1967.2.25.)	206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7.3.12.)	210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講話 (1967.3.20.)	212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風大會上的講話（1967.3.26.）	219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3.） （存目）	236
張春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4.）	236
張春橋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7.4.20.）	247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舞蹈學校部分師生的講話（1967.4.22） （存目）	248
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	249
張春橋在山東省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5.7.）	272
張春橋、姚文元、杜平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 （1967.5.14.）	275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講話（1967.5.24.）	296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6.2.）	297
張春橋關於上海高校運動的講話（1967.6.17.）	298
張春橋接見浙江省「聯總」代表時的講話（1967.6.24.）	299
張春橋談山東的形勢（1967.6.24.）	300
張春橋研究論文	303
「文革」研究文獻	309
後記	333

1966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 (1966.7.27.)

張春橋講話

他對原臨時文革的成立表示支持，並說：「對於臨時文革委員，量多的只見過兩次面，我不能對哪個人打保票。有不稱職的，經過群眾討論，隨時可以罷免。」

大會結束後，春橋、文元同志接見了原臨時文革全體委員。春橋同志說：「你們要走群眾路線，對各種不同意見要善於區別，力爭把90%以上的群眾團結起來。」當原臨時文革負責人談到臨時文革委員都很年輕，沒有經驗時，文元同志說：「如果你們像在非洲，拉丁美洲，沒有革命政黨領導，怎麼辦？」春橋同志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文元同志說：「你們要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相信自己，必須建立在毛澤東思想和廣大群眾的基礎上。」春橋同志說：「一，要破除迷信，時時處處依靠毛澤東思想，凡是與毛澤東思想不一致的都不能算數，誰掌握毛澤東思想就跟誰走。二，你們已經取得一些人的信任，大家是支持你們的，他們還要考驗你們。許多問題在群眾中商量，多數人還不是惡意的。真正要與廣大群眾結合起來，需要有一段過程。三，問題要一個一個解決，困難是不會少的。」春橋同志又說：「你們要吸取工作組的教訓，不能壓制群眾，只要你們方向對，我們就支持你們。」

張春橋接見學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8.1.）

【1966年8月2日凌晨，張春橋、關鋒、姚文元接見學生代表】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在開會，接到電話說人越來越多，文化革命小組派我們三個人來，我們有兩個任務：（1）我們對同學們表示熱烈歡迎；（2）大家遞了不少條子，提了好多問題，大部分問題有的我們事先知道，有的剛看到，明確的就可以說了，小組討論過，有共同意見，有的我們還沒有討論過，是新問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也是世界歷史上沒有過的，這些問題要依靠鬥爭實踐，不能光憑腦子思想，不是哪一個人可以解答，他們兩個（關、姚）也解答不了。有些我們也答覆不了，有的還回答錯了，有的是將來會證明錯了，今天我們認為是對的。革命在發展。

大家提議，現在工作組撤了，老的革命委員會，不信任，新的沒產生怎麼辦？這是這幾天才出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研究，要靠各校師生創造經驗，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沒有群眾的創造不能制訂出正確的政策；大家已經有實踐了，我們談談自己的看法，一類可以解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討論過，一類可以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可能錯，要你們創造。還有一類也可能解答不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同樣的事在這個學校、這個班裡不一樣，答覆錯了要害人的，有的問題要帶回去，要研究調查，那樣多具體問題要你們自己解決。

文化革命小組只能抓共同問題原則上解決，定出方向政策，具體的只能靠革命工農兵，革命師生，創造經驗在實踐中解決，這些意見可能對，可能不對。說的只能和同學們商量。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們表示後，你們可以繼續辯論。有的我們沒有把握，允許我們聽一聽。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在開會研究，希望同志們創造新經驗。我們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剛才關鋒同志已把最主要的問題解答了，回答了我們的態度。可能不對，可以討論。同學們遞的條子，一種是帶給毛主席的信，我們負責送給主席。還有一些條子提出一些新問題，如：是否可以建立工農革命幹部子弟協會，這個問題允許我們帶回去研究。問題太大，要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考慮。還有很多同志提出半工半讀的問題，情況我們未來得及瞭解。工作組問題上，所有工作組一樣對待，要撤。勞動會怎麼樣，請你們革命師生自己討論。既然叫半工半讀，你們就比一般學校先進，是全國的方向，不能把勞動放棄，如工廠不能停止生產專搞文化大革命；農民不能停止生產，而專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與生產的關係是什麼？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結果會提高我們的覺悟，工人把工業生產搞得更好，農民把農業生產搞得更好，學生把學習搞得更好，更加鼓起革命幹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衝破舊習慣束縛，促進生產力。半工半讀的學生可以著重一下，統一安排，又勞動又搞文化革命，這樣更合適一些。

有人問劉少奇主席說的保護少數如何理解？少奇同志講得很清楚，少數怎麼保護，運動中常出現少數，運動中出現多數少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常常有革命左派被打成了反革命。應該保護，不要看他們是少數，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多數情況下，真理在多數人手裡，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所以要保護。即允許他們保留意見，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講意見。不要不允許他們講話，在文化革命中要製造這樣的空氣，讓大家講話，真理越辯越明。所以應該保護少數是從革命利益需要考慮的。

有的同志說，對關鋒對對聯的解釋不同意。不同意很好，繼續討論。你說你是英雄好漢就領導革命嗎？被人說成是混蛋，你要革命，聽毛主席的話，共產黨不會拒絕別人跟共產黨走的。總給他們機會。毛主席哪裡說過不允許人革命？我們歡迎革命左派師生，今天來了很多左派同學，要學會團結他們。團結是有鬥爭，有過程的，一開始就講團結95%是不行的，但我們應有這種願望。

現在革命形勢很好，冷冷清清的局勢改變了，但恰處在工作組不繼

續工作，我們也不允許他們工作的時候。有的工作組癱瘓了，但陰魂不散，革命師生繼續挨鬥。市委正在建立領導大中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兩個還未成立起來，這幾天正是青黃不接。

很多條子要求小組到你們那兒去，我們組長加上組員只有十幾人。我和姚文元在上海工作，我們是來開會的。會議完了回上海，我們工作崗位在那裡，這裡剩下沒幾個人。有的人一定要見伯達、康生、江青，心情可以理解。我講召之即來，但現在召的人太多，能來的太少，我們不能變成孫猴子，拔一根毫毛變成許多小猴子，我們雖然要作孫猴子大鬧天宮，但我們沒有這個本領。我們還講召之即來，今天我們可以不參加會，到你們這兒來，有人給我在條子上寫「火急，火急」，怎麼不回答？我們帶回去，但可能不能立即解答。

我們的意見不一定正確，說錯了話可以貼大字報寫給我們。有的人在這裡等了兩天了，我們對不起你們，我們來晚了。非當面談不可，可以找我們。你們寫信好了，我們集中起來向中央、市委提意見。等兩天，時間上劃不來。學校的革命需要你們，應該把領導權掌握起來，自己鬧革命，犯錯誤不要緊，不要問了再做。革命同志要有闖勁，大家討論總可以解決。中央信任你們，放手鬧革命，你們要逐漸樹立信心，大家共同創造經驗，你們比我們經驗多，你們是直接革命，你們是創造者，希望你們帶信兒給其他同志，今天發言可以帶回去，今天很晚了，沒事就散會。

張春橋接見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來京同學時的談話（1966.8.6.）

【8月6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小組成員穆欣同志受周總理的委託，接見了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及河北大學來京參觀的全體革命同學代表，舉行了座談會，並作了重要指示。】

張春橋同志問：是哪幾個大學來的？（眾答：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大學。）什麼時候到的？（眾答：昨天上午11點。於是，張春橋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們互相作了介紹。）

張春橋同志說：我們不大瞭解大家要求談些什麼？各校不同，都是帶著什麼問題來的？

一個同學說：我們看到北大搞得轟轟烈烈，我們回去以後，究竟應當怎麼做？

張春橋同志問：你們看到了哪幾個學校？（眾答：北大，清華，還有師大）那你們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這裡來開會，文化革命小組開會。我也是看了這幾個學校。你們在天津有些什麼問題？

一個同學說：北大的形勢跟天津不一樣，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們要走的道路？

張春橋同志問：你們那裡和北大怎麼不一樣？（眾答：我們那裡由學校組織開大會批鬥，和北大不一樣。北大一次會就鬥好幾個，我們那裡是由革委會組織的……）

張春橋同志問：你們的革委會是怎麼選的？（南開大學一個同學講了自己對革委會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學提了很多問題，遞了很多條子。然後，由張春橋同志作了解答。）

同學們，我想這樣，大家到北京來，是來學習的，我們到北京也是來學習的，是一個任務。北京是黨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機關比較多，大專學校比較多。這個地方的同學在毛主席身邊，他們受到黨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經驗，我們來這裡交流經驗是應該的。我雖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的，所以對同學們表示歡迎。同學們要求總理接見，總理和中央領導同志工作很忙，今天來不了，打電話給我，委託我們來和同學們見面，所以我還要代表總理對同志們表示歡迎。

先介紹一下我們看到的北京的情況。

文化革命並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如果說是從討論《海瑞罷官》開始的話，從去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官〉》開始，發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6月1日北大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廣播。這期間，經過了二百天，這二百天裡，全國都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大家對國內階級鬥爭，特別是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認識更深刻了。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並不是偶然的，它對全國來說不是偶然的。而大字報由聶元梓寫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別人也會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報，立即就批了，讓中央廣播電臺廣播了。可見，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親自點燃起來的。從6月1日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開始，北京大學在6月18日發生了一個事件，即所謂「六·一八」事件。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件呢？因為工作組進來以後，沒有領導革命師生進行文化大革命，沒有領導群眾鬥黑幫，而是執行了一條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運動不是鬥陸平，到10日，連個鬥爭計畫也沒有，反而訂了許多清規戒律，如你們剛才提出的那些情況，這裡都有。例如：班級之間不准串聯呀，門口也不准隨便進呀，校系之間不准往來呀，兄弟院校，工農兵來聲援還不讓進去等等，同學們耐不住了，自己起來革命，就出了個「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幫分子。學生裡面有沒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數是好的，而張承先卻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當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學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學的衣服。張承先藉口說，這不是流氓行為是什麼？是反革命事件！6月18日以前，運動開展的轟轟烈烈。但6月18日以後，卻轉過去鎮壓革命學生，把參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學生當反革命來鎮壓。工作組本來應該領導同學起來鬥黑幫，但他們卻來鬥革命的學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響很大。此後，接連在北京出現了「六·二〇」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〇」事件……經過調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質很清楚了。為什麼有這個事件發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組不革命，別人起來革命。有的同學打了人，思想負擔很重。我們不提倡打人，但已經打了，怎樣？只好解放這些學生。當時兩派學生鬥起來了，其實兩派學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學自己就說嘛，打我們的同學也是為了捍衛黨的利益，是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原

來對我們沒有認識清楚，當成了反革命。這是工作組挑唆的，我們要解放兩方面的學生。好人打了壞人活該，好人打了好人是誤會，我們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後不要再打人了。這是第一句話。至於你們怎麼辦，你們自己討論。戴高帽子，我們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們討論，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們最富有創造性。他們現在還沒有地位，也不是權威；不怕罷官，也不會罷官，因為你們還沒有當官，頂多是挨鬥，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處，挨鬥也有好處，這樣可以鍛鍊毅力。平時說是忠於毛澤東思想，輪到自己頭上就不行了。你們不想給別人戴高帽子嗎？人家也能給你們戴，不怕！

（有些同學遞條子問：擴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學辯論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關。罷官都可以，連校長都可以罷，何況擴音器呢？（天大有同學提倡：既然工作組撤出，有的單位也有派出說明革命的學生，調回來怎麼辦？）派了學生幫助教職員革命，文化革命委員會有權決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邊派來的，是你們內部的人嘛！

關於怎麼鬥？鬥誰？由學生民主辯論決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麼多框框。北大一萬五千人的大辯論會都可以開嘛！南大可能多一些，（眾答：不多，五千餘人）也可以開嘛！

學生在文化革命委員會中應該占多數，教員就恐怕難教育，他們不大懂得革命，他們的地位跟你們不一樣，他們不理解同學。學生不起來，恐怕革命難以搞徹底。

同學們要求8月13日主席到你們那裡去參加慶祝活動，或者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去，我們可以負責轉達。有的同志還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到你們那裡去，現在中央同志正忙於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問題解決了，取得經驗，當然願意到處去一去。請相信我們能轉達就行了。

關於文化革命委員會，教師和學生的人選，中央沒有規定過比例。河北省委怎樣規定的，我們不大清楚，你們看怎麼辦，可以討論一下。這個規定是不是可以容許在革命中隨時改變，有不同意見可以寫大字報，不行就變動嘛！關於代表，絕大多數同學不同意，當然可以撤換。

（有人問：北京各院校的形勢所以是這樣，是不是因為北京市委爛了？）這個說法恐怕也不大妥當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確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領導下的校黨委也應該是正確的。這種論調是錯誤的。第一，上海市委雖然是正確的，但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也不能保證你就沒有問題。如果是這樣。中央主席是正確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麼爛了呢？黨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來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來革命。（穆欣同志說：你們還沒有鬧革命，你們鬧嘛！）上面還有很多框框壓著你們，現在你們希望我們出來說話，替你們把蓋子揭開，我覺得這個辦法不好，我希望還是你們出來。中央指示很清楚，你們是主人。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革命師生，你們是主人，你們起來革命嘛！我們頭腦裡也不是那麼乾淨，有錯誤就改。如果你們學校的領導願意革命，檢查錯誤，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轟嘛，就鬧革命嘛！

（有的同學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來參加學校的鬥爭會和文化革命運動。）據我瞭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開會。省委的一些領導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們認為有必要，可以貼他一張大字報。

（有的同學提出：劉子厚同志指示我校鬥婁平的時候，讓婁平和主席團並排坐著，大家不同意。）我們見到劉子厚我們傳達，如果見不到，可以送他一張大字報。

（有人問：批鬥怎麼結合，辯論怎麼結合？）這個問題我不想談，你們討論，看看怎麼進行。

（一個同學提出：北大發動群眾的方法是適合全國的，回去是否可以講？）當然可以。你提出這個問題，反映你們還有框框，還沒有起來革命，還沒有！你們自己組織起來。你們就說，我們大了，我們現在是大學，不是幼兒園，用不著給我們安排座位。

（有些同學提出：學校曾經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領導人，報上沒點名。）貼在哪裡都可以。一些框框規定，中央從來不知道，不知是從哪兒來的？如果你們對我的講話有意見，回去可以提。我們在下面的

時候常說，如果對我們有意見，都可以寫大字報。關於「內外有別」是國務院外辦說過，現在沒有必要了。總理講過了嘛，不要用這個約束大家。外國人來，叫他們看好了。無非是我們的大字報，我們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學校一些黨政負責人，不帶頭寫大字報，理由是領導上寫了好像是作了結論了。）等你們起來了，他就作不成結論了，誰也作不了結論。別說是黨委書記說了不算結論，中央一級同志講話，不是也有遞條子的嗎？我們也不強加於人，你還是勸勸他們吧，你說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結論，我們還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說嘛！你不說話，怎麼站在前頭領導我們呢？他說寫大字報不是時候，我們說，現在是時候了，叫他貼大字報，我們服從真理，不怕壓制，我建議你們在這裡辯論一番，交換意見，我告訴你們，提這個問題的領導幹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還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經看到了，像毛主席，大家已經是公認了。但還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認，要展開辯論。認識一個人要看一個過程。我們黨認定毛主席是領袖，是經過多少年的鬥爭的。過去也有些人自稱領袖，像陳獨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認。我們一些自己認為是左派的同志，還要採取謙虛的態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們的（行動）。這樣有益於取得群眾的信任，絕不能自己稱王稱霸。

（天大有人問：如果有人罵左派，貼大字報說你是「蠢驢」等等怎麼辦？）那你也給他寫大字報，你們千萬不要說自己是左派。你們要團結多數。

（天大有人問：調查材料時，受到人事部門，組織部門阻擾怎麼辦？）革命委員會真正把權力抓在手裡，是可以調查的。問題是現在還沒有動腦子，你們還要想一想，怎麼鬧革命，權不在你們手裡！又有委員會，又有代表，他們不代表你們，你們可以選一個委員會嘛！（穆欣同志插話：印把子還沒有在你們手裡）如果你們不知道革命怎麼鬧法，你們還是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從十二個人的代表會一直到進北京，新中國成立。革命怎麼鬧法，不能叫領導小組出主意。

給你戴了高帽子，你還革命不革命？是共產黨，共青團員，開除了

你的黨籍，團籍，你還幹不幹革命？有人提出對市委有意見，你們既然可以到北京來，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嗎？你們對市委就毫無辦法？我這可有點煽風點火了。

我今天談的是一個精神，具體的話我不保險，具體的事情，我還不大瞭解。總之，從領導上說要放手反動群眾，怕這怕那，統統是錯誤的。從同學來說，你們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來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們不是都會唱《國際歌》？《國際歌》的基本精神，就是號召群眾起來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是明確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們一邊。你們有個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你們提了很多問題，你們只要掌握了這個精神，在革命實踐當中，在向困難鬥爭當中，去想辦法。智慧是在革命鬥爭中出來的，一個人的聰明也是在革命實踐鬥爭中產生的，有了困難，要想辦法解決，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有障礙，我們革命前進中的資本主義的東西，封建主義的東西，都要徹底揭露批判！統統打倒。沒有任何人阻礙了我們。只要有這種革命精神，辦法就可以想出來。你們想的辦法會比我們講的辦法更好。我給你們想的辦法不一定好，一革命，辦法就有了。

最後，請代我們向學校的革命師生問候！¹⁶

張春橋接見北京天津紅衛兵時的談話（1966.8.27.）

【8月27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組員姚文元、王力同志接見了「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紅衛兵、天津紅衛兵一百多名戰士作了談話】

¹⁶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同志們：

經過戰鬥，受到了鍛鍊。當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們說的，幹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頭。這個流血事件是殘暴的。關於這個問題，你們整成材料，我們上報給中央。要解決問題，還要靠你們解決，這樣的鬥爭，還要靠當地的群眾。關於天津市委和其他省市的問題，中央已經研究了。罷官很容易，中央下個決定就罷了官，但是，你們就沒有對立面了。不能算勝利。所以我們要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靠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學們的氣憤我們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以前這樣做了，收穫不太大……。

他們打你們，你們就可以打他們，重要的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¹⁷

張春橋、關鋒在接見福建部分赴京同學時的講話 (1966.10.7.)

【10月7日上午10：15～13：55在中南海內接待站接見部分福建赴京革命師生的中央首長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有：陳伯達、關鋒、姚文元、戚本禹、穆欣、葉群。接見時張春橋、關鋒同志作了講話，陳伯達同志和葉群同志還分別用閩南話和福建話和福建同學親切交談。被接見的單位有：福建醫學院（東方紅）戰鬥團、廈門大學紅衛兵獨立團、等八個福建院校及清華、北大、北師大等校的代表共70餘人。】

同志們：

今天聽了同志們的講話，材料很多，有的材料過去已經看過，有

¹⁷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的還沒有看過，回去再研究。同志們提了很多問題，我想講這樣一個問題，明天是8號，十六條公佈已二個月了，這二個月可以看出什麼問題？林彪同志在國慶時說的兩條路線鬥爭還在繼續，在某些方面來說比十六條公佈以前更尖銳更複雜。為什麼呢？因為十六條公佈以前，有些地方群眾沒有發動起來，十六條公佈後，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有些原來的矛盾表面化了更尖銳了。十六條公佈後，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有的精神準備不夠，至今的確還不理解，有的是壞人，十六條指出，有四種人而不是一種人。有些工人、農民很容易被挑動起來，他們保衛省、市委是出於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他們不會不去，如果我是工人，軍隊我也會去。有一條，軍隊不能動，這是中央的命令，要能動軍隊，那早就開槍了。（笑聲）全國還沒有發生動軍隊。（同學插話：「有的公安部門已經動了。」關鋒同志說：個別地方有動。）正因為個別地方有，所以中央立刻下命令，這樣才能保證，鬥爭雖然很尖銳，但是沒有發生更嚴重事件，這說明瞭階級鬥爭複雜、尖銳的。證明瞭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發動是不行的，要使我國不變顏色是保不住的。

同志們受到壓力，受到迫害，是有困難的，這也證明這場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現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還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如果政權掌握在別人手中，那你們向誰控訴呢？你們將會怎樣呢？你們還會到這裡來控訴？（有個同學插話：「會被殺頭。」關鋒同志說：還是要革命的！）

同志們我們要把眼界放寬一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迫害，畢竟是暫時的，最後我們一定會勝利的，但沒想到會有這樣複雜，你們也沒想到吧！為什麼會這樣呢？你們的傳單可以印，我們的傳單不能印？政治上扣了這樣那樣的帽子，鬥幾小時，十幾小時甚至幾天。（同學插話，在漳州市街上發現有鉛印的反動傳單）你們福建情況可能要複雜一些，對面敵人會利用，公開的國民黨也會利用。這個革命非常不容易的。同志們，你們不是感到年輕，趕不上參加過去的鬥爭，覺得很遺憾生晚了嗎？但是現在參加這場艱苦鬥爭還可以鍛鍊，全國

的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你們還是能夠到北京，還能到全國去串聯，黨中央完全支持你們，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要站在革命立場上，如果不站在革命立場上就要被推翻。

看了條子，有幾種感覺，同志們受壓迫很重，較苦悶，問我們怎麼辦？我們倆（指關鋒同志）剛才討論一下，至於該怎麼辦，我們還得問你們該怎麼辦？（同學們堅定地回答：鬥爭到底！）不是中央沒說過話，十六條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他們也都知道這是毛主席親自支持制定的，而且有的人也參加了會議，（同學插話：「葉飛也參加了。」關鋒也說：不執行的還是不執行！）問題複雜就在這裡，一開頭中央就估計到，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時，毛主席公開指出有兩種情況：有的執行，有的不執行。全國都是這樣。現在出現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有的地方比你們嚴重，有的地方比你們差一點。這是有普遍性。中央說一句話，各人都可以利用。十六條各人有各人的解釋。林彪同志說：不要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說對不對？（答：對！）林彪同志說的完全對！革命的同志應當清醒。但有的人抓住這句話，說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講的話並不包括革命同志批評省市。委。（熱烈鼓掌）應該說：違抗十六條，攻擊十六條的人，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司令部，（長時期熱烈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你們回去要緊緊抓住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十六條指示，別人不執行，我們執行，我們不折不扣地執行。講道理就是講十六條的道理，林彪同志的講話，是根據形勢的發展，精神還是根據十六條。

你們要我們幫助。這些具體問題，對像是什麼人？周圍群眾是什麼人？左派是什麼情況？中間派是什麼情況？我們還不太清楚，應當注意壯大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極少數右派。左派當然人數少，現在少，將來也少。別想將來都會成為左派。當然囉要革命的是多數，最堅決、堅定的革命左派畢竟是少數。馬克思、恩格斯只兩個人，誰給他印刷機、宣傳車、錄音機呢？當時苦得很。（關鋒同志：連吃飯都成問題。）恩格斯只好跑到他父親的工廠去，他父親是資本家，不

是紅五類（笑聲）！列寧還不是這？毛主席也是這樣。毛主席被國民黨寫的傳單那多了。你想想，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傳單有多少？污蔑你們的傳單有多少？（同學插話：單單福二中傳單就卅萬張。）卅萬份不算多嘛！蔣介石一罵共產黨文章比毛主席著作四卷還多，但蔣介石被打倒了！

革命的新生事物最初總是少數的，成長非常艱難的。我們應向革命前輩、導師學習革命的精神，現在，總的形勢比他們好多了，國家政權在毛主席手中！（關鋒同志：受打擊是好事，不受打擊怎能成為革命左派！）（長時間鼓掌）毛主席過去被開除黨籍好幾次，被撤職、軍權被剝奪，但是最後真理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方面，雖然是少數，但最後必定會取得勝利！（熱烈鼓掌）我們今天在全世界還是少數，有幾個黨和中國黨結合在一起？現在蘇修一邊還是多的。有一同志問，少數和多數的關係，這個是會變化的。（關鋒同志：多數是暫時的、虛假的。）但只要是革命，你們就會勝利。真正革命派的少數是會逐漸增加的，如果一天增加起來是會垮臺的，你們別以為今天拿到這個講話，明天回去，隊伍就一下子擴大，那樣，風一吹就會垮臺的，到後來又只剩下你們幾個人了。幹革命就是要作紮紮實實的工作，革命是沒有捷徑的，要準備走曲折、艱苦的道路，每個地區具體怎麼走，不一樣，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他們的壓迫無非是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壓迫，中央發出的通知首都三個司令部物質待遇應當平等，中央文革小組講了，周總理也講了，但沒用。不要以為中央講了都會執行。到前天，第三司令部發通知，還是用手寫的，請我們去開會，後來我們查問，為什麼中央規定首都三個司令部待遇應當平等，你們不執行？後來就送來了鉛印的通知，我把鉛印的丟掉，手寫的留下，可貴！（熱烈鼓掌）我說這話無非是說革命還是要靠自己。把革命同志團結起來，形成堅強核心。

昨天江青同志講了要注意政策、策略，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注意靈活性。我們一些同志的弱點就是不太注意團結爭取多數，這樣會受打擊，因為左派不可能很多，中間派跟誰跑就力量

大。我們就要動腦筋和這些人打交道。如何去作工作，我們不要對過去圍攻我們的同學悶一肚子氣，大家都是同學麼！（關鋒插話：都是同學，都是階級弟兄麼，他們是一時受蒙蔽。）在北京，凡是說過這樣話的會爭取很多同志，如果罵倒一切，對我們很不利。這一點你們要考慮，不但對工農群眾，就是對同學，也要堅持毛澤東思想路線，這不是一天兩天，有些人今天跟你們，過兩天形勢一變又跑了，就繼續分化，不斷改組。道路是曲折的，你們回去應該這樣想問題。你們寫條子上來，說要急著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幾個學校去看，他們鬥爭比較尖銳，如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有的被孤立時只剩下10個人。（關鋒插話：有的被關起來。）昨天去念通電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們去問問他們，他們的經驗比我們多，當然我們也有受壓迫，今天我們不在這裡訴苦了。（笑聲）我們感到困難和你們不同，你們和這樣學校有些類似，是否和他們聯繫，學習他們。北航只要求工作組趙××談談話，到國防科委門口等了28天28夜。不談，我們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說：要談。他還是不談。後來，陳伯達同志說，你們二個住到學生中去談，如果被打死，我陳伯達抵命，還簽了字，立下軍令狀。就是這樣還不敢去。他們怕群眾怕到這樣的程度。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他辯論：為什麼陳伯達的話你不聽，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聽？我們火了，我們說：你們再不去，明天我和學生站在一起鬥你。（笑聲，熱烈鼓掌。）你們困難還不是最大，但你們受到的迫害，我們很同情。中央的態度很明朗，我就不多說了。你們多和他們聯繫，他們經驗是什麼，現在開始變化了。昨天的大會就是標誌，主席臺上的人好多就是戴過反革命帽子的，我念決定時，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們以後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現在不是同志了嗎？中央的批示你們聽到了吧？（眾：聽到了！關鋒插話：如果他們再戴你們的帽子，你們就叫他們把指示拿出來，讀給大家聽。）這方面的壓力，中央能作到的，中央決不會不管。但就是這樣，革命還是靠自己，要有勇氣，多動腦筋。從6月1日聶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張大字報到現在已經四個月

了，四個多月來鬥爭是艱巨的，曲折的。可能現在形勢又好轉些，但鬥來鬥去還會發生變化，可能要經過多次反復，毛主席這條路線才能取得勝利。

我們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覺悟，學習毛主席如何革命，作領導工作和分化敵人，他的天才還在於如何又鬥爭又團結，這裡有許多問題，你們應該好好想一想。

最後，我希望同志們真正地鍛鍊成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們大家都有這種願望。（長時間熱烈鼓掌）（此講話由福醫東方紅戰鬥團、廈八中、廈大紅衛兵獨立團等單位整理。）

關鋒講話

同志們：

剛才春橋同志已經說過，大家回去要堅決鬥爭。毛主席教導我們，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福建也是大好形勢，學生起來革命，少數派數目也不少。工人、農民被欺騙，被蒙蔽。圍鬥過你們的也出來揭發了，這不是大好形勢嗎？（同學插話：出來揭發的被壓的很厲害。）越壓越革命嘛！暴露也是個好事。

當然，不要這樣想，到北京告狀，黨中央和毛主席就下命令，罷某某人的官，問題就解決了。這樣就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簡單了。如果都是那樣自上而下罷某某人、某某人的官，那就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失去鍛鍊青年一代的意義。還是要靠工農群眾、革命學生自己起來鬥爭。毛主席黨中央對革命同志的最大支持就是十六條和林彪同志的多次講話，應當掌握這個武器進行鬥爭！

至於沒有印刷機呀，沒有什麼呀，我們講幾句話，一定要他們給，他們是不是就給呢？只要是真理嘛！傳單印得再漂亮，不是真理，只是謬論，也不行！主要在質不在量！舉個例子，據我所知，北師大同學譚厚蘭在批判工作組期間被打成反革命，是米高揚式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去開了個會，江青等同志都說了話，工作組也撤走了，形勢該好了吧？好了幾天又來了，說她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張春橋同志插

話：那次我們小組全體成員都去了。）在鬥爭中慢慢地經驗多了。現在形勢就好得多了，「井岡山」紅衛兵發展了很多，一批又一批的同學退出了原來的紅衛兵師，加入了「井岡山」紅衛兵。

那些所謂多數派是虛假的、是暫時的，多數人是要革命的，只是一時不明真相，受蒙蔽，對這些人好好地耐心地作思想鬥爭，要和他們講清楚，我們相信大多數會明白、會清醒、會站在這邊的。就是那些曾經罵過你們打過你們的同學，不要去計較，前幾天接待中有一部分同學，他們曾經圍攻北大同學，他們自己說了：「我過去圍攻還打過人呢。」他也出來講話，不是很好嗎？絕大多數同學一定會站在革命這一邊，他們都是擁護毛主席，只要我們作艱苦的工作，最後一定能團結大多數，左派隊伍一定會在鬥爭中壯大起來。

就講這幾句話。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鬥爭勝利！（長時間熱烈鼓掌）

附：當時有廈門大學革命師生代表隊散發的《「八·一九」事件真相》，和洪樂等人給毛主席的「急電」給張春橋、關鋒同志看，他們大笑起來，將幾份傳單拿起來揚一揚，很風趣地說，這麼好的紙呀！（全體同學跟著大學）。

整理者：謝培坤等七人

東方紅大學（原清華大學）
《北京公社》戰鬥隊印十.九.¹⁸

¹⁸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11）；《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12）；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二集）。

周恩來、張春橋接見清華大學八個組織的代表座談紀要（1966.10.9.）

總理首先問了我們學校各個組織的情況，什麼時候成立的？有多少人？同學一一回答。

總理：你們幾個組織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檢查之事）

同學答：七個，今天又來一個，八個。學校共十幾個組織。

總理：你們說9日（指開會）沒說8點。昨天才知道今晚八點開會。你們四日交的信，5日收到，9日就檢查，太快。彼此要有個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們對她負責，正準備檢查。王光美檢查，也要有個準備；同時，黨中央也要討論……。張春橋他是副組長，他也不能多講。我把我能說的話說了，不能多說了。我說過中央全會解決了。（有的同學追問，總理回答：基本解決。）組織上、思想上完全通要有個過程。

張：你們這個要求是合理的，她應該檢查。（張即張春橋同志，下同）

同學：不能壓制我們的革命精神。

張：什麼時候也不能壓制，周總理昨天沒有時間。

總理：還有個時間討論，中央常委討論，主席很忙，還要找時間。她最近去不去檢查？檢討得怎樣？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員，中央都必須討論。你們大學生，明白嘛！（總理接電話）

同學：領導談話可以印嗎？

張：有個青年，他的傳單說我主張武鬥，我怎麼能主張武鬥呢？我不更正。因為這個印傳單的打了人，一更正，這個人受壓不小。最近這個青年來信說：「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印了傳單未得到您的同意。」這樣我就算了。

總理：我們討論一下，王光美不去檢查，不能當場檢查，一去檢查肯定下不了臺，勢必鬧起來。一鬧就牽涉到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黨中

央。你們總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三大前提：黨中央領導，聽毛主席的話，十六條。不能拿這個問題為難黨中央，不能說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這場大革命，放手發動你們，動員你們來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還有放假鬧革命……。我這裡說的話，二十二號講了，十一中全會解決了。黨中央只能給這個範圍。我們碰到澳大利亞共產黨也只能講到這個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員，單一個人好辦，隨叫隨到。她一檢查，一追一問，問題就大了，勢必牽涉到另外的問題……傳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處？你們考慮。有一張大字報說中央怎樣，你們看了。現在全國廣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敵人也在仰望北京。《參考消息》有吧？（同學答：有）有外國記者評論大字報有多少中央委員點了名，希望你們自覺。革命派的人聽黨的話，你們要努力實現革命目標。我們在開會，今天下午中央決定了，你們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況講清，王光美寫了書面檢查，明天轉給你們，你們可以表態，提出意見，滿意不滿意。

同學：這與蔣南翔有關。

總理：我們也考慮這個問題。蔣南翔他接觸的主要兩個人，一是中宣部×××，一是前市委××。這裡面比較接近××，後期與×××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張：我到北京第一次開會就和蔣南翔在一個組，他對×××說得多，對××調子越來越低。

同學：陶鑄同志6月15日說蔣南翔性質定了，王光美7月還說蔣南翔性質未定。

總理：這是個人的看法。鬥蔣南翔也有各種看法。

同學：我們可以和王光美談話嗎？

總理：這必然要和上面有牽連。你們把問題擺在她面前，會牽連到別的。

同學：……。

總理：錯誤路線就是這些。毛主席健在，你們還不相信他領導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決這個問題嗎？中央全會12日結束，後又開工作會

議，16、17日他們才回去，各省委還未傳達到，你們紅衛兵就圍上去了。他們有的現在還未開省委委員會。要有個過程。這兩個月很忙，你們鬧革命，我們一方面領導你們，一方面向你們學習。我們先學習，後提意見。你們也這樣。司令部常常碰不到頭，幾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報那些問題，她不能全部回答，我們也不能全回答。22日我說全會基本解決了，毛主席說：也只能這樣說。你們大學生知道的。現在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健在，全會又解決了。現在中央若是修正主義起作用，那你們起來造反，現在不是。大字報貼伯達同志在北大的講的話，那是主席叫去講的。關於主席的文章，未公佈的，我們不能糾正，糾正等於肯定了。明天換個書面形式檢查，不通過再檢查。

張：你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問題是檢查範疇問題，換個方式，人不去，給書面材料。大家滿意不滿意，可以座談討論，把意見給她，再檢查。

總理：把她不能回答的問題就避開，不然要我們賠著，那更麻煩。背靠背可以避開一些問題。

同學：內外有別是指什麼？

總理：內外有別是指國內外。

同學：有的同學給破了。

總理：發展不更壞嗎？那樣的傳單發出去，影響很不好。黨未號召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那就是全會解決問題了。

（同學講形勢……）

總理：十一中全會後，各地為什麼還很抵觸，這是有個過程。你們現在大分化、大改組，浪潮一個一個的，經過十三期社論和10月6日大會，又大分化、大改組。毛主席總是告訴我們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樣的傳單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國家不能給印。你們的大字報，已把這個問題給貼出來了，再把它傳出去，現在你們正在為正確路線而鬥爭，再搞會走遠的。（電話）一個正確的路線，要在全國生根，要有個過程，毛主席一句話能解決，必須大家認識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點在文化機關中，也是逐步深入。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史無前例

的，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毛主席還在總結新的經驗，你們認識也有個過程。

同學：完全相信黨中央解決了這個問題。從我們學校看十三期社論，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要批判解決，清華必須聯繫到王光美。

總理：那些事，你們可以拿出來批判。下面要解決還要經過長期鬥爭。大字報的問題，傳單的問題，要牽涉到別的，而別的中央解決了。根據《紅旗》社論，你們完全可以深入批判……。我們準備把蔣南翔材料全部交給你們。

同學：……他們（指譚立夫等）走了。

張：他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吳晗，就是不在場，「三家村」也是一樣，其實換個翦伯贊也同樣達到效果。批判「三家村」，為文化大革命作了輿論準備。他們的東西在，他代表一個階級。（總理：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直接攻擊他個人的，別的學校就不必，我們的目的是解決一個人，我們的目的是放在觀點上。同樣，對王光美也是一樣，她能代表路線的要批判她的觀點、思想、行動、作風，這樣就能肅清影響，不妨礙批判。既然形成了個路線，全國各種表現形式差不多。

總理：陳獨秀他不在時，我們還要批判，這樣還更深，不會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肅清反動的路線，長期堅持不改，就會變到敵對的地位。群眾萬人大會上問了幾個怪問題，就會下不來台，我們有親身經驗。幾十年鬥爭證明，鬥爭剎車總是主席剎車，是組織上、時間上，而對錯誤思想的批判還要。黨內的事都說了。

同學：她說可以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員。

總理：她錯就可以批判，她有歷史根源……。

總理：內部館的問題那也不必，要貼我的大字報去貼。要你們認識到自覺地不出就行了。對聯的辯論，剛開始，工作很難，就怕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後來發展到譚立夫的講話，代表了。開始不是壞的，有的發展下去就不好了。慢慢發展，思想是有所發展的。分化，合併總是有，青年的思想變化快，沒有什麼包袱。黑五類子弟，我們不同意這個名稱，我們要改造他們，更何況子弟，他們不能形成一個階級，不要造

成人為的階級對立。要兩好，出身第一，還要有表現，最後歸宿還有個表現好。這個，譚立夫不同意……。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還在繼續。工作組去了，90%的工作組除了幾個特殊的，幾乎都或多或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沒派工作組的黨委也是一樣。黨的幹部，絕大多數還是認識問題……。

張：不點名還是一樣發揮作用。

同學：我們要向反動路線開火，絕對樹立毛主席的威信。

總理：對，而且要深入徹底批判，注意影響，路線要徹底批判。

張：書面往來。蒯大富他在群眾大會上宣誓，大庭廣眾上恢復了名譽……。

總理：何長工的大字報在街上多了，政府是中央領導的，政府威信沒了，不好。街道宣傳兩條路線鬥爭思想性多些，人名偶爾提到可以，不要把人的名字過分突出，讓帝國主義、國際上知道了，會造成更多的麻煩。強調思想性、政治影響，北京、上海、廣州影響大。今天我們講中國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要注意影響。任何事情總是事實在先，認識在後，紅衛兵就是毛主席及時抓住了。……社論是經過調查才寫成的……。8月4號就不讓王光美在清華活動。

張：你們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現在不要反過來，你們要注意團結犯錯誤的人。你們現在站起來了，以後犯錯誤的是你們。

總理：中國共產黨過去犯過錯誤，但不能說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組不贊成王光美去檢查，中央其他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華檢查，不然下不了臺。我解釋，不要面對面檢查，可以背靠背。……（同學談到三個司令部）

總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¹⁹

¹⁹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二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11）。

張春橋在西北地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10.14.）

【參加大會的還有穆欣、戚本禹、姚文元三同志。】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派我們四個人來，首先我受陳伯達同志和江青同志委託，向大家問好。大家剛才送來很多條子，都是要求見毛主席，見中央同志。同志們，你們這種願望我們完全理解，但是今天是無論如何沒辦法安排主席到這裡來啊！同志們，你們這種願望我們負責報告中央、報告毛主席。

同志們，我們在會場上收到很多材料，收到各個學校送給我們關於西北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問題有的是給中央文革小組，有的是要我們送給中央同志的，有的是要我們送給毛主席的，我們都給你們做通訊員，做到這件事。

同志們，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裡面，在全國範圍內，我們一方面看到文化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特別是我們的紅衛兵在這兩個月裡面，破四舊、立四新，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中間建立了偉大的功勳。這中間也包括西北地方同志們取得的偉大勝利，我們表示熱烈的祝賀。當然，革命總不是很平坦的，哪像我們面前這塊草地（指工人體育場）那樣平坦，而且上面長的草很軟可以睡覺。革命不是這樣，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非常尖銳的、複雜的、殘酷的，是生死的鬥爭。因此，就不能不遇到從各方面來的阻力，而且這種阻力在某些單位、某些地區是很強的，而且我們看到不光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步都不退讓，他們多麼頑抗，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鬥爭，甚至於經過艱苦的鬥爭。但是他們畢竟是腐朽的力量，是沒有生命的。我們革命的師生代表著新生力量，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們總是要失敗的。同志們都知道黨

中央和毛主席為我們制訂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完整的路線即十六條，只要我們按照十六條辦事，那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持反動路線的人就一定會被我們打敗的。當然，同志們，你們還會遇到困難。你們過去遇到了困難，將來還會遇到困難。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有多次的反復的，不單在一個學校會有反復，一次二次反復，在一個地區是這樣，在全國也是這個形勢。要把毛主席路線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徹底的勝利，那還需要我們作艱苦的鬥爭，做細緻的工作，陣地一個個佔領，我們不能希望很快地取得勝利。但是很高興地看到西北地方，在我們偉大的首都北京，有這麼多人開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在預告著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我們能夠最後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是的，我們要下定決心……而且我們要估計到。（同學們有的遞條子說：打成「反革命」怎麼辦？）有的地方甚至祖孫三代都打成反革命，問我們怎麼辦？這個中央已經有文件，通知了各個地方，你們大概也聽到了。怎麼說呢？就是《中央軍委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緊急指示》，黨中央所批准的，就講了在前一階段各個地方、各個地區、各個單位把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工人打成「反革命」，所有這些一律平反，這一條中央已經決定了，而且通知了全國了。同志們可能擔心，中央通知是通知了，他們不執行怎麼辦？有沒有這個可能？有。十六條不是公佈了嗎？他們就有人不執行嘛！那這個情況也可能嘛！我說不要怕，如果你們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被資產階級叫成「反革命」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什麼可怕的，所以，我們不必要擔這個心。我們既然下定決心，戴著這個帽子照樣革命，而且中央也不會說不要你們，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大會就表示了這個態度。同學們，我要說的話可以說得很長，時間已經很晚了，而且剛才接到電話要我們馬上回去開會，我就不能再多講了。

我們希望同學將中央文革小組對西北人民、對你們革命師生的問候帶回去。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⁰

張春橋關於長征問題的講話（1966.10.28.）

【地點：政協禮堂】

大連有十五位同學從大連跑到北京來，還有從上海來到北京的同學，（上海同學走的比大連還長，不登報是因為走了一段路，坐了一段車。）他們都很可愛。

蚌埠的同學17號到達通縣，問題出來了。（18日主席接見）同學說：是坐車去見毛主席呢？還是繼續走呢？還是走吧，下次再見毛主席。

有人說，瑞金-延安-北京，這個想法很好，現在看來雪山過不去，（謝富治副總理點著頭用手比）雪山這麼高，中央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吃什麼，還要設糧站。你們堅持步行是好的，有時我們還要幫忙呀。

北京現在一天走出不到十萬，很多還是北京的，外地的走的不太多。現在病號很多，（走出後）老鄉是不是歡迎呢？我看有的可能不歡迎，要做好工作，可不能下最後通牒。

長征，有些人不敢，別的事情都勇敢，走這條路他不敢。

走完了怎麼辦？我說不要緊，原先我也想不通，怕字當頭，都走了怎麼辦？現在看來一樣，走了很多不是一樣的辦事嗎？我看你們的觀點，出去串聯就統一了。有的在校保工作組的，在外串聯就狠搞工作組了。因為工作組壓了他，不壓迫不革命嘛！

²⁰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印；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11）。

出外串聯，對北京文化大革命不會有害處，只會有好處，不過時間拖長一點，沒有什麼，半年不行再來半年，（指文化革命）如果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把國家搞好了，永不變色，那還是成績很大了嘛！蘇聯搞了五十年還修了嘛！

出外串聯不會影響兩條路線的鬥爭，出去也是兩條路線鬥爭的一部分，長征能煉出一批走路的人，走路是不大容易的事。

（有人遞條子問：長征經費怎麼辦？）這個問題沒法答覆，因為剛開始，我們正在研究，哪些地方有糧庫，哪些地方沒有，哪些地方有醫院，哪些地方沒有，醫生怎麼辦？現在正在宣傳長征的意義和好處，有的先做起來了，可能會遇到許多問題和困難。²¹

張春橋接見「浙江金華北上控告團」時的講話 （1966.10.29.）

同學們：

真對不起，你們到北京來，已經等了很久，有的等得長一點，有的等得短一點，由於我們時間難安排，一直不能跟大家見面。這裡我先介紹一下：我叫張春橋（鼓掌），這位叫穆欣。（鼓掌）

關於金華的情況，同學們來以前，我們就知道一些，看到一些材料，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那邊文化革命很關心。剛才和你們的代表談了話，知道了一些最近的情況，他們也反映了你們到北京的要求。我想談談我們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最廣泛最深刻的革命，全世

²¹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印；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

界都沒有搞過，譬如蘇聯，從十月革命到明年已五十年了，列寧在時想搞，但未來得及搞就逝世了。斯大林做了一些文化革命的事，但像中國這樣由成千成萬學生，群眾參加的這麼大規模的文化革命，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過，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沒有過，別人也不敢！像我們這樣放手，大中學校都放假來搞革命，哪一個國家這樣幹過？沒有！而且可以坐火車不買票，一批一批到北京來。原來我們預計到北京二百萬人，可是現在將近五百萬了。至於各地學生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的互相串聯，這個數字還沒法統計。搞這麼大的革命，為什麼？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把思想領域裡，意識形態裡的資產階級東西肅清，用新文化、新思想、新風俗、新習慣，也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代替四舊，改造世界。如果我們的國家，七億人口都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來，那就不可戰勝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空前偉大的意義，你們現在還看不大清楚，以後會看到，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幹過的事，比巴黎公社的意義要大，比十月革命都更富有群眾性，比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規模都大。正因為是這樣一場大革命，因此，它必定會遇到各種阻力，這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具體如金華地區，會遇到那麼大的困難，這我們沒有想到。一個共產黨的地委，怎麼能壓制你們？怎麼能挑動工人、農民鬥你們？我們估計會有阻力，但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嚴重。在全國，十六條出來後，這個阻力更大了，也就更表面化了，而群眾則更發動起來了，有的地方發生在十六條以前，更多的地方是在十六條以後發生。對很多人來說有個認識過程，開始對運動不認識，但有一些人就不是，他們就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如果不從路線鬥爭、階級鬥爭角度看，那很多現象則沒法解釋。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本來就存在，但沒有這麼複雜，現在更加尖銳，更加複雜了。

你們在北京住了很久，北京各學校都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鬥爭很複雜，不是很容易的。看來會有反復，還會繼續很長時間。也就是無產階級起來，被壓下去，又起來，又被壓下去，雙方的鬥爭，會有多次的鬥爭較量，不是一次，可能反復多次，最後無產階級才能取得

勝利。同學們應該有這個準備。因此，就搞文化大革命說，現在只能說是初期，是個開頭。如從去年批判《海瑞罷官》算起，剛一年，但前半年規模不大，廣大工農兵剛開始注意，學生作一般辯論，報紙上也只開展一般的辯論，打「筆墨官司」。今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發表後，馬上起了一個高潮，但這個高潮馬上就被打下去了，到8月8日，十六條出來，又一個高潮，特別是毛主席接見了百萬革命小將後，又起了一個新高潮，各地學生革命大串聯，炮轟省市也起來了。金華的問題就出在這個時候。全國從那時到8月，幾乎所有的省市都被包圍了，這證明群眾起來了。結果會遇到阻力很大。你們金華問題，在全國也是很突出的，是一個很嚴重鎮壓學生的事件，完全違反十六條。我看了李學智的檢查，檢查太輕了，說什麼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這個「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就是完全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要我們表示態度，我們認為，同學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支持你們！（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革命的同學要求見地委書記，一個地委書記，竟然擺那麼大的架子！李學智怕得要死，共產黨員怕群眾的那個樣子，那稱什麼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本來應該到群眾中去，群眾找上門來了，他還不出來，這算什麼共產黨員？你們在地委門口等了20幾個小時，這完全應該！但是我有一點不大贊成，就是不吃飯。他們吃飽飯、睡好覺，你們也吃好飯、睡好覺再來包圍。今天你不來，我們明天再來，再跟你鬥！不吃飯，身體要垮的，我們以後不幹那傻事！你們出來，就沒有道理。你不出來算了，為什麼用那麼多方法去挑動工人、農民、利用工人、農民對黨對毛主席的深厚階級感情，去包圍學生，那還得了！這個不能怪工人、農民，這個責任應該歸地委。（鼓掌）特別是中央發表了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不准挑動群眾鬥學生，三令五申，他們仍然這樣挑動工人、農民和學生的關係，這更加錯誤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是完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反的。（熱烈鼓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相信群眾能自

已解放自己，依靠廣大群眾的力量來鬥垮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們（指金華地委）是反革命的路線，是壓制群眾的路線，是反對群眾的路線，所以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這條路線，你們要炮轟，要批判，我們完全支持！（熱烈鼓掌）這一條路線不徹底肅清，不徹底批判，那革命就要受挫折。你們同學要堅決執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辦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路線，才能取得勝利！

林彪同志在國慶日的講話，以後《人民日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已一個月了，北京搞的轟轟烈烈，又掀起了一個高潮。

金華地委呢？平反的問題，中央已發了指示，剛才瞭解金華還沒平反，這個錯誤越來越嚴重，還沒改正。因此同學們很憤怒，到北京來，要聽聽中央的意見，我們的態度剛才說過了，我們支援你們的革命行動，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而且全國都要搞到底，需要搞多少時間，就搞多少時間。現在搞了五個月，還可以來五個月，還不行，要多少時間就搞多少時間。一定要搞到底！這個決心非常堅定。是黨中央的決心，是毛主席的決心！（熱烈鼓掌）

如果同學們也贊成這個決心的話，那你們提出來的問題就好談了。

一個問題是要撤李學智的職，罷李學智的官，金華地委犯了那麼大的錯誤，依我個人意見，這個人做地委書記是不行的。（熱烈鼓掌）但是，目前我們這裡收到要求罷官的信很多，全國各地都有。這個人不行，是馬上罷了呢，還是先鬥一鬥呢？剛才代表來說，不罷了他，我們困難更多。我說這也有道理，如果先罷了，可以順利一些。但是很多地方要求罷官。為什麼一般的據我知道的都沒有批？是不是不能滿足同學們的願望呢？不是的。我們就講一個道理，這事最好慢一點，好處就是一直可以保留一個對立面。如平反的工作，要他去做，挑動工農群眾可以讓他到工農群眾那裡來檢討。如一罷掉了，他就不幹，同時同學們也就鍛鍊不出本領來了，因為同學們還很年輕，假如你現在蘇聯學習，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統治下你要起來鬧革命，怎麼搞法，你想過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修正主義根子挖掉，經過文化革命挖掉了，不是說以後不出修正主義了，罷了李學智的官，是否就挖掉了修正主義的根

子？列寧、斯大林沒有想到自己的故鄉會出修正主義，蘇聯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沒有鍛鍊好青年一代，出了修正主義，就沒有辦法了。蘇聯人民是列寧領導下的經過十月革命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們能夠取得勝利。但開始就沒有精神準備。蘇聯人民到哪裡去告狀？到中央去告，不是告一個抓一個？所以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大演習，在我們中國，如果縣委變了，這個縣的人民可以起來把他推翻。一個地委變了也同樣，人民可以起來把它推翻，而不是靠上級，這個就比較艱苦。好在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中央，現在我們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來一個演習，在鬥爭中鍛鍊你們。如果要中央下個決心，不難打個電報就行了。但對你們來說，在鬥爭中鍛鍊機會就少了。你們不是要在大風大浪裡鍛鍊嗎？你們要想辦法，不但現在不出修正主義，而且還要保證以後不出修正主義。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有辦法對付了。同學們可能沒有從這個方面去想，只想中央同意了，高高興興地回去。你們到街上去，到處都有罷官的要求，像陝西要罷霍士廉，甘肅要罷汪鋒，西北局要罷劉瀾濤，中央都沒有表示意見。為什麼中央不批准？難道中央不支持你們嗎？不是，北大陸平是修正主義，不行，一下子拔掉，派了張承先，北大同學說，大家含著淚迎來了工作組，但又受壓迫。同學們，沒有壓迫就沒有革命呀，沒有壓迫還算什麼革命者？算什麼紅衛兵？我們青年就是要多受一點壓迫，多受一些鍛鍊，也包括自己犯一些錯誤，這都不要緊。

你們怕回去交不上帳，回去怎麼辦？這沒有關係，我個人理解這正是毛主席完全相信革命人民有力量解決這些問題，只有這樣解決了問題，影響才大，影響好幾代，要創造一個不出修正主義的辦法，而且有參加過鬥爭的人，學會如何正確處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只要有了這種經驗，這種人，才撤職，罷官，意義就更大了。我把你們的要求我們一定負責報告黨中央，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考慮我們的意見。怎麼去工作、鬥爭，你們考慮，這是不是不支持你們呢？不是。用這種辦法才是最大的支持。如果只聽上級的決定，那蘇聯怎麼辦？所以這個問題，請同志想一想，因為這個問題不是我們兩個人所能決定的，也不是中央文

革小組所能決定的。不罷官，這樣去鬥，鬥起來才有味道兒，越鬥越有辦法，越鬥越有勁，聰明才智是在鬥爭中增加的，現在你們受壓迫，群眾起來了，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一個意見是要求開展四清，這個方針早定了，最近中央開了會，省裡同志也剛回去，這用不著擔心，同學們的意見是要提早搞，關於具體如浙江金華什麼時候搞，提早到什麼時間，這個我不瞭解，我們可以轉告。

還有一個意見，同學們要我們中央派人去調查、處理，我們非常感謝，這是同學們對我們的信任，我們有人會去的，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去瞭解，但是還是那句話，相信那裡的群眾自己可以解決問題，但要經過鬥爭。

你們送來的材料，我們要仔細研究，報告中央。

我們想，在浙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杭州是省會，金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那裡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搞好，靠誰做呢？靠那裡的革命師生、工農群眾。中央給你們的思想武器，是十六條，是毛澤東思想，有了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管阻力有多大，就一定能把鬥爭搞徹底，使得我們的國家顏色永遠是紅的，成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把全世界的革命推向前進。

我想向同學們講的就是這麼一點意見，不對的，請同學們批評。
（熱烈鼓掌）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對你們充滿信心，完全相信你們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只要到毛主席著作中取武器，勝利一定屬於你們的，不管碰到什麼困難，黨中央、毛主席都是支持你們的！（長時間熱烈鼓掌）²²

²²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印；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

張春橋、戚本禹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摘要 (1966.11.1.)

【被接見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造反紅衛兵總部、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北京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

張春橋講話

紅衛兵成立全國性組織，一定要通過中央討論。你們有這種積極性很好，我們不反對，請同志們考慮一下條件如何，是不是沒有這種組織不行，是不是第一位的問題。因為整個運動都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央都直接把指示告訴全國人民，每一次接見都提出了當時的中心問題，竭力避免形式主義。過去開會一定要作報告，報告三小時，現在都打破了這些，毛主席向來都不喜歡這些，不需要講的就不講嘛！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告訴全黨，全國人民。黨是從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得到發展的，毛主席的路線是經過鬥爭得到發展的。現在上千萬人在串聯，到北京來了幾百萬人，有的來過幾次，這就沒法統計了。原來想分期分批地來，現在都打破了。這麼大的運動也不能下框框，很多問題群眾在串聯中能解決。天南地北，從哈爾濱到海南島，在群眾大串聯中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解決。

全國性的紅衛兵組織的成立，我們要考慮，我看條件不夠成熟。

串聯的單位今天可能是左派，在大動盪中青年也允許犯錯誤，觀點也可以改變。大動盪中建立這樣的組織，有非常不穩定的可能性。現在你們要做艱苦，細緻，踏踏實實的工作，不能滿足於少數派，過去你們被鬥是光榮的。在革命運動中如何把左派組織起來，團結大多數，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不是講話，發通告能夠解決的。現在就缺少艱苦，細緻的工作。共青團中央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改組呢？還要看一看，因鬥爭在發展中變化很大，組織問題放在後期比較好。現在不要急於建立

全國性紅衛兵組織。

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實際上還是中國的，別的國家也不可能馬上成立紅衛兵組織，日本出現一股，很快就被撲滅了。墨西哥也出現一股，很快就被抓進監獄。說明中國紅衛兵在世界上影響很大，但在全世界還要有一個過程。

戚本禹講話

大方向是對的，潮流所趨，紅衛兵是否代替共青團還得考慮。紅衛兵全國組織是一種趨勢，將來總會建立的，這是大事情，非常嚴肅的事情，全國紅衛兵的大事，對整個世界震動很大。因此這麼大的組織不能倉促成立，要做很多工作。

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主席不能做你們的統帥，這不是小孩鬧著玩的事情，牽涉到國際關係……你們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發了大字報，外國人都很感興趣。我們兩人建議你們不要用這個旗號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對人家國家的紅衛兵鬥爭不利。日本出現了，被抓了，就搞祕密組織，抓是抓不盡的，革命的大火是撲不滅的。你們搞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有聯繫可以抓，這樣好心變成壞事，對外國（革命）並不有利。

紅衛兵全國性組織，將來是要成立的，但要經過一定時期。文化革命運動，要經過一定的階段，大動盪，大分化，比較穩定的時期……你們要成立，不要比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要比做踏實細緻的工作。現在不要急於成立這樣的組織，到時候你們不成立也不行，那時候我們再聽聽你們的意見。

各地方還很艱苦，你們要更好地做些踏實工作，你們會講話，會分析，都是風流人物……到各地聯絡，調查研究，哪些是左派，保守派是哪些，哪些人擁護毛主席。

你們要做踏實工作，不要打旗號，目標小有好處，懂嗎？將來是要建立這個組織的，前途是光明的。²³

²³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

周恩來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電話指示及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1966.11.2.）

【按：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丁萊夫操縱廣播局派到廣播學院的工作組拒不執行緊急指示，並將工作組整學院革命師生的黑材料藏到廣播大樓裡，企圖「秋後算帳」。學院的革命小將多次要求處理黑材料，工作組不理睬，11月2日廣院小將再一次到廣播大樓要求工作組處理黑材料。工作組競封鎖大門，把小將們阻攔在門外整整一天，進行刁難，不予處理，最後小將們忍無可忍，衝進大樓查封黑材料。】

周總理第一次電話指示

周總理命令學院工作組組長李哲夫（原廣播局副局長、局黨委政治部主任）：按軍委緊急指示精神處理黑材料。

周總理第二次電話指示

（革命小將們打開了政治部的一個櫃子，這時有人通知學生代表接周總理打來的電話。）

周總理：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同學們暫時撤出，你們找五個代表，我派一個外事秘書和你們一塊搜查，你們看好不好？

同學答：好！

同學問：丁萊夫是您親自派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不是，不是。我一個人怎麼能決定派誰呢？

同學問：是誰派的？是羅瑞卿派丁萊夫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這個我不太清楚，是中央決定派人，具體是總政治部幹部派來的，派誰由他們管。

同學問：您是什麼時候認識丁萊夫的？

供參考》（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1966年11月12日）。

周總理：他到廣播局後，我才認識他的。

【電話還未打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已來到廣播局。以下為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談話紀要。時間：1966年11月2日23時到3日凌晨。地點：廣播局總編室。】

開始，先到的同學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彙報要材料的經過。隨後張春橋同志（下簡稱張）問李哲夫（下簡稱李）：你聽到軍委指示後怎麼辦的？你們幾時傳達的軍委指示？

李：（含糊其詞）正式見文件是5號。是10月10幾號傳達的，哪一天，我記不清了。是丁萊夫同志傳達的。

張：什麼時候傳達的，你記不清了，……又記不清了，你們記性怎麼那麼壞？

姚文元同志（下簡稱姚）說：你們有些事情我們卻記得很清楚。

（接著李哲夫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經過。中間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見在門口的同學。）

張：你們的材料燒過沒有？

李：沒有。

同學：有。你們的組員有燒的。

（李哲夫繼續交待。）

張：傳達晚了，你說是丁萊夫，那就由丁萊夫負責。你們訂立執行方案沒有？

李：沒有。

張：你們到學院傳達過軍委指示沒有？

李：沒有。從我們撤離後，就沒管過。

張：軍委指示來後，未去（學院）傳達。你們研究過怎麼辦？按你理解怎麼執行？研究過方案沒有？傳達後，你們應該研究工作組應該怎麼執行。這個指示和你沒有關係嗎？（這一連串問話，李哲夫等無言可

答。)

姚：在9、10月份你們辦些什麼？和學院有聯繫嗎？

李：沒有。

同學：楊子毅找過×××

張：怎麼執行，黨委討論過沒有？有無執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張：你是黨委委員嗎？

李：我是。我參加的會，沒有討論過。我經常出去。

張春橋同志又問王壽仁同志（下簡稱王）

王：我們黨委會學習過一次。

張：制定過執行的具體辦法沒有？

王：四個人參加了，領會文件不透。去問一下，對這件事情不清楚。（說完出去了。）

這時，反對廣院小將革命行動的一個人（女）遞條子給姚文元同志，條子上寫：「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長不要聽一面之詞（指接見開始時革命同學向首長彙報的情況），全面瞭解情況。」此人出去後又進來說：「我想跟首長談一談。」姚文元同志說：「時間不早了，我們是專來解決材料問題的，明天還有事情，你寫成書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來。支持廣院小將革命行動的戰鬥團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遞上一條子，上面寫道「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廣播局問題很嚴重，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調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興趣，便和那女同志談了起來，並將他們送上的兩份文件拿走，說：「我們拿走，回去看一看。」

張春橋同志接著問：「領會不透，你們向中央請示了沒有？跟（學院）群眾商量了沒有？問問同學怎麼辦。」

李哲夫啞口無言。

張：根據你們（指李哲夫）說的，你們第一不上報中央請示，第二不同群眾商量。如感到沒辦法，一請示上級，二與群眾商量，兩頭都不問，那算什麼？

李（急忙解釋）：我們向市委請示過。

張：你們什麼時候才請示？他們找上門來才請示。這個指示（指軍委指示）是比較原則，很多地方紛紛打來電報，說：「難以貫徹。」你們領會不透，也不上報中央。當時學生普遍感到有壓力，反映這一條。我們寫指示時，想得比較簡單，認為同學自己寫的檢查交給本人，其餘的全部當眾燒毀。我們自己沒當過工作組，沒幹過工作組的事，所以我們不知道整理過多少種材料，沒想到這麼複雜。後來我們發現有同學互相寫的，比如我寫了你的，你寫了他的。如果不知道還好，知道後寬宏大量的還好。但是年輕人嘛，知道後就說：「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麼？」這樣知道後，會引起群眾鬥群眾，寫材料的人大都屬於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愛護。這樣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寫的檢討退回本人。還有些材料，如工作組長講話，也交給大家。其餘材料先封存，以後燒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糾紛。以後再也別搞這些，同學間有意見，可以正常進行批評。

同學：有人整理的材料還交出來，怎麼辦？

張：沒交出來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學不好團結，等他們覺悟了，他們會交給你們，或者自己銷毀。

同學：有人還整理材料，並且揚言「後會有期」。

張：這是工作組的遺毒，不要把矛頭指向那一派。你們一直叫少數派就不光榮了，當你們孤立時我們支援你們的，當形勢變化了，你們應從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對那些同學要做工作。對工作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學生處在變動時期，如跟著跑就壞了。你們更容易受外界影響，還需要與工農兵結合。我們比你們年歲大一點，也是這樣，有個時候，全國各地來電報都是說：「紅衛兵盡幹壞事、打人、鬧事。」我們聽了，也要考慮兩天，要是不堅定，有一點動搖，就會犯錯誤。

姚：同學們和我們座談，講有人要秋後算帳，這樣有人擔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現在也不敢說一句話。

張：這是一個禍根，軍委指示就是為了消除禍根，使大家能解放出來，共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開始我們想得簡單了，後來就決定發一個補充的，但認為用中央的名義，就不能匆匆忙忙地發，發了個補充，再來個補充，所以一直沒有發。關於工作組作的公開報告，有利於批判反動路線，拿出來批，其餘的封存起來，燒掉，免得以後再鬥起來，這是初步想法。

（同學說話很多）

張：我們一直想到你們那裡去。

姚：你們有個陳××跳樓的怎麼回事？他們鬥了這個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們幹的什麼事，我們都知道。

同學：有人讓中央文革小組到我院作檢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們是準備要去的，貼了我們的大字報，我們已經看到了。廣播學院的情況我們有所瞭解，廣播學院不僅是黑材料問題，還有別的問題。貼了我們大字報，我們怎麼能不知道？不是有人還「造」江青同志的「反」嗎？我們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沒有時間。

同學：《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出現了第三種意見，一手打倒「臨革會」，一手打倒「代表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張：其實還是兩派。

同學：現在過來的人逐漸增多。

姚：現在動盪很大，你們還要準備他們動盪回去。……

張春橋同志又把話題轉到材料問題上來：你們（李哲夫等）在廣播學院執行了什麼路線，要好好檢查。我們早就想找你們，我們感到你們有問題，我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找你們。我們很想把丁萊夫……你，你們黨委，找到我們那裡開個會。你們的事很奇怪。這個事，第一你們沒有認真討論，第二沒有一個執行方案。你們急不急？局黨委不急，你是工作組的人，你為什麼不急？也不請示市委，也不請示中央，也不與群眾商量，這些事你們都沒做。我的話是否符合事實？我根據他（李哲夫）講的，我沒做另外調查。你們廣播局，是消息靈通機關，沒有認真對待中央指示，你們同意不同意我這些話？這三點是否符合事實？10月

6號在第三司令部大會上，我宣讀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發言稿，全國都知道了，你們不知道？到十幾號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請示，態度是不對的，才發展到今天，現在是不是這樣？你們要保證材料不能轉移，不能隱藏，允許現在不全。你可以說：可能現在有些東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來，但要保證不能隱瞞，不能轉移，不能私自銷毀，可以把現有的封存起來。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學的個人檢討，拿出來；你們的講話都要拿出來，其餘的雙方（指同學，工作組）派代表，封起來。這幾天我們有些焦慮，同學們弄材料的時間多了。你們要早一些主動解決，就不會為這一件事糾纏。消毒是很不容易，這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很好的消毒，大會是能壯聲勢，真正能說通一個人不容易，特別是影響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說死話，還是說活話？現在允許你說活話。我們相信他們（指同學），也同意你說活話。

李：我們整了六個人的材料，已經給他們了。

同學：別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見有的組員已經銷毀了。六個人的材料，你們交出來還後悔嗎？

李：我們再讓組員找一找。交出來。

張：以後查出來的，再找他們一塊查看，再封起來，說我們又找來一批。開個目錄，寫上都是什麼材料，誰的，多少。

同學：人保科，我們信不著，他們盡幹壞事，我們已經把檔案封上了，怎麼辦？

張：學院你們管不管？

李：不管。

張：各個學校分別各部管，不行的話找那個副總理管，現在總理很忙，我們擔心他身體支持不了。你們再問一問中央。你們應該勇敢擔起來。錯就檢討，改正可以成好幹部，這樣不改就成問題，改不改頭一條就看平反。《紅旗》十四期社論講得很清楚，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

派」的革命群眾認真平反，公開給他們恢復名譽，並且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就勇於改正，同學們會歡迎你們改正錯誤。廣播局黨委也應當督促他們把材料搞好。（王壽仁同志連忙點頭說：是，是，是。）同學們一塊學習，過去說了那些錯話，交給同學批判。

你們（指李哲夫）幫查一查檔案。不能把材料往檔案裡塞，凡是從文化革命開始，從6月2日算起吧，塞進檔案的都不好，一是個人寫的，或別人寫的，一塊取出。

（李哲夫向張春橋同志彙報他們執行的具體做法。）

張：別這樣詳細的說了吧，我們很忙，封材料的事，你們雙方解決吧！我們就不參加了。

（這時王壽仁同志忙說：還有什麼指示？你就下吧！我們堅決執行。）

張：我們不是來下指示的，我們是來督促你們執行中央指示的。

同學：廣播局對我們少數派不平等。

張：在組織上，經濟上應該平等。

李：是，是。

張：至於在政治上嘛，傾向於誰，我就不好說了，你們自己決定。我們彼此之間是很瞭解的。

接著，張春橋同志把同學叫到一塊說：我們一點也不責備你們，我們怕你們上當，怕你們吃虧，我們聽到後，立即就來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從保險櫃中拿出來，然後引同學翻，這樣誣衊同學搶檔案，我們怕你們被動。

（大家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邊說著，邊往外走。走到門口，那位遞條子的所謂「受害者」和一位幹部反對中央首長支持革命學生，要求首長一定到×樓幹部處辦公室看現場。）

張：不去了，時間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舊不放，非要首長去看看不可。）

姚：好吧，我們不去看，你們下不了臺。

張春橋同志生氣地說：去，去。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轉身往政治部走。這時王壽仁連忙擋住去路，齊聲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長沒時間。）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塊走下樓。

張春橋、戚本禹與北航「紅旗」五名戰士談話 （1966.11.11.）

「紅旗」戰士：自從《紅衛兵不怕遠征難》那篇社論發表以後，大部分都長征去了，我們留下來的到北京社會上去，到工廠去。

戚本禹同志答：與工農結合，大方向沒錯。

問：我們到工廠去了幾趟，看到真正工人的造反精神比我們好，現在文化大革命向縱深發展，我們邁開腳步到工廠去和工人相結合，瞭解社會。我們到工廠去寫大字報，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與工人談心，替工人抄大字報，和工人一塊勞動，搬到工廠去住。

我們是到光華木材廠的。工人同志紛紛要求我們去，那裡路很遠，我們準備搬到那裡去住。

戚本禹答：到工廠與工人一起住，不要打破他們的生產秩序。當然有的生產秩序也是要打破的，靠群眾去創，去打破，這樣就可以了。

張春橋答：搞工廠是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至於怎麼樣搞，你們去闖，去摸索經驗。

問：有人反對我們進工廠，例如：北京玉器廠，光華木材廠，紅旗戰鬥團也對我們提抗議。

張春橋：這是一件新鮮事物嘛！當然有人反對，（笑）反對你們進工廠的指導思想是怕你們打破了他們的生產秩序。如果你們注意了，把革命和生產的關係處理好了，他們就不反了。首先你們應該和工人接觸，現在不要到車間去，因為他們內部不統一，也談不了多少話。我以

前有幾次到工廠去，也是這樣，要等工人下了班再和他們談話，否則你們到這派師傅那裡去勞動，另一派可能全部停工，那就不好了。

問：我們想搞幾個點摸索經驗，是不是你們也深入配合我們搞點，總結經驗。

戚本禹、張春橋同志：好！好！好！還是靠你們去闖吧！找幾個工人談談心。²⁴

張春橋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團代表的講話（1966.11.13.）

【按：11月13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同志在上海文化廣場接見了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控告由安亭部分回來的同志，同意了工人們提出的五項革命要求。這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次重大勝利！工農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成立和這次勝利，標誌著上海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最最堅決地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動，最最熱烈地歡呼他們所取得的勝利！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上海工人階級學習！上海工人赴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動！最堅決地支持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動！革命師生和工農兵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同志們：

大家在這裡等了很久，剛才在這裡跟你們總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問題，現在說明一下頭一個問題：

1.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否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

²⁴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

我認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2. 11月4日的大會後，有人到北京去控訴，這是一個什麼性質？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講一點意見，以後在這種問題上，碰到這個問題，無論是工人和農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為集體去會影響生產。
3. 現在這個事情造成的後果，你們代表提出這個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我也同意這個意見，我聲明市委昨天已發了通知，你們回去後受到指責和刁難，工資照發，如果刁難你們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知道市委有這個通知，你們回去但不能保證不受圍攻，我覺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採取這個態度，問題就好解決了。
4. 要求曹荻秋同志公開向群眾作檢查，這個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到這裡來沒有懷疑，我不是把你們當壞人，如果你們都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問題，我希望有理講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檢查不行，還可以來第二次。
5. 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這一條我同意，我想提一點意見，就是咱們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那些組織，汽車、錄音機、照相機，我們盡可能少用一些，繼承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大會後我還要找工人同志瞭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遇到什麼問題，你們如何解決，如革命和生產的關係，曹荻秋同志檢查的時間，下一次會議的準備等，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為全國的模範。上海有二百萬工人，是有光榮傳統的，最熱愛毛主席，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上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一定能夠走在全國的前面，如同工業上一樣。

附件：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全體工人要求：

- (1) 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組織；
- (2) 承認「一一·九」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問題派代表——張春橋同志加的）
- (3) 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完全負責；
- (4) 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 (5) 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同意 張春橋（簽字）1966年11月13日²⁵

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的座談講話（1966.11.13.）

【編者按：11月13日下午1：00~4：30，張春橋同志在上海市文化廣場與上海「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和北京、上海大專院校一些學生座談。】

當工人代表談要去北京時，張春橋同志說：「你們到北京去，去控告，是革命的。但這麼多人，中央明確態度是不同意的，因為它影響生產。」

緊接著又有一位工人說：「你限制不了工人革命。」張講：「我怎麼去限制呢？你們認為發袖章合適，是可以的。這怎麼能認為我是要解散你們的組織呢？」

聽聽各種不同的意見，最後選擇一個辦法，中央正在開會，還沒有定下來。

在全國範圍內到處是這樣。十六條公佈了，就想有人會執行，有人會拿十六條壓制群眾。

²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印；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

馬上又有一位同學問起陳伯達同志這份電報。張講：這完全是陳伯達同志親自寫的，現在原稿還在這裡。

（接著張就把陳伯達同志的原稿從口袋裡拿出來，我接過來，一字一字從頭到尾看完，並且核對。伯達同志的電報是用鉛筆寫的，十六開紙，一共九頁。——董長華注。）

接著工人同志談了一陣，你一言我一語。後張講：學生應該走向社會，應該到工廠、農村中去。不這樣，文化大革命就沒法搞徹底。現在不去還只是一個暫時規定。搞文化大革命我們沒有經驗，世界也沒有經驗。學生會很快突破這個規定的。徒步串連最初是學生提出來的，大連……（張談大連同學步行來京情況，略）這種行動才能和工農群結合，學校才能搞好鬥批改，這個過程不會妨礙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會妨礙鬥批改。學生不能到工廠去，農村去，看樣子不行。現在去我們還沒有經驗。現在需要總結已有經驗。

文化革命不只是學校的事情，需要解決整個上層建築。工廠的上層建築、規章制度、管理方法，雖然58年有所突破，但還沒有完全解決。目前工廠還有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東西，個別工廠和單位還有封建主義的。這一切都需要徹底改。這主要靠工人，也要學生幫助。

這個文化大革命從6月1日算起，還不到半年，我們還需半年。我們要徹底搞，要很長時間，這是第一。第二，工人起來究竟怎麼搞？正在研究。靠群眾起來，根據各個不同單位的情況來進行。工廠和農村不同，沒有農閒，它是一環扣一環的，搞亂了，曲折太多。曲折是有的，階級鬥爭嘛！這會反復多次，革命力量起來，會壓下去，又會起來，按毛主席的路線，文化革命一定能搞好。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蘇聯不就是這樣嘛！生產大發展必須抓革命。人是最積極的因素，即使是最先進的生產也還要靠人。人是第一位的，不能說思想領先，生產就不重要了。抓革命促生產，這中間是不是會出現一時的混亂，肯定會有的。人的思想只能……（漏記）沒有什麼好辦法。亂，倒是亂了誰，亂了資產階級還是亂了無

產階級，只能亂了資產階級。大驚小怪沒有什麼必要，包括打人。這樣一個情況，支援革命，克服缺點。可以說，我來鎮壓你們的革命，我想都沒有想。我想來解決這個問題，來研究一下工廠文化大革命怎樣搞法。

我到北京，你們問我和我愛人怎麼樣？我給我愛人一封信也沒有寫過。上海情況我們確實不瞭解。我在北京要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規定，那些表態，那些不表態。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應該走在前面，應該成為全國的模範。上海有二百萬工人，到現在我也不改變我這個看法，也可能做到。

（開始座談只有十來個人，後來人多了，由於屋子小，這時又換了一間房間。）

這個地方同學多了，待會需要，我跟大家去談。

這些問題都需要我調查研究的。

剛才講到這次來是倉促的。那天正在連夜準備主席接見。

昨天晚上，我跟陳伯達講話，講話可能說重了些。當時只接到鐵道部電報。你們對電報有意見，完全可以提。陳伯達說：「可能有些話說重了。」杭州有一個廠全部停產，全部都是國外定貨。我們知道上海有一些工廠因為原料缺乏，也影響了生產。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受人家攻擊，其中有一條就是因為生產。攻陳伯達同志就有生產這一條。6月份下半月到4月份上半月，攻陳伯達同志主要一條就是生產。這一段生產確實有些下降，他們想以這一點整得你文化革命沒法開展。6月份生產又有所下降，中央文革又遭到攻擊。與其說我們關心生產，不如說我們關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想起58年，現在還是高興的。60年連續遭到自然災害，加上蘇修破壞，生產有所下降。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最主要地希望我們生產搞壞。我們不知道你們知道和懂得不，他們不敢攻主席，他們整陳伯達，正是為了整垮文化大革命，陳伯達同志正是為了這一點打了這封電報。我跟陳伯達同志工作這段時間，我感到他真是一個最熱忱支持文化革命的一個同志，我們聽到一些地方學生、工人遭到圍攻、鎮壓，陳伯達同

志難過得很。有些事情我們不好說，中央有個規定，有些地方不讓我們說話，要考驗他們。批評他們，幫了他的忙。平常我們不只是說一小撮嗎？大量的還不能判斷，有些聰明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就滑過去了。有些時候，我們不要講話。中央文革相當於中央常委的秘書處。只對主席、林彪負責，只負責調查，只對中央常委提供意見，從來不發號施令。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

從昨天一天瞭解的情況，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軍隊是另一種搞法。成立工人紅色造反組織的只有兩個地方，北京和上海。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應該創造好經驗。我到這兒來，希望同志們和我交換意見，我願意和工人、農民談，跟學生談。現在我腦子還是空的。中央文革小組這項工作抓晚了。中央要我們提出建議的時候，我們拿不出完整的意見，但中央對於這個問題的方針是明確的，放手發動群眾，學生能自己解放自己，工人為什麼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呢！

工人同志要開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革命的。

（一工人同志問：工人起來了，怎麼辦？）張講：應該支持。北京已經成立了。這樣的形式好不好，我們不好說。困難在那裡呢？中央正在研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也可以發圖章。如果我不承認你們是一個革命組織，我就不跟你們來談話。

11月9日的會你們要求組織召開，我支援你們革命的行動。工人要求組織起來，當然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至於什麼樣的形式，還在研究。

你們要到北京去控訴上海市委，這種行為當然是革命的，但是這麼多人去北京值得研究，派代表去，以免影響生產。

你們不瞭解，我們天天是受壓的，他們攻擊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在攻擊主席，因為它是為主席服務的。

什麼叫左派呢？就是因為有右派，才有左派。沒有壓迫就沒有革命了。不要怕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跟北航紅旗熟了，說話就直接了，有缺點就直接批評他們。是那一天他們去衝國防部了，我找韓愛晶來，我問他國防部長是誰呀？噢！

那我趕緊撤。我說先撤後談。扯得太遠了，這個不談了。

張春橋接見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全體戰士時的講話 (1966.11.15.)

非常感謝同志們對我的信任，到處找我。但希望這種方式今後不要推廣。我高興又不高興，高興的是與你們見面，不高興的是這樣做影響我的工作。我回來是因為上海部分工人到北京請願步行到安亭，影響了交通生產。為此我匆匆忙忙趕回，但是具體情況還不太瞭解，問題亦沒解決完。這次回來匆忙之際本想把這個問題解決後，再與同學見面談談，你們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興與你們見面。我總想回來的，對上海的文化革命我們關心。從同學來信和與到北京申聯的同學談話中知道一些情況，但不詳細。

首先嘛，要談一談陳琳瑚（原工作組長）的問題。剛才同學與我談了一下情況，當時討論的焦點是陳琳瑚去檢查。這個原則無問題，中央早已作了決定，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無論什麼人叫，什麼派要他檢討，即使很少的人叫他都要去。如果一派要，就向一派人作檢查，那派不需要檢查，那就不要聽。現在聽起來「紅旗」（同濟保守派）也想讓他作檢討。我這次來是和大家見一次面。另外還有一部分工人在等我。你們把材料另外送給我，我看了再發表意見。你們原來是少數派，你們要注意他們那邊過去可能保得很厲害。你們說他們說過工作組執行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下子轉過來不那麼容易，現在突然轉過來，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恐怕還要具體分析。同學中問題，他們可能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較深，應按《紅旗》十四期社論關於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影響者處理，只要他們認識覺悟過來就行，要團結一致。同學一般是不檢討的，但是如果個別人執行堅決，行為惡劣的，我個人意見也可以檢查一下，因為太堅決了。但我們始終認為要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

人」的態度，原則上不能調和，思想上要劃清，開展辯論我贊成。青年人嘛，思想是易變的。團結和批評是統一的。我們自己不會犯錯誤嗎？也會的。

工作組檢查，完全可以，要求他首先到東方紅兵團（造反派）檢查，也可以，因為你們要求積極。要陳琳瑚到學校住，原則上同意。

同學之間的問題完全可以解決，不要為這些問題爭執不下，不要在同學間對立起來。毛主席曾經講過不要忙於派工作組。對工作組問題大家都有一個認識過程，我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過去無論搞土改，四清，什麼都有一種習慣，要派工作組；還有解放軍是戰鬥隊亦是工作隊，這已成為一個習慣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組本身不是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工作組是一種形式，土改派工作組就不是路線錯誤，四清也不是。問題是派工作組去幹什麼？是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一個提出工作組問題，又考慮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是陳伯達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個工作組（《人民日報》），但它執行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是大家公認的馬列主義的工作組。因此不能那樣談，要具體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線的影響。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沒有派工作組嗎？那裡鎮壓學生運動的情況也夠噲！不能看形式，要看他執行的什麼路線。不相信群眾，不派工作組還是有犯錯誤的，這和執行路線的人有關。

關於材料問題，中央軍委已作指示，最近還可能發一補充指示，今天我就不講了。

（念條子：為什麼我們少數派找陳琳瑚不容易，而他們紅旗兵團一個電話就把他請來了。）

這說明他們聯繫沒有中斷，因此很容易。同志們要知道，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黨歷史上，從來未像這次這樣廣泛開展群眾運動，例如對陳獨秀、李立三、王明路線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大規模的在黨內外的進行批判。我希望你們在批判錯誤路線中學習好毛主席著作，真正用毛澤東思想批判，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是必須的。你們要學習毛主席關於黨

內路線鬥爭的著作，學會這一條很不容易。要知道，只要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只要有階級鬥爭就必定會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就不會停止，不會熄滅的」。就是沒有階級，也會有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在兩條路線鬥爭中要學會主席思想。你們將來成了當權派後能否像主席那樣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呢？

同志們一定要好好抓緊活材料（同濟具體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多學毛主席著作，不能只看眼前的事，還要好好對照毛主席著作學習。

今天還有同志等著我，我看是不是談這些，以後有問題再說。

同志們，你們知道我平時對這些問題的態度，但我對「紅旗」一點也不瞭解，我必須聽聽他們的意見，一點也不聽他們的意見這怎麼行呢？我不搞折衷主義，我是傾向於你們這一邊的。²⁶

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1966.11.16.）

【錄音記錄於蘇州鐵路中學】

同志們，我們又見面了，這次見面，你們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變化，當然我這方面的變化不小，我下面再講。我接受任務，由韓哲一同志講到他是在怎樣一個匆忙之下，講了放行的話。這的確是谷牧同志作出的決定。後來中央知道這個決定，認為是不對的，怎能作出這樣的決定呢？因為，那幾天，同志們都知道毛主席連續檢閱接見，頭一天六十萬，第二天一百七十萬，中央的同志就是為這二百萬革命師生的接見日日夜夜忙著，別的事情一點也沒幹，總理忙得幾天都沒有睡，所以，有的事情處理比較倉促，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這個部門和那個部門，

²⁶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

這個人和那個人都沒有接頭，倉促之間出了這樣的錯誤，在那樣的情況下決定派我來的，給我的任務也是非常倉促，拿我個人來說，我也沒有來得及打個電話問問上海到底是怎麼回事。伯達同志在那裡寫信，寫了一夜，信確實是他自己寫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電話，問飛機怎麼樣，因為飛機要臨時調，班機沒有。這樣忙著出發，非常倉促，到了上海機場，也沒有來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們，這幾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對我提出的批評，說我在安亭講話不妥當，這個批評我是接受的，因為，我的精神準備沒有這樣的複雜，我是個共產黨員，給了我任務馬上要出發，可是，出發不是那麼從容，不是那麼從容地調查過，當時，同志們要知道為什麼陳伯達寫了那麼一封信，講了那麼一番道理，現在說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義的，這些話我統統在電話中告訴了伯達同志，那時陳伯達同志匆匆忙忙寫這封信是在什麼客觀環境下呢？我不是講客觀原因，而是要說明一下。

從8月18日毛主席接見革命師生以來，鐵路運輸很緊張，而且一天比一天緊張，過去我認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過去，現在天安門廣場就像星期天的南京路，隨時開五十萬人的大會，這要安裝個喇叭就有這麼多人。過去來北京的最高每天達十萬人，到後來每天達二十萬人，有一天達二十六萬，火車載重到什麼程度呢？車廂底下的彈簧有要斷的危險，車廂廁所住了六七個人。中學本來是百分之十的，實際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車子停了，貨也運不出去。這樣的情況，就變成了好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歡迎革命師生大串聯的人攻擊文化大革命的藉口。他們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聯，最好學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緊張了，這是普遍的，對我們的壓力很重，我們是支持革命大串連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國各地，可是，我就抓住這個交通問題又來了，很糟糕呀，對中央文革小組講，你看看，那攻擊不知道有多少。這問題，不單單從生產看，還是從整個文化大革命形勢來看，都是個焦點，好多道理，社論上反駁了，你們看就是這個交通問題從來沒有寫過社論，這問題是難說的，我們就是

這種心情，很焦慮，伯達同志當時更焦急，我就帶著這種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們的感情相差十萬八千里，你們的遭遇，你們碰到的問題，聽說以後，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韓哲一同志差不多，對問題沒有估計那麼複雜，當時文革小組只有我一個人，獨立地一個人作出正確判斷，這是困難的。所以我不是嗎？當然，我反復想了同志們提出的意見，慢慢懂了，這個電報講得不完全對題，不適合情況，因為那時滿腦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不清楚，這方面寫電報時確實沒有多想，文革小組對這方面情況是沒有來得及問。對文化革命來講，當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組對工廠生產問題是不管的，我們只是到時間問一下生產怎麼樣，因為唯恐我們自己工作有毛病，生產受影響，人家要攻擊。我那天講過這話，同志們應該記得。

階級鬥爭一個方面之一看生產有成績還是失敗。如果生產品質下降了，那麼罵娘的就多了，他不僅罵你一個工廠，他要說：「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轟轟烈烈大躍進，那是一場大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後帶來文化革命，這樣好的形勢到60年後就下去了，就是因為自然災害、蘇修破壞，再加上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同志們應該記得，60年到64年，資產階級攻擊，三面紅旗多厲害，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包括那麼許多無恥的反動言論，什麼「蔣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飯」那些話，同志們難道現在都忘了？這個我是永遠忘不了的，後來，同志們，你們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們經濟上困難，來攻擊我們的革命，要資產階級復辟，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工廠裡原來大躍進裡破壞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復了，不該恢復的，也恢復了。當時就是這樣，所以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黨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文化革命小組在這方面為中央作參謀，也經常觀察這個問題。

同志們提出對伯達同志的批評，我剛才講我已經告訴他了，在電話裡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心裡不安。他要我有機會的話告訴同志們，這封信寫得太倉促了，伯達同志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個很虛心的同

志。他說：「怎麼辦呢？想什麼辦法來彌補呢？」我講：現在已經造成了這樣結果，請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倉促，不要再弄一個倉促的事情了，伯達同志又說：「是不是寫第三封信。」我說：你如果要寫的話我贊成，再寫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觀點，可以考慮一下，不要馬上寫，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索性把工廠文化革命問題能不能說得完全一些。因為他現在正忙於調查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中央呢，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對伯達同志的批評已轉告了，今天我又聽到了一些意見，我還要繼續轉告，我相信同志們會相信他，他一定能夠採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響能夠糾正，我從安亭回去後，那一天沒有來得及，因為回上海深夜了，也沒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廣場等我，我本來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瞭解情況。結果沒有來得及趕到文化廣場，到了文化廣場和那裡的同志交換了意見，繼續瞭解情況。到最後在那裡達成了五點協定，同志們可以瞭解，從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態，我一直沒有表示，這是不是革命行動？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到文化廣場我明確地表示我的意見，這對我應該是一個進步吧。對這個問題認識比在安亭大進了一步。我也看到問題關鍵在什麼地方，本質在什麼地方，這次我可以下判斷了。這樣就是說用了二十四小時，我這個決心下得還很不慢吧。而且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文化廣場回到我住處，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把同志們剛才對我，對陳伯達同志的批評告訴了他，他聽了這樣的話心裡很不安，並且也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了他。

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組織，你們的行動作出了判斷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這樣，我在這個過程裡，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和陳伯達同志在最後就這個問題認識是有個過程的。那末，現在應該以最後為標準，最後那就是判斷你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你們的組織是

革命的組織，對這樣一個組織，應該加以支援，那我們前一階段時期的錯誤現在就改過來了。我們共產黨人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不可能隨時都判斷那麼準確，處理那麼正確，問題就是在於在最後作出比較正確，比較科學的判斷，所以有些剛才對我說，懷疑陳伯達同志，我就想作些說明。我剛才說，我從出發到今天，經過一個長時期，我們彼此更瞭解了，我們處理的過程中，工人同志的講話，發言給了我很深的教育，同志們講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達了上海工人階級那種熱烈的熱愛毛主席，熱愛黨中央，對革命事業那種無限忠誠，你們這樣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感染了我，我想這一段時間內，時間雖然不長。但對你們每個人來說，也許能成為終身難忘的事情，對我來說，也會成為我永遠忘記不了的事情，因為我們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認識的，不是在一個平平靜靜的環境裡認識的。

我們第一次是在安亭見面的，第二次見面跑到蘇州來了。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我們彼此談論革命，談論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談論如何把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很多同志說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所以，我現在的心情，和剛來的時候不同了，我現在主要是想什麼呢？現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後，趕快召開座談會，來談一談你們廠裡的階級鬥爭情況，你們感覺到文化革命要解決什麼問題，你們覺得怎麼解決，這一方面請同志們想一想，就是你們廠裡的階級鬥爭是些什麼問題，是怎麼樣的問題，怎樣的情況。工廠與學校不同，與農村不同，這些問題應該怎麼解決，你們有些什麼想法，我現在想知道這方面的意見，能夠及快地把你們這一方面的呼聲、願望、要求，盡力報告中央文革小組，報告中央，因為中央正在討論這個問題。同志們也知道，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使得人們思想革命化，然後推動我們整個經濟建設向前發展，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那麼，我們的生產可能大發展，但是，我們的國家就是改變顏色，我們工廠可以建設起來，在建設的時候是社會主義工廠，但是建設成了，他就變成了修正主義工廠，特別，我們上海的工廠，原來很多是帝國主義辦的、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辦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

義還有封建主義壓迫並沒有完全消除，在所有制方面是解決了，但是在制度方面各種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制度還有影響，從蘇聯學來的一套東西使我們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壓制，工人階級的創造性不能發揮，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就是要按毛澤東思想辦工廠，把工廠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要辦成社會主義的工廠企業是要經過鬥爭，經過文化革命，加以徹底改造，如果我們工人階級不進一步革命化，不把那些阻礙工人實現革命化的障礙，阻礙工人生產積極性，阻礙發揮工人階級創造性的東西，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甚至封建主義的，對這些東西徹底破除，不把毛澤東思想在工廠企業紮下根來，那我們的工廠企業搞不好，生產搞不好、但性質也變了，從社會主義變成修正主義了，所以，應該是抓革命促生產，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確的地位，政治是統帥，思想要領先，不是不革命抓生產，也不是停革命抓生產，更不是壓革命抓生產，當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產，這二個東西一定抓，在這裡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二個字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抓生產促生產，那就不行了，只能是抓革命促生產，當然也不能把生產搞壞了，在革命的過程中，促生產受某些影響是可能的，但是，要竭力避免的，我想每一個工人都是熱愛生產、熱愛勞動的，不愛生產不愛勞動這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是四舊，那是要破的，我很高興，和同志們接觸中間，看到同志們革命積極性是很高的，你們的革命熱情非常高，我想你們可能成為上海工廠企業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躍的分子，成為骨幹，成為帶頭人，我和一些同志接觸，從你們的談話和發言中，我有這麼個感覺，經過這幾天我們彼此更瞭解了，我覺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廠企業中同樣好，同志們，你們肩上責任更重了。

要真正把革命擔子挑起來，使我們的生產事業得到發展，使我們上海二百萬工人階級更加革命化，在革命鬥爭中學會革命，學會管理工廠，學會管理企業，想出各種辦法，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工廠不會改變顏色，這個重大擔子就落到你們造反司令部身上，也落在你們每個成員身上，而且從這裡開始，幫助更多人，使他們更好處理這個問題，把上海二百萬工人階級都發動起來，使上海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作

出更好的貢獻，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應該成為全國的模範，成為全國的榜樣，因為這裡工人數量最多，最集中，歷史最久，像這樣的城市很少，只有幾個，老工人比較多，因此上海工人階級擔負著責任特別重大，革命責任重大，生產責任重大，經過這幾天的接觸，我這方面的信心越來越強了，對你們的感情越來越深，我們更加相信了。同志們能夠這樣的擔子，我也就把這樣的情況報送中央文革小組，報告中央，我想關於一般問題就是這些。

現在我談談幾個具體要求：

- 1.承認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組織，從11月9日以來，特別是赴京控訴上海市委貫徹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行動是革命的，並立即頒發帶有總部公章的袖章。這是第一條，一句話，你們的行動是革命的，你們的組織也是革命的，這個我在文化廣場和你們總部的同志已經談過，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現在我再重複一遍，同意第一條，不過在後面還要說一下今後再碰到類似的問題，中央建議派代表的方法，避免佔用過多的時間過多的人力，派代表方法比較靈便，阻力較小，對於革命，對國家，對群眾，對個人都比較方便。
- 2.絕對保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員的政治人身安全、經濟保證。這一條上海市委已發出通知，不准給你們扣帽子，故意刁難，你們回去後，應該受到歡迎，在這時期工資照發，這個問題應該，這樣我完全同意。
- 3.要曹荻秋同志檢查，並且把我們領回上海，並用公用大轎車送回家。曹荻秋同志不是來檢查了嗎？當然這個檢查是初步的，將來還會要繼續檢查，他來了和大家見了面，這一條已經實現了，至於送回家去，這也不成問題，你們提出先集中一下再分開，這些細節問題就不修改了，我就同意這一點。
- 4.要開動除了廣播和報紙以外的一切宣傳工具，對前一段的謠言進行闢謠。再不許出現惡劣攻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謠言，否則，概列於非法。這個謠言是應該辟的，這一條可以同意。不

過我覺得，同志們應該有這種精神準備，幹革命那有不受攻擊的，沒有攻擊那還稱什麼革命呢？你要幹革命就一定有人攻擊，你說他是非法的，咱就把這寫上是非法的，甚至說要抓起來。只要是革命的組織越是革命，越是正確人家就越要攻擊你，如果你是那麼正確，他反駁不倒你，他擺事實講道理講不過你，於是他就造謠，對一個組織是這樣，對一個人也是這樣。當前全世界共產黨，受攻擊，聽到謠言最多的是中國共產黨，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革命、光榮的。我們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在人家的攻擊、造謠中，一直到現在還是受到攻擊、造謠，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內外反動派都攻擊他，主席不是講過嗎？被敵人攻擊的是好事不是壞事；這句話就是主席從他親身體會中得來的，我們的心胸應該放寬一些，你講你的，我幹我的。因為，有辟不勝辟的謠言，有些無頭案還不知從那裡刮了出來，你沒有辦法闢謠。你看攻擊中國共產黨這麼多謠言，中央從來沒辟過謠，毛主席的闢謠，《人民日報》總要登吧，你看見什麼時候毛主席辟過謠。就這些事情要看得開就沒有什麼了不起，當然如果十分需要澄清的事，那也可以。我是同意寫這麼一條的，但又有一個建議：不在乎。

5. 對上次上北京控訴上海市委貫徹執行一條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所造成的一切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這一條那天我完全同意過的，今天我還是同意。

同志們，你們提出的五條剛才我同韓哲一、曹荻秋交換了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而且我還希望同志們除了這幾點以外還可以提，因為，你們還要幹革命，就這麼五條我覺得太少了，咱們這裡有五百幾十個人，我在這裡也是一條，我希望你們每人給我提出一條，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有什麼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幾十條，那我的收穫就太大了。如果每人寫上十條，文化革命要注意什麼，有些什麼問題，應該怎樣解決，這樣就可得到許多條，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決，有的可以當作研究的資料，留作中央考慮問題的材料，你們共同要求的東西可以把它集中起

來，並且希望你們把與你們不同的意見也寫給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車間裡，工段裡，生產小組裡對文化革命有各種不同意見，都告訴我，那就更好。那我就不但滿足了你們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幾千條意見，那我非常感謝同志們了。我再說一遍，非常感謝同志們這幾天對我的教育，對我的幫助，還希望同志們今後對我繼續進行說明，如果有錯誤，你們隨時可以向我提出來，不管我在上海期間，還是在北京期間，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國共產黨員，我隨時準備聽同志們的批評，接受同志們的意見。我講就講到這一些。同志們你們都很辛苦了，要把身體搞好，因為我們搞革命搞生產都需要把身體搞好。同志們，我就講這些，沒有了。²⁷

張春橋接見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團的講話（1966.11.21.）

【時間：1966年11月21日，地點：上海紅都劇場。】

在長時期熱烈鼓掌、口號聲中工人造反隊代表給張春橋戴袖章。

張春橋講話

同志們：（台下叫：曹荻秋靠邊），我首先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到會的全體同志表示親切慰問。（鼓掌）向全體同志致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高呼口號）

中央從知道同志們乘車北上，那就非常關心這個事情，立刻決定派我到上海來和同志們見面，幫助同志們解決問題，我到上海以後，算一

²⁷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12）。

下時間，我是11號離開北京的，到現在十天了，時間過得很快，在這十天中間，同志們：你們走得最遠到了南京，到了六河，那麼這樣我就非常不安，北京給我打電話，也是問，說南京的同志回來沒有，這中間，中央文革小組還曾經直接打電話到南京，請江蘇省委轉告你們，說我已經到了上海，這個你們大家已經知道了，中央對這件事情極關心的。

對同志們的行動，剛剛，我們開始的時候，我們雖不知道前因後果，很倉促，因為只知道交通受影響，而那個時候，全國的交通，同志們都知道，現在是很緊張的，因為有大批的革命師生要求到中央去見主席，現在北京據我昨天聽說，已經住滿了，現在連中南海也要準備讓出來讓革命師生住了，因為實在是到處都住滿了人，估計就是截止到廿日為止，大家不再上北京串聯，在這幾天裡，北京可能有三百萬人在裡面，交通的壓力非常之大，這三百萬人到了北京，再把三百萬人疏散出來那要占很多的火車，而工人同志們特別容易理解，我們上海的各種工業器材，煤呀，鐵呀，都是要從外地運進來的，交通如果受到影響，那我們的生產，原料運不進來，產品運不出去，那樣地情況就會影響很大了，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心情，伯達同志寫了這樣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比較倉促，考慮得不是很周到，我到了安亭以後，到了上海以後，和工人同志們交換了意見，聽取了你們各式各樣的意見以後，就感到了這電報是有缺點的，預先我們的情況調查得不完全，不知道甚至於這基本的情況還沒有完全瞭解清楚，這樣寫一個電報，倉促了。

伯達同志表示非常不安，他要我向同志們表示他的不安，同時他說，我們總要想辦法來彌補這一缺點，所以這個問題，剛剛有的同志說了，說：「有的人利用這個電報炮打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挨幾炮這也沒什麼，我們挨的炮很多，那各式各樣炮都有，我們也沒什麼，因為你要革命，還能不挨幾炮嗎？當然囉這裡邊有的（鼓掌）現在伯達同志的電報，一方面有人想利用這個電報來攻擊陳伯達同志，這個剛才你們的代表和學生代表好幾位同志都談到了，我們完全贊成你們這樣的意見，就是要維護伯達同志，這個不是因為我的上級，我要保他的皇，而是因為他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人之一，我們應該為了保衛中央，

保衛正確路線，就不應該在他臉上擦黑。但另一方面，有人利用這個電報，來壓群眾，那是不允許的（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這話應當說到二方面，第一方面，同志們，你們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有任何意見都可以提，很歡迎，包括我在上海的工作，有缺點，也有錯誤，你們隨時都可以批評，很歡迎你們對我們的批評，歡迎你們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評，另外一方面，有那麼一些人來自另一方面的批評，那就不叫批評了，那一種（原稿不清），可是我們決不允許用伯達同志的信，（原稿不清）錯誤的，因為陳伯達同志沒有這個意思要壓你們。（鼓掌，高呼：炮轟上海市委！火燒曹荻秋！氣死老保！）

同志們，那麼你們到北京去，是一個革命行動，你們這一次回來，也是為了革命。從這樣一來一回，同志們雖然受了辛苦，有很多同志病了，有的同志沒有吃好飯，挨了凍，饑寒交迫。可是這樣十天裡邊，證明瞭什麼呢？證明瞭上海工人階級對毛主席，對黨中央是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的。（鼓掌）我們就應該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我們上海工廠裡邊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因為同志們都向我講，你們要到北京去這不是你們的目的，你們的目的是要控告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派我來，要我聽取你們的意見，我一定忠實地把你們的意見向黨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彙報，（鼓掌、呼口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正像很多同志都知道的：上海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工業基地，我們上海的革命搞得好，對全國都有偉大的推進作用，我們上海的生產搞得好，對全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有偉大的貢獻，也有重要的作用。反過來，如果我們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話，那麼對全國也會起很不好的影響，如果我們的生產搞不好，那麼對全國也同樣會起不好的影響。因此，上海工人階級擔負的責任在全國工人階級中間肩上所擔負的責任特別重大，我們確實挑著兩副擔子，不是一個輕擔子，而是兩副重擔子。但是，過去中央從來是相信上海工人階級能夠挑這兩個擔子的，現在、將來都會相信同志們能夠把這兩副擔子挑起來！（熱烈，長時期鼓掌）

當然，不是沒有困難，阻力是很大的，因為要革命，有阻力，要搞好生產，有困難，這個是我們意料之中的事情，不是什麼意料之外的事

情。我不知道同志們怎麼樣，我原來，拿我個人來說，我也知道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會有困難的，而且困難是很大的。但是，我的精神準備很不夠，我沒有想到困難是這樣大，阻力是這樣大，原來沒想到，那就是毛主席常說的，我們幾乎每前進一步，我們都要經過戰鬥，如果不經過艱苦的鬥爭，勝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那末現在，我們工廠裡的文化大革命，就全國來說也好，就上海來說，僅僅是一個開頭，這個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非常大的，是一個徹底的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的。別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搞，他們，就是蘇聯，搞了這麼幾十年，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了，但是五十周年，列寧時代沒有完成革命，列寧活的時間比較早地就去逝了。那麼後來，斯大林同志領導，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就使得將來，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資產階級思想，就剛才在語錄裡所講的，在意識形態這個領域裡面，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那末當資產階級占了優勢，占了上風以後，修正主義就要復辟了，資本主義就要上臺了，修正主義占了統治地位，蘇聯工人階級長期鬥爭的勝利果實要被資產階級重新奪過去了，我們一定要牢記這個經驗教訓，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重複。我們一定要使得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之下，把我們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搞得徹底，搞得越徹底越好。

但是這一個革命會是相當長的時間，最近在中央討論的時候，毛主席也曾經講過，說我們現在如果從去年11月份算起的話，到現在不過整是一年，在一年裡，前六、七個月，就是從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底，這個呢，只能是輿論準備階段，就是大家發動群眾，思想要有準備。從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這中間的鬥爭也是很激烈的，但是還算輿論準備階級。從6月1日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那麼從6月1日到現在也只是五個多月，還不到六個月，從6月1日算起的話，所以這個，這樣下去要多久呢？那時間很長，一直要到資本主義思想在我們社會裡完全肅清，把私有制肅清以外，還要把人頭腦裡的私有觀念，用公字，用共產主義的思想來代替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這個鬥爭是會很長的，因為它不只是一個敵我矛盾，還有

大量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這鬥爭，要解決起來就會有一個波浪、一個浪潮的進行起來非常的久，恐怕不是一個戰役，二個戰役能解決的，而且中間會有大的戰役，小的戰役，有各種各樣的鬥爭形式，所以我們工人同志，要準備打比較長的仗，要這樣重新組織我們的隊伍，重新教育人，把我們，從領導機關，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領導機關，按照毛澤東思想，來重新檢查，重新檢驗，看哪一些是緊跟著毛主席的，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哪一些不是，哪一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還要看哪一些願意改，還有些不改，有的人犯了錯誤他願意改，我們就歡迎。如果他改得徹底，我們就更歡迎。他有一部分改，我們就歡迎他這一部分，那麼當然，如果要是一直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個性質了，這是毛主席最近也一再強調的，就是要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別人改正錯誤。因為鬧革命，總會犯錯誤的，我到上海來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裡邊，我也會有這樣的錯誤，那樣的錯誤，有些話也可能說錯了，有些事情也可能做錯了，那我有一條，我反正，只要你們提出來，我的思想通了我就改，如果不改呢，那我也可能要變的，那就要變壞了，這只要是改麼，那我們要歡迎，這是對幹部。

對群眾中間的問題麼，我也希望同志們注意這一點，你們剛才喊的口號裡邊，有一個口號我也跟著喊了，我也舉了手了，就是「打倒保皇派」這個口號，但是，這個口號，我應該對同志們說，中央是不同意的，因為這個口號是容易傷群眾，因為這個口號是容易傷群眾，因為什麼呢？現在被稱為保皇派的，不是那個當權的人，而是二派工人之間。

我最近，我也應該向你們彙報一下我的工作，我一方面從安亭回來了，回來以後做了些安排，和總部同志談了話，交換了意見，隨後訂了五條，後來到蘇州，又訂了五條。然後呢，那就一方面通過北京給你們打電話，希望你們快點回來，一方面在這裡繼續做工作，也和一些和你們工人同志經常往來的同學談了話，聽他們的意見，也聽工人的意見，我還開過一天的會，這和什麼人開會呢，就是即強烈的反對我答應你們五條這一批工人開會，他們說我犯了錯誤，說我違反了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叫我。幾十個廠子，上千個人，現在還陸陸續續不斷地有很多工人

到這兒來見我，要求我談話，前天我談了一天。我和這一些工人同志接觸中間，我也就深深地感覺到，就是毛主席經常講的，我們要相信群眾，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是好的，那麼那些人，他們反對你們的行動，舉了種種的理由，反對我答應五條，仔細聽下來，同志們會知道，他們完全出於對黨中央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他們並不反對黨中央，並不反對毛主席，他們也並不擁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也擁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但是，他們對這些問題，一時就搞不通。

從早晨9點談起，一直到下午5點，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大多數同志說是被我說服了，說可以同意我的觀點。但同意也有各種各樣的同意方法，同意也不完全是一個樣子。還有一部分同志表示繼續表示懷疑，同意一部分，但還有作問題懷疑。還有一部分同志，一直到散會的時候，還有說，我堅決反對。我也注意了這些同志，這些同志都是一些好同志並不是壞人。所以，同志們，我把這些情況跟你們介紹一下，就是我還繼續做他們的工作，我也有責任向他們做工作，正如我有責任向你們做工作一樣，我也希望同志們，你們能在這一方面支持我，就是你們回到廠裡邊，對於工人同志要採取毛主席的方針，團結——批評——團結。工人之間的問題，只能按這個方針解決，只能是團結——批評——團結，不能用別的方法，這樣，一方面他們不應該給你們扣帽子，說你們是什麼、什麼，那是錯誤的。同時，我也希望同志們，他們也不給人家扣帽子，現在北京，我們已經經過幾個月工作，「保皇派」這個名稱基本上不用了，街上的標語，沒什麼「保皇派」了，會場裡喚口號也沒有這個口號了，只是偶爾有時個別談話，說慣了順口說一句麼，這個東西我看也不能過多地責備，因為這口號主要是不利於工人內部的團結。同志們，你們現在是少數派，少數派，革命運動最初總是少數，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少數派，滿足於少數派就不好了，我們如果光是一直是少數派，少數派光榮，那又怎麼革命啊！

革命是要靠廣大群眾，毛主席的偉大地方就是他不只團結了一批最革命的人，而且是他團結了那些願意革命的，甚至犯過嚴重錯誤，但是願意改正錯誤的人。如果毛主席不採取這個方針，那我們黨就不會是今天，

就不可能把全黨團結起來。同志們，要知道，在我們黨中央裡邊，過去有很多人都是反對過毛主席的，但是只要他們表示願意改正錯誤，毛主席都是和他們團結。比如很有名的人物——王明麼，王明路線的代表人物麼，那個反對毛主席還不是反對最厲害囉，但是不但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他做中央委員，但是第八次代表大會，八大還是選他做中央委員，我們八大的代表都思想不通，說：「這個傢伙還選他！」毛主席親自出來在會上講話，說同志們應該選他，選他有好處，這樣可以團結多數，毛主席的這一個思想，已經寫在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裡邊，你們還記得嗎？五個條件裡的一條是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反對你，而且證明他是錯誤的人，不曉得你們注意了沒有。如果反對你，他是正確的，他反對你，當然應該團結囉，問題有呢，他反對你，而後來證明他是錯誤的，還要跟他團結這是同志們，主席是當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我這個話一點不假，我身邊沒帶，你們自己去查，上有沒有這個話？（工人：有！鼓掌）

我的意思是說，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你們這個隊伍如果想過，搞一浩浩蕩蕩革命隊伍的話，就應該好好學習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你們如果不學習這個，或者口頭上學習了，不執行，那你們就一直叫做少數派，而光是有一個少數，革命是搞不成，一定要使自己從少數逐漸變成多數，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才能夠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打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鼓掌）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熟了，而且你們給我戴了袖章，我想，我說話就坦率一點，我這個話你們鼓掌，我就很高興。現在我戴袖章，我應該申明一句，因為有的同志跟我提，說作你們的政治委員，我覺得我應該申明，你們給我戴袖章，我很光榮，但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每一個約定，就是不擔任群眾組織的職務，因為如果答應，那麼所有的組織都會要我們答應擔任職務，我們也不能說：「我只支持一派」，因為我們要對各派都做工作，我們是希望能夠通過文化大革命把我們工人階級，把我們勞動人民的隊伍，徹底地按照毛澤東思想，重新教育、組織，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間最強大的力量，而且成為世界革命的一

個堅強的、戰無不勝的堅強的部隊。（鼓掌）

因為同志們很辛苦，我想我今天不準備多講了，咱們以後還有機會，我想同志們這二天是不是可以，有的身體好，當然就可以回廠工作了，如果有的有病，還需要治療一下，有的同志還要休息一下，你們都回來了，我現在心裡就安下了，我就可以和你們總部，你們大隊部，我們一塊好好地商量一下，把工作安排一下，這兒還有些條子，都是給我們提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中央正在那裡研究，在起草文件，準備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我今天在這裡不想講了。因為到底怎麼定，這問題要中央才能決定，我在這裡，而且今天不是這樣一個討論工作的會，我是歡迎同志們我們大家來見面的，這些問題，我想我們都要專門開些座談會，聽同志們意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也是讓我在這裡多聽一些工人同志對工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這些意見，我一定負責彙報中央然後中央加以規定。這樣，我們中央再有一個補充意見十六條，因為十六條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綱領，那些原則都適用於工廠，但是工廠畢竟有工廠具體的問題，完全用在裡面，有些具體問題它沒有，所以中央同志準備寫一個文件，等你們回來，我和總部的同志就可以安排一些工作，然後我們可以安排一些座談會，這些問題，我想今天就不答覆了，而且因為這幾天，幾乎到了上海以後，就是不斷的談話，談話，談話，你們聽，我的嗓子已經啞了，一直很痛，所以我想今天就不講了，我們還有機會再見面，祝同志們身體好！（長時期熱烈鼓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志們，再見！

（以上是錄音記錄）²⁸

²⁸ 《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12）。

張春橋接見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時的講話 (1966.11.22.)

【按：原稿是同學問，張春橋同志答，這裡簡為「問」、「答」】

問：上海市委不支援我們，不給提供方便，不給會場，市委同志不肯出席我們的會議。

答：我可以傳達給市委。革命的新生力量生命力是強的，不會夭折，不必悲觀。（大笑）

問：請張春橋同志談談對上海文化革命形勢的看法。

答：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研究形勢，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集中在黨中央。

問：上海市委是否完全貫徹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這樣的問題我怎麼能談呢！我是來甘當小學生的，要先聽你們的。

問：外面現在有大字報，抄的是林彪同志《論左派》的文章，有這麼回事嗎？

答：林彪同志從來沒有寫過《論左派》。

問：聶元梓同志那張大字報（指《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嗎？

答：……那張大字報我不清楚，你們去問聶元梓，她在上海。（另一同學插話：昨天我們問了，是她寫的。）

問：我們整天忙著找會場，市委不支持我們，希望能給我們一個固定的會場。

答：我是主張刻苦些。所有的領導機關在對紅衛兵組織的物質待遇上要完全一樣。另一方面，所有的同學要艱苦些，搞革命就要艱苦些。那些是北京第一司令部搞出來的，它成立時，解放軍那時是很熱心的，支持摩托車。後來楊成武同志承認了錯誤，把車收回去了。物質上一律

平等，政治上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北京第三司令部在成立大會時，給我們的請帖都是普通紙用手寫的。我們感到這種精神很可貴。同志們這有深遠的意義呀！我們要準備過艱苦的生活，還要準備打仗，打起仗來哪有什麼錄音機、汽車！在北京城我們是到處這樣講的。

問：可是市委就是不平等待人。

答：不平等待人可以批評他。

問：沒有（另一同學插話說：搶！）

答：搶的方法我不贊成。

問：他們還圍攻。

答：搞革命不圍攻幾次不行的。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恰恰證明兩條路線鬥爭是尖銳的，我們就是要在各種困難條件下鍛鍊。否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不用以前的辦法搞。中央文革小組的日子也不好過！（眾笑）有人支持我們，有人反對我們。因為兩條路線鬥爭很激烈，世界上既然劃分兩個階級嘛！

問：中共中央補充規定上說的「監督」，我們認為是對黑材料，要瞭解其內容，確定其性質，查清數量。

答：這個已報中央，請他們解答，我無權解答。這個規定，我參加了前期的起草工作，最後定稿討論我不在。這個規定是中央搞的，不是文革搞的。

問：這樣查是否恰當？

答：原來意見是不看的，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改了。初期起稿是不看的，但目錄可以開下來，例如：名稱、數量。

問：現在東西燒光了，如何批？

答：規定的序言中要求抓活的，抓大的。我們只要抓住幾件事就可以批透。批判王明路線只要抓幾件事就可以。中央原來如此，不要詳細弄。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線已給我們創造了先例，不要導入煩瑣哲學。這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鬥爭方法。這一個月來抓材料太多了，所以中央才發這個規定，否則就不發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時，就抓住他三個字「發財了」。這三個字就是資本主義，抓住了典型就把布哈林批

倒，我這個人糟糕！又說開了。

問：我們怎麼批？

答：中央文革小組不能發號施令，同學們可以自己討論，集中力量從政治上思想上進行批判。不光是黑材料，整個檔案制度中央準備來個大改革。毛主席鑒定幹部靠群眾。看檔案鑒別、選拔幹部肯定犯錯誤。我舉個例子：一個人覺悟高，每次運動他都檢查；另外一個人覺悟低，會吹牛。十年後，領導幹部一看，覺悟高的人又是「左」傾，又是右傾，問題倒很嚴重。按此選拔，不倒楣了嗎？（大家熱烈鼓掌）

問：他們搞材料要整人。

答：這個北京同學有經驗。第一，他要整你，沒有黑材料也能整你，材料都在腦子裡。第二，搶不盡的，一個人藏的東西很難找盡，要麼小孩藏的大人能找到，而是從他的眼色上發現的。（眾笑）最初我是支援搶的。第一個搶的是北京地質學院，後來一想這事被動，他藏著看你找，把包袱扔給你。藏起來的東西難找。最後還搞成學生鬥學生，工人鬥學生。我們要從政治上批，造成壓力。

問：沒有材料怎麼批？

答：要批判還怕沒材料？北京有個譚力夫講話，就夠批的了。

問：我們要黨委書記把他的平時言論，報告，講話交出來，可以嗎？

張春橋同志問：你是哪個學校的？學生答：科大的。

答：革命者胸懷坦白，覺悟高的可以交。有的人覺悟低，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又不可以下一個死命令叫他交。有的問題中央正在研究，如什麼叫「革命群眾」。

問：怎樣進行路線鬥爭？

答：路線鬥爭是觸及人們靈魂，如何從思想上批判，這個工作很難，材料不好搞，嘴巴長在他嘴上，我們還沒有好的經驗。搶的辦法、逼的辦法，主席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都沒有用過，請同學們看看主席的整風報告。主席是怎樣教育那些幹部的，主要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分析得越徹底，就越擊中要害。一小部分是敵我矛盾，當然兩樣。大部分還是內部矛盾，包括一些提出的人。

問：目前要不要進行鬥批改？

答：鬥批改還要看一看。當前集中力量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林彪同志講話，《紅旗》社論發表快兩個月了，但花在材料上的時間很多，沒有好好搞批。北京是這樣。砸櫃子、搶材料，到底兩條路線是怎麼回事？主席是怎樣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沒好好學。

問：轉入鬥批改的標準是什麼？

答：轉入鬥批改的標準是什麼？中央也在研究，先別做這個打算，黨中央這次發的指示很少，只十六條。這次大革命沒有經驗，它本身是有規律的，大家不必急。不是到明年暑假嗎？本來是到寒假的，黨中央後來看看不行，還會出現什麼情況不能預料。

問：曹荻秋某月某日報告中講，上海前階段運動是江青同志抓的。

答：去年到今年，江青同志在上海待了6個月，搞部隊的文藝工作，但中央沒有這一說法：她指導上海的運動。我想江青同志也不會這樣說的。《海瑞罷官》批判，江青同志花了很大力量。

問：市委指示下達後（按：《上海市委關於各級黨委停止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的決定》）黨委仍在領導，這是一個花招。

答：你們怎麼看？毛主席對罷官有新的指示，不要急於罷官。同志們，不要林沖誤入白虎堂。他們如果把機密材料放在保險櫃裡，你們去拿，這政治責任負得了嗎？中央這個規定主要是出於對你們的愛護。一罷官，雙方都洩氣了，沒勁了。北京的劉仁罷了，很舒服，我們累死，他們十年後再給他們幹。罷官是容易的，批判透是難的。主席說：通過幾個月的經驗，罷官放後期，通過大革命，幹部隊伍有很大調動，哪些是跟主席的，哪些是反對的，有些犯錯誤的幹部改好了也行。

同志們的問題我都是臨時答的，對的算你們的，錯的算我的。²⁹

²⁹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

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6.12.6.）

【地點：政協禮堂三層休息室，時間：6日晚至6日凌晨1時多。】

代表：我們這次到北京來有四點任務：（1）反映上海的情況；（2）談談對中央十二條的看法；（3）把在北京的同志帶回上海；（4）聽聽中央對上海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的新指示。另外介紹一下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組織情況及上海的新形勢。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到工廠去了。（學生代表介紹下廠的情況）

張春橋：好啊！

代表：關於生產情況，我廠提前一天完成全月計畫，其他廠也是這樣，新新機器廠超額完成任務。（把新新機器廠的喜報交給張春橋同志）

姚文元：你們把宣傳資料給我們一些，我們幫你們宣傳。你們也印，來闢謠，做些宣傳工作，搞些快報。

張春橋：國棉十七廠的情況如何，他們打了幾個電報叫我回去。

代表：國棉十七廠關於封材料，燒材料問題，……廠裡成立了赤衛隊，遊行大叫「要造張春橋的反」、「張春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張春橋：這個我知道，遊行我不知道。他們連打了三個電報叫我回去檢查，否則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代表：……再提一個問題，工作隊到底要不要？

姚文元：工作隊撤了沒有？

代表：撤是撤了，但裡面有鬼。

張春橋：是不是所有的都撤了？

代表：已經撤了，但工人要求批判以後再撤……。

張春橋：這不要緊，要檢討，還可以叫他們回去。

姚文元：有一篇文章《論造反者》寫了我的名字，我沒有寫，這篇

文章是假的。還有《論左派》用林彪同志的名字，陳伯達同志《答誓死衛東戰鬥隊》，這些都是假的，你們要闢謠，搞些傳單到街上貼貼，打破他們的謠言。

張春橋：赤衛隊總部有多少人？共有多少人？

代表：不清楚，赤衛隊有人到北京來。

張春橋：他們來了，沒有找我？

代表：他們來是找周總理告你的。

姚文元：來告，我們也不怕。

代表：當前運動可能有大反復，中央文革處境也很為難。

張春橋：（笑）不要估計太高，你們不要替我們擔心。

姚文元：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

（一代表介紹「中國紅旗軍」情況）

代表：哈爾濱紅旗軍頭子是全國人大代表，工人工程師蘇廣銘。

張春橋：現在他們都找勞模做領袖，這是一個特點。

姚文元：對！

（代表又談到「中央文革十二條」問題）

張春橋：我們找了首都工人來座談，8小時生產要保證，每週一次生產討論要保證，其他由工人自己安排。

代表：工人同志要求長日班用6至7小時完成當天的生產定額，用剩下的時間搞文化革命。（彙報三個廠的調查情況）

張春橋：這樣可以的，連續生產單位是困難的。十二條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們想寫的簡單一些，越寫具體越難，越沒有辦法寫，爭論越多，我們準備寫那麼八、九、十條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證品質，要放手發動群眾，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資……最近我們的精力都放在這上面了。

姚文元：這也是試行的。

張春橋：讓全國工人提意見、討論，中央過早作決定不好。

代表：對於中央十二條，工人說沒有十六條那麼親切。

張春橋：問題解決還要靠時間，靠群眾運動本身。

代表：我們希望中央下次寫文件時，把我們的意見也考慮進去。

張春橋：你們對十二條不滿意，反對的人可多了，他們革命講多了，生產講得太少，我們要在各方面都聽。

姚文元：你們是從革命方面考慮的。

張春橋：有人說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這兩種思潮隨時反映在黨內的……這個問題要從實踐中解決，關於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社論，從群眾中解決，我們想寫的簡單些。思想問題從社會中解決，關於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社論，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要根據運動的特點，準備再詳細地寫篇社論。當前，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姚文元：這是運動的必然趨勢。

張春橋：農民運動還沒有起來，不過開始冒頭了。他們的問題要複雜，階級關係複雜。對農村連這樣的十二條也拿不出來，他們不是8小時問題，而是季節問題，這真是吃飯的問題，季節一過，一年就完了。

代表：我們歡迎學生有組織、有計劃地下到工廠，既勞動又幫助我們總結生產與階級鬥爭的經驗，現在就是阻力很大。

學生代表：下廠阻力大，市委不支持，要月票也不給。

張春橋：他們就是怕，怕你們下廠。

姚文元：這個問題靠革命解決，我們提倡進宿舍。

張春橋：你們有一個點子，他們必然也有一個點子，你講完成生產任務，他們把生產定額提高，不然就不要搞文化革命了。

姚文元：不要從紙上的條文來規定，這些問題都說明瞭一個問題，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張春橋：有兩種情況。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這樣。一種是壞人要破壞，但有些老工人是由於舊的習慣勢力。這種勢力相當大，對於這種人更難辦，這種人打不得罵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個傾向，就是勞模被拉過去了，他們不但在廠裡有影響，在社會上影響也很大，我們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衛隊四十萬人。

張春橋：中央不會把文化大革命停下來的，主席也是這樣，決心下定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進行到底，當然還有分期分批的問題。一個城市不能分期分批，像上海形勢很好，可以全面鋪開。有的就不行，像中小城市、三線問題，現在大家都用個「紅」字。情況很複雜，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復辟活動，也有些人抓著生產來進攻，當然我們也不怕囉。同志們對於抓革命、促生產理解很好。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會出現各種問題，這是難免的，要以革命來推動生產。今天的爭論是圍繞著革命的問題，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問題。無論如何要下定決心把革命搞好，革命搞不好，生產怎麼能搞好呢？中國不是要變顏色了嗎？現在我和你們有共同利益了，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打電報要我回去。這點我不怪你們，幾時我回上海開一個十萬人的大辯論會。但做法上要有策略，要爭取多數，把中間狀態的人不要當作壞人，赤衛隊中間的大多數都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

姚文元：都是階級弟兄嘛。

張春橋：有些人，薪水一高，有個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義，怕丟飯碗，怕報復，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沒有這種顧慮。我們對那些人要做艱苦的工作，這樣就形成了多數，形成多數才可解決生產安排問題。你們對生產、革命都要很好地重視起來。問題在少數，我們提口號要考慮到多數，有些同學提口號不注意多數，這樣不好。對他們要一步一步地來，飯要一口一口地吃，要允許別人等待，允許他們觀察。一切工作都是輿論工作在先，這些工作我們很需要注意，這是普遍性的問題，否則要引起群眾對立。我認為群眾鬥群眾有些問題是我們有錯，被人抓了把柄，當然根子歸在領導，如果沒有人挑動，群眾是鬥不起來的。

姚文元：我接觸了一些青年人，在8月份只談闖，只有三個月，現在他們頭腦冷靜多了，這是一個飛躍，將來還會有更大的飛躍。

張春橋：近來我收到控訴我的意見，對你們的情況聽得比較少，我希望能聽到你們的情況。另外希望你们把廠裡造反隊中生產好、革命好的典型總結一下，要確實的消息，寄給我一些，我要給中央看，也可以在北京宣傳。

對於打人的事，你們要觀察一下，到底是誰在挑動打人。

代表：這很明顯，頭子是張琪，是總工會主席。

姚文元：我們的頭腦要複雜一些。

張春橋：有人是公開指揮的，有沒有地下司令部呢？對於這些事情，我們要盡量減少衝突。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學生很憤怒，要上街遊行示威。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給他們提過建議，這次提建議叫他們不要遊行，因為這一遊行要衝突。

（由於時間關係，春橋同志還未吃飯，所以由代表又提出幾點希望後，就請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回去休息。臨別時姚文元同志意味深長地說：工廠搞運動，工人起來了，這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這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前一階段在薄一波領導下，工業交通部門有很多地方是修正主義的。）³⁰

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講話 （1966.12.9.）

【按：我們懷著無比憤怒的心情嚴厲聲討叛徒、工賊、內奸劉少奇在廣播局的黑爪丁萊夫扣壓中央文革指示，自覺緊跟劉鄧黑司令部，瘋狂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又一滔天罪行：丁萊夫對我們全域革命同志封鎖了1966年12月9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來局發表的有關我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極其重要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在我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發展到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發表的。講話明確指出了紀念「12.9」是個大陰謀；指出了「4.16」反革命政變預演事件；指出了丁萊夫頑固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張

³⁰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12）。

春橋、姚文元同志還對當時的三個群眾組織明確的表了態，特別是從周××事件中，指出丁萊夫反對江青同志的嚴重問題。春橋、文元同志所指出的這些問題，都是有關我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我局運動的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但是，狗膽包天的丁萊夫，竟敢將這麼重要的講話封鎖起來，扣壓起來，並且繼續挑動群眾反對中央文革，挑動群眾鬥群眾，致使廣播局長期存在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丁萊夫如此反對中央文革，真是罪惡滔天！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這波，流惡難盡！丁萊夫死有餘辜。現將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重要講話發表如下。】

1966年12月9日晚10：30，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來到丁萊夫辦公室，會見了丁萊夫、楊祚銘、王壽仁、王永慶等人。關於廣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春橋同志問廣播局有多少群眾組織。丁萊夫回答主要有三個組織：戰鬥團、縱隊、造反團。

春橋同志問：三派組織主要分歧是什麼？

丁萊夫回答：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捍衛團（戰鬥團）認為我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自覺地執行反動路線的。縱隊不同意他們這種提法。造反團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做法不同於捍衛團（戰鬥團），他們不同意捍衛團（戰鬥團）的一些做法，也認為縱隊舉的旗幟不高。

春橋同志問：黨委同三個組織有什麼關係？

丁萊夫答：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經常找（或揪）我們。

春橋同志問：你檢查幾次了？

丁萊夫答：三次。

春橋同志問：去縱隊檢查幾回？

丁萊夫答：一次。

春橋同志問：去縱隊檢查舒服一點吧？有打成反革命的嗎？

丁萊夫答：沒有人被打成反革命。

文元同志追問：一個人也沒有？

丁萊夫答：沒有。

春橋、文元同志立即提出政訓隊的問題。提出周××事件。

文元同志問：周××是什麼問題？

丁萊夫答：他們說（指戰鬥團）是把他打成反革命了，我還沒有調查。……5月25日×××用保密電話說，周××準備同其母親去南方，任務急，今晚走。……周××回來後（5月底）講，到南方見了大人物，對丁萊夫是後期處理。他寫了張大字報，對我提了十條，沒有實際內容。……還有幾件什麼反中央的事，都是沒有的事。對他的懷疑，是否搞什麼東西，向×××講了，也向保衛處講了，指出不要搞監視，出幾張大字報沒什麼了不起。

文元同志問：實際上呢？

丁萊夫答：他說（指周××同志）技術處長監視他，最近捍衛團（戰鬥團）說圍攻了他，把他打成反革命了。6月中旬，×××說他去上海見到江青了。

春橋同志問：你知道周××去上海見了江青同志，你講了沒講？

丁萊夫答：向局文革小組講了。

文元同志問：你們懷疑了佈置了對付的辦法沒有？

丁萊夫答：沒有佈置。

春橋同志問：為什麼把他打成反革命？

丁萊夫答：沒有把他打成反革命。

春橋同志問：你們向張平化講過懷疑，沒有向下面佈置過？

丁萊夫答：沒有向下面講過。

春橋同志嚴厲批評說：這不用佈置，你們就會影響下面。

文元同志說：如果不知道是遇到江青同志你們會怎樣？……捍衛團（戰鬥團）是什麼理由？

丁萊夫答：捍衛團（戰鬥團）沒有講理由，把他叫到臺上去了一下。

（周××同志被監視提審，引起戰鬥團戰士的關心。在一次戰鬥團大會上，把周××同志請到臺上和全體同志見了面，並宣佈要為周平反，同丁賊做不調和的鬥爭）

（當談到幾個群眾組織的性質時）丁萊夫說：我說捍衛團（戰鬥團），縱隊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對的。誰合乎毛澤東思想我就支持誰。

文元同志問：你覺得幾個組織是否都符合毛澤東思想？

丁萊夫回答：捍衛團（戰鬥團）批判反動路線是正確的，但做法不符合實際情況，有時只取一句話，就不合原意了。如有關中央軍委指示傳達的問題，根本不是扣壓指示，抗拒指示、違反毛澤東思想。……我認為是針對院校的，也認為局裡沒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所以沒有研究出措施。兩次答辯會都是這個問題，是怎樣就是怎樣，不是自覺的。

……

春橋同志問：運動發展的慢是什麼原因？

丁萊夫回答：是領導的不好，毛澤東思想水準不高。7月底以後領導被動。

春橋同志：是否「砸爛閻王殿」以後？

丁萊夫答：學院大字報出來後，局裡有的單位群眾還去過學院。文革選不出來，一批判反動路線，那些人（指戰鬥團）最積極。

春橋同志：你們是否積極、堅決？

丁萊夫答：不認為不積極，不堅決。

春橋同志：你們也積極、堅決，但同群眾積極、堅決不到一塊兒去。

丁萊夫說：同他們（指戰鬥團）提出的問題有分歧，發展到完全對立狀態。今天的報告沒有同我見面，就發到下面去提意見。他們（指宣教處在丁萊夫授意下為他起草的12.9報告）不是提意見，而是批判，說丁萊夫又放毒，帽子給我扣上了。

春橋同志：批判也是提意見。你事先不提意見宣教處怎樣起草？

丁萊夫答：我沒有提意見。

春橋同志：你算什麼黨委書記，宣教處領導你，還是你領導宣教處？

丁萊夫答：過去講話是我自己起草或講幾點意見由別人起草。

春橋同志：你是推託責任，或者是不負責任，這比你發表意見還壞！

丁萊夫說：這次是自下而上。

春橋同志：你兩者必具其一，第一，不是我起草的；第二，下面討論的。

丁萊夫答：我也修改了兩次。

文元同志：毛主席早就嚴厲地批判過這種作法。

春橋同志：自7月以來，你的日子不大好過，自上而下不行，自下而上也不行。……

丁萊夫說：日子不好過，被動了三個月。

文元同志：根本問題在什麼地方？

丁萊夫說：思想水準不高，問題抓的不夠，主觀主義。

春橋同志：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元同志：你們在肅清劉、鄧影響做了什麼工作？

丁萊夫這時迴避實質問題不答，東拉西扯，推卸罪責。

春橋同志：你不怕（成了）修正主義電臺？我向你說過，4月16日第一個廣播的是誰？還不是電臺。

丁萊夫說：新華社也播了。

春橋同志：你不覺得這是嚴重問題嗎？

丁萊夫說：我做了檢討。

春橋同志：你做了檢討？你當成什麼事，你是孤立的看這個問題。

丁萊夫說：我不是孤立的看這問題。

春橋同志：你就知道檢查工作組問題。你們警衛的很嚴，內部怎樣？你們是聽哪個司令部的？

丁萊夫說：根本是盲目性。

春橋同志：先不要講盲目性。

文元同志：今天時間晚了，你們應該想一想。我們還要聽聽三個群眾組織的意見。³¹

³¹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北京廣播學院學生代表時的談話（1966.12.10.）

【按：1966年底，正當無產階級革命派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把矛頭直指劉鄧黑司令部的時候，北京地區的右派勢力策劃大搞慶祝「12.9」的大陰謀，妄圖以此為劉鄧黑司令部招魂，炮打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這股反動逆流中，丁萊夫在陶鑄的支持下，打著慶祝毛主席為人民廣播事業題詞發表一周年的招牌，在12月9日大搞慶祝活動，為劉、鄧、彭真張目。12月9日當晚，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親臨廣播局嚴厲批評了丁萊夫。12月10日，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在中直禮堂接見了廣播學院革命學生代表。下面是這一次接見時的談話紀要。時間：1966年12月10日下午。地點：中直禮堂。】

接見時主要是同學們彙報情況。先從學院的情況談起，一直談到廣播局的情況。談到「11.2」事件。同學們彙報說：陶鑄在接見廣播局保守組織「誓死縱隊」時說我們是錯的，我們準備找他辯論。張春橋同志說：你們一天寫一封信給他，把他逼出來，要他澄清事實。

談到在「11.2」後，同學們進入廣播局揪丁萊夫時，張春橋同志插話說：「我們已經領教過了，在天安門上，我們批評他，要他檢查錯誤，他不接受，跟我們吵了起來。」

談到丁萊夫紀念「12.9」時，張春橋同志對同學們說：「你們怎麼沒有造反？那天我們把所有的事都安排了，專門在家裡等了一天，可是一直等到晚上也沒有接到電話，我們想，是不是消息被封鎖了？是不是電話被控制了，打不出來？於是我們兩個人就坐車到廣播大廈，在外面轉了一圈，看到廣播大廈燈火輝煌，我們就到廣播局裡去了。」找到丁萊夫和楊祚銘，我們問，你們今天是什麼日子？怎麼這麼熱鬧？你們不知道社會上有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他們什麼也沒回答。我們又

問，你們把群眾打成了反革命給平反沒有？他們說，我們廣播局沒有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談起毛主席為人民廣播事業創建廿周年題詞發表的問題時說：姚溱、吳冷西等人推說要等《人民日報》版面空了再發表，主席的題詞是9月中，他們一直扣壓到12月9日，這是他們搞的陰謀。

在談到掌權問題時，張春橋同志說：廣播局一定要左派掌權，中間派不行，右派更不行。

最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跟學生代表商量說：廣播局搞起來會不會停播？

學生代表：戰鬥團完全能控制廣播局，不會發生問題。

張春橋同志：我們先找你們談，還要到廣播局去找他們三個組織談。³²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1966.12.11.）

【按：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白色恐怖中衝殺出來，大造梅益、丁萊夫等一小撮走資派的反。丁萊夫為了維持梅丁王朝的反動統治，撲滅革命的烈火，操縱「誓死縱隊」和「紅色造反團」，圍剿革命派。在我們鬥爭最艱苦，最激烈的時刻，12月11日下午，毛主席司令部派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來我局，接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十五名代表。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和代表們親切交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革命行動表示支持。下面是這次接見的談話紀要。】

³²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張：我們想瞭解一下情況，找你們黨委談過。我們知道你們有好幾個群眾組織，基本上有三個，我們都想談一下，先和你們談。我們瞭解過一些情況，但不很多。你們各派都寫過信。你們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打算怎麼做，或者你們認為需要的，我們都想瞭解。

姚：就這樣吧，你們說，我們聽。

代表：要不要先挨個介紹一下？

姚：介紹一下吧，你們哪幾個是主要負責的？

張：你們有沒有團委呀？

代表：沒有，我們只有聯絡員。

（代表彙報丁萊夫的「七·二九」黑報告，當談到丁萊夫說群眾批評他是「雞蛋裡頭挑骨頭」時）

張：這是誰說的？丁萊夫？

代表：對。

（代表彙報丁萊夫搞假選舉陰謀）

張：那你們局裡現在還沒有選舉文革委員會？

代表：沒有，還是舊文革領導。

張：是指定的，還是選舉的？

代表：選舉的，但實際上是指定的，基本上是局黨委和各大口負責人。

（代表彙報丁萊夫在廣播學院事件上，對抗中央文革的罪行。談到丁說「不能說一千二百人都是右派」時）

張：那時特別對一千二百人講了話，說你們是受蒙蔽的，包括工作組的大多數，都是好的。我們再三講。

代表：他根本沒有傳達這些。

（代表彙報局文革迫害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當談到有人問周海嬰去南方幹什麼時）

張：是不是丁萊夫直接問的？

（代表介紹情況）

張：丁萊夫說他不知道周海嬰是中央文革派去的。

姚：他們對周海嬰採取了什麼行動？

代表：準備開鬥爭會，會議程式，口號都擬好了。

（代表彙報鬥爭梅益情況）

張：梅益開了幾天會？

代表：四天。後轉入小會。

張：有材料可以給我們看，因為情況很多，先談當前情況。政訓隊呀，軟禁室呀，都是怎麼回事？都解決了沒有？現在還存在嗎？

（代表介紹政訓隊情況）

張：政訓隊有多少人？

代表：九十多個。

張：黑幫占多少？

代表：六十三個。群眾十八個。

張：政訓隊還存在嗎？黑幫是怎麼定的？這有六十多人，還有十八個人，還有工作人員，三種人。

代表：對。

代表（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被送進政訓隊的王××同志）：
說我們是中間人物。

姚：中間人物？（笑）

張：中間人物和黑幫一樣待遇嗎？

代表：政治待遇上基本一樣。

張：和工作人員呢？

代表：不一樣。

張：現在這樣的還有多少人？最多的時候多少人？

代表：十八個人。

張：軟禁室怎麼樣？

（代表介紹軟禁室情況，談到走資派，原中控室主任景潤身時）

張：他真有本領嗎？技術上怎麼樣？

代表：他根本不怎麼樣。

張：你就講講軟禁室內幕。

姚：軟禁室有多少人？

代表：八個人。

姚：控制室一共多少人？

代表：××××人。

張：現在還禁閉著嗎？

代表：沒有，但沒有公開平反。

張：多久的時間？

代表：最早是8月底去的。

張：其他單位還有沒有軟禁室？

代表：大樓裡只有一個。

（代表彙報有一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電視中出現丁萊夫，「誓死縱隊」一些隊員歡呼）

張：哪一次接見？

代表：大概第六次。

（代表彙報當前運動的阻力和幾個組織的情況）

張：誓死隊有多少人？

代表：他們說五百。

張：丁萊夫找過你們這些人開過會嗎？

代表：沒有，他不敢。

（代表彙報我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妄圖用所謂「黨紀」來鎮壓造反派。胡說什麼「黨員對黨組織有意見，只有按組織系統向上一級反映，不能公開貼大字報」。代表批駁了這種謬論，並請示首長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張：你剛才已經答覆了嘛！這樣答覆就可以。如果出了修正主義，包括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就造他的反，不然，就要陷於蘇聯赫魯曉夫式的統治。向上級控告？赫魯曉夫的上級是誰呀？（眾笑。）

（代表彙報傳達室剛剛摘掉劉少奇的題詞）

姚：他們想毀滅罪證嘛！專家接待室是否還掛著？

代表：不知道。

張：你們大樓有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彙報政治情況）

張：政治部有多少人？你們戰鬥團占多少？

代表：政治部×××人，我們只有一人。

張：你們開會在劇場開？能容納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彙報「一一·二」事件，「誓死縱隊」要首長上×樓政治部時）

張：那天非讓我們到×樓去不可，氣勢洶洶。那天我們家裡有事，不然就去了。

姚：後來我們要去，他們又不讓去了。

（代表彙報「誓死縱隊」派人到國務院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狀）

張：我知道。他們要找我辯論，我沒理他們。

（代表彙報「一一·四」事件）

張：我知道。

（代表彙報「一二·九」大陰謀。）

姚：可以想一想這個問題嘛！

（首長上車時，代表說：「歡迎首長常來」。）

姚：革命還要靠自己嘛！³³

³³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中央廣播事業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6.12.13.）

【按：1966年12月13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組員姚文元同志來中央廣播事業局接見了原保守組織「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縱隊」的頭頭們，並做了重要指示。「誓死縱隊」的頭頭們卻扣壓、封鎖中央首長指示，不向全域革命同志傳達，更不向「誓死縱隊」的群眾傳達。現將兩位元首長的指示，根據記錄整理如下。】

張春橋同志首先說：「我們想首先聽聽你們的意見，聽你們談完後再發表意見。今天，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先聽，也沒有帶什麼題目。」

姚文元同志接著說：先從「縱隊」本身如何建設，基本成份方面談談。

「縱隊」頭頭丁寶庭開始彙報。當彙報到丁萊夫的「6·3」報告，傳達了鄧小平1966年5月31號對首都新聞界的講話，肯定新聞單位沒問題時，張春橋同志說：「這話是站不住腳的，吳冷西就坐不住了嘛，怎麼說沒有問題呢？！」

由於彙報情況囉哩囉嗦，只談現象，不談本質，全是為丁萊夫評功擺好，為丁萊夫辯護，姚文元同志說：「有些情況稍微扼要一點。」張春橋同志說：「主要談一下《十六條》公佈以後的情況。」運動初期可以說很不理解，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以後，中央一次一次的討論這個問題，看情況怎麼樣？

丁寶庭彙報《十六條》公佈以後，局裡運動情況。

張春橋同志問：「你們什麼時間感覺到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在場人大都回答在撤銷工作組時才有感覺。

張春橋同志說：「丁萊夫對5月31號鄧小平的講話傳達這麼快，同樣，對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廣播學院時的講話卻傳達這麼慢，為什麼對正確的東西就聽不進去呢？一個人的腦子不是真空的，不是被這種思

想佔領，就是被那種思想佔領。為什麼丁萊夫對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廣播學院時的講話傳達這麼慢？因為在他認為是不正確的。我們到廣播學院那天，丁萊夫也在場，態度很壞，公開和江青同志頂起來了。」

當彙報到局裡有同志貼出《徹底砸爛丁萊夫的閻王殿》的大字報以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認識，丁萊夫表現也很不冷靜時，張春橋同志說：「是很不冷靜。各種事物總有兩種不同意見，一年來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一直存在的。砸爛丁萊夫的閻王殿有什麼不好呢？」

當彙報到廣播學院革命小將因為派工作組問題來局裡貼大字報時，張春橋同志說：「這個我們完全懂。我們到廣播學院時，群眾說，我們是含著眼淚歡迎工作組的，但想不到工作組來後是整我們的。」

「縱隊」頭頭們為丁萊夫鎮壓革命師生辯護，說什麼丁萊夫是聽了張彥的話等等。

張春橋同志當即嚴厲批評了「縱隊」頭頭的這種錯誤，說：「不要把原則問題說成是枝節問題，應從當時的鬥爭環境裡去看兩種意見，為什麼有的聽得進去，有的聽不進去，比如丁萊夫為什麼對鄧小平5月31號的講話和張彥的一句什麼話就聽得進去？」

張春橋同志接著說：「一個人像在大風大浪裡，可以把你沖到左邊，也可以把你沖到右邊，但階級鬥爭還有能動性。我們現在也在研究，看到有些幹部在革命戰爭時期作戰很英勇，為什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卻站錯了隊。」

張春橋同志又說：「他（丁萊夫）的架子太大了，態度很不好，在廣播學院，在天安門見過幾次面，但談不到一塊去。『一二·九』全北京只有廣播局燈火輝煌。9號（1966年12月9號）晚上我們去找他，聽他介紹情況，沒法談，思想距離太大了，他根本聽不進去。『一二·一二』他還指揮警衛部隊對付廣播學院的小將。」

接著，丁寶庭彙報12月9號紀念毛主席題詞發表一周年的情況。張春橋同志問：「12月9號紀念會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嗎？」丁寶庭等說沒有。張春橋同志說：「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何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貫徹中央指示，如何紀念主席題詞發表一周年？馬

克思主義每前進一步都必須進行鬥爭，在這樣的大會上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怎麼能通得過？那天他（丁萊夫）光講通不過，沒說遇到什麼阻力，我們也沒來得及問他。」

姚文元同志接著說：「毛主席在去年題詞正是階級鬥爭最激烈的時候，誰決定在12月9號這天發表？9月份題詞來了，到12月份才發表，這不是階級鬥爭？還是版面問題？」

張春橋同志又說：「我們來審查片子時，已是十一中全會以後了，在廣播局還看到劉，鄧等的照片和他們的題詞還掛著，為什麼沒有換？這是緊跟哪個司令部？為什麼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東西不緊跟，而對劉，鄧的東西跟得那麼緊呢？『6·3』報告他就跟得很緊嘛！丁萊夫的黨委是不稱職的。電臺是政治機關，是最靈敏的政治機關，外國人對北京電臺廣播的一句話都猜半天。廣播局不是和毛主席同呼吸的。十一中全會這樣的大事，為什麼這麼遲鈍？我沒有責備你們的意思。」

這時隨來的秘書同志出去接了個電話回來，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回去開會。張春橋同志說：「今天談不完了，以後有時間再談吧！」有人問什麼時間再找首長彙報，張春橋同志說：「不是你們找我們，而是我們找你們。」³⁴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紅色造反團」的談話（1966.12.15.）

姚文元講話

這次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相當尖銳，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司令部鬥爭，跑到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是資產

³⁴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階級反動路線。因此，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走，十一中全會以來，就是解決跟哪一個司令部走的問題。

張春橋講話

你們想一想：丁萊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還是跟哪個中央跟得快？要從這方面看問題。你們大部分是黨員，也有些是團員，跟誰走，現在是很分明的了。5月份以前，中央階級鬥爭的蓋子還沒有揭開。是跟誰跟得緊，跟毛主席呢？還是跟彭、陸呢？十一中全會以後更明白了，那一條路線的勝利，關係是重大的。這是大方向。

廣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但還要看到全國的整個黨的鬥爭，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大事，這個鬥爭勝利才能保證傳播毛澤東思想。廣播局跟彭真站在一邊，還是什麼，要從大局來考慮。

「4·16」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事件，不是毛澤東思想的聲音，是反毛澤東思想的聲音，是政變的信號，這不是技術問題。當時，我們聽了廣播震動很大，廣播在前，新華社在後，新華社跟彭真跟得緊啦！這是兩個階級命運的鬥爭，是最緊要的關頭，彭真的最後的決戰。他拿著一份報紙到毛主席那兒去說，我們是批判的。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們要從大局考慮。當然，我們對任何幹部都要從善意出發，分析事實考慮大局，否則要看不清楚。我們希望幹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樣，我們就要從另外來考慮，否則我們就看不清。譬如廣播學院衝大樓的問題，那天跟我們打電話的很多，各方面組織都有，丁萊夫也打電話，當時我們不在家。我們認為：丁萊夫如果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應該讓他們進來。如果是我，我不那樣處理，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過廿來人可以讓他們進來，我處理這類事很多。那時衝國防部，是學生沒辦法了，鬧了一天一夜，我是學生我也要發火，我們要設身處地來考慮考慮，如果我們是學生該怎麼想。我去處理這個問題時，國防部門口要我登記辦手續。我當時說，我是中央文革的，他們還要我辦手續。那裡的火燒得很大，我是來救火的，還要我來登記。我們有許多東

西是不適合革命的需要的。至於運動中出現一些亂子是很難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亂子，資產階級革命比我們出的亂子更多。至於共產黨成立以來，我們要把亂子都記下來，要積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萊夫接觸很多次，比你們接觸得多，他對學生的情緒是對立的，對學生的感情距離很大，聽不進我們的意見，水潑不進去，他總感到學生情緒很糟糕。我們談了許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眾在一起，始終沒有轉變對學生的感情，如果和學生站在一起就鬧不起來。從7月份跟他接觸後，都是講學生不好，半年過去了，始終沒有扭轉過來，態度仍然沒有改變。

主席對待群眾是什麼態度可以作比較，每次接見他都要到群眾中去，到金水橋，幾百萬群眾什麼人都有。我們為他的安全擔心，不讓去，勸過他。後來主席批評我們，這是錯誤的。主席對群眾是什麼態度，要學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裡，那樣熱愛群眾，關心群眾，聽群眾的意見。革命靠群眾，我們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較，這樣一比較就看出問題來了。兩條路線的鬥爭根本問題是對群眾的問題。希望同志們考慮，你們的意見我們還想聽。我們也希望幾個問題弄得很清楚。

我們的同志看問題，有些事不要就事論事，有些觀點不要固定，要看得寬一點深一點。³⁵

張春橋等在接見部分歸僑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時的講話（1966.12.18.）

【江青同志在12月18日接見了首都歸僑紅衛兵代表，她堅決地支持了革命歸僑師生和紅衛兵對僑務界和中僑委的革命造反行動。她對我們

³⁵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說：「我堅決做你們的炮彈。」並指定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在體育場電影館接見了我們北京歸僑減資興無學校（原華僑補校）、華僑大學藝術系和北京外國語專科學校等單位兩百名革命歸僑師生和紅衛兵，並聽取了我們對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彙報，最後給我們作了重要指示。其他中央首長要求我們把將要在本月底召開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準備好，並說中央會派人來參加我們的大會。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對我們革命歸僑最大的關懷和鼓舞。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一定遵循主席的教導，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積極地行動起來為開好這次誓師大會而努力，為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為把僑務界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而奮鬥！】

張春橋講話

同學們、同志們：

（同學們：請坐下）不用坐了，因為坐了一個下午了。

我們確實是這樣，對華僑界方面的情況，接觸得很少。最近嘛，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一些標語是你們貼的。裡面有廖承志的、方方的，還有林一心的，對於這些名字，剛才你們講的，我們腦子裡還有個印象，但是這些單位，我們確實都沒有去過。材料呢，也沒怎麼看，因為我們人很少，我們覺得一天要處理的問題非常多。那麼，現在看來，這個應該說是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於很重要的方面沒有注意，現在是你們用行動使得我們注意了，這使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熱烈鼓掌，高呼口號）

從同志們今天所講的這些情況，我們感覺到，問題確實是嚴重的。這就證明瞭華僑這個名稱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因為不管是在國外的華僑也好，回國的華僑也好，或者是在國內其他的人也好，總是分著階級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這裡邊寫著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嘛，這是最基本的。在華僑裡邊也是分著階級的，也是有階級鬥爭的。那管理華僑的部門裡面也自然會有階級鬥爭，或者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

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或者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我們的同學包括廣大的歸僑或者海外僑胞，我們總是相信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因為那裡勞動人民是占絕大多數，決不會是資本家占絕大多數。（熱烈鼓掌）不僅僅是說，像說什麼三百年前是一家，那是講歷史；講現在，也還是這樣，也還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是主要的。我們如果忘了這一點，那我們就忘記了最基本的事實。

同志們剛才給我們講了很多，今天時間來不及了，我們不能夠在這裡繼續聽，因為晚上的會已經約好了。你們剛才說今天這個會開得很突然，我們也很突然。我們是正在開著會，就決定說江青同志要我們兩個馬上離開會場到這兒來接見你們，就是這樣子來的。（呼口號）因為時間倉促，今天就不能暢所欲言，而且同志們還沒來得及準備，有準備的也沒有來，還有許多材料也都沒有帶來。（眾：帶來了）有的材料恐怕沒有帶來。所以，我想是不是這樣，如果有材料呢，現在給我們也可以，如果現在來不及，也不要緊。我們希望是這樣，第一嘛，如果你們有現成的材料，你們就比較早地可以給我們，送到中南海門口就可以，請你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如果寫張春橋、戚本禹，寫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就更有把握地到我們手裡，這樣子沒有什麼問題的，不會被人扣的。這是一個。第二呢，還可能許多沒有現成的材料，因為剛才所涉及的已經很多，比如說中央僑委，對僑務部門，到各地的僑務部門的問題，有的是農場的問題，有的是工廠的問題，有的是學校的問題，很多方面，有的是專門的華僑的學校，有的是在別的學校裡邊的華僑的問題，各方面的情況我們都願意瞭解。（鼓掌）希望你們把這些各方面的材料給我們，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且把情況報告中央。（熱烈鼓掌，呼口號）至於同志們剛才提的具體要求，我們回去以後報告江青同志，文化革命小組再研究一下，然後我們……（高呼口號）

但是我們應該說一句，就是要革命還是要靠自己。黨中央、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高呼口號）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中央常委的一個辦事的機關。我們人手也很少，我們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做的成績也很少，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好。比如像剛才講的，華僑方面的情況，我們就

瞭解得太少了，幾乎沒有瞭解，這就是我們工作上的很大的缺點。那麼，我們能夠為大家做一些什麼呢？我們能做一些通風報信的工作。你有什麼消息，有什麼要求，我們可以向中央報告，我們做一些這樣的工作。但是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中僑委的問題也好，解決各地的農場、學校、工廠或者其他方面的問題也好，還是要靠那裡的革命的工人、農民，就是歸僑吧。歸僑裡面也是有工人、農民、學生、有教師。靠這些人，和那裡的其他方面的革命的人民團結在一塊，那麼我們就能夠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因為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堅持這個路線的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畢竟是一小撮，他們沒有什麼力量，幹不出什麼事情。（對！鼓掌）只要我們革命的工人、農民、革命的師生團結起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堅決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麼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是完全可以把它們徹底地揭發，徹底地批判，可以把他們打倒的。（鼓掌）

我想，我就簡單地說這麼一點話，我們以後還有機會見面。（鼓掌，高呼口號：「把歸僑界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徹底改組中僑委！」「堅決要求中央罷方方的官！撤方方的職！」「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同志們，我不準備多講了，因為時間實在來不及了，以後我們還可以再談。同時我們希望你們很好地總結自己的經驗，很好地考慮自己的鬥爭，我們相信你們有力量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戚本禹講話

剛才要講的話，春橋同志都講了。我想，下次有機會我還可以給大家講講。好不好？（同學們：說幾句吧！）大家在國外受了很多的壓迫，你們的父兄在外國也在受壓迫，你們經過了千辛萬苦回到了祖國，我們就一定要把我們的祖國搞成一個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有這麼一個中心，我們的父兄，在國外的父兄，要革命就有了一個燈塔。怎樣把我們的國家搞成一個革命中心呢？就是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一定要打垮我們國家裡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鼓掌）他們是想使我

們國家重新恢復到你們過去所待過的那麼一個國家，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搞修正主義。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的話，那我們這個國家就要變質，我們就要繼續像過去一樣的受資本家、地主、富農的壓迫。時間的關係，我今天的話不能講很多。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熱烈鼓掌，高呼口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³⁶

張春橋接見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及工人代表時的談話（1966.12.23.）

張春橋接見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及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

時間：1966.12.23.下午3：30~6：55

地點：人民大會堂西廳。

張：好，你們談談吧！

工人：我們談幾個問題：第一，張春橋同志批准了我們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五項條件。你說，主席也是同意的，中央文革也是同意的。他們說，這是造謠。因此，我們想將主席的原話登報。第二，《紅旗》十五期社論發表以後，對我們工人的鼓舞很大，工人造反派現在的隊伍有很大的發展。

張：（插）工人造反派現在有多少人？

工人：六十多萬。

工人：（插）上海市委同意大批的工人造反隊的隊長到北京來，這是市委的一個大陰謀，現在已有五千多人到北京來了。上海市委現在表

³⁶ 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面上是支持我們了，但實際上，是在造反派內搞分化活動。安亭事件以後，有一部分工人組成紅旗挺進隊到北京來，向劉寧一要了一個公章，這個公章很大，還要了一面旗，他們準備打旗回上海造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反，他們想擠垮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他們根本就不是造反派。

張：我希望你們搞幾個工廠，使革命群眾在那裡佔優勢，變成革命堡壘。這個事情早就講過，把總部安在工廠裡邊，這樣就保險了，人家砸也砸不掉。你們孤零零地又沒有保衛，一砸就砸了，最好的堡壘是在群眾裡面，這個事情我們是有經驗的。革命時期在敵佔區裡，周圍都是敵人的碉堡，我們住在老百姓家裡，成天在敵人眼皮下活動，他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卻很安全。所以，你們總部是否走這一條路，設在群眾中。各個區的聯絡站也是這樣，這樣就保險了，不會被砸。你們負責同志每月要參加幾天生產，這樣做，一方面不脫離生產，另一方面又不脫離群眾。你們要爭取多數，關於我簽字的問題，13日，我在文化廣場簽了字，回來，我就給陳伯達同志打了電話，下午，陳伯達同志打電話給我，完全同意我的做法。我打電話不到一分鐘，陳丕顯也打電話給陳伯達同志，他代表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魏文伯、曹荻秋、陳丕顯），這樣，中央文革就聽到了兩個意見，同意了我的。第二天（14日）中央常委開會，我也作彙報，上海碰到許多問題是如何處理的，中央都同意我的處理，過了兩天，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說的「先斬後奏」就是針對陳丕顯說的，主席的意見，中央開會的情況，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市委始終沒有傳達，一直到24號也沒有傳達。那天，我第一次參加上海市委常委會，提出為什麼不傳達，我把主席的意見，中央指示講給他們聽，曹荻秋還公開表示想不通，我叫他們給中央打電報，直到現在還沒有。這個事我過去一直沒講過，你們不是說沒有炮彈嗎？這就是給你們的炮彈。中央已經同意了，他們還反對，上海市委直到那個時候還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蓋子怎樣揭開呢？在蘇州那天，我還和曹荻秋吵了兩個鐘頭，那時鬥爭很激烈，要他簽字。我說：你不答應，我簽。後來他簽了。我們不輕易用主席的名義來發表，因為主席的話影響很大，不要隨便發表。口頭完全可以講，登報不必要，可以印成傳

單。（工人說：我們寫好給主席看一看再發表。）我看還是不要給主席看吧，我們希望盡量用自己的鬥爭去解決，我們還可以辯論嘛，到底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該不該成立，如果用主席的原話，人家就會認為我們用主席去壓人。

工人：外面造謠說，張春橋同志要我們暫時不動。

張：這件事是這樣的，當時我想，你們組織剛成立，站都沒有站起來，我建議你們暫時不動，主要的是你們內部很亂，一、二兵團的劃分是沒有基礎的。因為它既不是生產中組成的，又不是戰鬥中組成的，而是鐵道部給你們搞的。我認為這樣的組織形成不利於戰鬥，我認為按照地區和產業是比較好的。但是，這件事也得民主，總不得強迫你們解散。我們只有一個前提，就是有利於文化大革命，有利於戰鬥。幹部也要民主選舉，當選上的不一定是好幹部，有些選上了，過一段時間不行了，可以換嘛。有些沒選上的，但是是好幹部，過一段時間又可以選上，選上了好好幹，選不上可以回去工作嘛，把你那個廠的少數變成多數，我們不能總是少數。現在的問題，不是建立上面的問題，主要是建立下面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群眾工作作得很不夠，我們幹革命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有私心雜念的人是沒有好下場的，群眾也不願意有私心雜念的人去當他們的幹部，而且有私心雜念的幹部也不能為群眾服務。

工人：關於奪權的問題，有的人要用兵團衝垮總部，這個苗頭露出來了，很不好，有的同志不是為了幹革命，而是為了奪權奪利。有人在北京搞了個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駐京聯絡站，我們總部電沒有開介紹信，連我們總部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有一個公章，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同意他們的。

張：現在市委有這樣一個情況，從什麼都不同意到什麼都同意，不管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這對於保他們的人沒什麼，但對革命派很不利，這是一個壞主意。他會腐蝕革命派，而且會把罪名加在我頭上，都是你同意的呀！

工人：這次你同意了我們的五項要求，他們就寫大字報，要炮轟火燒你。其實這件事，主席，中央文革也是不同意的，實際上，是將矛頭

對準中央文革和主席，這種人是否要抓起來？

張：如果公開反對毛主席，攻擊林彪和毛主席，就公開宣佈他們是反革命，把他們抓起來，行兇、殺人的也應該抓，除了十六條講的殺人、放火、放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外，加上殺革命群眾的也該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他們抓起來，北京有好多攻擊中央文革的，如果是一般的，就不要抓，並組織辯論，因為抓起來也不一定解決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所以，抓可以抓幾個，但不要太多。上海也可以選擇很少數的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民憤很大的，扭送公安局，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有大民主。

工人：如果不收呢？

張：不收可以問他，你是不是專政機關，你們保證不保證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事要問梁國斌，究竟是不是專政機關，北京可以提，你們不可以提？但是你們要先做輿論，做好輿論準備，讓大家都懂得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採取大多數同情。北京第一天抓了幾個，當天就有人去公安部去造反說：壓制民主，挑動群眾鬥群眾，我們說這不是群眾鬥群眾，而是革命群眾鬥反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

工人：你走了，上海赤衛隊看了110號文件後，開了二次大會，他們以反對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組織了工人赤衛隊，他們的批判是假的，因為（1）他們僅僅是從110文件後才看出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我們造反派明早就看出上海市委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2）批判會比他們早，（3）你是代表中央文革來的，他們要火燒你，他們的矛頭是對準中央文革和你的，他們說，我們的組織是非法的。我們回去也沒有辟過謠，他們攻擊我們的組織，他們的宣言寫得很好，但實際行動是攻擊造反派，我們沒有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因為大部分參加赤衛隊的人都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他們的大方向和我們是不一致的，特別是我們的12·11大會開得很好，他們現在感到很孤立。他們執行的是一個抓生產壓革命的路線。現在，他們反過來說，與我們大方向一致，我們不同意，因為他們成立的目的行動都看出與我們的大方向不一致。

張：那天大會誰去了？講了什麼話？市委採取了什麼態度？

工人：楊士發參加了大會併發了言，王少庸也參加了大會。

張：我知道曹荻秋是同意他們成立的，他講話沒有？大會的情況到底如何？如果要批評，就得抓住他們一些材料。

工人：我們當前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整頓內部與爭取群眾，市委和他們參插在一起搞，報紙等宣傳品樣樣都有，而且很快，他們的通訊工具也很方便，甚至要有收發報機設備，這是完全有根據的。

張：現在赤衛隊到底是誰在搞？

工人：楊世發，總部沒在總工會七層樓，他們的條件很好，樣樣都有要參加只簽個名字就行。要袖章也很方便，簽個名就可以拿到。我們還要登記，直到現在，我們還有很多人沒有袖章。參加的人有中層幹部直至總支書記，赤衛隊市委對我們不敢不支援，我們覺得他們這樣做是一箭雙雕，成功了，他們會說當時支持我們的，不成功，往你張春橋身上推，赤衛隊從成立到現在沒有寫過一張炮轟上海市委，火燒曹荻秋的大字報。

張：赤衛隊有多少人？

工人：號稱40萬，實際上沒有這麼多人，他們的袖章發不下去，開了一次辯論會，他們自動拿下了。

張：昨天馬天水打電話給我，我問赤衛隊有多少人，他說，據我所知反正造反派多，還說總部有七個人有動搖。有的說方向錯了，不幹了；有的要回工廠；有的說不能走，應該留下來扭轉方向，我們走後，可能有更壞的人，出來幹更壞的事，據他說總部有動搖。

工人：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真正掌權的還不是工人，他們完全受當權派支配的。

張：我認為這裡分三種：一、是群眾，二、是領頭裡最壞的人，三、是幕後指揮。現在要揭露的是真正起作用的，並且表現很壞的。你們應該調查那些總幹武鬥的人，抓到這些人，他們內部會更亂，而且要抓幕後指揮者，北京西城糾察隊在運動初還是比較好的，有些功勞，在掃四舊時，他們打人殺人是有問題的，但也有可打可不打的，那時我們

沒有出來講話，因為，當時他們的大方向是對的。現在不同了，主要打的是革命群眾，所以就抓了他幾個，應該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這裡也有幕後操縱者，主要幕後操縱者揪出來，聽說，有勞動模範支持他們，現在還有幾個？從蔡祖泉轉變過來，你們應該看到，他們是能夠轉變的，那時候我就想到了，要是勞動模範站到你們這一邊就好了。（小王插話：北京的時傳祥如何？）北京的時傳祥有可能變得很壞，這些人要給他們做工作，王鐵人也表現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這些年來，他們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到那裡都鼓掌，都受到歡迎，沒有聽到什麼批評，但是，他們影響很大，一起來談話影響就大了，應該看到這個嚴重性。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到處講話作報告鼓掌，還有什麼革命要求呢？他們不像一般工人，貧下中農，楊懷遠現在有什麼壓迫？沒有壓迫。如果你們給他一點壓迫，他就可能革命了。有些勞動模範，過去受苦容易滿足，現在沒有革命要求和遠大理想，光知道現在甜呀，甜呀。所以，不能老是憶苦思甜，闖吧！還要有個遠大的革命理想。好吧，你們還有什麼不瞭解的話？紅革會的同志談談吧，那天很對不起你們。那天你們走後，安徽的人保李葆華真是毫無道理，一個問題就搞了二個小時，開始就錄音，就搞了一個多鐘點，第二談話一段就要整理一段，還要我簽字，我說，為什麼要這樣呢？我們談話是很隨便的，如果說這樣的話，那我就不談了，你們乾脆提出幾個問題讓我回去考慮一下，寫成書面的當面來講，為這事情就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好吧，紅革會，你談吧。

李：我們這次派人到北京來，主要是向首長彙報，此外就是要見中央首長，我們的聯絡還沒有站住腳，《紅旗》十三期發表以來，上海的運動形勢大好，但是上海市委有幾個擋箭牌，譬如評《海瑞罷官》的問題。

張：關於《海瑞罷官》以後還得姚文元同志講清楚它。上海市委一點力也沒有出，這是主席的功勞，當時江青也在上海。從一至六稿是我與姚文元同志搞的，都沒有給市委看過，直到七稿時才給市委看，這件事和市委根本沒有關係。

李：當時流傳定稿是上海市委討論的。

張：沒有這回事。實際上，這事是我與姚文元搞的。我也不好，當時是為了搞好市委內部，此話在上海市委是講過的，說市委討論過幾次。也為了不搞個人突出，謙虛，沒想到這變成了保市委的資本……

祁：有人講：總理打電話給市委，說市委是革命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那天5號早上，我到這裡，總理一見到我就對我說，你看上海怎麼搞的！總理很不滿意。很多北京紅衛兵一見總理就問，總理不知解釋了多少遍。對一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因為運動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績，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中央是有一定評價的。總理是因為北京學生不介情況，給他們講一講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們調查一下。但是怎麼能夠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確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紅衛兵來了為什麼連見一見都怕得要死呢，特別是宋季文講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問題，我和姚文元聽了都氣死了！其實《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有成績、有錯誤與宋季文一點都沒有關係，他有什麼可吹的？只要粘一點邊，好像就和他們關係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來了。評「三家村」是我一手經手的，最後的稿子市委要去討論過的，修改的地方、增加的恰好是吳 的觀點，我正好到北京開關於彭真的會議，沒有參加討論。《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思想是主席的，具體是由江青同志搞指導的。

（總理為這個很生氣。主席說，北京找不到人寫文章，才帶到上海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有成績也好，有缺點也好，與宋季文毫無關係。）

李：陳丕顯這個人物很值得研究（張笑了笑），他是幕後指揮，我們認為他還是有實力的。市委保常溪萍，保楊西光很厲害，他們認為常的問題，主要是北大的問題。《紅旗》13期以來上海才真正亂起來了。市委是十分狡猾的，九·四事件以後來了個大串聯，四、五天之內都走光了，10月5日指示以後搞三秋勞動，勞動後又搞串聯。

張：你們還是集中力量攻市委吧！這樣才能爭取中間派，取得一些

勝利，中間派會跟過來的。關於工人五項要求的問題，當時從市委書記處到常委沒有一個人支持我！

李：他們還說，派工作隊張春橋也在場。

張：他們現在是什麼東西都把我拉在一起，他們老早就要我回去，他們拿我當擋箭牌。

李：曹荻秋那時很得意，有人講：上海很好，派工作組派得少，有水準。曹荻秋說：「也沒有什麼，按主席指示辦嘛！」

張：「8.26」事情以後他們拼命要拉我回去，他們拉我做擋箭牌。我看事情已成這個樣子，我就不回去了。

李：上海市委決定黨委停止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據說你是同意的。

張：當時我是看到黨委領導運動蓋子揭不開，他們給我說了，我也就同意了。但後來在「支部生活」辦公室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所以現在我也變得聰明，他們用電話給我反映一下就要我表態，我不發表意見，讓他們自己處理，關於《解放日報》事件大體上我已經知道了，有不同觀點的人寫信給我，有同意你們的，也有不同意你們的，傳單我也看到了，同意你們的是多數。

李：陳丕顯到底怎麼樣？前一個時期他不是說生病，中央是同意他休息的嗎？

張：生病休息是有的，在這次中央會議上給他談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來，對他說：「我和春橋做你的參謀」，但他沒有這樣做，特別使我吃驚的是他打電話（指關於五條問題給陳伯達同志打的那個電話——轉載者注）問了那麼多的問題，「到底中央文革給了他（指張春橋）多大的權力呀？！」「他為什麼不與我們商量？」態度很壞。實際上說我完全沒有給他們打招呼也不對，我在去文化廣場之前就已經給他們談過了。馬天水這次的態度還好，但他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態度很不好，批評了他，他在會上表示我改我改！

工人：目前階級鬥爭很複雜，工人造反派裡還有混進來的「託派」。我們要好好觀察形勢。鬥爭還會有變化，有的要多觀察幾天，等

他暴露出來再說。比如北京那次要炮打中央文革，很多人替我們擔心，我們說沒有關係，看幾天，我們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是明辨是非的。要沉著，就可以發現問題，有的人要上街，我們讓他們這樣，他們只不過是小小的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內部的動盪是不可避免的，原則問題不能讓，枝節問題不要糾纏，學生運動中出現的缺點，只要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以後就會改正，出現問題主要是私心雜念。

小王：在鬥爭中內部有矛盾如何解決？你們要求同存異，北京已是這樣，在原則問題上不要讓，學生本身有弱點，沒有經過鍛鍊。工人運動也有問題，我早就觀察，有些人的行動就不像學生裡的「左」傾，工人與學生要在鬥爭中結合。

我最近回上海想瞭解一下上海的情況，市委老早就希望我回去，革命派也想我回去，揪我的人當然要我回去。

眾：現在回去不適宜。

工人：你可以以中央文革的名義回去，不要以市委的名義回去。

張：市委希望我回去，要我幫忙，這個問題不可能，反正我不會保市委，對你們我也不能包辦代替。但有些工作，你們不能做的，我可以幫你們做，比如市委幹部不明真相的，你們就不能去開幹部會，開勞動模範會，使大多數站到正確路線上來，你們不能做的，我可能會做。我去了以後，你們不要完全來找我，有些事情可以找我，有些也不用找我，你們自己去幹，有些事情如果我不表態，你們不要硬叫我表態，有些事情你們自己作主。至於保皇派對我可能日子難過一些，硬衝進我家，那也沒有關係。因為上海城市太重要了，政治經濟都很重要，六個月來市委對群眾一直壓著，使你們沒有得到鍛鍊，不過時間長一些可以鍛鍊人，我想等姚文元一起回上海，把一些情況與幹部講，把市委的幾人法寶繳械，減少阻力，上海市委老是講工業搞得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評「三家村」我們要講清楚，對你們可能有好處。把幹部爭取過來，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更加順利地進行。

×：總理說，停止串聯，抓緊這個時間搞鬥批改，但是我們認為北京走到外地的前面了，但是我們坐下來搞鬥批改可能搞不下去。所以我

覺得，讓我們先下廠、下農村鍛鍊一段時間，然後與其他地方一起搞鬥批改。

張：中央的意見可能是這樣，中央有個新的考慮，我們將林彪、陳伯達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發給你們，總結一下，學習一下，然後下到工廠去，鬥批改目前看來還不可能。

—完—

（本文系紀錄稿，僅供參考）³⁷

³⁷ 《反到底》，1967年1月8日。

1967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1967.1.9.）

【時間：1967年1月9日中午12時15分，地點：上海延安中路友誼電影院。】

張春橋講話

今天報紙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人民日報》發表了編者按語和你們紅革會等十九個單位聯合簽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發表在造了反的《文匯報》上，毛主席看了這個材料，毛主席看過後，認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寫得非常好，《解放日報》《文匯報》的反造得好。為此，《人民日報》為這篇文章加了編者按語，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上海革命學生、革命工人的最大關懷，最大鼓舞。關於這一點不要寫大字報，可口頭傳達。（姚文元插話：這是毛主席的聲音。）我們上海革命左派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這個編者按語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在上海各工廠、街道、里弄家家戶戶進行最廣泛最深入的宣傳，把毛主席的聲音告訴全上海人民，動員一切力量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把資產階級的新的進攻徹底打倒，不只是把經濟鬥爭轉過來，而且要把革命左派隊伍真正壯大起來，把工廠、農村的左派隊伍真正壯大起來，使我們革命左派隊伍在上海真正取得優勢，這樣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才能更深入、更廣泛、更全面、更好地開展，這是我們今天來的希望。

你們紅革會也好，其他革命組織也好，希望你們分分工，大家做做宣傳工作，要把這個當作很重要的任務來完成。同學們對經濟鬥爭沒有經驗，參加這個鬥爭對我們同學有很大幫助，人家還會以經濟手段來向我們進攻，例如：一個碼頭停工，要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不僅在經濟上有損失，政治上也有損失，外國已有二十幾隻輪船在中國開不出去，莫斯科的

廣播電臺也在宣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上海的工人要求加工資罷工了。這是對我們最大的考驗，我們要有勇氣迎接他們的這個新挑戰，老實說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究竟是資產階級力量大還是無產階級力量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爺不會幹事的，叫曹荻秋開汽車他會嗎？能力、權力在我們工人手裡，但現在被利用了，被蒙蔽了。所以，需要學生不只是到工廠，也要到街道、里弄，也要到自己家裡去宣傳，使群眾瞭解什麼叫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的鬥爭。從政治上揭露這一陰謀，如果跟這一條路線走，那我們文化大革命要失敗，有的人搞了一千多元錢，但文化革命不搞好，我們眼前的這點利益也沒有了。我們的矛頭不指向工人，藝徒，不責備他們，不要抓小人物，要抓就抓大人物，要揭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搞陰謀，大家來批判揭發，可登在你們的《紅衛戰報》上，也可以登在《解放日報》上，《文匯報》上來揭露他們的陰謀，把矛頭對準這些人。

我們要相信上海工人大多數是好的，最近有許多工人特別是革命造反派工人表現很好，不離開工作崗位，而且延長工作時間，頂別人的班，我們要大力表揚「抓革命、促生產」的好工人，我們應向他們學習，宣傳他們的事蹟，表揚「抓革命、促生產」好的單位。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我們要看到主流是很好的，要求加工資是一股逆流。

毛主席講過：「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在這些階級鬥爭中，中央要抓重點，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東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這樣一個地位，這說明，毛主席對上海的運動很關心，並寄予無限希望，我們兩人每天要打電話回去，毛主席對上海的運動非常關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學生起來了很高興，後來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來了，更加高興。12月25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們到毛主席那裡去，他說：「上海的革命學生起來了，革命的工人起來了，革命的機關幹部起來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上海有了新生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又有了這樣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不僅對上海有影響，對華東地區，對全國都有很大影響。我們有責

任，有義務在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成為全國的模範。全國只有上海有這麼多工人，上海的學生也是有革命傳統的，上海的幹部也極大多數是好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把上海變成一個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新上海。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來到上海作調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來的調查員，市委希望我們回來作他們的擋箭牌，我們不幹。赤衛隊要把我張春橋揪回來鬥，我不接見他們，因為要首先說清楚一條：究竟是他們對，還是我對，說清楚了再接見。我們到上海來，是向上海人民學習的，我們主張快點把消息轉給中央，我們當義務傳遞員，把《紅衛戰報》轉給毛主席。（熱烈鼓掌）你們有什麼好的經驗，我們可以替你們傳達、介紹。我們還可以給你們提些意見，我們不一定說得完全對，你們可以自己考慮，你們完全有權力自己去做，你們也可以不和我們商量，你們給我們商量，我們也可以不發表意見，你們自己去做，這對你們有好處，因為我們一發表意見，你們就會按照我們的意見去做，我們的意見不一定對，我們也要向你們學習，我們彼此之間可以談談心，交換交換意見，你們敢想、敢說、敢革命，我們有意見一定會給你們提的，例如，我們今天談話不要用大字報貼出來，因為這樣對你們沒有好處，大家會認為都是中央文革給你們出的主意，我們有時說錯了話，你們也可以批評，炮打中央文革小組，要砸爛狗頭，同志們的批評不屬於砸爛狗頭之類（大笑）。我們批評你們，你們批評我們，這是完全正常的。

（浙江金華大中學校革命造反總部駐京聯絡站1967年1月18日）

張春橋、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駐滬聯絡站人員座談 (1967.1.11.)

【參加座談會的有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等外地駐滬聯絡站工作人員】

張春橋講話

早就想與北京來的同學談一談了。大家無非是想聽聽消息、交換意見，你們可以先提意見。

（有人提到學校裡軍訓，調回去的問題。）得到通知的是不是四個單位：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北大、清華？你們講講看法吧。

（三司的說北京要求明天就回去，他們想留點人在這兒。）大概不可能，軍訓只有兩個星期到二十天。軍訓是這麼回事，最初，從毛主席接見碰到的問題，隊伍到天安門就走不動了，後來派解放軍去。這樣好看，時間也節約。他們說那一次最好按毛主席的指示編成隊伍，根據這一點，今年4月又要接見，如果又恢復接見，又會碰到問題，這是最初的想法。後來想不僅如此，真正的紅衛兵站隊要像樣，最近這半年也懶散了，睡覺、吃飯也不規則，有些人由於工作需要天亮才睡，當然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懶散。我們討論時，不僅軍事訓練，也要政治訓練，紅衛兵正處於初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年，紅衛兵8月才成立。紅衛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為毛主席的紅小兵，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問題、作風問題。中央考慮就要政治上訓練。現在有條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現在能看懂了，除了「老三篇」和語錄外，讀一讀古田會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和時局》，左派隊伍中出現的問題與古田會議差不多，對紅衛兵也完全適合。上海各紅衛兵組織間，一個組織內部，查一查古田會議決議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變形式，有的連形式都一樣。伯達同志講「老三篇」討論時，主席講，

大學生對馬列主義基本的要讀一讀，如《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是必要的。經過這一段，學習一下，總結經驗，把學習主席著作與總結結合起來，時間又不能長，又要總結經驗，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別是中學生不同意。因為中學生最近才回去，認為對兩條路線鬥爭有妨礙，這個大概討論了一個月，開一次座談會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勢變了，北京在一周內就變了，抓西城糾察隊，許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華好多左派組織合成了一個井岡山，在新形勢下，感到要軍訓了，組織之間問題不怎的……清華只餘下了「井岡山」，地院只剩下「東方紅」，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員會，先在這些左派佔優勢的學校搞軍訓。我與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學習一下，因為全國都要準備推廣。這個問題就這樣，因為我們不能代替總部，我們可以向北京問一下。從我們兩人在這裡的意見。希望多留一點。也可能家裡人少了，各地方不回來也不行。學完後也準備下廠下鄉。（有人問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聯歡他（指日本政府）不發簽證嗎。準備了一年多了，來以前在加緊籌備，最後不發簽證沒法來。（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聯絡站能否搞軍訓）因為上海學校沒與他們商量過，究竟什麼時候搞？你們可以向總部建議。（姚文元插話：可以提一個，也可以提兩個。）

關於周總理、劉甯一講話我們沒問。根據我們知道，中央準備發一個文件，徵求意見稿，他們剛剛起草出來，還沒徵求中央意見。如果正式稿，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中央發社論、檔，因為全國都有類似問題。

（談到按職業成立組織問題）我們主張按階級組織隊伍，紅衛兵是革命青少年組織，應該是堅決捍衛毛主席路線的，無產階級化的隊伍。1965年、1963年畢業生有各黨各派，我們主張按階級分，不按職業分。美國分裂工人隊伍是按職業隊伍，十六條提出是組成階級隊伍。

（談到支疆家長造反及回鄉支農造反時）方向不對的。要到新疆去。到邊疆去，上山下鄉這是總的方向。

（談到市場感到壓力很大）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話反映百貨商店情況）整個形勢，經濟問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已作了基本分

析。這個文件主席看了說：很好，又是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人民日報》編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對《解放日報》、《文匯報》造反很贊成。同學們過去恐怕沒碰到，那時來串聯誰會想到這一手。衝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別我們同學沒搞過經濟工作，我們碰到了，見見世面，我們要很重視，看到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總的要藐視它，他們是沒辦法，最後掙紮。過去上海抓生產是舉得很高的，過去到過上海的同志對我說，上海十六條只有一條「抓革命，促生產」，還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上次我來處理安亭事件時，最大壓力是生產，對工人造反隊是最大壓力，對我也壓力很大，說我拿原則做交易。這些人當時還覺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沒壓下去，他們就連原則也拋棄了。我們沒來時接電話聽說，赤衛隊「三停」，幾萬人包圍了康平路衡山賓館，幾萬人上北京。赤衛隊來電報很多的，壓中央文革派人來，我們感到這是件大事了。但也預感到赤衛隊要垮臺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脫離上海人民，幾萬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產？！我們就與一些同志打電話趕快把抓革命、促生產旗幟舉高高的，過去他們拿來壓革命，現在拿來促革命，保衛毛主席路線，現在看來應該這樣，把這旗幟樹起來，因為這代表了廣大群眾眼前和長遠利益，我們要有精神準備，甚至造成比這更大困難，也不要怕。為什麼不要怕呢？應該相信廣大工人群眾不會去搞破壞，去離開生產崗位，這點要充分相信群眾，他們要聽主席和中央的，這點無論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這就垮得更快。上海剛解放，問題更嚴重，現在碼頭上東西多，沒法運，而過去是沒東西。我們最關心糧食，第一位的是吃飯，只要上海人民有飯吃，就大膽幹，餓肚子也可幹，但有飯吃更好。那個鋼鐵廠停了，這個嚇不住我們，停幾天，革命照樣幹，以後再趕上去，當然我們不是提倡停工。但我們來上海感到左派壓力大。我們沒掙錢，沒簽字，沒停工，壓力不是對我們。

那一天對《解放日報》也說了，報紙上要表揚一些抓革命、促生產的好事，按工廠十條搞得好的，應該登報，個人、組織、一個單位。因為這些同志在階級鬥爭這個關鍵問題上站在正確一邊，應上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造反了，沒框框了，過去不能上報，現在統統可上

報。簽字特別多的，胡開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長以上的，廠長、科廠不要，開鬥爭會鬥他，讓老工人發言揭發他，甚至讓一部分覺悟的赤衛隊員來控訴他。

剛才講了戰略上、具體工作上要艱苦，自發的工人運動總是要搞經濟問題，我們任務是把經濟問題提到政治上來，提到兩條路線，國家變不變顏色上來，學生與工人結合，把馬列主義、毛主席基本觀點帶去，這是需要知識份子說明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識份子快，他們文化上有限，知識少。這是學生光榮任務。你們下去在一個廠、一個車間看到的要登報，可能發現新的勞模，代替了他們，應宣傳這些新的人物。

現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門。先穩定下來，碼頭已回升了，最低點是萬噸，昨天達到六萬噸，能把自來水、郵電、公安等部門左派真正動員起來，占了優勢，「三停」做不到，然後發動更多的人到工廠去，這樣更加廣泛結合，我們去不能光談經濟問題，要掌握鬥爭大方向，要把經濟鬥爭提高到階級鬥爭上來看，這鬥爭有什麼嚴重惡果，在鬥爭中不斷揭露市委，揭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稍穩定下來，還要回頭打政治仗，現在不能不抓一下生產，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決，不然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就要犯錯誤。

（大家反映了關於社會青年、下放工人的問題）

馬陸公社的農民為什麼進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簽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臨時工，收入就比農民高，吃飯算那兒就成問題。於是就規定你在城裡做工的，收入歸公社一部分。簽字就說全歸個人，公社工業國營，於是農民就進廠，變成農業工人，鬧國營農場要求。

（有人說這股風刮到農村影響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萬，這完全是破壞農村文化革命的。我們要承認我們的工資制有問題。是在進城後形成的，特別上海千差萬別，有的是帝國主義工業，裡面重體力工人給很低，要害部門工資很高，用這分化工人。這制度對我們也有影響，所謂保留工資，還有封建主義影響，解放後蘇修影響，還沒有按中國情況。主席一貫主張搞一套適合中國情況自己的，有利於消滅三大差別的制度。討論了幾年始終沒解決，這問題到

文化革命後期一定要改。否則，也可能因為這犯錯誤，影響國家前途。同學們說理時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這工資不僅個人生活問題，而是關係前途問題，是按修正主義道路發展呢，還是按共產主義道路發展？這是在文化革命中間，在批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決定性勝利後才能解決，領導問題解決了，左派占了優勢，正確思想占上風，才能解決好。目前不要上敵人當。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現實要解決的問題，目前先剎住，你們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現在做起來不難的，不解決就又走向另一極端，這也要注意，否則就脫離群眾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於揭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之要與兩條路線聯繫起來。最近我們還沒有與基層工人接觸，因為與各組織見面還沒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兩派問題）我剛剛接觸到公安局問題，過幾天，找他們談一談。解放軍接管，或分化他們。後想解放軍接管不好，不是有個基本原理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則變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這在任何時間不要動搖。這問題看來要外地幫一下。他們中間總要有人起來堅持毛主席路線的。因彭真、陸定一搞好多年，有問題。但毛主席對這抓得很緊。我們正在交換意見，都交給造反派，任務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動串聯了，後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許多人找不到地方睡，於是這些造反派找我們，我說搞一個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來很困難，因為機構都癱瘓了。現在造反不那麼簡單，一造反，各種壓力困難擺在面前，如《文匯報》、《解放日報》也是，給壓力很重。我們考慮，有的還是要當權派幹，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線上？就幹嘛，給機會嘛，最近幹部要來談的就多了，他們犯錯誤，檢討承認給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這樣對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機動一點。公安局問題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訴造反派去監督。否則他們自己要造反了，又搞業務，忙不過來。

（有人問：可不可以與公安局串聯？）這問題沒有研究過，原則上不採取串聯。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軍接管公安局）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還沒有

撤，陳毅還是主任，隨時可以管制。還是用大民主。西城區糾察隊也沒什麼了不起，一個小指頭問題，不要都壓在自己身上。那幾天北京同學幾個司令部都很緊張，說他們要鬧大事了，也沒什麼。一二·九要在天安門開大會，也沒有開起來。他拿這個旗幟根本號召不起來，群眾不會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視，要積極做工作，爭取群眾，他也要相信群眾，保爹保媽這誰聽，這口號叫不起來的。

（關於赤衛隊）總部桌子砸爛了，思想沒有砸爛，方向沒有砸爛，你們的宣言、通令怎麼辦哪？那些事做錯了，要在社會上說清。

我們來是以調查員、通訊員身分來的。一個是來不來？後來說來。來以什麼身分？後來考慮以這個身分最好。這樣是不是消極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見可以找我們，我們有的意見也有錯誤，我們剛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問我們，有的，不說一點不好辦，說一點又不夠，你們最好自由行動，我們也自由。如1月6日會，我們考慮不參加，要參加就要講話。一些會也不參加，可以東跑西跑，瞭解情況，大會可以瞭解情緒。中央也給我們任務，給上海左派組織，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給以幫助。因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談談，在上海就沒有，各組織發生問題也沒人幫忙一下。³⁸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1.11.)

中央賀電發出後，影響很大，人們要來上海學習經驗，要接待。全國在向上海市學習。中午，中央文革小組通知我，中央四個組織（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署名發一個賀電，送到主席那兒去了，正經主席審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寫好了，

³⁸ 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上海工人革大《紅旗》1967年1月13日。

明天見報。我回電向中央表示感謝，這是中央對我們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無前例）以中央四個組織的名義給革命群眾組織，而不是給上海市委，這是從來未有的。上海解放時，中央與中央軍委發過賀電，再也沒有發過賀電。這是對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最大關懷，最大支持，也是給了我們最大的責任。（召集大家來，討論一下，我們怎麼辦）

（北航紅旗王健良：我們上海各組織給中央四個組織發致敬電。姚文元：給毛主席。）

現在形勢在回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來，不管碼頭、工廠、市場都在回轉，但不穩定，困難還是不少。

（在談到《緊急通告》上簽名問題時）有些名稱不妥當，本來想商量一下，來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組織是毛澤東主義的，在北京已改正過來。毛主席不同意這個叫法。我提個意見，你們考慮考慮。（讀賀電，從略）

我們來上海，身分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調查員。四日來以後，開過一些座談會，還沒有在大會上和群眾見面，不是怕群眾，而是為了爭取時間，工作從容一些。調查員顧名思義是作調查的，不是來當保姆的，不是來包辦代替的。主要靠我們自己，你們有什麼工作最好不要和我們商量。我們沒有來以前，你們不是幹得很好嘛。上海的情況，我們可以向中央彙報，中央有什麼指示可以傳達，我們不會對大家保密的。

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經驗。在市級黨政機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但是革命群眾能夠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辦事。你們現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裡。只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進行到底。我們應當相信上海革命工人、農民、學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時間內就把形勢扭轉過來了。就港務來說，原每日八萬噸，6日低潮僅三萬多噸，現在回轉過來了。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進攻打退下去了。

我們取得了一點成績，中央作出了這麼大的估價，說是全國的模

範，而我們作的還不夠。與其說是中央對我們這樣高的評價，不如說是中央對我們寄託這樣大的希望。我們怎麼樣作出行動來不辜負中央、主席對我們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組織之間有些矛盾，彼此聯繫不緊，有些事情是不妥當的，如《緊急通告》的署名次序問題，光想爭第一位、第二位簽名，揚言要封《文匯報》，為了登一個廣告，就想封《解放日報》。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麼都可以登的。這樣就推遲了《文匯報》、《解放日報》的發行。

我給上海各個革命組織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以全域利益為重呢，還是以個人、單位元元的利益，局部利益為重呢？中央說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聯合，這是對我們的希望，但是我們這裡確實有問題。我們應該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求同存異。

上面談到的事，我原來很吃驚，《文匯報》、《解放日報》的新生，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件。毛主席剛剛肯定了的，有什麼理由要查封呢，這算什麼革命行動呢？老實說，現在有人要查封《文匯報》、《解放日報》，包括《支部生活》的話，受到砸，我們每個革命組織都有權起來保護。砸爛狗頭是對敵人，不是對同志。以後要變了，再造反，現在不行。

聽說小教挨了六發小口徑步槍子彈，不要以為我們革命鬥爭成功了，鬥爭還會尖銳起來的，要做好準備，鬥爭有各種形式，敵人一手失敗了，還會有另一手的。我們要互相幫助，互相支援，如果小教挨了砸，我們能都去支持嗎？我們不要互相拆臺，勾心鬥角，爭名奪利，我們要想到現在鬥爭很尖銳，階級敵人會用任何辦法來對付我們的，我們要真正互相幫助，只要是一個革命的組織，革命的人，不要什麼命令就要互相幫助支持。這樣才能不辜負中央給我們這樣高的估價，這樣大的希望，才能達到上海市革命組織真正的大聯合！

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中央賀電，學習中央對我們的評價。已經做到的，我們要保持；還沒有做到的，就去爭取，以實際行動來回答中央對我們的支持。

目前，保守派，我一個也不接見。昨天晚上，有二、三十個不速之客翻牆進了我的住處，自稱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沒接見，我是有準備的，當然不知道赤衛隊什麼時候會衝進我那裡。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夠把言論權、時間安排權給我們，工作會從容一些。上一次來上海，到最後幾天，是無法生活了，而且幹的也不是我所願意幹的。

革命造反派之間，有什麼就談什麼。以後有什麼問題最好是寫信，托《文匯報》、《解放日報》社整理信件，我們去取。上海這幾個組織不好單獨接見，大會又不解決問題。

（姚文元同志感冒了，他不講了，散會。）³⁹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 (1967.1.12.)

【上海革命造反派召開「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講了話。】

張春橋講話

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幹部同志們、紅衛兵小將們、同志們、戰友們：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大家好。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同志們：我現在來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上海各個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略）

同志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我

³⁹ 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上海工人革命大學紅旗總部1967年1月13日。

們非常高興地參加今天的會，並且我們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身體也非常健康，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對於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關心的。大家都還記得：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就是從《海瑞罷官》這個反動戲的批判開始的，而這個正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在上海揭開的。上海市委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傢伙，他們貪天之功，好像他們在這一方面還有什麼功勞，可以拿來當作抵抗革命的擋箭牌，這是非常可恥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連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況，甚至於上海革命群眾提出來的中心口號毛主席都能夠一字不差地背得出來。

上海文化革命中間，每當出現了一個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堅決最熱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為標誌的上海革命工人運動的興起，是什麼人首先來支持的呢？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革命同志們造了反，奪了權，又是什麼人首先出來熱烈地讚揚的呢？又是我們的毛主席。上海各個革命組織發表了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一個文件一傳到毛主席那裡，他就立刻給予最高的評價。1月9日發表的《緊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讚揚。這都一再地說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連心的。

毛主席最近，當我們出發以前不多久，給我們說過，他說上海很有希望，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各方面都起來了，上海搞好了，就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這是毛主席最近講的，對上海的很高希望，那麼今天剛才我宣讀的昨天已經向全國廣播了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更加集中地體現了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的關懷，這是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這一個賀電也是對於一切反對上海革命人民的傢伙們的最沉重的打擊，上海是我國無產階級強大的革命基地，帝國主義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他們要想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就一定要奪取上海這個基地，上海

解放以後十七、八年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是我們全國階級鬥爭的一個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間鬥爭的歷史。在這個鬥爭中間，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地搗亂，一次又一次地失敗，無產階級一次又一次地鬥爭，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間，上海無產階級在偉大的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芒萬丈的燦爛的光輝照耀下，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勝利。《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就是上海的無產階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們已經取得的勝利的總結，又是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動新的進攻，粉碎資產階級新的反撲，開展全面階級鬥爭的前進的號角，是我們奪取新的勝利的進軍的號角。

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於失敗的，他們還會採取各種手段同我們較量。但是同志們，他們只是一小撮，他們是腐朽的力量，他們是註定要失敗的。我們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在戰略上藐視他們，在戰術上重視他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賀電就是最新最活的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奪取新的勝利的方向盤和指南針。我們為了奪取新的勝利，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成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我們要永遠地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及時地識破和揭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給予粉碎性的打擊。我們要堅持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我們一定要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堅決地執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中間規定的政策，把每一條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貫徹執行。

我們勝利的保證就是偉大的毛主席撐我們的腰，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有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我們勝利的保證，還在於我們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聯合。上海各個革命組織，已經聯合起來，我們希望你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的原則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這種聯合，把一切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我們希望經過我們的鬥爭，使得上海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機關、每一個街道，都成為無產階級的強大堡壘，經過我們的鬥爭使整個上海成為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我國革命人民的強大的基地。

全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聯合萬歲！

偉大的上海人民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⁴⁰

張春橋談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鬥爭（1967.1.18.）

【按：1966年12月31日，中央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在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下，一舉奪了中央廣播事業局梅益、丁萊夫等一小撮走資派的黨、政、財、交大權，從此，廣播局回到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手裡，廣播局新生了！就在這幸福的時刻，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肯定了我們的奪權，指出了我們要奮鬥的方向。1967年1月18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對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革命群眾的談話中，談了中央廣播局戰鬥團的鬥爭和奪權。】

⁴⁰ 上海革命京劇文工團、上海新華印刷廠半工半讀學校《新印》戰鬥隊毛澤東思想宣傳員聯合編印，《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張春橋講話

中央台有三個組織，現在變一個了，三派最初我們也搞不清楚，因為現在他們都打造反的旗號。後來，我們和每派人都談了話，識別了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保的。在「保」的人當中，一般群眾是熱愛黨的，不能都看成壞的。中央台多數同志是好的，丁萊夫黨委是不好的。後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內部的革命派，那裡的革命派要經過幾個回合，把多數人團結起來，才能站起來。單純來一個宣佈是不行的。要我們宣佈一下當然是簡單的，但是不利於鍛鍊真正的革命派。

去年4月16日，我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也都在上海。那天早上一早就聽到廣播《北京日報》假批判真包庇的編者按語，引起了我們很大的注意，我們一聽就知道是假批判，很明顯這是假批判嘛，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就使我們感到，即使門口戒備再森嚴，裡面照樣可以發布政變的命令。你外面保護得很好，裡面搞政變有什麼用呀！所以權不在革命派手裡，那就應該奪權。不過奪權的條件要去創造，中央台他們奪權也不是一天就奪下來的，他們經過幾個月的鬥爭，是經過一段工作的，我們感到他們奪權可能是比較鞏固的。⁴¹

張春橋在接見上海革命造反派會議上的講話 (1967.1.20.)

【1月20日晚上9時，張春橋同志接見了上海三十五個革命造反組織（原三十二個加上紅土司、教革會、公安造反隊）。就上海當前任務作了重要講話。此文根據「教革會」參加接見代表的傳達整理。未經本人審閱，供參考。】

⁴¹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張春橋同志說：「你們不要認為鬥爭勝利了。在我們的面前還有嚴重的鬥爭，我們還要準備打幾次硬仗。」（這句話張春橋同志反復講了兩遍，姚文元同志在旁邊又重複了一遍）

張春橋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奪權，要接管。他說：「奪權的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權一定要奪回來，一定要奪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革命的百年大計、萬年大計、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我們一定要化很大的力氣，化很大的功夫，把權奪到無產階級手中。」他說：「奪權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大聯合。奪權是爭取群眾，聯合要在鬥爭中聯合，要在鬥爭中爭取群眾，現在還有一些陣地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還有很多群眾沒有站在我們這一邊。」

張春橋同志特別提到中學的運動幾乎處於停頓狀態，中小學一百多萬師生都沒有發動起來。如果發動起來的話，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中學的運動絕不能走過場。他指出，目前還有很多群眾卷在經濟風中，所以上海目前運動的焦點是反對經濟主義。如果不反對經濟主義，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斷。經濟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通過反對經濟主義，我們可以達到革命的大聯合，可以爭取群眾，創造新的經濟命脈，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張春橋同志接著說：「你們想一想在當前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中有那些可幹？」他說：「正像你們剛才說的（指他講話前大家的議論）陳丕顯還沒有打倒，他還在活動，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還有勢力。市委機關的階級鬥爭蓋子也沒有真正揭開。赤衛隊還在改頭換面，轉入地下活動。社會青年、里弄幹部、下鄉支農返滬人員的工作都沒有人去做。」他還指出：「難道教育系統、文藝戰線上就沒有經濟主義嗎？為什麼沒有人去搞呢？」

張春橋同志最後說：「現在考驗一個組織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徹底不徹底就是看他在反對經濟主義問題上的態度。」⁴²

⁴² 上海工人北上返滬三兵團，《狂飆》第三版，1967年2月2日。

本月

張春橋對上海目前形勢的幾點看法（1967.1.）

- 一、中心問題：是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
- 二、造反派要更好地團結群眾，建立新的勞動秩序，有些組織有機會主義，如57年成立派別，58年成立級別，炊事員成立派別等等，這樣會分散階級隊伍，建議工交系統組織階級隊伍。
- 三、上山下鄉是大方向，應大力宣傳。
- 四、多宣傳打倒經濟主義，就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五條，逐條宣傳，集中點便是抓革命，促生產。這樣可以處於不敗之地。可以召開上千人的大會，介紹新的先進事蹟。
- 五、上海形勢，外部矛盾轉入內部矛盾，造反派內部打內戰，造反派要整風，做到艱苦樸素，接近群眾，不要有氣，有些組織可以搞些條例。
- 六、遊街多，打擊面過廣（注：上海最近遊鬥過多，當權派、保守派等被拉上街），有的出現跪的現象，這本身就是封建主義的東西。
- 七、左派掌權，左、中、右都可以使用。不然，左派就會被別人打倒。
- 八、要做群眾工作，接管後，主要問題是生產問題。上海地方關係全域。
- 九、造反派要注意團結，在大方向一致下求同，小節可以有異。好好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 十、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中，北京市中學生要比大學生差二大截。上海也是這樣，上海某些中學造反力量很弱。

（此講話大致在1月下旬）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講話摘錄（1967.1.）

【時間：1月中旬】

張春橋講話

「康平路事件，到我家去沒什麼，我早就有精神準備，早晚要砸，到柯老家，那天我問，柯老家去人沒有，他們說警衛去兩個，局長、副局長為什麼不去？他們答不出來，我很氣憤，你們只知道保衛曹荻秋，對柯老不關心。」

「這次上海工人階級的確偉大，在歷史上也將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市委實際上是癱瘓，或者說被群眾推翻了。」「中央和毛主席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高興，毛主席看到我們在經濟上能打勝仗，在政治上能打勝仗，在無產階級專政上也能打勝仗。」

「現在接管成風！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我建議把總工會接管，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掛上，抽一部分來接待，快速調查一下，多少空房子，有多少炊事員……目前不做，（來滬串連的人）五十萬人的打算是要被動的。主席很關心上海，一是經濟問題，全國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階級強大，在黨政機關癱瘓以後，自己搞起來。」

（有人提出徹底改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們提個方案，誰當第一書記？」

工總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張春橋：「現在叫誰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一樣過兩天就變成鬥爭的對象，黑龍江省委改組了，下面一套班子沒動，思想沒過來，潘復生同志是個好同志，現在壓力很大。」「現在實際上擔子已落到左派身上了，一方面要推給當權派，一方面要依靠群眾起來，擔子落在我們身上了，任務重了，就逼迫我們聯合起來，不聯合不行，大家要顧全大局，從大局出發，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不是號召我們關心自

己、團體的大事。」

「分裂這個問題要做思想準備，我可以公開講，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這個旗號舉起來，不要把這個旗號放下，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不但在國內有影響，在國外都有影響，外國通訊社有影響，外國通訊社都轉播了《告全市人民書》，說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澤東一派，赤衛隊是反毛澤東一派，蔣介石就不管你們什麼內部矛盾，給你分開了。」

「你們總司令部搬到市總工會去，集中起來可以自己搞點警衛隊員，不行可找公安人員，到必要時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軍保衛你們，集中就好保衛，現在正在進行經濟方面的鬥爭，一定要把這仗打好。毛主席對上海關心很細緻，主席對『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這個口號都背熟極了，我還背不出來呢，你們對電話局我不知你們怎樣，那天開會為什麼來那麼多保字型大小的，就是電話總機中出來的。」

「對蔡祖泉同志提出的口號，我和姚文元商量的，恐怕不當。哈爾濱師範學院那篇文章，是毛主席親自看過了，那是毛主席推薦的，哈爾濱兩個團，一個造反團，一個『八·八團』，那個『八·八團』保的要死，拚命的保，保院黨委保省委。蔡祖泉他不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要允許他改過，把他當做回到革命派方面的典型，這是很重要。毛主席說蔡祖泉不是過來了嗎？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是左中右都要見面，當然要支持左派。到現在我們只見了左派。上海現在是最容易出經驗的時候，要是個高潮，要敢字當頭，放手解決。」

「要善於聯合，毛主席提出兩個中間地帶，這只有毛主席才能提出來的，現在不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要聯合法國，打倒美帝國主義。」

「對待彭、羅、陸、楊也是這樣，先解決羅，要解決彭，把彭的問題整了一半又來解決陸，陸到會場還不知道，但知要出事，……」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聯合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張春橋、姚文元談上海高校「紅革會」 (1967.2.1.)

張春橋：矛盾會轉化的，很多組織還沒有意識到。原來是革命的組織，現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紅革會兩次要求警備區派隊伍，並帶有威脅性口氣說的。24日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奪權派了隊伍，26日開常委會要派部隊保護他們，30日下午開炮打張春橋會說：「我們要開大會，要派部隊保護我們，要警備區副司令員和師政委及上次參加行動的部隊聽我們的揭發控訴。」一個革命組織可以調動軍隊對付別人的革命組織，那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怎麼辦？紅革會恨我們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打電話給公司，叫他們搞大聯合。可紅革會把住中蘇友好大廈質問我們：為什麼不相信紅革會？

同學：破壞大聯合的罪魁禍首是紅革會。

張春橋：他們已到了無聊的地步……他們幕後有人，適應了陳丕顯、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說要跟我個別談話，早不寫，晚不寫，就在今天寫了。曹荻秋曾對我說：你來上海嘗嘗味道。

姚文元：曹曾講：你們中央在北京發號施令，到上海來嘗嘗味道。

張春橋：紅革會的頭頭是什麼性質？可以考慮。所以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中說：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

同學：（把紅革會的情況談了，略）

姚文元：一個組織不敢展開辯論。處處以武力來壓別組織，發展到這個地步？

……紅革會某些負責人非常怕別人起來造他們的反。最近馬路上陳丕顯、曹荻秋的大字報沒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認自己被打倒，陳丕顯的問題根本沒有揭透，這個行為適合誰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後策劃者，大方向轉移了，轉移了矛頭，紅革會的大方向錯了……。當前兩個首要任務：（大意）

1. 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等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 大聯合大奪權。

這兩個都給紅革會破壞了。毛主席提倡大聯合，要把紅革會的戰士和負責人分開來，只通過鬥爭才能團結紅革會戰士，不鬥爭不行。上海形勢複雜，左派要聯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籠了，另外在造反派內找代理人，紅革會就是，我們要作好精神上的準備……（大意：《紅旗》社論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穩立場，對大反撲要作好準備。大意：我跟紅革會接觸了兩次，有一次把我們鬥了六個小時，還叫我念「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想這是普遍真理，對任何人都適用。

張春橋：現在要好好學習社論，不要跟他們跑。要高舉奪權旗幟，繼續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現在街上沒有陳丕顯、曹荻秋的標語是不正常的，要高舉大聯合的旗幟，奪權！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目前上海砸風還很盛，互相砸，砸電話機……這是國家財產，電話機是無產階級性的。要用擺事實講道理來處理內部關係。

姚文元：紅革會不願擺事實講道理。

張春橋：紅革會把別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們辯論大方向，講大道理。現在正適合陳丕顯、曹荻秋的要求，不鬥他們的，聯合破裂了。但是我們一定要聯合……。28日復旦紅革會反張春橋，×××說：「以前我兩面派，現在我一面派，堅決和紅革會一道搞張春橋」，這並不是孤立的，總要爆發的，就是不派軍隊也要爆發，這樣也好，我們重新組織隊伍大聯合，沒有分裂就沒有大聯合，和這部分人聯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鬥陳丕顯、曹荻秋一定要幹，只有這樣聯合才更好、更鞏固。否則鞏固不了，但將來還會分裂。在取得勝利時，易迷失方向。從奪權變當權。陳丕顯在三年遊擊時很苦，但頂住了。進城後，政治地位改變了，他就越來越滑下去了。現在我們奪權，奪權以後就是當權了，你們大學生就要出來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廢，紅革會就是這樣。毛主席說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幾。階級鬥爭最複雜的就在上海，上海兩個階級力量都很強，牛鬼蛇神、帝國主義、美蔣特務，都出來了，這是大好事，我們要準備真正的反革命包

圍，開槍怎麼辦？那天我和姚文元議論了一天，到處都有反革命活動，可上海沒有這一手，我們很懷疑。我們從來沒有對紅革會有惡意。同志們要考慮到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不能把紅革會看作孤立的現象，應和其他現象聯繫起來。《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對幹部也要分析，一分为二，打擊面不能過大。有些地方一開會，就把幹部統統跪在地下，現在形勢變化了，要強調區分幹部，社論中幹部問題也就是這樣，開始時區分是不行的，當革命群眾佔優勢時，再不區分是不對的。

「懷疑一切」是錯誤的口號，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懷疑一切是反馬列主義的口號，過去不批評，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句口號來壓群眾。王任重、張平化就是用這句口號來壓制群眾的。

希望同志們考慮下一步怎麼辦？和紅革會鬥爭只是一部分。
學生要到工人中間去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⁴³

張春橋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2.5.)

革命的工人同志們，農民同志們，人民解放軍駐滬部隊的指戰員同志們，紅衛兵小將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幹部同志們，戰友們，同志們！

在今天歡慶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熱烈的祝賀，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戰友們，同志們！我們的大會已經宣讀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宣

⁴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言》。各方面的同志講了話。千言萬語，都是歡呼一月革命勝利萬歲！

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的人民革命。回想1月以前的情況，真是驚心動魄呵！當我們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在光芒萬丈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向上海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傢伙發動猛攻，眼看他們就要全線崩潰的時候，他們刮起了反革命救濟主義的妖風。他們滿以為這樣一來，就會轉移了大方向，就會挑起全市人民對革命造反派的強烈不滿，就會把革命造反派壓垮。即使他們失敗了，留給上海人民的也是一個混亂的局勢。這一手，也算不得什麼大發明。上海解放以前，以及解放初期，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就是這樣整過我們的。但是，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永遠也不懂得這條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猖狂反撲，只是更加激起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萬丈怒火，只是更加促進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更為重要的是，是喚醒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認真地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能刮起這場經濟主義的妖風？是因為他們亂簽字。他們為什麼能夠亂簽字？是因為他們有權！黨權、政權、財權、文權，這本來都是屬於人民的。都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英勇奮鬥、流血犧牲奪取來的。而今被這幫資產階級老爺們竊奪去了。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把這些權奪回來了！於是，開展了自下而上的奪權鬥爭。《文匯報》、《解放日報》新生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發表了，一小撮赤衛隊頭頭揚言要「三停」的碼頭，車站等等要害部門的權奪回來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簽字權作廢了。在這場偉大的階級搏鬥中，無產階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場勝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裡，將永遠記在我國人民的心裡，我們將千百次地歡呼，偉大的一月革命萬歲！

一月革命的勝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上海革命造反派、我們上海革命人民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親自指揮下奪取來的偉大勝利！讓我們再一次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

萬萬歲！

戰友們，同志們！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舊市委、舊市人委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垮臺了，標誌著上海無產階級率領廣大革命人民奪了權，當了政。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階級敵人是決不甘心失敗的。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立，不是一月革命的結束，而是上海無產階級有了一個統一的，戰鬥司令部，可以更好地根據我們最高統帥毛主席的命令，繼續進行艱苦的鬥爭，繼續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我們要時刻記住，這是鬥爭的中心，鬥爭的焦點，成敗的關鍵。

因此，我們上海革命造反派、我們上海革命人民的首要任務，就是在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紅旗》雜誌第三期《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篇社論所闡明的毛主席的指示，堅決貫徹執行今天宣佈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這篇宣言和第一號通令所規定的上海革命人民的任務，開展全面的奪權鬥爭。

毛主席教導我們：「寸權必奪。」我們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還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漢派竊據的權力統統奪回來！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是革命造反派的上海，是革命人民的上海，是全國革命人民的上海，是毛主席的上海。不把一切權力奪回來，誓不甘休！

階級敵人不但不肯讓權，我們奪了權，他們還會反奪權。他們還會玩弄各種文的、武的陰謀手段，給已經奪了權的革命造反派，給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製造種種困難，施加壓力，妄想整我們。在這裡，我們要告訴資產階級老爺們，你們的這一套，我們早就領教過了。你們是腐朽的力量，是一小撮，把你們這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等等統統加起來，也還是一小撮、在一千萬革命的上海人民面前，你們是註定要失敗的。我們革命造反派已經作了準備。還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同我們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誰膽敢進行反革命活動，就一定砸爛誰的狗頭！

為了繼續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我們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

在偉大的反經濟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就是用「抓革命，促生產」的鐵拳打敗了敵人的。讓我們用抓革命促生產的新成就，來慶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吧！我們一定不要放鬆了抓革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發展生產力的動力。我們一定要大抓革命，大促生產。事實將會證明，我們上海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在各個生產、工作崗位上的革命人民，不愧是挑起革命和生產這兩副重擔的英雄。英雄的上海人民萬歲！

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是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產物。為了繼續奪權，為了鞏固和發展上海人民公社，為了奪取更大的勝利，我們應當繼續鞏固和擴大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這個大聯合，不是大雜燴，不是聯合國，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大聯合。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從來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擁護，就贊成，就支持。我們應當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強和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一定要不斷地整頓思想，整頓組織，像我們公社的名字一樣，打倒「私」字，確立「公」字，使我們的隊伍不斷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戰友們，同志們：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並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我們下定決心，在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領導下，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務員。我們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堅決地同上海人民公社站在一起，用最大的努力來支持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動和革命工作。對於犯過錯誤的工作人員，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不是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我們都允許他們改正錯誤，歡迎他們突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羅網，站到革命人民方面來，站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來。

讓我們全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學生、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幹部聯合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偉大的一月革命萬歲！
 上海人民公社萬歲！
 上海人民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春橋、姚文元與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等談話摘要 (1967.2.10.)

【接見單位：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市第一醫院星火燎原兵團、華東工學院紅旗兵團、清華井崗山駐滬聯絡站、北大文革駐滬聯絡站、北京工農兵體院駐滬聯絡站。】

關於目前大聯合問題

張：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們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
 《人民日報》裡有句話，不知道你們注意了吧！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
 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
 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
 的形式。這裡有誰參加起草。（同濟大學東方紅回答：我們參加了。）

姚：只有大聯合才有權力，一個組織講話沒有人聽，三十個組織講
 話就有人聽。在當前正需要，這是我的感覺，不知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
 要求，能不能通過鬥爭先弄成錐形。

關於紅革會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大字報幾乎不見了，矛頭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鬥爭的大方向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紅革會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大方向錯了。陳、曹的問題原本沒有揭開，曹荻秋還不承認被打倒。紅革會還破壞了大聯合，在上海有兩種大聯合，左派之間大聯合，而右派之間也在有意無意地湊到一起，現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紛紛出籠了，要有思想準備。對紅革會的認識，以前對它負責人還是認識不清的。鬥了我們六個小時（指元月28日在中蘇友好大廈紅革會等組織召開鬥爭張春橋、姚文元的會議—編者）也是一個好事，認識一個問題。

張：關於成立新市委問題，是趙全國（原上海的頭頭）已被捕入獄，趙全國到北京回來就反對我，不知是什麼道理，我在北京時陳丕顯一定打電話到中央要我回來，說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線，設陷阱，我總覺得這裡面有玩意。當前在街上沒有打倒陳丕顯的大標語，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應該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們仍要抓鬥爭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聯合，否則聯合了，沒有思想基礎，以後還會分裂的。我們黨的歷史，開始黨代會十二人，現在呢？陳公博是個大漢奸、張國燾……，你們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風大浪中鍛鍊。陳丕顯參加革命時，還是紅小兵，在那艱難困苦條件下，受得了，他們還想到今天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你們以後當權了，要注意。條件變了，不注意就會慢慢滑下去，現在分裂了，可能你們人少了，少沒有關係。毛主席說：真正的革命左派總是少數。紅軍原來幾十萬人，後來只剩下幾萬人，到底什麼時候強大的呢？長征以後強大……一月革命幹了幾十天，現在2月了，不知是誰個勝利了……現在有的人說：「我這個組織好，即是科長以下的人組成。」把科長當成當權派統統拉來鬥，這是非常錯誤的。當前怎麼搞，紅革會是不是會作為鬥爭的一個內容。前一階段有些打擊面太廣。對紅革會要把某些負責人和紅革會戰士區別開。

矛盾會轉化，有一點你們意識到了吧！本來是革命的也會走向反面。

姚：一個組織不敢展開辯論，處處用武力來壓個別組織，會發展到啥個地步？……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非常害怕別人起來造他們的反……方向轉移了，轉移了矛頭。紅革會的大方向錯了。當前兩個任務：（一）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大聯合、大奪權。這兩個都給紅革會破壞了。毛主席提倡大聯合，要給紅革會的戰士和負責人分開來。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團結紅革會的戰士，不鬥爭不行……我跟紅革會接觸了二次，有一次在中蘇友好大廈把我們鬥爭了六個小時，還叫我們念：「搬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想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適用。

張：懷疑一切是錯誤的口號，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懷疑一切就是反馬克思的口號。過去不批判，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個口號來壓群眾。王任重、張平化就是用這個口號來壓制群眾的。希望同志們思考一下，怎麼辦？和紅革會鬥爭只是一個方面。

學生到工人中間去，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還是晚些成立好？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渡性機關。

姚：大聯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來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來，成立一個「上海人民公社」。⁴⁴

⁴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張春橋、姚文元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2.24.）

附：張春橋在上海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傳達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海市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姚文元張春橋在會上講了話。】

×××：現在歡迎姚文元同志主持會議（掌聲）。

姚文元講話

現在宣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正式開始。全場起立！奏東方紅！（《東方紅》）。大家請坐！

同志們、戰友們：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著一片大好形勢。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卷全國，「三結合」奪權鬥爭的經驗正在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鬥爭中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我們應當滿懷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需要奪權的單位元元進一步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奪權鬥爭，把革命進行到底！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更大勝利。（口號）

在一月革命的風暴中，我們自下而上地從市委、從市人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成立了自己的「三結合」的最高權力機關。最近，張春橋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彙報了上海的工作，參加討論了現在已經發出來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們，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口號）

我們親自聽到了毛主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為重要的指示，親自聽到了毛主席對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更大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的支持，我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

我們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燈，是我們革命人民的無價之寶。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個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這三個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見眉目。我們當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聲音廣泛傳達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堅決地貫徹執行，化為我們的實際行動。毛主席說過，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我們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勢，總結工作，明確當前的鬥爭任務，要繼續發揮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那種大無畏的革命首創精神，我們要繼續前進，我們要進一步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批判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潮，提高我們的無產階級覺悟，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鞏固和擴大人民的大聯合，按照毛主席的一貫的指示和政策，正確對待幹部問題，普遍地發展革命的「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革命，及時地識破、堅決地粉碎階級敵人的各種新反撲。

同志們，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傳達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並就當前形勢和任務進行了討論。會議決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們把討論的結果報告了毛主席和黨中央，並且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口號）

今天，將由張春橋同志向大家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並且佈置當前的任務，會上要宣讀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草案，供各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討論和試行用。

張春橋同志的傳達，希望大家不要去張貼，希望大家不要去張貼。因為今天講的一些東西還是作為內部傳達來講的。現在我們就請張春橋同志作報告。（口號、掌聲）

張春橋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起討論問題了。剛才姚文元同志說了，我們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12號去的，是毛主席要我們去的。（口號）

現在街上有一個大字報說，張春橋為什麼又到北京去了？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答覆：是毛主席要我們去到北京的。（掌聲）我們12號到了北京以後，毛主席當天很快就接見了我們。後來，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會議，討論了上海的工作，還有其他的問題。在我們離開以前，毛主席又接見了我們。剛才姚文元同志已經說了，我們首先應該向同志們彙報的，就是主席的身體非常非常的健康（口號）。而每一次的談話的時間都是很長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終都很愉快。每一次談，對上海的情況非常熟悉，好多問題，上海的情況只要我們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講一些地方的情況，非常關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北京一個星期，每天都感覺到這一點，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黨中央各個方面的同志，對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關心的，使得我們非常感動，你們知道我們兩個人，主席在三天的時間裡面，一再接見我們，這不只是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我們感到是光榮的，我們知道，我們是代表著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們去向毛主席彙報的。（口號）

毛主席對於上海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所取得的成就，給了很高的評價。這一些同志們都會知道的。過去，已經給我們很高的評價。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上海各革命組織所發出來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都是毛主席在當時一接到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決定了向全國廣播。在這次談話裡面，毛主席又說：上海的工作總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講了一下這一段歷史，比如說，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個時候，他講，你上一次去的時候，不是只有一、兩千人嗎，那麼，現在已經到了一百多萬人了，工人組織起來一百萬了，本身就說明上海的工人群眾發動得比較充分，毛主席對各個方面的情況都問了我們，學生的情況、農民的情況、機關幹部的情況、各個方面的情況都問了。機關的情況，甚至於還問了一些市委幹部的情況，我們都彙報了。他還問到，比如像一些細節他都曉得的，他問，你們那個時候學生不是到了碼頭嗎，那現在學生是否還在碼頭上呀？我們告訴他說，當我們陪康生同志到碼頭上去的時候，我們還

是碰到很多學生還在那裡，主席說，很好。他對學生的關心，對工人、對農民、對機關幹部、對解放軍的上海部隊的情況，都是非常關心的，而且對上海革命群眾每一個好的創造、每一個革命的行動，主席都無微不至的關懷、瞭解。我們感覺到主席對上海的關心，這對我們上海革命造反派來說，對上海的革命群眾來說，對我們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榮，也是對我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援。（口號）有了毛主席的支援，有了黨中央的支援，我們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難，不管階級敵人還會玩弄多少花樣來反對我們，但他們都沒有辦法來阻擋我們上海市革命群眾，在黨的領導之下，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去奪取一個又一個新的勝利！

我想下面來分別地說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講一講奪權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在主席那裡談得比較多。這個問題我想講的多一點。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到了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是從上海革命群眾奪權開始的，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所講的一月革命風暴開始的（口號）。我們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來說，也是解決政權問題。但是，我們這一次的奪權，就其任務和1949年，我們從國民黨手裡奪政權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這次和我們談話中間說，我們現在的這場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同志們注意主席的這一句話，他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這個革命是我們發動的，這就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動的，是毛主席自己發動、自己親身領導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考慮一下，寫一篇文章，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對這一句話，我想，就我們的理解在這裡解釋一下。照我們的理解，主席說，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就是說我們十七年來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昨天《紅旗》雜誌第四期的社論裡面說了這個意思。就是十七年來，在政治上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了統治地位，不是劉、鄧路線占了統治地位。這十七年來，我們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這個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是實行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的。現在不能說十七年來，我們的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或者是劉、鄧路線占統治地位，不能做這樣的估計。對於主席這句話，前半段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是肯定的，那末後面這半段又是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怎麼要革命呢？為什麼要革命呢？毛主席說，那許多問題好解釋了，他說，這是因為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中間，有一部分被篡奪了，這一部分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這句話是辯證法的。他先總結了是無產階級專政，又說還要革命。為什麼要革命呢？就是因為我們的專政中間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資產階級的，被篡奪了，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那麼一小撮人篡奪了，所以說需要革命。

（口號）有些地方，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徹底改善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口號是個反動的口號！為什麼要徹底改善？就是，實際上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本主義專政。所謂徹底改善，就是說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行了，要徹底改善嘛。正確的說法，只能夠是部分的改善，這是講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個問題。為什麼說這個革命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呢？事實是如此。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是毛主席自己發動的。為什麼要自己發動這一場革命，是因為我們國家已經統一了十七年了，這十七年比較穩定，大家都很满意，覺得中國至少一百多年沒有統一，四分五裂，很不穩定；那麼現在呢？經過民主革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我們國家穩定了，統一了。凡是事情總是這樣，統一、穩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帶來了問題。就是在這種穩定中間，實際上也不穩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權、黨權、財權、文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了。毛主席發動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為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使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能夠把修正主義根子挖掉，能夠使得我們的祖國——社會主義祖國不變顏色。我們感覺到，毛主席提出這樣一個思想，這是個很重大的問題。譬如說，現在這個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從這一句話，主席常常是這樣，他把許多複雜的事物，最後歸結成一句話，而這一句話非常重要，能夠啟發我們去想各種問題。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一點，對我們當

前奪權鬥爭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句話，我們就看不到發動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這場鬥爭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很好地懂得了主席這一句話的意思，那麼，我們就能正確地按照主席的思想來辦事。（口號）這是關於奪權裡邊，我想傳達的第一點。

第二、在奪權鬥爭裡面，在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成為中心的是「三結合」問題，這是能不能奪權、奪了權以後能不能鞏固的關鍵。（口號）我們大家還記得，在我們上海，對我們上海舊市委、市人委這個權已經奪過好幾次了。1月14號，上海市二兵團，他們奪了一次，發了通令。1月22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個單位奪了一次。1月24日紅革會和其他單位又奪了一次。那麼他們奪到了一些什么東西呢？他們奪到了幾間房子，有的就到市委、華東局，把大印搶在手裡，就以為這個印拿到手就算權奪到了，但實權呢？根本沒有奪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奪了權，那麼應該可以發號施令了。而我們不知道，奪算是奪了，但是他說了話沒有人聽。（口號）市委的權是這樣子，華東局也是這樣。我現在講的華東局機關也奪好幾次了，但現在你說權奪到了沒有呀？我看也就是這樣，占了幾間房子，還有些人就強迫魏文伯、韓正義簽了字，要點東西，找個汽車什麼的，這些東西大概得了一點，別的東西得不到呀。好比我們在上海工作，沒看到他那裡對我們上海也沒有影響。所以，我看勸奪華東局權的那些人還是不要奪了吧！要奪你也要搞「三結合」，而你又沒辦法「三結合」，這個事情將來會專門跟他們談，我在中央也討論過一下，華東局的權不能這樣奪法，因為華東局書記處的權是不能奪的。華東局書記處是黨中央的代表，那麼你奪權就是向黨中央奪權啦。那末要奪只能奪華東局機關的，而華東局機關就是一些房子，有什麼好奪呢？我現在是講一個市委、一個華東局機關，其他單位，同志們，你們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縣、有些區、有些企業、工廠，奪來奪去誰也沒奪下來，那麼這說明瞭一個什麼問題呢？這說明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是奪不了權的。沒有這個大聯合，幾個單位、一個單位、兩個單位或幾個單位

去奪權是奪不來的！那種奪權那種小聯合的奪權只能夠產生小團體主義。這兒有一個單位去奪權，奪了什麼呢？只奪了個印刷廠，以為這個印刷廠就算我們單位的了，人家再來印東西就不給印。這樣的奪權，我說是一種小團體的奪權，實際上是把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小團體所有制，這是破壞社會主義的，我們的每一個工廠、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學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屬於任何一個團體或者個人，怎麼能夠屬於一個小團體呢？如果那樣子的話，這是小團體所有制，從全民所有制變成小團體所有制，這實際上是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南斯拉夫的辦法。（口號）我們這個話說得尖銳一點，是為了告訴這些同志：這條路是不能走的，這是南斯拉夫的辦法！有些什麼工人自治呀、小團體呀，那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那末，我們現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聯合奪權。大聯合奪權還不能夠完全說明，道理還不是說得很清楚。要實行大聯合，關鍵還在形式，在找到一個恰當的形式。這個恰當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結合」。（口號）「三結合」，同志們現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人民解放軍駐軍的代表和革命領導的代表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夠算大聯合。說大聯合，並不在於有多數的群眾團體都參加了。當然，凡是革命的組織應當聯合，這個思想我們已經宣傳了很久了。現在的問題是，不只是說群眾團體越多越好，而是說，如果缺少另外兩方面，只有革命群眾組織而沒有解放軍、沒有革命領導幹部，那末這個權是奪不下來的！奪下來也不鞏固。所以主席這次對我們談話，談得最多的「三結合」問題。我們很好地學習主席的指示，考慮了，想了這個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換了意見，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東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彙報工作，山西同志彙報的一天我們參加了，山東的彙報那天我們就回來了，沒有能參加。所以，從各方面來看，山西當然十分明顯了，有軍隊的作用，山西的奪權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那根本奪不回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省委，山西省委反動透頂，而且已經準備拉武裝呀！搞了那麼一些便衣特務，發了槍，給劉格平同志領導奪權的領導班子來了個（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對面就有兩個特務，有槍，槍口就對著他的門口，隨時準備把劉格平捉起來的，只要

他們沒奪權，再過兩天這些現在出來的領導幹部就要都被捉起來的，人民解放軍堅決地站在革命派這一邊，支持革命派奪權，這樣，這些手裡一根槍也沒有的革命群眾才把權奪下來了。剛我們念語錄不是念了主席的這句話：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沒有軍隊的政權，在世界上、在階級社會裡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講奪權又沒有軍隊，那怎麼行呢？我們奪國民黨的權要有軍隊，那時候靠軍隊打天下，今天我們把一部分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竊奪的權奪回來，那還要靠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來支持，沒有這個力量是不行的。沒有領導幹部、沒有革命的領導幹部行不行？這也是不行的。因為群眾，它只要是採取革命行動，它必然要有幹部。比如說，有那末一個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個戰鬥隊，總要有一個負責人，不管名字叫什麼，大家說的，有的叫「服務員」，有的叫「勤務員」，因為大家有些人不喜歡這個「長」字，他不願意叫戰鬥隊的隊長，不管叫什麼，因為總要有領導，總得有幹部，現在我們要奪權那總得有幹部，無非是有新的幹部、有老的幹部，有新的過去沒有擔任過領導工作的，還有那些過去擔任過領導工作的。為什麼要一批擔任過領導工作的革命的領導班子呢？因為事情很明顯地擺在這兒，一個工人同志，不管他多麼好，革命積極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這次文化大革命裡邊有很多貢獻，讓他馬上在一個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個省，像江蘇省，交給這樣一些工人來管是很大的困難，因為他沒有經驗，他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去管一個車間可能比較熟練，管一個大的工廠這已經困難了，如果，把上海市統統交給他，那困難還更大，這個道理用不著多解釋的。比如說，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隊的同志們，你們裡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現在馬上交給你們，你們有困難，現在，就說像我吧，我總算做工作還做了一些年了吧，現在你說要我負責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事情我過去沒怎麼管過，我這個經歷並不那麼寬，現在，一大堆問題就擺在面前。過去，有的時候，我也頂多參加了一些討論，但是決定不是我決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沒有碰過，沒有摸過。經濟工作、生產、工廠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

業，知道一點也不多，像財政稅收這些事呀，我從參加工作以來，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們講，我從來沒有興趣！我過去對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來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來嘛，這種感覺呀，譬如說，在柯慶施同志在世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雖然也擔負著很重的責任，和我們的能力也不相稱。但那時候，有些事都覺得好辦，到最後有些問題不好辦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個決心就辦了。自柯慶施同志一病倒，64年一病倒，65年去世，那時候我們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挑不動了，這個擔子突然往我們身上一加，我那時候就感覺到一個人沒個地方商量的了，擔子一加挑不動，那末，何況現在是面臨的任務哪，比哪個時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麼一個普通工人同志、學生，我想他們遇到的困難會比我還要多。

我在主席那裡談到，我們說，一個大學生啊，還剛剛畢業，有的還沒有畢業，就要管一個上海市是很難的，主席他就說，我看當個大學校長也不行！當個大學校長？這個學校很複雜呀！你是作為學校裡一個剛剛畢業、還沒有畢業的同學，學校裡全面的情況也不瞭解。後來，主席甚至於講，他說，我看呀，當個系主任也不行！當個系主任總要有點學問吧！那麼，你這學生，專業還沒有學完，或大學剛剛畢業，學問還不多，而且沒有教書的經驗，沒有管理一個系的經驗，他說要搞個系主任那恐怕總是……，我們也已經培養了一些助教、講師及一些原來的領導的幹部，所以都要這些人出來。針對大家剛才講的，主席說：「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夠都不要。」當然啦，他也說了，周穀城恐怕不行了吧，說「周穀城啊，如果再教書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還行哪」，主席很關心這事。同志們，特別是青年同志啊！你們不要洩氣呀！怎麼主席又怎麼說了這些話啊！主席又說：「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做了很大貢獻，但是現在馬上來接這些班子，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這個班還有些困難，這有個過程，還得學習。「三結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幫助青年同志學習的一種方式，過去，我們不是老是考慮怎麼樣培養接班人嗎？這個班怎麼樣接呢？看來「三結合」不但是奪權的一種形式，而且是老帶新的一種形式。大家在一塊工作，

學幾年，七年、八年、十年。現在廿來歲，學十年，三十幾歲，作省委書記，那還是很年輕嘛！所以，主席對青年同志從來就是很熱愛的，對青年人評價很高。但現在呢？不能夠單單強調這一方面，因為我現在講的是「三結合」問題，所以就不能不說到「三結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說到青年工人同志，我們的學生同志，在現馬上接這個班還是很困難。拿我們上海的情況來看，我們上海的革命群眾的組織力量是很強大的。這事我剛才已經傳達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評價。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我們的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在成立的時候，不是實行了「三結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們說沒有這個危險嗎？有這個危險的，因為第二個、第三個人民公社已經在那裡籌備了嘛。他不要砸掉這塊牌子？在外灘的人民公社委員會辦公的那個地方啊，警衛連的同志他們都向警備區的首長請示，說這個牌子有人來砸，怎麼辦？警備區首長下了堅決的命令，誰要砸這牌子當然是反革命，抓起來！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參加了公社的「三結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這裡過高地估計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們兩個人沒什麼，但是因為我們兩個是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就這麼一點身分我們參加了工作，這麼一點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對人民公社，不能不考慮一下。所以，在這裡也可以看出來，為什麼那麼多人去奪市委的權就奪不過來，為什麼我們只要「三結合」這個權就過來了呢？就是因為「三結合」。如果不是這樣的「三結合」，權也是奪不過來的，我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那麼它今後也是這樣，也是「三結合」的。我下面還講這個「三結合」，它還會繼續加以充實、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為代表，這種基本形式已經形成。那我們再加以充實、加以提高，這個，市的革命委員會就會更加鞏固。誰要反對這樣一個組織，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組織會起來反對它，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就會來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那這樣子，這樣一個臨時的權力機關它就可以形成，是一個有威信的、有權威的，可以來領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這個機構，現在是有權威的，在將來會更加有權威，會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來試一試，想來反對，過去想反對人民公社，現在還想來反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那麼就請來試一試吧！我們也準備好啦！誰願意要來碰一碰，我們就會等著他們，對付他們！（掌聲、口號）以上這一些，這是我們講的第二點，就是要實行「三結合」，「三結合」是主席跟我們反復講的一個問題，先講了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要搞這個革命就要大聯合，大聯合最好的形式「三結合」，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全面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我們現在應該在市一級擴大這個「三結合」，同時在以後，各個奪權單位元元，需要奪權的地方，在進行奪權的時候，我們都要實行「三結合」。

有沒有可能實現這個「三結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個付局長以上的幹部，處長以上的幹部有六千多人，難道說我們從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間找不到「三結合」的對象？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應該說，這個六千多人我是講處長，還沒有講科長，科長就更多了。這麼多人裡面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較好的，這一點應該有充分的估計，當然啦，上海革命的幹部，或者說整個的幹部造反的比較少，而且造反比較晚，上海機關幹部造反是一直到12月18號開大會那天算是開了炮，這樣子是相當晚了。但在全國還算好的呢？還是比較先進的啦！當時毛主席看到了這個消息很高興，說上海的機關幹部也起來造反了。但是整個數量來說不是很多，在12月18號起來造反的幹部中間，還是一般幹部比較多，市委書記一個造反的也沒有，付市長一個造反的也沒有，這個事情當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這個不能怪革命群眾，這個事情他們自己負責，誰要你不造反的。這個事情我們沒有辦法替他們負責的，但是呢，我們也還應該看到，首先，應該是陳丕顯、曹荻秋來負責，他們對幹部是欠了債的，他們自己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一大批幹部帶壞了，總有為首的嗎。同時呢，據我們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沒有很好的向幹部傳達，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眾，或者一般的幹部沒有傳達，包括那些中層以上的幹部，甚至於市委裡邊一些人，也沒有傳達，這樣就使得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不能夠傳達到群眾和傳達到幹部中間去，十一中全會回來以後傳達了什麼啦？沒有很好傳達。據說市委的會，開市委還是委員會曹荻秋傳達了一個小時，

那怎麼行呢，那樣能傳達出什麼。中央工作會議，他們也沒有很好傳達。據我們聽說，像十一中全會，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根本沒有很好的告訴群眾，沒有很好的告訴幹部。所以當北京的紅衛兵小將一衝的時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幹部莫明其妙什麼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應該由領導負責的，是應該由為首的人負責的。有一些事情他們根本沒有傳達，比如，同志們知道的安亭事件，那個事件他們傳達誰的指示呢？傳達陶鑄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給陶鑄打電話，陶鑄就是給他說了一通，用了那一種口氣，中央嘛，既然已經承認啦嘛那就只好這樣子嗎，再繼續作工作呀，再把他改過來吧。就這樣，曹荻秋就是根據這個來辦事的，他就聽陶鑄的。對伯達同志的意見，到後來主席的意見，我都告訴了市委，市委不但沒有向一般幹部傳達，連市委書記處都沒有傳達，連馬天水都不知道嘛。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會議上去放炮，那當然是非常嚴重錯誤，但是，後來我在北京和他談話他就告訴我說，他說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見？不知道！所以他才敢於跑到中央會議上繼續來攻擊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見，我想這個人他也沒有那麼大的膽量，他就是不知道。而這個陳丕顯、曹荻秋這些人呢，就是鼓動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講，什麼話都講！」這樣子鼓動他，對這種人哪，你說，你說到底，同志們也可以看一看哪，像這個陳、曹這樣的人，他們欠債實在欠得多，不但對上海的人民欠了債，對幹部欠了債，我看對周圍的同志也欠了債。後來他們又用什麼內外有別呀，要組織紀律呀，不能夠什麼東西都講呀！所以把幹部都拚命壓在裡面嘛，所以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有許多幹部，包括些領導幹部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

我前面先講了，首先要他們負責，但是領導也要負，這個不能怪我們，不能怪革命群眾。我們相信他們中間，這六千多人處長以上的，還有六百多個付局長以上的幹部，我們相信他們的多數，是願意革命的，是願意跟著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話我們怎樣來解釋這樣的問題。同志們為什麼當柯慶施同志在世的時候，還是這些幹部，那為什麼在柯老領導之下就能夠執行主席的路線，就能夠堅定地跟著毛主席，在上海的工

作做得還是比較好嘛，特別是在柯慶施主持工作的時期，特別是58、59以後這個時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國是比較好的嘛，還不是這些幹部，還不是目前這些領導幹部，還不是這六百多個副局長？我不否認他們中間有一小撮壞人，但是，我是講多數，現在這些同志，那個時候跟著在柯老領導下，他們做出來很好的成績嘛，我們剛剛念語錄不是說主席的指示，我們要看幹部不但要看他一時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嗎？那我們應該看一下這些幹部十七年來的表現，可以加以對照，而且呢很多我們幹部那個時候，在柯慶施在世的時候，他們是執行了主席的路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他們的表現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個樣，我們應該採取分析的態度，毛主席這次跟我們談話的時候，又一次地向我們講，說我們應該相信95%以上的群眾，相信95%以上的幹部，是會跟著我們走的，這裡講的，我們就是跟著毛主席走的，特別講到，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相當多，這個中農啊占的數量很大，城市裡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包括一批小業主，這個數量相當大。毛主席說我們要善於引導，他們也會跟著我們走的，主席在任何時候，他都是一再地強調：「我們要相信大多數。」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相信大多數，就是不相信大多數人是要革命的，結果失掉多數，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來。那麼要實現「三結合」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對待幹部問題。《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裡面有一段就專門講了正確地對待幹部問題，第四期專門寫了一篇正確地對待幹部問題。這兩篇社論黨中央是討論過的，毛主席看過，頭一篇主席作了許多重要修改，正確對待幹部的一篇哪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問，我們只知道我們走的那一天，是當天送給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改。譬如，說像這樣的話，《紅旗》第三期，現在大家經常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句話：「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或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就這一句話，後面那幾個字是主席加的。原來是：「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允許他們怎麼樣，怎麼樣。」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後面又加上「而又堅持不改或屢教不改」這樣就體現了主席一個很偉大的思想，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如果不堅持

錯誤，或者他不是屢教不改的這句話是可以這樣理解的，所以強調出來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又堅持錯誤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這樣呢，剛才我們念語錄裡也講的不是不可救藥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這麼幾個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寬得多了，現在同志們我是已經在別的會議上說過，好多同志最近比較忙，特別奪權以後據說奪權以前學毛主席著作還好說是有時間，奪權以後現在忙得一塌糊塗，不看書、不看報，這個危險啊，像這樣兩篇社論和中央最近發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慮的啊，那裡面常常是兩個字的改變，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為革命總在發展在變化形勢在變化，如果我們的頭腦不適合於這個形勢的變化，我們就可能犯錯誤。

在這次談話時候毛主席反復地講了「打倒一切」和「懷疑一切」這個問題。「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這個口號相當的普遍相當流行，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反動的。這種思想在我們革命派內部有了影響，這種思想不是我們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響了我們，影響了我們一部分同志，因為在這個，這個我們理解呢，說是文化大革命裡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種頑固勁哪，就使人發生了一種錯覺，以為到處都是壞人，所以因此呢，當別人宣傳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時候，自己也覺得有道理，覺得有道理，其實啊，同志們，這種口號我們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說打倒一切嘛，那提出這口號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麼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還是打倒一部分，說懷疑一切，是他真的懷疑一切嗎？他也不懷疑他自己，他不懷疑他，這個口號對不對，那麼應該首先懷疑懷疑我這個「懷疑一切」，對不對啊，他也不懷疑的，實際上他也是懷疑一部分。世界上沒有那樣的事是「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只能是這個階級，兩個階級對壘，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打倒無產階級，那能那麼打倒一切呀，資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呀，那是他們內部發生了矛盾，這一種口號啊，今天阻礙著我們的大聯合，特別阻礙我們的「三結合」，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夠坐下來真正解決，「三結合」是搞不起來的，那麼你看到的這個人也要懷疑，那個

人也要懷疑，這個人要打倒，那個人也要打倒，那你還有什麼「三結合」呢？這些打倒一切的人，懷疑一切的人，最後勢必被人家懷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這一點毛主席說得非常確切，他說：「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幹不了幾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個單位，就是中央氣象局有一個單位，那個單位啊，到我們這裡講。說我們一到上海就碰到一個問題，我們一和哪一個造反派談話，我們問，你們那個造反派怎麼樣啊，他說我們那個造反派很好，一個科長都沒有，（笑聲）就表示他這個組織最純潔啦，我們一說這些話主席就說啦，說：「我們這還有一個單位呀連付科長也不要。」那個單位三十多個副科長，也不是個很大的單位，一個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這個都不作階級分析呀，而是根據職務，從擔任的職務，那一級職務以上，這那裡是階級呢？階級，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當權派有無產階級當權派，有資產階級當權派，科長，有贊成毛主席，擁護毛主席跟著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對毛主席的，應該是這樣分嘛。現在有好多不講階級的，我們那裡有一個市一級的市人委的機關什麼造反委員會，我們在北京就看到國務院轉給我們材料，下了一個通令用電報發給國務院要取消一切「長」，這個單位你們要提出建議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長」，也未嘗不可，但是他是給國務院用電報發了個通令，而且這裡頭有許多話是完全錯誤的，說什麼說歷來的就是處長管科長，科長管科員，那麼將來還是處長管科長，不能叫那個科長管處長，除非他們把關係改變過來，把現在的科員改成處長現在的處長改名字叫科長，那又有什麼意思，本來就是叫書記，在國民黨時代是最微小的官職，到了我們這裡變成了最大的當權派了，這個都是名字問題嘛，而且說什麼，一切帶「長」字的都是騎在黨和人民頭上，我說這句話是反動的，那麼我們的國防部長林彪同志也騎在黨和人民頭上嗎？根本沒有階級性。同樣的一個國防部長，彭德懷也叫國防部長，林彪同志叫做國防部長，屬於兩個階級的，怎麼能夠這樣子來呢？搞這一套呢？如果不講階級，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搞「三結合」，一講階級呢，那麼就能把我們的隊伍重新來看囉，把每一個人都重新來考察。主席說：「副科長都

不要的人，這些人啊，搞不了幾天的。」他說得，毫不含糊，那種「一腳踢開」，最後一定也要把自己踢開。「一棍子打倒」的這種風氣萬萬不可長。我們同志們，主席過去一再勸，說要讀一讀魯迅寫的《阿Q正傳》，裡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們不要不准別人革命，不要學那個裡面的趙太爺，要允許別人革命。毛主席所規定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見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合作，還要和那種意見對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人，他又反對過你，而又證明他是錯誤的這種人合作。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條件之一，我們毛主席是這樣的模範。大家也來看一看吧，現在事情都已經揭開了，大字報都上街了，其實這些事呀，很多事情黨中央過去沒有公開就是了，那麼你比如像這個朱德，總司令，這個是從井岡山就反對毛主席嘛，我們現在學習的《古田會議決議》，那個裡面好多條就是講朱德的，那裡面就是糾正錯誤傾向，誰代表錯誤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對這種人是拉著走，總希望能夠多團結一些人嘛，對這一點也希望我們革命派的同志們向主席學習，我們現在就應該根據主席這樣的思想，對本單位的情況作一個具體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麼情況，作階級分析，同時呢，我們要對他們創造出條件，給那些領導幹部有機會來檢查錯誤。

在上海有這一點，據我們瞭解，有一些人始終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應該給他們機會。當然一般幹部不要搞人人檢討，人人過關，不要搞這個。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個檢討呢，他沒有辦法出來亮相，還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給他機會，讓他亮相，讓他出來表示態度，歡迎他們出來發表造反聲明，也歡迎他們互相之間去串連，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換意見。假使他們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線這方面來，我們給他機會。但是給了機會，有的人也不幹，那是他們的事情，我們應該創造這個條件。或者我們不要等到一切條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結合」，也不要搞得那樣十全十美，還非要搞那樣好的幹部，那可能是不多。我們只能夠根據不同的人，來區別對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請他參加領導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參加一般的

領導，有的可以參加核心，或者還有其他的方式，這些在「三結合」這個問題上，同志們還有意創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創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結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機假造反，怕我們認錯了人，怎麼辦，同志們不要緊的，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應該什麼都不怕的，怎麼能夠忽然怕起來了呢，他投機嗎，投機他將來總會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沒有暴露，你怎麼能說人家投機呢？如果弄錯了，認錯了將來我們再改嘛，我們就不能犯錯誤啊，這個也是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造成的結果，這樣同志們我們將來就不准犯錯誤了，一犯錯誤就打倒，我們還是也會犯錯誤的，還是會經常犯錯誤的，造反派的同志，也會犯錯誤的，犯錯誤咱們就改，拉倒，堅決改（笑聲）沒別的，有什麼辦法。只要我們有這一條，我們就不會變成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又是堅持不改，又屢教不改的，只要不作這種人就行了。第一不要當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那麼其餘的你就不怕了嘛！你無非不要堅持不改，不要屢教不改，所以我們今天認錯了幾個人，不要緊。那麼都這樣怕，那我們將來自己犯了錯誤，那怎麼辦啊？現在我們也不能用了，那沒人做事情了。所以可以請各單位考慮一下，排排隊，最好先選擇幾個標兵，某一個人站在那一個位置，當然有了這個標兵就好辦嘍。

當然剛才講的都是給革命造反派說的了，我希望我們大家要向那些幹部那裡去做工作，我們希望他們要堅決站過來，光是我們做工作他們不站過來也不行啊！他們現在也有很多顧慮，說「晚嘍」，早沒有站過來。你既然承認早不站過來是不對的，那麼你現在還不站過來那不是越來越晚了嗎？還等到什麼時候，黨和人民是歡迎他們歸隊的。黨中央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是鮮明的，犯了錯誤，對黨對人民犯了罪，只要堅決地改，黨還是歡迎的嘛。而且犯過錯誤也有好處，犯了路線錯誤，那麼可能因為犯了一次路線錯誤就增加了免疫力，那麼在以後就少犯路線錯誤或不犯路線錯誤，也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但是現在雙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過不來，有的同志也說，鬥了一場，鬥了怎麼還去給他做工作？我們說，誰鬥的還是誰去做工作好，因為我們是執行毛主席的革

命路線的嘛，有什麼不好呢？我們是毛主席的學生，我們都是執行毛主席路線，而現在搞「三結合」還是執行毛主席路線。在這一點上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自己應當首先把感情轉過來，我們不能夠對革命造反派記仇。什麼秋後算帳啊，打擊報復那是不允許的，自己挨了些鬥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訓，那就應該更快地覺悟，回到黨的路線上面來，毛主席的路線上面來。那麼鬥了一下，可能有的是過分了，應該這樣的，我們對你們說，我們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難道你對革命造反派就不執行這條路線啊？你要無情打擊？那當然不行。小將們有一些做得過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夠諒解。任何一個革命都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革命，決定中國的命運的革命，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樣的革命，難道不應該付出代價嗎？我們看我們這個代價並不大，比起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付出代價並不大。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德國革命，他們那個反復，奪權反奪權，那個代價大得很。我們現在代價不大，那麼自己挨了鬥這也算有代價，我看有的鬥的完全對，有的鬥的有一點過分，那麼也不過就那麼一「點」嘛。那麼算有點代價吧，就算你對革命的貢獻好嘍！（笑聲）

老實說，如果沒有革命的小將們那麼英勇、那麼敢想、敢說、那麼英勇的衝鋒陷陣，上海的階級鬥爭蓋子是揭不開的，這個功勞誰也不能夠抹煞。如果沒有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沒有毛主席領導，像有些事我們就覺得出來呀？那麼我們上海的面貌像今天這樣子的改過來，不可能的，誰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證明這些人現在還沒有瞭解現在的革命到底是幹什麼的。我們勸過一些人，你們想想大局吧！想一想這一場偉大的革命使得我們國家的面貌，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是幾天，而是決定我們幾十年幾代的問題。這樣的大問題。想一想這一些，自己即便有點什麼不愉快，也應該改過來了，這是一個大的考驗。所以我們現在必須搞「三結合」，我們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積極去做工作，堅決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我們也希望所有幹部，包括那些領導幹部，包括市委書記處的那部分人，如果他們還願意革命，還願意跟著毛主席走下去，那我們都準備根據主席的指示來考慮他們的問題，我們

是聽毛主席的話的，我們也希望這些犯了錯誤，甚至於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在這緊要的時候，考慮一下自己究竟還願意不願意跟著毛主席走，還願意不願意改過錯誤，是堅定不改、屢教不改呢？還是準備改，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現在是非常重要的時候，不能夠再拖延了。我們也請他們考慮，這樣子我們的「三結合」，我們的奪權鬥爭就會更好地進行，這是「三結合」問題。（口號）

下面我想談一下「三結合」奪權的組織形式問題、政權的組織形式問題。也講一下上海人民公社為什麼改名字。這個問題，毛主席在談話中間也作了詳細的指示，大家都說巴黎公社，我們不是都講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嗎？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麼到現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麼他依據我看呢，現在也一定是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麼長久，這是巴黎公社。「蘇維埃」就是蘇聯的政權形式。蘇維埃政權形式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這是工農兵一個偉大的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寧當時沒有料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那麼現在蘇維埃，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國王嗎！美國是總統制，本質上還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他還舉很多例子，這個南越呢，是總統制，南越偽政權是總統制，而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國。那一個比較好一點？恐怕還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制，它旁邊的尼伯爾是王國。這兩個那個好一點呢？看起來還是王國比較印度好一點，就現在的表現來看囉！他說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國，就叫「天王」。唐高宗嘛，這是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對總統制、國王制、君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些東西都是形式，我們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個名詞，在英文裡邊和「校長」是一個名詞，是一個字，那考慮校長就和作總統差不多，其實

英文裡是一樣。所以主席說這個名稱不宜改得太多。他又舉了歷史上的王莽，漢朝、前漢，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他當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就像現在，我們現在很多人不喜歡這個「長」啊，都要改，他是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所有的縣統統改了。主席說在那一天下午紅衛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後他又不記得，還是記不好名字。那麼這個王莽下詔書，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難了，他也不知道這個縣改成什麼了，下詔書還得寫上，比如說邢陽縣，河南有一個縣叫邢陽，改成了齊由，詔書裡還記得寫上邢陽即齊由，不，齊由即邢陽，還得把老名字寫在詔書裡面，這樣使得這個公文來往非常麻煩，主席又講話劇，他說：這種形式外國也可以用，中國人也可以用，無產階級也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他說主要的經驗就是巴黎公社和蘇維埃，他說，可以設想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鬥爭，以後他說，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臺他們也可能不改名字，也還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呢，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了，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了，就像蘇聯那樣，它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共和國，它都不改，但是變了。

所以主席提出來，他說，這個問題主要看那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不在名字。所以他說，是不是咱們穩當一點好，不都改名字了，因為現在出了一個問題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學我們上海一樣，也叫了，主席最近一個時期反復考慮這個問題，中央的同志也反復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最初沒有這樣去想，如果這樣地想下去，如果各個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麼國務院又叫什麼？國務院叫什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主席說，這樣就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發生了改變政體的問題，就是國家的體制問題，國號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成中華人民公社呢？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還是叫社長？（笑聲）就出來這個問題了，不但出來這個問題，還出來一個問題，緊跟著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們改成中華人民公社，那就發生了一個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這個問題我估計，蘇聯就不承

認，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麼又出來個中華人民公社？他們不好辦，資產階級國家倒可能承認，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說在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呢？黨放在那裡呢？他說，總得要有一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他說，你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嘛，公社總要有一個黨，公社能不能代替了黨呢？毛主席說：所以，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規矩辦吧！將來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那麼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是叫革命委員會，那麼，也跟我們研究，大學是不是還是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好，因為十六條上面規定了嘛，工廠裡面或者叫革命委員會，或者就簡單一點，叫革命委員會也可以，工廠的「三結合」這種委員會也有「三結合」的，應該有幹部，包括技術幹部、領導幹部、一般幹部，應該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還應該有老年工人，還應該有民兵，就是這個名稱，主席的意見是原來憲法上規定的一些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這些都不動了，將來還是叫國務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還叫市人民委員會，他說，也不要改了，不過，毛主席又說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歡人民公社，很喜歡這個名字怎麼辦？他問我們，說你們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無非是幾種辦法嘛！

一個辦法就是不改，上海還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這個辦法的好處就是可以保護上海人民的革命熱情，大家很喜歡這個公社嘛他說，缺點呢？全國只有你們一家，那麼你們不是很孤立嗎？（笑）因為我們現在也不能登《人民日報》，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認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報》上，全國都會說：「你要叫，你為什麼只讓上海叫，不讓我們叫。」（笑）這樣呢，不好辦，依主席這個辦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優點，也有缺點。

第二個辦法是全國都改，全國都改就發生上面講的一些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承認不承認，很多麻煩的事，也沒有什麼意思，也沒有什麼

實際意義，第三個辦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這樣就和全國一致了，當然了，你們也可以早一點改，也可以晚一點改，不一定馬上改，如果大家說還是不想改，不想改那麼你們就叫一個時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傷上海革命群眾的熱情，他說，這個事情你們想一起看，又不要傷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熱情，又要找到一個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同志們，你們從這兒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問題總是站得高看得遠，一個問題到了他那裡，他就反復考慮的，考慮得比我們細緻得多，他提出了我們根本沒有想過的問題，這個包括我在內。同志們，恐怕你們也沒有想，我是沒有想，什麼國號問題呀！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呀！根本沒有想過這個事，那個時候，還有大家哪！有很多單位主張搞公社，我們也覺得不錯麼！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幹起來了，幹起來了我們當然就報告中央了，我們在那個時候就沒有再往下想，有些時候，腦子裡轉過一下，唉呀！我們說什麼人叫做社員啊！比如農村一個社員問題，農村人民公社，惡霸地主、富農不能當社員，在我們上海人民公社什麼人當社員，什麼人不能當社員，這個問題將來怎麼解決啊？腦子裡想過一下，但也沒有想下去，因為忙得不得了。腦子裡有點熱了。主席呢？他考慮問題反復地考慮。同時非常注意保護人民的革命熱情。最後中央是在會議上討論了主席的意見，就同意了全國的臨時權力機構的名稱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別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給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個餘地，給你們上海人自己考慮考慮。（長時間鼓掌，口號：毛主席萬歲！）所以毛主席在這些問題上考慮的非常周到，非常細膩。特別是對上海市人民群眾的熱情，（他們就是怕，我們沒有阻止他們）主席說：「你們看怎麼樣啊，能不能說得通呀？」我們說，上海人民都是聽主席話的，主席講了，大家會聽的。（口號）我們回來以後就向公社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了。大家一致地，沒有發生任何爭論，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麼就是中央給我們留下的這個餘地。我們完全考慮了，我們考慮的結果，還是按照全國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員會的口號），從今天會議上大家的情緒來看，就更加證明瞭：我們向主席說

的話不是假話，我們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眾組織、全上海的革命群眾一定會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掌聲）（口號聲）

那麼現在有人造謠說，因為上海沒有實行「三結合」，所以毛主席才沒有批准的，還有的說，因為紅革會沒有參加，所以《人民日報》才沒有登。還有什麼街上貼了七問、八問、十問等等，現在也請這些人把你們這些問題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號）我們不過是改了一個名稱，上海的政權、黨權、財權、文權統統地從舊市委、舊人委手裡轉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手裡，這個事實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口號）有那麼一個人在一個會上說，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口號是錯誤的，主要是因為這個公社是少數人搞起來的，更確切一點，我說開了，就是沒有包括他在內的。（掌聲）那我可以明確地表示我們的意見，這個口號「一切權力歸人民公社」如同現在「一切權力歸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樣。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口號。（掌聲口號）因為這個口號的實際意義就是說，他是把一切權力歸於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說把一切權力從資產階級、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回到我們自己的手裡來了，那麼這樣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政權是不同，不會和任何一個個人野心家、小集團來共用政權的。他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沒有資格來講話。（口號）那一種說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數人搞起來的人，如果他不是別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是上海的無產階級自下而上的、從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權。這個革命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工人階級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不愧是20世紀60年代的英雄，他們冒著極大的困難，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產的重擔。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我們的一月革命，我們還在想，實際上上海的奪權是從去年12月下半月就開始了，那麼我們的奪權絕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員會才開始的，而是我們當時看到了，鐵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衛隊要搞三停這樣的威脅，而市委在那裡繼續搞經濟主義的妖風，使得上海已經陷於癱瘓的狀態，這個

時候，如果我們再不奪權哪，同志們，不是說還有一個月不奪權，如果我們1月初不發告全市人民書，如果不發緊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個月，再有十天，我們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說我們收拾起來就更困難了，我們的奪權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奪了權，人民公社成立奪權時候，（我們的奪權已經）那個時候市一級的權實際上我們拿到手了，市委已經停止活動了麼，市長1月6號的大會就宣佈不承認了麼。1月6號的大會上，宣佈不承認曹荻秋是市長嘛！我們早已奪了權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從組織，給一個組織形式來表達就是了。正因為這樣，它是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的，所以黨中央，特別是毛主席，一看到這個現象，他就發現了這個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毛主席發現的，他才親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四個單位的賀電，這樣深厚的群眾基礎怎麼能夠說是少數人搞起來的呢？還有人說什麼是我拉起來的，我謝謝你！我沒有這樣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沒有上海的千百萬群眾起來奪權，誰也搞不成這樣的局面。我們的同志有這樣的口號：「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人民公社。」我說這是一個莊嚴的革命口號，他表示了我們有決心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今天把名字改一下，這個並不是改變了我們的決心，我們還是要用鮮血和生命來保衛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掌聲、口號）有那麼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麼一小撮，他們被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倒沒有把他們說成那麼壞，至少被這種思想、被一個「私」字迷了心竅，這種人你們永遠也不懂什麼叫做用鮮血生命保衛人民公社，如果還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問題上，還作一些文章的話，我勸你們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再打什麼主意。這方面沒有什麼文章好做，在這方面做文章，沒有什麼好結果的。（口號）上面主要講了一些奪權的問題，後面的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第二個問題，講一下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因為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報紙上已經發了告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和這幾天陸續發表的關於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信，關於臨時

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還發了小學、中學、文藝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的文件，還發了工作組問題的文件，還發了機關保密檔案的文件，還發了很多很多的文件，這些文件都是中央經過反復的調查研究討論寫出來的，你像小學開學不開學的問題，我們沒有回上海以前，12月份我們在北京就開了好多次座談會，反復地徵求意見。徵求小學教員的意見，徵求學生的意見，徵求家長的意見，調查了幾個月才下決心的。中學也是這樣。那麼這些文件裡邊，像合同工人這樣的文件也是調查了很久。這些文件我想不在這裡一一解釋了，都有文件發出來了，我們的任務是要堅決執行，問題是我們現在能不能執行，能不能貫徹，這個問題，首先是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要下決心，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證黨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貫徹，這裡邊，除了今天到會的各縣都來了同志，但是畢竟到會的農民同志少，他們現在聽廣播了，不是在這會場裡邊，在這個會場裡邊的是城市的人多。我們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貧下中農同志他們很好地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來保證今年農業有一個好的收成，同時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從各方面來支持農業，因為農業最大的特點是季節性。比如說，晚了一天就要影響到收成，我們不管搞什麼革命，都離不開一條，我們今天到會的同志，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我們都要吃飯，如果吃飯成了問題，那麼別的問題都談不到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農業搞好，但是搞農業也好、搞工業也好，其他的很多問題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產是上不去的，我想在這裡應該解決一個思想問題，好像一講抓革命促生產嘛，那就要把時間花在革命上，就侵佔了生產的時間，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時間多，用的勞動力多，好多基層組織大量的人脫產，好多人民公社的群眾組織，一個生產隊的人不多，而脫產的人員很多，這個是不對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講過，說我們抓革命、促生產，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應該放在第一位，但是時間的安排，不能夠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產放在第一位，那麼工廠就先按八小時安排生產。否則的話你這個生產如果要打亂了，那麼促生產就沒有辦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時，農業它不是按八小時工作制的。特別是春耕大忙也來

了，時間、勞動力更加緊張，這個時候我們抓革命，就要按照這樣的情況來考慮，在這裡，我特別想對現在還留在城市裡的農村來的同志講幾句話，這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同志和許多支持內地的工人同志，他們這些不是從農村來的是從內地來的，還有一些回鄉支農的工人同志還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還有他們的家長，我希望你們能夠很好地學習中央的文件，你們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內地去，這個大方向是非常光榮的，過去這樣做，今後還要這樣做。如果不把農村搞好，不把內地的建設搞好，不把邊疆建設好，我們上海建設得再好也沒有用，我們上海今後的任務，仍然是要支持全國的農業、支持全國的農村、支持邊疆、支持內地，我們的生產是為全國服務的，我們的工業也是為全國的，我們同志應該記得，柯慶施同志就是關心內地建設，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為這樣他才在那裡去世的，他最後還是那樣關心內地建設，為什麼我們不應該繼續這樣呢。有些人現在拋棄了自己的光榮的工作崗位，跑到上海來，有的人跑到上海來要求報戶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達不到目的，就去鬥里弄幹部，就去鬥那個工廠的幹部，我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是錯誤的。有些人吃了國家的飯，不為人民服務，在城市裡幹了些壞事，那更是錯誤的。

新疆建設兵團那裡，因為內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區去了，比如像回到上海來了，他們那個地區的農業一定受到影響，我們崇明島、長興島一些國營農場，因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內來了，那裡的生產就完全停頓了，有的農場，去年的稻子都沒有收，一些棉花還在地裡邊，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學生同志聽到這個消息，他們非常痛心，現在已經有幾千人跑去搶收了，那麼為什麼現在原來應該在那個崗位上的人，還不應該快點回去呢？我們特別聽到在幾個大飯店裡面，聽說在和平飯店裡，那裡就住著有一些國營農場的工人，那麼我們就請問這些工人同志，你們住在和平飯店幹甚麼，你們的崗位是在你們的農場麼，你們住在和平飯店，我說你們要學壞的，你們應該快點回去。而且在你們中間，在上山下鄉的青年中間，或者其他從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間，我們知道，有那麼一小撮是壞人，他們在那裡不幹好

事，我們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們的當，應該按中央的指示辦事，回到自己的光榮的崗位上去，現在春耕已經開始了，應該回去了。

你們是有實際困難的，我們知道，但這些困難應該按照正常的方法來解決，決不能用這種事情作藉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從貴州回來的同志，或者四川回來的同志，我們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電報，那個時候貴州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厲害，壓得過你們，那麼現在那些地方改變了麼，貴州變成先進的地方了麼。你們應該回去和那裡的工人團結一致，鬧革命，支持貴州的革命委員會，去進行奪權鬥爭，也不應該再在上海留著了。有一些人，顯得勞動紀律很不好，一天啊，名義上說是出來造反，實際上出來是沒有甚麼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這個話不是說所有的人了，是講有那麼一部分人。我還是覺得，如果同志們你們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員會的話，那就應該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因為這樣子懶懶散散不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本色，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難的時候都頂上去的，應該向這些同志學習，回到生產崗位，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違背這個方針。也不能違背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的那些規定，我們贊成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的意見，對有些人，他們這樣不顧勞動紀律，那就應當加以考慮。第一、如果教育了、勸了，還不回去，就應該停發工資，因為國家不能這樣子拿錢養人的，實在不行，應該開除，如果再幹壞事，就按法律處分。

我們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後還是會往外動員人口的，至於想在上海市內安排工作，就不要抱這種希望，沒有甚麼希望，死了這條心吧！（熱烈鼓掌、口號）所以抓革命問題，我不想多講了，我就講這麼一點。我把話說死一點，是為了這樣子，他就死了心麼！促生產的問題才好辦了，才好回去。那麼鎮壓反革命，這一方面就用不著我多講。

上海這個地方，同志們總還記得，階級鬥爭是尖銳的。上海不但有中國的地、富、反、壞、右，還有外國的地、富、反、壞、右，他們的人數是不多的，只有那麼一小撮。在戰略上我們藐視他們，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他們。鎮壓反革命問題，不能輕心，不能粗心大意。現在有情

況很複雜，需要我們很好地觀察，特別是我們廣大群眾要擦亮眼睛，因為現在情況的複雜性，就是由於有許多反革命。他們如果要是說：「我是反革命。」這個就好辦了。他們，其中有一些是打著造反的旗幟，有的是削尖了腦袋，鑽到了造反組織內部來了。這一點我們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應該提高警惕性。我們鎮壓反革命的方針，從來是毛主席的方針，就是要靠專政機關、靠人民軍隊、靠公安局，同時要靠專政機關和革命人民的結合，這樣的充分的群眾路線。如果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起來了，那就不管他們打著什麼旗號、用什麼方式的活動，他們搞祕密活動也好、搞公開活動也好，我們就容易識破他們了，這是一個。希望同志們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們人民解放軍公安機關要加強自己的工作。同時我們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援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同志們可以看到我剛才講了我們的革命委員會，我們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強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軍，不但有陸軍，而且有海軍、空軍。這是我們最可靠的支柱！（掌聲、口號）我們上海的陸、海、空軍，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我在這裡代表革命委員會，向上海的陸、海、空軍的指戰員同志們表示深深的感謝！（熱烈的掌聲、口號）同時我們向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保證，如果有人攻擊你們，如果有人想著對你們採取那種衝擊，衝擊軍事機關的那樣的行動我們全上海的革命派堅決地和人民解放軍站在一起！（熱烈的掌聲、口號）那麼當然也發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軍根據中央的指示實行軍事管制，但是那個地方有的組織他們也說自己是革命造反組織，有的我談過話，予先談過話，本應該服從中央的命令，要實行軍事管制就實行，但是那裡的組織裡邊的，當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援軍事管制。甚至於把軍事管制的命令圖了叉叉。而且對軍事代表圍鬥、圍攻，我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些單位的犯過這種錯誤的人，他們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話，他們應該寫出檢討，向軍事代表賠禮道歉。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我們將採取別的措施！（口號）

我在這裡還應該說一遍，就是現在市面上謠言很多，這些謠言造得越來越離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專門靠造謠吃飯的。有那麼

一位是機關市委的，他公然發了一個所謂的總理的四點指示。我看了那個指示不奇怪，我說中央要有這樣四點指示不會不告訴我們的吧。後來我們就打了電話到北京問，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義到處散發，是中央總理的幾點指示。當人家問他的時候，他說，不是總理的，是陳伯達同志的，再問又說不是陳伯達同志的，又是在哪聽來的（笑聲），固然可以這樣，冒充總理的名義到處造謠，紅革會的人也幹這個事，說是中央文革1月29日的電報是假的，然後從北京又打來一個電話，說什麼總理經過總參，經過總參又告訴上海的紅革會，又是總理，也恰好又是四點指示。總理好像專門發四點指示（笑聲），說什麼紅革會是不對的，張春橋派兵也是不對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樣子，真的是胡說八道！總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四點指示。上海的紅衛兵還發過兩次特大喜報，一次特大喜報是總理講毛主席林彪同志講，復員轉業軍人不要再成立什麼單獨組織，但是總理說：「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報說是總理說：「全國的紅衛軍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紅衛軍最好。」（笑聲）這些東西本來我們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謠言嘛，這一次，我們在北京開會的時候是當作笑料，對總理說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場。關於這個徹頭徹尾的造謠，毫無一點影子。還有一些謠言也造到我身上來，我最近看到關於我的謠言，多的我簡直都沒辦法。比如說，有張傳單說我對商業廳三軍的同志談話，談話的時候強調什麼工商業司如何如何，我在這裡負責聲明，我和商業的同志談話多次，但是從來沒有談過什麼工商業司。

謠言多了，有些什麼我們在北京，突然國務院那個接待站打來電話，上海一二三兵團工商司的代表來告狀，告上海的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告王煥文、譚得幹（音不準）和我。他告我，而且裡面說嘛，而且說上海有一天有五十萬工人大遊行。你們在上海的，你們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萬工人大遊行？不過是一百多輛汽車嘛，這兩天又有什麼有好幾個離奇的電話，又說什麼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勢有五點指示，我算算那個時間，我們那個時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這個事。我也沒去問王力，因為用不著去問這個事。還有一個說什麼是什麼中央文革接

待站答覆的，說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說一通，中央不承認，我在這裡說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根本沒有一個接待站，還有什麼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聲）在北京不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嗎，那個地方是什麼呀？那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秘書廳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組沒有接待站，我昨天還看到一個消息，說什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聯絡站，還有一個什麼又有幾點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說八道！哪裡有這些東西！連個接待站都沒有，你怎麼在那裡聽到五點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嘍！（大笑）所以現在有些人就是靠這個，就好像說北京有什麼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貼，就誰也不能闢謠。我說實在的，是不願意闢謠，也不值得闢謠。如果要闢謠也很簡單，你以為你可以造謠，我們就不可以給總理打個電話問一問嗎？讓你造謠吧！這樣的人要再造謠呀，就小心一點。假冒中央，給國家（錄音脫落一句）（口號）我們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擺出來，不要搞謠言，靠謠言吃飯是吃不飽的，（大笑）有道理你來講嘛！對於紅革會那些頭頭們，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講嘛！不要搞造謠，我們相信紅革會的戰士們是要革命的，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紅革會的戰士們曾經向我們打電話要求，說他們要開請罪大會，要我們參加，我們說你們戰士沒有什麼罪呀，你們請什麼罪呀？紅革會的戰士是無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頭頭。（熱烈的掌聲）就是對那些頭頭，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真正地改正錯誤，我們並不準備一棍子打死！但是，那還是老實的態度，不能夠採取蒙混的辦法，或者故意挑動紅革會的戰士們，使得戰士們繼續上你們的當！我們還是1月29號中央文革小組電報的態度，我們支持紅革會的戰士們起來造反，我們歡迎紅革會的戰士們造反！（掌聲）現在還有那麼一股風，故意挑動我們革命幹部子女、軍隊幹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個什麼叫做革幹、軍幹子女聯合戰鬥兵團的傳單，這是一張反動的傳單，他們故意挑動軍事、革幹子弟，說現在好像社會到處鬥你們、鬥你們的父母，這是胡說八道！我們革命幹部絕大多數是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我們的軍政幹部更是絕大多數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軍幹、革幹子女絕大多數也是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這些孩子是黨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熱烈

的掌聲、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他們即便是有缺點、有錯誤，是可以改正的。你們想著挑動他們的感情，把他們拉到一條錯誤的道路去，去搞什麼「聯動」呀！你們是得不了逞的！我們希望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很好地對待這些青年同志，因為他們是黨的，他們不會一直跟著他們父母走的！他們會跟著黨走的！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做對他們的工作。這樣才能使得「聯動」這樣的反動組織不能在上海擴大活動。

最後我想說一下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整頓作風問題，這個問題就不準備多說啦！我已經講得時間相當長了，那麼現在呢？我們為了要執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們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組織能夠加以整頓，特別是要從思想上加以提高，我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為上海的人民、為全國人民建立了功勞，這是誰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們也有許多問題，我這裡是講的革命造反派組織，不是反革命組織、反動組織。我們隊伍裡也有不純潔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時哪，我們建議按照鬥爭形勢的發展，現在有些組織需要考慮，按照單位、按照產業、按照系統、按照地區加以調整。現在有些革命組織跨行業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組織，裡面又有農民，又有機關幹部，又有學生，又有文藝工作者，這個很雜，有的學生組織為主，又吸收了別的，有的工人為主吸收了別的。這樣的話不好，還是按著產業來組織好，同時不是按單位組織也有問題，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進了壞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單位組織就比較好，壞人不容易鑽進來。同時從整個鬥爭，從批判或者從改，「鬥、批、改」嘛！從這個要求來看，如果按系統來搞呢，比較適宜。你比如說，紡織系統工人組織，如果他們搞成一個大聯合，或者冶金系統的組織，實行大聯合，那麼他們在批判、鬥批改紡織系統的問題，或者冶金系統的問題，那就比較方便，這個問題是個建議，請同志們加以考慮，因為這個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組織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決，用協商的方法解決，現在有些辦法。有很多行會性的組織，有些專門搞經濟鬥爭的組織，那實際上是分裂了工人階級。比如說有的搞年分，那些東西怎

麼能夠造反呢？比如說1956年大學畢業生一個造反司令部，我就勸這樣的同志，你們考慮一下，因為1956年也好，57年也好，65年也好，多來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總有左、中、右吧，有兩個階級吧，你們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們要搞，就要按階級，按左、中、右來組織嘛。我們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來組織，怎麼按處分哪。說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也不能夠劃分階級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時搞經濟鬥爭的。還有些特殊的單位，那天我聽人家說，什麼東西呀！不是頭些日子有一些公墓呀，有些墳哪被挖了嗎！當然這個事情應該解決，那麼被挖了的這些家的這些人就組織了一個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曉得到底要造什麼反（笑聲），又要經費，又要刻圖章，又要搞什麼，這個不成為一個什麼革命造反組織嘛！像有一些組織呀，是不能夠承認的，不應該組織的，我希望他們最好自己自動解散。

（鼓掌）有些機構脫產人員太多，剛剛我講了，要加以解決，要將來逐步地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則來選舉，有一些組織，在市內名譽也很大，你一問也沒有幾個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車。這些人我還是希望回到原來崗位，去好好地生產、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夠把你的單位的革命搞好了，我看就不錯了。咱們現在還有好多單位的權沒有奪下來呢！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我也想說一下，這是講組織，第二要很好學習，要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夠藉口忙不看書。對舊市委的有一些領導人，不講別的，就這一點，就非犯錯誤不行。就是不學習，要想讓他學習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難了，什麼規定星期六學習了，你到那時，一個人也找不到，這個東西，要靠自覺的。

我們同志們哪，知道《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說有一句話，說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為曇花一現的人物，我希望，我們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想這一句話，因為我們最近發現了一批人，當然總數不是很多的，當然了，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們都是很欣賞的幾個人，實際那幾個人真是不錯，在文化大革命裡面很有才幹，但是在最近都犯了比較大的錯誤，這句話是對這些人講的。在座的同志們，我們自己有沒有可能

啊？有沒有可能上當，剛剛取得一些勝利，就沖昏了頭腦，原來個人主義就有，在這個時候，個人主義突然大發展有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要很好地讀毛主席的書，不是只是在開會的時候念幾段語錄，要真正學會主席的思想，語錄要讀，主席的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要讀，特別是已經當了權。同志們，你們中間的很多人，過去不是當權派，現在奪了權，自己是當權派了，究竟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這個問題我們面臨著考驗！如果我們當了權，我們跟著毛主席走，真的讀毛主席的書，和我們頭腦裡那些不好的東西經常地、不斷地作鬥爭，那我們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當權派；如果我們頭腦裡，資產階級東西發展了，那麼，我們也可能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就要被打倒，那個時候，就要有另外一些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來，要打倒我們。這個話，我在今天我們很高興的時候我講一講，有好處。為了使大家不會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聲、口號：永遠聽毛主席的話！）

在學習這一點上，我們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學習。毛主席現在一天花在讀書、看報的時間，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國的紅衛兵報紙，他現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種傳單他都要。每天秘書都給他一大羅報紙和傳單。他為什麼要瞭解那麼多情況哪，很多情況從這瞭解的。他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講，他對我們講：不管你們怎麼忙，你們要拿四小時讀書、看報。同志們，在座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能拿兩小時呀？（笑聲、鼓掌、口號：聽毛主席的話！）同志們，我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們各個革命造反派，我們是聽毛主席的話的。我們有信心，我們不管階級敵人多麼猖狂，他們是打不倒我們的！但是堡壘是容易從內部突破的如果我們自己搞不好，如果我們不是堅決的、完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們不是經常地、不斷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地改造我們的世界觀，那麼可能，壞事就壞在我們自己手裡。所以，我在結束我的講話的時候，我想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信心：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我們有這樣的信心！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我們有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毛澤東思想。我們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會在毛主席的關

懷之下，在黨中央的指導之下，取得更偉大的勝利！（掌聲、口號）我祝同志們身體健康！祝同志們在工作裡邊取得更大的勝利！完了。（熱烈掌聲、口號）

南開大學廣播社、資料組根據錄音整理。⁴⁵

附件：張春橋在上海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傳達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月12~18日，毛主席請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個星期中主席接見了三次。接見時，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結合」問題

毛主席講：奪權一定要「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的問題也不大，內蒙的問題不大，亂就亂一些。現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眾，27%是部隊，20%是機關幹部。上海應該向他們學習。一月革命勝利了，二、三、四月是關鍵，更重要。

毛主席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上海市人委機關向總理勒令，要把所有長都取消，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反動的。這是誰搞的？現在都不願叫××長，叫勤務員、服務員，其實這只是形式，實際上總是還要有長，要看內容。主席說：湖南有一個口號「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都要改變」這是反動的口號。

（二）關於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說：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一系列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承認你嗎？蘇聯就可能不承認你，英法倒可能承認。改了以後，駐各國的大使館怎麼辦？等等一系列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現在許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請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

⁴⁵ 天津市財經學校一二·二六戰鬥組，1967年3月4日。再印1967年3月8日。

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議：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或者還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還說：公社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手軟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狀，公安局抓人前門進，後門出。

主席說：學校的權力機構，可為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三）關於中央文革緊急指示

毛主席說：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有造反氣魄。最後一點說：「將採取必要的措施。」這次炮轟張春橋大會開的話，一定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幾筆帳以後還要算

1.市人委機關向總理勒令。2.紅革會問題。3.廣革會反對電臺軍管。
4.龍華機場反對軍管。

（五）1.現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注：這條語錄

是毛主席在1920年講的），自己也記不住了，以後不要用了。

2.以後不要提「打倒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還是提「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3.主席問：「同濟大學的學生是否還在車站，碼頭？」張春橋答：「還在。」主席又問：「你們來的時候是否還在？」張答：「還在。」主席說：「那很好。以前學生和工人結合，沒有真結合，現在才是真結合了。」

4.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反馬列主義的。現在我們鬥爭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爛狗頭」，「打倒××」。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點文章批判。

5.文藝界也要回原單位進行文化大革命。

6.《文匯報》搞得很好，很同意他們不鬥爭里弄幹部的觀點，我

支持他們。張春橋同志說：「《文匯報》壓力很大。」毛主席說：「要支持他們。」⁴⁶

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2.24.）

【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廣場召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戰友們：

你們好！我們好久沒有坐在一起討論問題了。

12號毛主席叫我們去北京的。毛主席當天很快接見了我們，以後又召集、主持了中央會議，討論了上海問題和其他工作，發出了一系列決定。臨回上海時，主席又接見了我們。

首先要向同志們彙報的是毛主席身體很好，每次談話時間都很長，但精力始終旺盛、愉快。對上海非常關心，非常瞭解，使我們很感動。毛主席對上海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貢獻給了很高的評價。這次講：「上海的工作，總的來說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時才幾千人，現在一百多萬了，這說明上海工人組織得很快。」主席又問了農民、學生、機關幹部的情況。這是對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幫助和支持。有毛主席、黨中央的支援，我們面前有再大的困難，階級敵人耍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擋我們前進。

一、關於奪權問題

（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是由上海的「一月革命」開始的。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也

⁴⁶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是如此。這次奪權和1949年從國民黨手裡奪權是不同的。毛主席講：「這次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是我們發動的。」那一天，毛主席還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寫一篇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們的理解是，毛主席在這裡指明了十七年來，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而不是劉、鄧路線占統治地位。那無產階級專政下又為什麼還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釋說：「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中有一部分被篡奪了。」毛主席的話是辯證法的，先肯定了整體、後否定了局部。毛主席還指出所謂「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自己搞起來呢？因為我國建國十七年，十七年來都很穩定。中國經過一百多年動亂，終於統一了，穩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樣，統一和穩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帶來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奪了，穩定中包含著不穩定，搞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義根子連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強，把很深的道理歸結成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二）在奪權鬥爭中，成為今天的關鍵的是「三結合」的問題。這是奪權和鞏固好權的重要條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已經奪過好幾次了：1月14日北上返滬第二兵團奪過；1月22日上三司等四個組織奪過；1月24日紅革會又奪過，但他們奪了些什麼呢？奪了幾間房子，奪了大印，自以為有了權，實際上根本沒有得到實權，他們也發表聲明瞭，但他的話根本沒人聽。華東局機關也是這樣。奪了幾間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幾部汽車，別的東西都沒有得到。我看這樣的權還是不要奪了。中央指示，華東局書記處的權不能奪，因為它是黨中央的代表機關，奪就是奪黨中央的權。華東局機關的權可以奪，盡是些房子，奪過來也沒意思。這說明，必須有無產階

級革命派大聯合才能真正奪過權來。一個、兩個組織奪權，只能發展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實質上是把全民所有制變成小團體所有制。實際上是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南斯拉夫的辦法，他們那裡不是在搞工人「自治」嗎！我們把話說的尖銳一些，目的是讓這些同志明白這條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奪權，就必須找一個大聯合的最好形式——這就是「三結合」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聯合。大聯合不是說群眾團體多就算，缺少另外兩方就不算大聯合、就奪不過權來，奪過來也不會鞏固。毛主席這次談這方面最多。

我們旁聽了山西省代表的彙報：如果沒有山西駐軍的支持，山西根本奪不了權。山西省委反動透頂，組織了便衣特務，發了槍。劉格平對面住了兩個特務，槍口對準劉的視窗。劉隨時有被捉的危險。因為山西駐軍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奪了權。因此，必須要有解放軍的支持。

那麼沒有革命領導幹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個戰鬥隊還要有個負責人嘛！現在奪權也要幹部，無非有新有老。為什麼要有擔任過領導工作的老幹部呢？道理很簡單。比如，一些工人表現很好，敢闖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貢獻，但如果把一個城市，比如上海；一個省，比如江蘇，交給他們，他們就會感到很困難，因為沒有經驗，他們管理一個車間也許會熟練一些。不要說工人同志，我總還算做過一些工作吧！現在讓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難。我過去也參加過市委的討論，但不是我做決定。柯老在世時，我們有問題解決不了就跑去找他請示。他病倒後，我們便感覺擔子很重了，現在更重得多了。對許多東西我瞭解很少，比如財政稅收，老實講，我過去根本就沒有興趣。對農村有些瞭解，但很不夠……。毛主席講：一個大學生當大學校長不行，大學還沒畢業，對整個

學校還不熟悉。當個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為沒有教過書，沒有領導全系工作的經驗。還是應該由過去培養的教師、助教來擔當。在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洩氣，毛主席還說：青年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貢獻，但是讓他們馬上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的班還不行。我個人的理解也是這樣，「三結合」的方式是對青年的很好鍛鍊。青年人二十幾歲跟著老革命幹部學習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歲當省委書記也還是很年輕的。

拿上海來說，主席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但是如果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開始成立時沒有實現「三結合」的話，牌子恐怕老早就讓人家砸了。沒有這個危險嗎？人家不是早在籌備第二個、第三個公社嗎？連守衛公社辦公大樓的警備連都向上請示過，如果有人來砸牌子怎麼辦？因此，如果沒有解放軍的支持是不行的。我這裡不是過高估計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們個人沒有什麼。但是由於我們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時多考慮考慮。這說明「三結合」的重要性。有的人總想試一試，過去，有人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現在，有人反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們態度也很鮮明，誰敢試就讓他來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經有了一定權威，今後還要加強它的權威。

上海市部（局）長以上幹部六百多名，處長以上幹部六千多名，難道這六百多和六千多中還愁找不出「三結合」的對象嗎？這裡面的大多數同志還是好的。當然，他們起來造反得很晚，直至12月18日開大會，但這在全國還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興。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幹部，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中沒有一個。這當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們自己，也怪陳丕顯、曹荻秋他們。他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一些幹部帶壞了。許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們根

本沒有認真傳達，使得許多幹部聽不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八屆十一中全會，曹荻秋在市委常委會上只傳達了一個小時。據說，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根本沒有傳達，因此北京紅衛兵小將一衝，許多幹部有抵觸情緒。「安亭事件」，曹荻秋只傳達陶鑄的指示，而毛主席的指示連市委書記處都未傳達，馬天水就不知道。因此，在曹的鼓動下，竟然跑到中央工交會議上去放炮。所以陳、曹這些人不僅對上海人民和廣大幹部欠了債，而且對周圍的同志也欠了債。他們又利用「內外有別」、「組織紀律」來限制幹部，由此，我們才理解到為什麼柯老在世時，也是這批幹部，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還比較好嗎！特別是1958、1959年期間，上海工作在全國還是比較好的嘛！還不是這六百多部（局）長，六幹多處長嗎！毛主席講，不要只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而且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態度也不是鐵板一塊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相信95%以上的群眾。95%的幹部是會跟著我們走的，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很多，但只要我們引導很好，他們也會跟我們走。毛主席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相信群眾的最大多數。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不相信最大多數。《紅旗》第三、四期社論很重要。其中第三期裡面有一段原文是「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毛主席改為：「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主席加這幾個字體現了最偉大的思想，政策界限清楚了，寬很多了。

有的同志奪權以前還注意學習主席著作，奪權以後忙得一塌糊塗，不看書，不讀報，這是很危險的。這兩期社論應當逐字逐句地體會呵！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動的。這不是我們造反派的思想，但對我們有影響，因為看到許多人那麼頑

固，十分氣憤，於是在人家宣傳時就聽信了。其實這個口號根本不成立。首先喊這個口號的人就不打倒他自己，不懷疑自己，也不懷疑這個口號是否錯誤。階級鬥爭就是兩個階級的對壘，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資產階級也打倒資產階級嗎？除非他們內部有矛盾。喊「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最後勢必走向自己的反面，被人家打倒。

在上海，當我們問到造反派組織怎麼樣時，他們總是說：我們組織很好，連一個科長也沒有。中央有一個機關連副科長都不要，還自以為純潔。簡直沒有一點階級分析。最近，國務院向我們反映了一個材料，一個市委機關造反總定向國務院發了一個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長」。裡面不少話是錯誤的。如「歷來是處長管科長，科長管科員」。我看將來也還是要這樣。「帶長的歷來騎在黨和人民的頭上。」林彪同志是國防部長，他也是騎在黨和人民頭上嗎？這是反動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講：「連副科長都不要的，待不了幾天。」毛主席在五項接班人條件中講：「……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朱德從井岡山時期就反對毛主席，《古田會議決議》中許多就是反對朱德的。毛主席對這種人多年來就是拉著他走。我們要向主席學習。

據我們瞭解，在上海，有些人一直沒有發言機會，我們應該給他機會，讓他們出來亮相，讓他們串連，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當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就是給他機會也不行。我們不要等條件完全成熟再「三結合」，我們也不要一定找十全十美的幹部來結合。可以區別對待。有的參加核心領導，有的搞一般工作，還可以有別的形式。

有人擔心他們「投機」，這也沒什麼可怕的。投機遲早會暴露的，革命造反派什麼都不怕，怎麼現在怕起來了？這

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影響的結果，如果我們將來一旦犯錯誤也會立刻被打倒。回去以後，各單位要排排隊，選標兵，也要對幹部做工作，要他們站過來。他們之中，有的也承認站晚了，那就趕快站過來吧！「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可以這樣辦。

現在雙方感情上過不去。鬥了半天，現在又要結合。感情上不通，認為不好。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們鬥是為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今天結合也仍然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首先要注意不能記仇，鬥了一下，有時過分了，應當諒解。造反派對犯了錯誤的幹部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幹部對造反派、對革命小將也要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代價，這樣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怎麼能不付出代價呢？我們的代價並不大，比英、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代價小得多。有的鬥完全對，有的鬥過分了，也算是你對革命的貢獻吧！老實說，沒有革命小將的衝鋒陷陣，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沒有這樣一次偉大的運動，上海市委的蓋子能揭開嗎？一些人能揪出來嗎，不可能！這些偉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還是看看大局吧！從國家的、世界的前途著眼，不要光看到自己。包括省、市委書記處的同志，只要他們願意改正錯誤跟毛主席走，我們就歡迎。那些犯了錯誤的甚至是犯嚴重錯誤的同志，現在是你們選擇道路的緊要關頭。

- (三) 毛主席說：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到現在已經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當時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我看現在也得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會允許無產階級公社存在這麼長時間。十月革命創造了蘇維埃，列寧很高興，但沒有料到這種形式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結果讓赫魯曉夫利用了。……南越是總統制，鄰國柬埔寨是君主制，我看還是柬埔寨的君主制好。印度是總統

制，尼泊爾是王國制，我看還是尼泊爾的王國制好。以後，毛主席又舉了周、漢等朝的例子，談到王莽時說他是最喜歡改名字的了，就和北京的紅衛兵把所有街道名稱都改了一樣，結果，新名字記不住，還用舊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內容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哪個階級在掌權。比如蘇聯變了，但名稱卻仍然沒變。我看我們還是穩當點好，現在各省、市都學習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麼呢？國號改不改呢？如果改為中華人民公社，那國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長了。國號一改，還有個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我看蘇聯就不會承認，承認對它不利。公社成立了，還要不要黨呢？我看應當要，總要有個核心，甬管叫共產黨、社會民主黨，還是叫一貫道……總之，還要有一個黨。我看名稱還是不變的好，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也還叫國務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歡人民公社這個名稱？你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還叫上海人民公社，優點是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缺點是全國只你們一家，不是很孤立嗎？《人民日報》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會發生上面一系列的問題。你們回去以後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總之，既不要挫傷上海人民的熱情，又不要影響大體。

從上面，我個人體會到主席站得高，看得遠，什麼問題一到主席那裡，他總是考慮得很細緻、很多、很遠。而且總是保護人民群眾的熱情。以後中央會議決定一律不叫人民公社，但給上海人民留了餘地，指出「除上海主席另有指示外」。我們回到上海後開會時，大家一致同意改名。

現在，有不少人講，由於沒有實行「三結合」，沒有「紅革會」參加……因此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這些人請你們收回你們的言論吧！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市委、

市人委的權是不可抹煞的。

有一個人在會上說：「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為是少數人搞的。說穿了，就是因為沒有包括他，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切權力歸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和「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一樣，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的權力決不能和一些個人野心家分享。

那些喊「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數人搞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話，也是根本不瞭解什麼是一月革命。上海的奪權鬥爭在12月下旬就開始了，那時「赤衛隊」搞「三停」，如果再不奪權，只要一個月，不！二十天，上海就會不可收拾了。實際上遠在公社成立以前，1月6日的大會上就奪了權了。上海千百萬群眾起來奪權，這麼雄厚的群眾基礎怎麼會是少數人搞起來的呢？有人還說是我搞起來的。謝謝你，我沒那麼大本事。我們今天只是把名稱改一下，有的同志提出：「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人民公社」是一個十分莊嚴的口號，現在可以提「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了。

有那麼一小撮人，只是一小撮，搞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被「私」字迷了心竅，老實說，誰想從人民公社改名字上做文章，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勸你們不要枉費心機了。

二、抓革命、促生產

中央最近發出了一系列文件，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執行。我們革命造反派要下定決心保證黨中央的指示得到貫徹執行。首先是農業。因為農業最大的特點是季節性強，晚一天就會影響很大產量。不管搞什麼革命，大家都要吃飯，因此要促生產。但是要搞好生產，又必須抓革命。不要一提抓革命、促生產就無限制地增加革命的時間，抽出許多人脫產。林彪同志講：抓革命是第一位，但在時間上，生產是主要的。特別

是春耕季節，要按照現時的具體情況處理。

對於支農、支內、支疆的同志，我希望你們用心地領會中央的指示，你們去那兒是十分光榮的。那裡不建設好，上海建設得再好，也沒有用。我們應該記得，柯老正是因為關心內地建設才到四川去，而在那裡逝世的。有的人想回到上海來，達不到目的，就去鬥里弄幹部、安置幹部，有些人吃人民的飯，不為人民服務，而且在城裡幹了許多壞事，就更成問題了。新疆因為許多青年都返回原地，生產已經受到很大影響。……在和平飯店住著一些國營農場的工人，你們在幹什麼？你們的崗位在農村，你們再在這裡（飯店）待下去，會學壞的。我們知道，你們之中有那麼一小撮人是壞人，廣大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們的當。

懶懶散散不是工人階級的本色。

三、鎮壓反革命

上海不但有中國的地、富、反、壞、右，還有外國的地、富、反、壞、右。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在戰術上則要重視。現在情況很複雜，而要我們認真觀察。他們打著「造反」的旗號，有的更是削尖了腦袋鑽到造反派組織內來了。鎮壓反革命，毛主席的方針從來就是專政機關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我們要堅決支持人民解放軍，不僅陸軍，而且包括海、空軍。上海的陸海空三軍對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很大。在這裡，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上海還有那麼一小撮人反對軍事管制，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造反派，那麼首先應當向軍代表賠禮道歉。否則，我們將採取另外的措施。

現在，社會上有那麼一批人，就是靠造謠吃飯。如市委有人假造了周總理的四點指示，又如關於「紅革會」和我全不對的總理指示，「紅衛軍」的兩次大喜報，王力同志關於上海形勢的五點指示，全是偽造的。更可笑的是最近有人傳出所謂中央文革接待站關於上海形勢的指示。只要說一句就夠了。中央文革根本沒有接待站，連接待站都沒有，哪有什麼幾點指示呢？真是見鬼了！我們闢謠很容易，但我們不願意，也不值得。這些造謠的人自己要小心一點，假冒中央和國家首腦的名義

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們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你有理就來講嗎！不要靠造謠吃飯，造謠是吃不飽飯的。「紅革會」那一小撮頭頭，你們有理就講嗎！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紅革會」的戰士是革命的。他們打電話給我，講要開請罪大會，我說，你們有什麼罪，有罪的只是「紅革會」的一小撮頭頭，對他們也要爭取，要看他們自己的表現是否悔改。

目前有人在挑動革幹、軍幹的子女，我們告訴你們：革幹中大多數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軍幹中更是如此。這是黨和國家寶貴的財富，我們絕不允許「聯動」在上海擴大活動。

四、組織整頓

上海造反派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是全國人民都看得到的。我講的是造反派組織，不是反革命組織。我們內部有些不純分子，同時，我們要按鬥爭形勢的要求進行調整。按系統、部門、單位建立組織。有的組織裡面有工人、學生、幹部……，很雜，大家都浮在上面，混進壞人也不知道，如果按系統組織起來，如紡織系統、冶金系統，那麼解決本系統的問題就好得多。此外，有的組織本身就具有分裂的性質，如有的按年份，如1956年大學畢業生組織一個造反司令部。不管你是哪一年畢業的，總有左、中、右之分吧！我們要按階級，按左、中、右來組織，而不能按別的原則組織。有的組織則更明顯地帶有經濟主義性質，如遷墳的那些人組織起來，成立什麼造反司令部，我真不知道，他們要造什麼反？我勸那些浮在上面的人還是回到本單位去搞鬥、批、改，許多單位還沒搞好。

革命造反派必須抓緊主席著作的學習，不要當曇花一現式的人物。在北京和外地，我們發現有這麼一批人，當然還是少數，我們很欣賞的人，很有才幹，但現在都先後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這個教訓大家都要記住。我的話，就是對這些人說的。總之，要去掉盲目性，加強自覺性。奪權以後，大家成了當權派了，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要看今後的表現。弄不好，又會被別人，也許是這裡的一部分同志所打倒。為了讓同志們不被打倒，現在要記住打倒。

毛主席每天讀一大迭報紙和傳單。他再三囑咐中央文革小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時讀書讀報。在座的能不能拿出兩小時來呢？

我在結束講話時，我想講，我們應當想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我們一定要乘勝前進！⁴⁷

張春橋與華東局革命造反派座談記要（1967.2.25.）

上一次來上海主要是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這次去北京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彙報工作。周總理問起華東局現在搞得怎麼樣了，我回答是目前一時期工作很忙，沒有插手管。這次受總理的委託我管一管。所以今天找你們談一談。

周總理說，華東局書記處的權不能奪，書記處是黨中央派出的機構，要奪也只能奪華東局機關內部的權。就是要奪華東局的權，也只能待六省一市全部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後和華東局機關一起報請黨中央指示後考慮。現在各省奪權沒有通過華東局，上海奪權也沒有通過華東局。周總理我管江蘇、浙江。現在有些省的當權派被打倒了，李雪峰還沒有打倒。中央「三結合」也剛剛開始，許多部門癱瘓了。目前煤礦煤的生產有些下降，西北陽泉煤礦的權還沒有奪下來。經濟形勢一、二月可能有些下降。但權奪過來之後就會好轉。農業還跟得上，問題不大。農民自聽了中央的指示後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小三線建設和上海協作等問題要抓起來。

機關的運動短了一些，目前要：（一）搞好機關文化大革命；（二）抓革命，促生產；（三）「三結合」奪權。對於幹部要階級分析，要相信大多數。有些幹部的政治面貌是人是鬼，已是很清楚了。

⁴⁷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320頁，1988年10月。

（這時潘國平要走了）張對潘說：耿全章抓起來你知道不知道？潘說不知道。張說，我認為不要抓來抓去，要照顧工人熱情。

六省一市的組織不要搞了，叫他們回去。各省都打倒不對。他們（他們指省委書記）在民主革命時期都有很大功勞，現在犯了錯誤要允許他們改正。潘復生一開始就站到造反派一邊來。貴州情況也是如此。中央曾經排過對立面名單（指站到造反派一邊來的幹部）但非常困難。彭真、薄一波在山西已有三十多年的老根。山西省的權現在奪下來了，但那時白色恐怖很厲害。

現在提出「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是無政府主義的口號，這是對外講的，實際上這是反動的口號，「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是陶鑄提出來的。在運動一開始，我們沒有反對它，這是由於在運動開始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當初姚文元同志曾寫過文章，但毛主席說，不要發表了。我們也反對湖北當初的全面批判這一口號，但運動發展到了現在，矛盾基本暴露了。如果再提出「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口號，就離毛主席路線更遠了。

毛主席說你們對劉少奇怎麼辦？是不是要抓起來？我看以後我還要和他一起工作的。彭、羅、陸、楊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唱的調子愈來愈高了，毛主席建議不要開了，毛主席說我怎麼能和他們四人（反黨分子）一起開會呢？毛主席對犯路線錯誤的幹部一直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要團結——批評——團結，如歷史上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王明等都是這樣。王明在七大、八大都選上中央委員了，以後九大不會選了。因為王明逃到蘇聯去做特務活動去了。劉少奇看來九大中央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

《紅旗》13、14、15期社論，是一級一級加油的，要相信廣大群眾過去很多人都怕，當毛主席上天安門時很多人怕群眾。過去鬥地主時有人怕了。說做得過火了。毛主席說現在不要掛牌子、戴高帽子。掛牌子、戴高帽子是我在湖南農民運動中提出的，當時是鬥封建主義剝削者地主，這是完全應該的。但到解放區鬥地主時也很少用了。現在鬥的是些當權派，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都有功勞的，這是和過去鬥地主時是

有區別是的，以後不要掛牌子了。要照中央軍委八條規定辦事。一出現時，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他們無微不至地愛護和關心，但後來發現紅衛兵中一部分人打人，為了這事，中央文革小組調查了這事，開始發現打的都是一些壞人，都是地、富、反、壞、右，打過就算了。但後來發現壞人、好人都打了，這就不對了。中央不得不出來制止打人的。

現在外面說，有些省委書記失蹤了。這是不對的。葉飛、江華、譚啟龍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請他們去的，他們到北京去後一面要檢查自己的錯誤，一方面要學習學習。他們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都有大功勞的。

機關內各部委要實行「三結合」，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員會。農委、計委、財委、經委等業務工作要做好。內刊、理論班不要急於殺出去，以後理論工作還是需要的，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是好事。知識份子弱點就是怕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對當權派鬥爭要大、中、小會相結合：大會是造聲勢，中小會是解決問題。山東省、福建省奪權鬥爭快了，江蘇、浙江還有些問題。我插手管一下。華東地區的反動路線主要是魏文伯、陳丕顯、曹荻秋三人負責，其他人都是執行者。去年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批判了劉鄧路線，這時魏文伯也寫了一張劉少奇的大字報，說劉的檢查極不深刻，還不如解放軍的一個連指導員。會後我和魏談話，你的大字報怎麼能這樣寫，指導員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劉少奇是代表一種資產階級思潮的，是在我黨的代理人。魏文伯看來很糊塗，但不是一般的糊塗，去年10月初批判彭真大會，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是毛主席批准的。在到北京去之前，我徵求魏的意見，魏提出兩條：（一）要狠狠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二）劉鄧的人事關係很複雜，你要小心。在十一中全會上主席曾對各省委書記批評了一下，魏根據個人的印象，自己寫了一些省委的材料。結果毛主席看了之後批評了他，省委書記不要人人過關。

魏文伯和韓哲一要有區別，我接觸韓三次，在安亭事件中曹荻秋是反對的，但韓是同情我的，他主動去蘇州解決問題，我在中央看過韓的

材料至今沒有發現什麼。韓和薄一波的關係可能很複雜的，薄是經委主任，薄的一批人主要和劉少奇有密切關係，他們都是北方局的，但韓不一樣。做經濟工作的一天到晚就是算帳，全國搞經濟工作的人很少，餘秋裡就是如此。

貼我大字報不要講人家反革命，但要看問題的實質。上海前一時期紅革會是代表一種思潮的，他們要炮轟中央文革，這就走向事物的反面了。

平時劉鄧也見我們表面上很客氣，但心裡是恨死了我們，如他們再上臺，我們就要人頭落地。對陳丕顯我們是做了一番工作的，在北京開會時，我曾對陳說，你要振作起來，站到紅衛兵和毛主席一邊來，江青同志和我曾願意做陳丕顯的參謀，但陳根本沒有聽進去。

陳伯達同志說，反動路線問題按內部矛盾處理，以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給予出路，批鬥從嚴、處理從寬。

毛選第五、六卷在去年12月毛主席已經批准了。五、六卷的出版是由上海負責。照理在2月份是要搞五卷的，毛主席也同意搞出給他看看，前一時期由於我工作忙沒有抓。同志們要節約鬧革命，特別是紙張，如果再浪費，下半年連報紙也困難了。

最近你們看到沒有，本來提到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現在只提二反了。這樣問題就狹多了。本來提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後一條不提了，只提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農村是搞遲了兩個月，照理在秋後應及時搞的，但沒有抓緊，脫了2月，在這以前陶鑄搞了一個文件。

對於各地聯絡站，中央已有文件了。對於以前的聯絡站，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壞事，如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崗山，希望撤回去，就地鬧革命。對於保皇派，這個名字在上海能聽到，在北京是不提了，用保守派比較好。對於保守派在運動初期中民憤很大的骨幹分子，特別做了盯梢，抄黑名單，保黑材料，保黑黨委的人，應該給予批評、批判，但不要打擊面太廣，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相信大多數原則，保守派中大多數是受蒙蔽的，骨幹分子是極少數。

對於犯嚴重錯誤的幹部應該怎樣對待？張春橋同志說：《紅旗》社論第四期中有段是毛主席加的：「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有人提出可能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滑過去，我認為不要緊，也不要怕，許多年來，劉鄧滑過去了許多次，但這次終於暴露了來了，這是一次總爆發。

你們很關心主席最近在做些什麼工作，毛主席最近在考慮批和改的工作。去年12月毛主席和我們談了，在批判時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鄧小平多年來的講話，對他們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教工聯絡站

上海財經學院造反隊翻印

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材料組再轉印1967.3.18⁴⁸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3.12.）

【張春橋最近抓川沙縣、黃埔區基層奪權。會上先由川沙縣同志介紹了一些情況。】

張春橋講話

組織機構問題，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再拖上兩三個月，群眾非造他們的反不可。區和縣奪權後，不要急於先改造機構，建立新的機構，因為過去的機構已經癱瘓了兩三個月，建立要花很多時間，而且群眾又不熟悉。還是把原來的搞好。所謂打碎國家機器，是要把裡面的壞人除

⁴⁸ 南京大學紅色造反兵團主辦，《紅衛報》，1967年3月25日星期六第26期。

掉，組成「三結合」的班子。

文化革命是從學校開始的，但現在大學已落後了，社會在擴大奪權，大學還沒有鬥批，怎樣改？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應從大局考慮，學生還是要回學校去。

這些組織（指革命委員會裡的各小組）無論如何不能建立龐大的機構，把事拿到局裡去做，把原來的機器開動起來，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結合」，不要新設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這樣是不是恢復到舊市委，舊人委？只要實行了「三結合」，那就不是的。如果不實行「三結合」，那就有可能。必須要把事情更快地辦起來。這樣是否沒有群眾基礎呢？工人階級當權，不是把革命委員會都變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執行什麼路線。當然，要把工人中的優秀代表吸收進來；同時要不斷地提拔一批新幹部。考慮幹部首先要從革命不革命，是否忠於毛主席來看。當然，也不排斥這一點，一些局吸收了一些工人成立了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只能議論一番，商量一下大事，到執行時還是各個部門去執行，要有分工，現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狀況請大家考慮一下，裡面真正的劳模一個也沒有，農民代表也沒有。到底要多少委員？大家討論一下。我傾向於多一點，委員會下面設常委，處理日常工作。各個群眾組織要加強組織紀律，代表要考慮把隊伍帶好。有些事情外面很快就知道了，上次傳達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外國通訊社都報導了。更重要的要把隊伍帶好。例如工總司，上百萬的人，這個隊伍怎麼樣？怎麼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政權組織與群眾組織是有區別的，有些事情不應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出面。革命委員會發言要負法律責任，現在有人談到摘桃子問題，毛主席是指兩個階級而言，不是指個人，個人有什麼桃子可爭？搞革命要一不為名，二不為利，這個桃子應落在無產階級手裡，而不是落在個人手裡。如果落在個人手裡，就把這場鬥爭的意義看錯了。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如沒有毛主席的指示，權能奪過來嗎？有一天《人民日報》四版的都是上海的消息，我看了有點擔心。人民公社改名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早就被砸爛了。我們這個權是黨、群眾、毛主席奪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最近上海的同志驕傲勁不得了，老子

天下第一，其實至多是第二，毛主席第一。要是內部的人互相幹起來，用不著階級敵人出動就非垮不可。最近有的人頭腦中「我」字大大膨脹了，毛主席和黨、群眾都沒有了，敵人也沒有了。我們要總結，要整頓思想，這樣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辦事。有的人想個人多，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艱苦的工作還在前頭，要開門整風，不整不行，關門整風也行，總之是要整的。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些組織一整就打架，一開口就是「大毒草」、「大陰謀」、「撈稻草」，這是對敵人講的，對同志哪來的大陰謀？對敵人要狠，對同志要和，這當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只能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

全市性的組織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決議草案上已經講了，根據這個精神辦事。我認為各組織首先要瞭解自己組織的情況。有些組織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還有反革命，司令員要回連隊，摸出經驗來，把自己單位的大聯合搞好，這樣才能有發言權。都回去，下去幹，把自己的工廠、學校的大聯合解決了。市一級組織要保留的話，無論如何不要妨礙下邊的大聯合；如妨礙、干涉的話，主張把這個總部推翻。市一級的組織對下邊的聯合都要支持，不管以什麼名義聯合⁴⁹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3.20.）

【地點：上海中蘇友好大廈。】

徐景賢：自從2月5日我們奪權以後，大家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績，幹得很好，在這裡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同志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參加我們工作的有革命的學生，

⁴⁹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各群眾組織（38個造反組織），還有各地的革命學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會也是歡迎他們。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見到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橋同志在百忙中抽空來和大家見面，下面張春橋同志給大家講話。

張春橋講話

剛才聽說大家都在革命委員會工作，在同一個機關裡沒有見過我，那就很糟糕了！看來，這也是對我們的批評，因為我們很官僚主義！實在對不起。每天給我們的信很多，要求見我們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裡看也看不完呢？剛才交大反到底給我一個條子，說從安亭事件答應接見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做到，……（這時有人在搞錄音）春橋有些生氣說：何必錄音，搞得很緊張，又這麼現代化，這個習慣不大好，大家隨便談談嘛！一次我和華東局的一些同志隨便談談，一下子傳單就傳到北京。這一次傳達毛主席的聲音，也傳到北京，其實看了裡面很多東西不是我講的，這不大好，現在我們掌握政權了，在我們內部還得內外有別嘛！

還是回頭來講。我們大家在一塊工作，可以說，很熟悉了。我們回到上海二個半月沒有做什麼事情，主要聽了一些彙報，見的人也很少，許多工作主要靠在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和革命的幹部做的。比如火車站通車這件事就是這樣嘛，我們又不會開車，火車的通行還不是鐵路的工人和同濟東方紅戰士幹出來的！我們頂多提了點意見，而且有時還是錯誤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來成績就是很大的了。

現在上海的形勢很好，全國的形勢也很好，我覺得一天時間有時過得很快，也過得很慢，我從北京返來又要一個月了，想一想許多工作都還沒有頭緒和眉目，這樣想又覺得時間很慢，急的很。不過總的時間是過的很快的。現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天下，誰敢說不是！這幾天我們又在搞領導幹部的造反，上海的舊市委書記處除我一個分裂出來以外老是鐵板一塊，怎麼會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總是

一分為二的嘛。現在總算是開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力有來自上面和下面的，以及自己頭腦裡的。上面的就是劉鄧路線，劉鄧實權已經沒有了，但能不能說完全打倒了呢？還不能這樣說。劉鄧路線在全國批判還很差，上海就更差。過去開大會也提提，根本不徹底，比如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流毒20~30年而且很深，62年還再版了一次，影響極壞，到現在還沒有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時連一篇《紅旗》社論也很困難，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去搞了。劉鄧只是二個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鑄也是一個，是繼劉鄧下臺又上來的。是不是這三個人？當然有，上海不是就是陳、曹，劉少奇作報告還有些「理論」，曹荻秋沒有什麼理論。我們如果不把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批判，那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沒有徹底完成。因為社會主義內部階級鬥爭仍然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也肯定存在，資產階級也肯定會反撲的。所以，我們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勢，又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還有階級敵人。這是個大方向。現在大家馬上殺回學校去鬧革命，就有鬥爭方向的問題。我們的矛頭還要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否則就會迷失方向。現在不管是工人運動也好學生運動也好，都有這麼一個問題。工人運動的興趣轉移到對另一個群眾組織上去，有的拼命想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學校裡也是這樣，同學和同學之間爭論的非常厲害，不是把矛頭對準陳、曹，這樣學生鬥學生的現象還會存在。有的同學認為陳、曹倒了，沒事就是打內戰，提出「內戰到底就是勝利」，有的人還說有根據哩，主席也講過的呢？不行。對人家動不動就說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張春橋。人家一講話就是「老保翻天」，你要老老實實向毛主席請罪，人家不講話，又說人家是折中主義，調和主義，和稀泥，這怎麼可以！講也不行不講也不行。這種情況是不是鬥爭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1.26奪權，當然是一個大組織，可是搞小團體主義不搞大聯合，把人家組織，不少是左派組織，打成反革命，這是什麼奪權？還有浙江也是如此，我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內部也有矛盾和鬥爭，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沒有如此嚴重的情況。沒有過什

麼命令把一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包括紅革會在內，應該考慮到他們有那麼多戰士，他們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會使他們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確革命大聯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團體主義。大家要想到面前還有美帝國主義敵人在那裡，都覺得鬥爭需要我們聯合起來，不認為需要當然聯合不起來，可是最近一個時期，我們感到工人、學生活動中間大方向不是那麼清楚，我們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實這個口號也是陶鑄當時在北京搞的，他說：「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懷疑、炮打。」上海紅革會的頭頭是犯了很大錯誤的，他們方向錯了。不是說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評，我們有什麼批評不得，還可以炮轟的，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關鍵在於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在於上海當時處於革命大聯合的時刻他們破壞了大聯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們希望大家回到學校後一定要緊緊抓住鬥爭大方向。大方向看準了，各個組織之間的問題就能正確處理，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嘛。比如浙江二個大組織都是中央接見過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說服了也解決了。不能說「就是我最革命別的都不革命」這樣勢必走向反面，走向歷史的反面。現在我們革命剛剛開了一個頭，都在學習，特別是青年一代世界觀正在改造。下去以後聽說中學生裡搞得很凶，有的人人過關，這怎麼能行。一個中學生怎麼能不犯錯誤，不犯錯誤才見鬼哩！大學生也應該犯錯誤，列寧曾經說過：上帝賦予青年犯錯誤。犯了錯誤，檢討一、二次就行了，哪能老檢討。要讓大家去實踐，讓大家在思考時間，不能像對敵人一樣對待我們的同學，如：「你說，你說……」（作狀，大家大笑）。

大家回去，大學也好，中學也好，應該靠自己安排。我從來是沒有上過大學的，而且離開學校很久，學校的問題靠你們自己解決，這樣創造性就來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主席一貫的方針，不要怕犯錯誤，不要認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回去犯了錯誤怎麼辦？不要緊嘛！主席最好的學生也難免犯錯誤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貫徹執行主席的路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紅衛兵問題也不大，過去有市紅革會這個大的組織，現在沒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動的自由，更能實行由班組自下而上的大聯合。

這幾天大家都在問，市一級的機構還要不要，實行自下而上的大聯合可以不去考慮它嘛！在上海我到想可以保留幾個大的組織，這到不是為了大家打內戰，因為上海有特殊性，與外面聯繫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們的人，支持越南北京集會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眾團體發起嘛，所以從這個角度市一級機構有保留的必要。如果從大聯合角度我也主張撤銷，不過不撤銷也行的，只要這個組織實行大聯合的方針，可以的嘛。我有一次到工廠裡和一個組織談起對和其他革命組織的大聯合的看法，他回答說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認。這不行，這還不是陳、曹的路線了！要知道群眾會前進的，我們不能站到群眾的對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過去有多大的功勞仍然被打倒。有人說，毛主席黨中央支持我們的，這也沒有用，劉少奇，毛主席過去不支持，沒有毛主席他的威信會那麼高，毛主席還公開宣佈劉少奇做接班人，但現在他站到歷史的對立面，站到群眾的對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學要回去，拉拉扯扯談了這麼一些，就是一個意見，一定要緊緊抓住鬥爭的大方向，要實現大聯合，打擊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敵人，這樣才能完成歷史賦予的任務。

姚文元講話

大家要我講話，沒有什麼話好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

大家參加革命委員會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剛才春橋都講了。這一段應該說是難忘的！從一月革命開始，上海革命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幹部都和我們戰鬥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工作做的最少最差。雖然是難忘的，但是革命還是要繼續前進的。大家還記得吧！1949年剛剛解放時，解放軍剛進城，那時我還在地下，春橋同志是接管員，我們當時和這次一月革命勝利一樣多高興呀！但革命仍然繼續前進，我清楚記得當時的一些老戰友，現在有的跟毛主席繼續前進，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動搖，有的變質了！走的無非是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我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學校後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黨，

永遠忠於人民，永遠忠於革命事業。我們能永遠戰鬥在一個戰壕裡，繼續把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幹部要保持晚節嗎？對我們青年一代是不是還有一個早節！應該說，在一個革命高潮時成為一個革命者是不難的，但是革命到了轉折時，到了關鍵時刻才能考驗人，這也是對人的最好鍛鍊。我希望我們共同戰鬥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燒的，我希望第二個就是大家回頭好好學習十六條。現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寫得很好！現在裡頭有很多具體的政策和社論，但是十六這是一個總綱，我們要堅持的就是這條路線。現在說的許多問題其實十六條都定了，比如群眾路線，黨的階級路線，幹部的政策等等。這裡邊第二節「主流和曲折」也說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讀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這一段）階級鬥爭以前有過幾次反復，對我們來說確實吸收很大教訓，增長了階級鬥爭經驗。以後運動會不會反復？十六條說：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應該這樣去想。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會甘心於死亡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的。但在看到敵人反撲時也不要將前途看成漆黑一團，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他們是不堪一擊的。在勝利時看到困難，困難時看到光明，這二個方面都不能忘記。我們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線走到底！這一段時候有一點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們毛主席始終支持群眾中的新生事物，紅衛兵也是毛主席首先發現給予支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也是毛主席親自批准全國廣播，點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從那以後毛主席還支持很多。從上海來說，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月9日《緊急通告》，《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直至最近（3月6日）《文匯報》的反對風頭主義的社論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報》以顯要的地位刊載！大家返校鬧革命會遇到許多問題，大家還要敢於革命，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要敢於提出革命的倡議，要敢於把運動推向前進。因為世界是決不會停止的，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發展的，因此

同時我們還應該積極支援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我們的革命要發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眾，所以第三個願望就是希望大家繼續發揚敢於革命、善於革命的革命首創精神，樹立我們無產階級的權威。無產階級的權威就是把千百萬群眾的意志集中起來。紅衛兵的發展就是如此，從學校發展到社會，從一個城市發展到全國。

現在大家殺回去是去鬧革命，不是別的，這說明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關鍵的時刻，大家殺回去就是要把你們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再也沒有了，那時大家還可以殺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張春橋講話

我補充一點，現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會上我講過：最近紅衛兵的勁頭好似沒有過去大了，有的還覺得灰溜溜，這不行。要殺回學校好好整頓再殺出來！我說的是大家現在殺回去好好整頓一下思想、整頓一下組織，將來士氣更大，人數更多，還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殺出來，而且一定要高水準。因此，我的話是鼓勵大家殺回去的，回到學校去。想不到同學的勁頭很高，聽到以後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舊，把小腳管給剪了，人家有意見的跟他辯論，大概他辯論輸了，問他誰叫剪的，這個學生說是張春橋叫我剪的！（大笑），我怎麼會叫剪呢？現在謠言很多，我也無須闢謠。

有些學校根本還沒有建立一個權威的組織，怎麼能殺出來？現在還是回去好好整頓，將來出去是不是我們再商量一下。其實，我們是早有建議和打算，是不是能在5月1日開一個「工人代表大會」，「五四」召開「紅衛兵代表會」，紅五月嘛開門紅，不過最近工作忙，也沒有很好地搞，總的困難是不少的。⁵⁰

⁵⁰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風大會上的講話 (1967.3.26.)

剛才姚文元同志已經做了系統的講話，他的講話我們兩個是商量過的，他的講話寫了稿子，這個稿子我們兩個共同修改了五次，那麼我今天就沒有準備稿子啦，因為說好了，他的講話算我們兩個的。剛才在這兒坐著嘛，條子很多，還提了一些問題，我想還需要補充一點。從剛才姚文元同志講話中間，同志們可以看到我們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間存在著不少問題。那麼出現這些問題，我們是有責任的，首先當然我有責任。因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們抓得不緊，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況不大瞭解，或瞭解不準確，有些問題，我們感覺到了，但是，是在小範圍談的，找了很多談過話，開了會，但是因為我們的話沒有直接和全市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派的同志們一塊商量，一塊談，有些話傳來傳去，就不曉得傳成什麼樣子啦！有的就傳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們根本沒有講過的話。我今天在這裡沒有辦法一一地來講，也不需要講，總而言之我們有責任，這一方面的事情沒有做好。就是我們話講了，或者我們的意見還對，那也不一定就能解決問題。因為有許多事是階級鬥爭的規律，這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有一些人我幫他很多了，一再談一再談，但是無效，包括陳丕顯、曹荻秋這些人，那我們談過很多次話，毫無效果。我們革命派的同志們也有一些這樣的情況。我們發表的這一些意見，包括姚文元同志講的，有一些意見可能是正確的，也有一些意見可能不完全妥當，也可能是錯誤的，同志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為什麼要說這個話呢？因為是整風嘛，整風就要敞開思想，把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說出來，對我們的意見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評，我們歡迎這種批評。我們兩個人還有個共同的希望，我們還比較希望尖銳的批評，因為模稜兩可的話，我們平常不大說，我們批評人也批評是尖銳的，我們也希望別人對我們如果是批評的話也是尖銳的。我們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幾百封信，從來信中間給我們提了很多

很好的意見，也提了各種問題，我們當然不可能都答覆，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有的同志要求我們談話，這個願望我們到現在實在是無法滿足，我們希望同志們不管給我們寫信也好，或者談也好，對我們可以提意見，也可以批評，這是同志之間的批評是正常的，這個不會混淆起來，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這樣一種空氣，好像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評的，那就糟糕啦！批評我們，絕不等於炮打中央文革，也決不等於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和善意的批評是兩事。

在批評中間，毛主席所講的，有兩種，一種是敵對的，一種是人民內部的。這個人民群眾也可以分得開，我們可以分得開，對同志的批評我們歡迎，對敵人的攻擊，那我們當然有對付的方法。這是我想首先說的。

第二想說一下整風。我們發表的意見僅僅是我們的觀察，我們的這些意見對不對，觀察的正確不正確，剛才講了。我們整風的時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學習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為主要的學習文件。我們的講話，只能作為輔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說嗎，我們是市長，有毛澤東的思想作為武器來學一學，錯誤的思想，我們說得對不對，那還要同志們來判斷。同志們自己也是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為主，以毛主席著作為主。姚文元同志講話裡已說了，有一個風氣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馬路新聞過日子的，聽到個風聲，看到街上有張大字報，或者是北京傳來的什麼××首長講話，他們也寫。這個是不妥當的，要上當的。我們有我們的經驗，中央同志講話，好多大字報，我們都看過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記錄和原意根本不對頭，不能靠那個。我們在這兒，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對同志們有所幫助，我們能夠比較準確的知道中央的意見，我們一定給同志們講，但這個也要區別開，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見，那一些是我們的意見，這還是要區別開。至於大家在整風裡邊學習，還是主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我說有的同志要我講的需要補充的問題，大概是這樣一些問題，一個是有的同志要我講講形勢，因為說是最近比較閉塞。這些馬路新聞少了，街上大字報也少了。北京同學又大部分回去了，消

息不靈通了。我們現在形勢究竟好不好。我們說形勢是大好的，我們看形勢的時候，就應該遵照毛主席歷來的教導，要分清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因為現在當然還有一種逆流，逆流也是一種支流吧，我們要看全國的形勢，看全世界的形勢，世界形勢現在第一個大形勢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決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勢，而且是決定全世界在今後多少年的形勢，究竟向什麼方向發展。那我們現在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總的來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較，我們可以和一年前比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為昨天我們突然想到了，這個月的29號，再過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這個口號的一天，現在正是一周年，去年這個時候，主席到了上海（……）楊尚昆那時候住在上海，陸定一是3月8號還在上海，去年3月8號在這裡，在我們上海的，彭真是2月在上海的，那時還是這些閻王飛來飛去很活躍的時候，是這麼一個形勢，全國那時在幹什麼呢？還是在貫徹執行彭真2月提綱，就是五人小組彙報提綱，一個修正主義的提綱，彭真的蓋子還沒有揭開，是這樣一個形勢。也就是去年的3月底，這個時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閻王，那時具體指的彭真，陸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時還是講學校，文化界，因為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是在準備階段，是這樣一個情況。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務，現在回過頭來看，經過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來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經解散了，陸定一的中宣部已經解散了，陶鑄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經換了兩個了。要解散北京市委還有個解散那個時候的文化小組，五人小組，這三個任務都解決了，只有一個現在還沒有解決，就是要把國家機關精簡，他給我們談話，但是集中起來就是那麼幾句話：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簡機構。同志們想一想啊，這一年變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陸定一，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發展嘛，把劉、鄧的問題也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今天，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發展到一月革命，開始了奪權，現在凡是奪了權的，而且經中央批准的，就是報上登的幾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這都是中央已經批准了的，這些地方

奪權以後的形勢，雖然鬥爭很激烈，但都能夠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勢大概是這樣；所有的專署地委級和市委級，比如大同市，陽泉市這些地方都奪下來了，縣絕大部分奪下來了，還沒有完全奪下來，貴州現在是這樣，貴陽那裡很好嘛，當然專署還沒有完全奪下來，有些縣沒有奪下來，整個的形勢有鬥爭，不要想沒有鬥爭了，鬥爭都存在，但是形勢都很好，別的地方也是這樣，我們上海的形勢同志們都看得到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力量在大發展，比一月革命的時候，我們的力量是強大了呢，還是減弱了呢？當然比一月革命的時候，上海的形勢好得多了嘛，有一個同學寫信給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個地方去，他說到了別的地方，那個地方還是沒有奪權的地方，就感覺到在上海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天下，在這裡過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個地方心情就感覺到不同了。我們希望我們上海永遠是這樣，一直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天下，每一個跟著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暢，過得很愉快。當然我們愉快總有人不愉快嘛，你說上海一千萬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陳丕顯現在愉快嘛？當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還有一些人，他們總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們愉快了，那我們大概今天這個會就開不成了，那就是說在座的如果你要堅持革命的話，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這是已經奪了權的，奪了權得到中央同意的，這些單位都是形勢很好的，還有一些呢，是條件逐漸成熟，奪權的條件逐漸成熟，或者過去奪了權，奪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樣的情況，或者還沒有實行「三結合」，是單方面奪權，是一部分單位奪權，有的地方沒有奪權，現在條件逐漸成熟了，同志們從報紙上可以看見北京的條件，那就逐漸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報紙仔細看一下，就可以看出來了，他們「三結合」的條件已經在報紙上可以看出來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員會了，因為革命領導幹部的名單，後面已經有好幾個了：吳德、劉建勳、高陽文、丁國珩，還有什麼李清泉，市委書記處已經有五個人站出來了，因為他這個書記處跟上海書記處不一樣，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錯誤，是這樣一個情況。他的軍隊

的名單也已經有了，群眾團體嘛。現在紅代會了，工代會開了，貧下中農代表會也開了，主要的群眾組織已經選派了代表參加市委革命委員會。所以他們的臨時權力機構條件也比較成熟了。據我們知道天津的條件也比較成熟了，所以條件成熟的單位逐漸地增加，當然也有比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難更大的地方，譬如我們最近的江浙兩省現有條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國發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來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勢這樣，生產的形勢呢？也是好的，但我們比較擔心的是究竟今年怎麼樣？我們現在看呢，全國的生產形勢根據我們從各方面看到的材料總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擔心的煤礦的產量下降，因為那一陣經濟風刮得好多煤礦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來了，上來了到處串聯，那個煤炭生產就受了影響，從1月份開始下降2月份繼續下降，那幾天我們是相當擔心，因為上海咱們這個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鐵，如果要是煤不來呀上海的威脅就大了。

從最近得到的材料都開始好轉，3月下半月以後譬如說山西大同煤礦就同我們上海關係很大，因為他是全國最大煤礦之一！陽泉煤礦從奪權以後產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問題還是革命問題還是政權問題，權不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那你就沒有辦法，那個產量非要下降不可，這樣一奪權，條件成熟了奪權生產就恢復，所以千萬不要聽那個話，好像生產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產量的下降證明必須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的，這個責任落不到我們身上。我們上海的局面，誰要陳丕顯、曹荻秋他們繼續管下去呀，如果我們1月不發生奪權，那現在上海是什麼樣子？所以這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這是和革命形勢的發展直接聯繫著的，這是主流方面。我們看到主流是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說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有問題，隨著鬥爭的發展，這個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東西發展，但這一個也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支流，這也不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主流，誰如果誇大了這一方面的情況來整我們，那就證明他立場錯了。主流方面還是好的，這是講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對立面資產階級走資

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呢？他們當然是不甘心下臺的，同志們大概注意到了為什麼周恩來同志在北京職工代表會議講話裡提出了那麼幾個絕對不許呢？周恩來同志說階級鬥爭還在十分尖銳複雜的情況下進行著，我們希望親愛的職工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堅持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復辟逆流，下面就講了四個絕不許，絕不許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復辟，絕不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絕不許四清運動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絕不許地、富、反、壞、右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反動分子亂說亂動，我們要堅決地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周恩來同志的講話當然是有根據的，因為確實鬥爭還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銳，因為這一場鬥爭是生死鬥爭，這究竟是無產階級在中國勝利，還是資產階級在中國勝利？究竟是社會主義道路勝利，還是資本主義道路勝利？究竟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還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勝利？這是關係著中國的命運、關係世界命運的問題，兩個階級都是下了決心的，我們下了決心，以毛主席為代表，代表我們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全國的革命的群眾下了這個決心，一定要把這一仗打勝，一定要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呢？他們難道說甘心失敗嗎？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嗎？當然也不是，不會，決不會！劉鄧沒有死心，像陶鑄那樣的人也沒有死心，那也還有群眾面前沒有充分暴露的人，因為資產階級他總要找出代表人物，他們會起來搞復辟搞反撲，他們不投降，那麼就用各種辦法來搞復辟搞反撲，就是說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聯合還可以搞復辟麼，在大聯合中間把領導權拿過去，名義上還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實際上變了。沒有經過批判鬥爭，沒有經過檢討，群眾也根本沒通過，那裡或者全同群眾接受，這裡要有一個「三結合」，這當然是少數的，也有的地方，利用無產階級革命派整風，或者利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工作裡面犯了錯誤，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隨便地宣佈一個組織是反革命，這實際上是搞了白色恐怖，這樣的情況下邊，是姚文元同志剛才講的話，要我們時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為上海的形勢特別好，我們就應該警惕。

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剛才姚文元同志講了，不要只是關心一個小團體，也不要關心一個廠，要關心我們全市的工作，我們要關心整個國家的命運。我們應該有這個決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擔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們對全國人民對黨中央對毛主席我們是有義務的，不能推卸的義務，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們現在的局面絕不允許什麼人來破壞，一定這個地方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天下，什麼反撲什麼復辟在這個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這樣，我們也可以下這樣的決心，現在當然中央已經通知了停止大串聯，各地方奪權嘛，我們也相信各個地方的革命派他們雖然遇到了困難，我們相信他們有力量能夠轉變這種局面，如果需要的話，我們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經過整風更加強大了，只要黨中央毛主席要我們支援那個地方，我們立刻可以去。當然現在沒有這個要求，要有這樣的決心，要把上海搞好，我們一月革命搞得早麼！而且毛主席給了我們那樣多的支持，我們還不應該搞好！全國的產業工人，數量最大的最集中的的是在上海，我們上海的工人階級難道不能夠擔負起這樣的責任來嗎？應該和可以的，我們過去做的工作有成績，現在我們應該做得更有成績，現在全國的革命和生產形勢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裡想復辟，這也是我們預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奪權就有反奪權，這才合乎辯證法，這沒有什麼奇怪，包括在上海我們都歡迎有些人出來要奪權就奪權，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衛隊的頭頭，改頭換面搞組織，我說你有膽量最好是不要改頭換面，你把旗子拿出來，戴著袖章出來。（鼓掌）我們進行光明磊落的正義鬥爭。你把你的膽量拿出來，到全市人民面前辯論，電視臺可以讓你發表電視演說。（鼓掌）陳丕顯不是也是講話了，為什麼不可以給你：可以！我們相信上海的革命群眾，會懂得如何答覆你們的。我們上海一月革命以來，工作太順利了！曲折太少了，這個不過癮。（鼓掌）你們如果出來給大家一個機會，讓我們戰士多打幾仗，使得我們鍛鍊得更強一點，我們非常感謝（鼓掌）。曲折只能鍛鍊我們，有復辟活動只能使得我們反對復辟的鬥爭搞得更徹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徹底，使得上海的資產階級消滅得更乾淨一些！（鼓掌）這就是形勢。

再講一個問題，就是剛才姚文元同志講了，堅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發表一點意見，同時答覆幾個問題。

我們的任務很重的，我們不僅要對上海人民應當擔負責任，我們要對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擔負責任。不管擔子多麼重，我們決心下了一定要擔負起來。那麼靠什麼呢？靠群眾，靠上海的幾百萬革命群眾，進一步組織起來，實行大聯合，我們由於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這一個時期，的確裡邊風頭主義，小團體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多了，眼界就狹窄了，看不到我們的任務是多麼重，看不到我們對全國全世界的責任，看不到我們還有敵人，有人還要搞復辟，不想這些事了，而結果死想著自己的小團體，那就忘記了我們今天的任務這麼重我們靠什麼人呢？我們的革命隊伍究竟是多一點好呢，還是少一點好呢？參加革命的人多一點好呢，還是少一點好呢？我們究竟是要組織一個浩浩蕩蕩的大軍，還是就這麼幾個小團體，這些事情想沒想到？因為想的這些東西少了，有時候而不是講任何時候，有的時候在處理有些問題的時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擔心大方向，有認為大方向搞錯了，那個事情就是一個好同志也苦惱得很！我們現在還不是講那些壞人，這樣迷失了方向實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顛倒了，方向一搞錯，一切事情就顛倒了。我這個坐火車到北京，幾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錯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過浦口鐵路向北走嗎！我總覺得向南走，從北京回來的時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東西顛倒過來了，南北全部錯了，心裡知道那裡南那裡北，你的感覺就不對！這都顛倒了，東西南北都弄錯了，這不是坐火車，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車子總把你帶回上海來，革命就不是這樣了，同志，革命坐在車子上，那個車子要轉變的，要摔下來的，而且會把自己的同志當敵人打，把敵人當同志看。把資產階級思想當作無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思想當作資產階級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顛倒，那就糟糕了，剛才聽了念了幾個信，都是宣傳停止內戰的，這個單位實在是內戰就是不停，而雙方爭論得有的看不出來，原則分歧有那裡，有的互相把對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發傳單，另外一個組織他是反革命，那裡有那麼多

的反革命。反革命總是有很少的人，還有大批的。這是個老保，那個是老保，這個是保皇組織，那是保皇組織，那有那麼多保皇的。革命的群眾總是多數嘛！當然覺悟有不同，有的在這個問題上有錯誤，有的是在那個問題上有錯誤，有的單位那個地方開會是難開的，我們瞭解過，因為什麼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發言，另外一批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不能發言，還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這樣一個學校裡邊都沒有正確的了。那麼你保過皇也好，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這裡邊總有區別嘛！有一個程度。性質嚴重不嚴重，程度深還是淺，還有一個人家改了沒有，是頭頭還是一般群眾，頭頭改了沒有。對犯嚴重錯誤的人、領導幹部，我們都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為什麼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學生就不應該採取這個方針呢？如果說有責任的話，領導幹部最最大嘛！因為領導幹部，他領導的嘛！全國的責任是劉、鄧，上海主要負責的是陳、曹。真正把大方向糾正過來。對於革命群眾內部的問題，當然革命群眾裡邊有壞人，而且常常是發生在武鬥事件上。如果同志們出去看一看，這個地方不說十個有十個，總有七、八個是有壞人挑動。我們革命委員會從成立以來，沒有挑動群眾鬥群眾，我們沒有挑動過武鬥。什麼人在挑動呢？在工人與工人之間非要武鬥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這個意見嗎，總是有人在挑動的，有人利用的。看來想搞他自己小團體的利益，有人想達到他自己的個人的某種目地。像頭幾天，心裡氣憤，突然間到中國福利會去，那裡的群眾告訴他說，這裡是外國同志住的，不讓人進去。偏偏要進去，到那裡把人家鑰匙拿走，把抽屜打開究竟是幹什麼？不對。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眾。在那裡要搞辯論，這裡有鬼。所以，什麼武鬥、內戰、裡面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分析。當然也有兩方面都是小團體主義，兩方面都有錯誤的觀點而武鬥了。那我們也希望不要武鬥。說過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幹什麼呢？電話機是國家財產，它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通道說陳丕顯用過的電話機，我們就不能再用了？我們可以用，為什麼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麼好處？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這究竟誰吃虧呢？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吃虧。電話機、

廣播電臺、凳子，什麼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統統燒掉了，燒得光光的，資產階級還是照樣要復辟，他再蓋一個比你的還漂亮，不觸及靈魂，不作政治鬥爭，用這種方法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們各個革命派之間的問題只能夠協商解決。就是對反革命組織都應該是用正當的方法來進行鬥爭。因為政權在我們手裡，你砸也砸不掉，解決不了問題。若不解決大方向的問題，不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那我們就不可能聯合起來，也不可能搞「三結合」；而沒有大聯合、「三結合」，我們的政權是鞏固不了的。

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那就是看我們雙方——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究竟誰把群眾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如果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把盡可能多的人團結在自己周圍，那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復辟。如果我們不團結，而是排斥，那當然我們這邊是不利的。搞「三結合」也是這樣，如果我們「三結合」搞得好，我們革命的力量就組織得更加好了，就能發揮無窮的力量。不搞「三結合」，不搞革命的「三結合」，那我們的工作是有困難。當然了，有的幹部翹尾巴說：「你看，搞來搞去還是對我結合吧！」我在這裡幫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該說這種話；你如果是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就請你走開，不要你（鼓掌：呼口號）。我們要的是革命的「三結合」。我們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有原則的，凡是願意革命的，我們都應想一切辦法幫助他們。但是你說你在那裡還要擺個架子，好像離開你不行啦，放心吧！離開你我們照樣革命的，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沒有什麼本事，他也不會開火車，不會開輪船，坐汽車還要別人開，有什麼了不起（鼓掌）！但是我們這個話是要說給那裡那些在那兒擺架子的人聽的。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們對於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們都要想一切辦法盡最大的耐心去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現在，根據我接觸的情況來看，有些同志經過半年的鬥爭，而搞的有些昏頭轉向了，不知道怎麼辦，有些同志不知道怎麼辦。過去有些人談話還滿好的呢！過去談話還蠻好的，還能談，現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覺得有些同志變得木頭了，什麼意思也說不清楚了。他該檢

查，不知道怎麼檢討了。我這裡講的是一些好同志，他們不是反對主席的方針，也不是擺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麼辦，而再加上我們一些同志對這些人總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們談話，就不敢下定決心，去和這個人結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錯誤還不大，辦事也不大能辦的人。那樣的人，當然囉！對任何人都要給予出路，給以適當的工作，可是他來「三結合」，還是不能解決咱們的問題。老實說，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他真的肯改，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我看「三結合」可能比沒有犯過錯誤的人還好一點，為什麼？他有經驗。他對群眾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比我理解得還深刻，因為他自己有實踐經驗。在這個條件下他把別人打成反革命，在這個學校裡面，這個學校怎麼整的，如果他真正決心改，他以後就不能這樣幹，這個同志可能變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這些人看死了，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幫助他們，這個不叫資產階級復辟，這個不叫復辟。那種匆匆忙忙，也不要檢討，連承認錯誤都沒有，就把他和上來了，那個有點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復辟的味道，那個要警惕，要看我們現在這個搞法，我們搞得相當細緻了，像陳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們先先後後開了多少次會，面對面地同陳、曹進行鬥爭的啊！而且不是在一個小房間裡吵架，而是在電視廣播裡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這樣的同志，我們就應該信任他們。有一種思想很糟糕，他們誤解，以為「三結合」這三個原則……（錄音壞了）那到不見得。比如說他原來是當局長的，「三結合」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要當局長，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確實原來的錯誤不很嚴重，檢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當的，那當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現在聽說有的單位所以沒有「三結合」，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那麼我們就建議是不是過渡一下，他們不一定馬上就恢復原來的工作，將來誰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麼死。要對幹部不是一個辦法處理，在這當中，有的是要罷官的，但是還有個別的極壞的甚至還要抓起來的，那不是一般的罷官；還有那些留在原來的單位上，用剛才那個說法就是要搬回原處了；有的要

調動一下，現在不一定要調動，將來可以調動。比如說有一個縣委書記在這個縣裡當縣委書記，困難了，就是檢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難。雙方都有一些困難，群眾對他也有一點難辦了，這樣的人還是個革命同志，不過調到另外一個縣還可以。有這樣的事，革命嘛，在哪兒都一樣革命，可以調動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處理。並不是「三結合」就是按照原來那個班子，恢復原狀，那不行。我們現在僅僅是這一點結構，我們現在主張不要大動，動多了不好，等到將來再動，等到鬥、批、改的時候再動，這一段已經走了一些彎路，機構變來變去，結果秩序越來越亂。我們意見現在各個局，局的機構最好能夠早一點實現「三結合」，把這個機器開動起來，使局、公司、廠這個指揮線不斷。有個同志問，現在有這樣的情況怎麼辦？廠裡「三結合」了，但是公司沒有「三結合」，局也沒有「三結合」，市革命委員會不是有個規定嗎？說要經過批准。我們說這樣好不好，如果一個車間先「三結合」了，你就先幹著嘛，只要群眾批准了，這個事就不大，就怕我們批准了，群眾不批准。群眾只要批准了，我們革命委員會意見就不會多了。如果是廠裡沒有「三結合」，局也沒有公司先「三結合」了，那怎麼辦？我們說你們也可以先工作起來，如果說你不批准我們沒法工作，我看這話靠不住，你這「三結合」群眾路線不夠，群眾路線夠了，群眾為什麼不批准呢？群眾批准了，你們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廠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縣也好，包括區以下都是這樣，能夠大聯合自己搞起來就搞，「三結合」能搞起來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們還保留一個批准權。為什麼要保留一個批准權呢？我們不是為了妨礙群眾運動，不是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腳都捆起來，不是的，同志們，我們是為了防止假奪權。（口號）我們規定了這一條是為了防止假奪權。你們那個地方人家搞了個假的，群眾沒辦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勢力很大，我們市革命委員會就掌握了一個否決權，到那個時候不承認，自上而下地支持群眾。我們是為了這個，所以現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麼約束。凡是革命的行動都會得到黨的支援，應該相信這一點。相反的，我們現在希望全市

的同志們要發揮首創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現在搞大聯合、「三結合」都是照抄照搬，這個不好，因為各工廠、各單位情況不一樣，不要抄那些，不要什麼都照抄照搬嘛！連開個大會都照抄照搬。因為市里開會，人民公社成立的時候，發了個宣言，發了個第一號通令，還有一個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川沙成立縣革命委員會也是照樣告全縣人民書，第一號通令，給毛主席的致敬電，都是一樣。後來我們到黃浦去開會，拿文件審查，一看也是這三項。後來我們給黃浦區的同志建議，你們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麼一號通令，因為根據我們的經驗，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只發了個一號通令，二號通令也沒有，你何必學那個形式。所以不要學那個形式，因為各個單位的情況不一樣嘛！下一次你只要一個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發個通知也可以，按你們的實際情況辦事，也不要說因為黃浦區是某一個人做第一把手，我這裡也照樣找一個那個條件都不一樣（似應為「都一樣」——編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長也來「三結合」，我這裡就不敢找個正局長。那怎麼行呢？各個單位要很好地發揮創造性，來考慮自己的問題。我在這裡順便提兩個問題讓同志們考慮。現在我們手邊的材料很少，到處問到底有沒有一些單位元元不需要奪權，到底有沒有？現在不需要你們回答，請你們回去想一想。現在好像是到處都要奪權，而實際上上海革命委員會那一個決議草案裡寫的是，要各個革命組織討論一下，究竟哪些單位元元需要奪權。文章裡還是講嗎？凡是需要奪權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個地方當權的同志或者多數同志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不是一定要奪權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奪權是不是也要發動群眾啊？需要建立一些監督領導的機構，那倒需要。用什麼形式，去發展創造。這是一個問題，請同志們考慮的。還有一個問題，現在各個部委、各個局、各個縣、各個區、各個工廠、各個學校，等等這些單位，究竟有沒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市里開了一個電視大會，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罪行。現在各個單位都在照搬。一個局就把局長和黨委書記兩個人狠鬥一下，像這樣，一個單位是不是都是打兩個？那就恐怕不適當了吧？剛才姚文元同志講話中念了幾段話，我們對任何事情都要採

取分析的態度，要分析你們那裡的情況。也可能你們那個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壞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壞。情況怎麼會是一樣呢？要分析。（錄音脫落）搞革命要有勇氣。如果他確實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要有這個勇氣不是啊呀，我說了，會不會被說成是保皇派（錄音脫落）。

第三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那麼匆忙。各個大學、中學的紅衛兵能夠多數的學校已經能夠統一了，他們選出代表來開全市的紅衛兵代表大會。如果中學先聯合起來了，那中學先開也可以，不必定得那麼死，大學的紅衛兵如果先聯合起來了，也可以，將來再開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時間差不多，那就等一等，開全市性的紅衛兵代表大會，來選舉全市的領導機構，這樣比較合適。在這種情形之下，現有的第一級機構，有的已經宣佈撤銷了，我們覺得也可以。有些機構自己覺得還是保留好，我們也不勉強他們撤銷，因為有關群眾團體的事，我們不好作決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決議草案嗎？他們為什麼說那段話呢？我是說過的（錄音不清）。

還有一些組織，你要搞大聯合，你的上級不答應，怎麼辦？我就在這個地方對工交系統的工人講過，不理他，自己幹。我說過這個話，因為不能妨礙群眾的革命行動嘛！我們不管做那一級的領導工作，同志們要記得，永遠跟革命群眾站在一起，不要站在對立面，要同革命的群眾一塊前進！群眾總是要前進，人類總是要前進，而我們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眾當然是要起來革命的，什麼樣的理由也不能壓制群眾。現在這個問題的分歧不太大了，不過我們還是要說。如果還有人要壓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從來不要人批准。本來二司成立，根本用不著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幹什麼？不應該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反，大家可以發揮創造性。從各個方面來看到新的形勢，這是大聯合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講講生產。這個問題沒有多少話好說，因為現在關

鍵問題還是革命。抓革命，促生產，革命裡面大聯合，「三結合」問題，大聯合，「三結合」不解決，我們生產上不去，現在已經妨礙生產。好多單位就是在那裡打內戰，把生產打糟了。有些科研單位還說什麼中共中央的信不適用科研單位。我不曉得你算哪一派。你算是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總有你的份吧！科研單位據說還沒有堅持工作時間，一天到晚還在那裡辯來辯去，把工作完全拋掉了。有的科研部門幾個月沒有幹工作了，這是不適當的。同志們，你們要知道，我們希望我們國家科研發展得快一點，我們現在是同美帝國主義在那裡爭，爭時間，搶速度，看我們能不能把它壓倒（錄音斷）。

在業餘時間鬧革命，這是中央的方針。如果堅持不改，屢教不改，那怎麼辦？那就不應該再發工資嘛，這是天經地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你不勞動，為什麼拿工資啊，現在崇明農場還是寶山的一些農場，還有一批人在市內逛，不回去。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複一次，上次我講過，你死了心嗎！你不回那裡去，市里決不會分配工作的。

還有現在短途運行非常緊張，海港很多倉庫的運載量都很大，有些運不出來，船上的東西運不下來。為什麼，因為車子不夠。車子到那裡去了呢？今天到會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們佔用的非生產的車子太多了，有些單位，凡是從生產單位要來的，統統退回原單位，為生產服務。有些不應該坐小汽車或吉普車的，好多機構都有車子。我們建議大家把車子送回去。你從那裡來的，送到那裡去。我們也建議公安局交通處把全市的汽車牌照都檢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發現了不是屬於你們單位的車子，一律扣留。這樣，對我們生產有好處，對我們革命的同志有好處。

還有一個問題，軍隊的同志現在參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績，現在根據的指示，（脫落）我們解放軍同志到各個單位，希望各個單位的革命同志們表示歡迎，第二要向解放軍學習，這是向解放軍學習的很好的機會；同時也要把本單位的情況如實地向解放軍講，不要隱瞞，不要歪曲，也不要誇大。但是，應該說上海單位太多了，工廠

有八千個單位。學生是二百萬。把我們警備部隊和野戰軍統統分掉也分不過來，因為你一個地方不能去一個人，我們跟三軍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區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夠來參加要害部門，最緊急的部門，比如交通部門，運輸部門，這是關係到全市的，其餘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還是以自力更生為主，包括軍訓。軍事訓練也不能等著解放軍來再軍訓，而且解放軍也只能幫助你們一個短時間，不能老住在你們那裡，所以基本上說以自力更生為主。你那裡總還有民兵，基本民兵嘛，還有復員軍人嘛！自己為什麼不能搞軍訓呀！可以搞的。而且軍訓和政治訓練配合作用，所以我們希望同志們去發揮創造性，自力更生，自己來想辦法來幫助大家。（口號）今天到會的軍隊同志，我也是穿軍裝的，我想給軍隊的同志來說幾句話，因為軍隊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雖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現在與要到的大單位並不熟悉，同時軍隊……（此處錄音脫落約十分鐘）領導之下，或者他們自發的，怎麼不管他了，反正是鬥了他們。鬥了他們嘛，後來就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結果這些青年都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好，那麼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就自己站出說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把那批青年同志關進牛棚。我說就是不正常的現象，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你們自己想一想。我建議把牛棚撤銷，不要搞牛棚，讓那些青年出來說話，讓他們有錯誤自己檢討，關在那裡有什麼用處呢？關在牛棚裡他又不變成牛，還是個人，他們的思想問題根本解決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關在裡面。我建議文藝界的同志，如果對別的單位有牛棚，我贊成你們不要搞牛棚，不要關起來，有道理辯論嘛！我們跟陳丕顯、曹荻秋辯就辯嘛，有什麼好怕？真理在我們手裡，不要用這種辦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的問題，我上一次傳達，24號傳達的時候講過，毛主席說過，我們總要有一個黨，現在這樣的狀況只是一種暫時的，沒有黨是不行的，各個革命造反派組織怎麼能代替黨？！革命委員會也不能代替黨。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黨，沒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毛澤東思想的黨，我們的革命是沒有法前進的。有些人說現在不要

黨了，看到黨員就罵。我說，這種人至少感情上有點問題，有的就說：「你們這個黨就是劉鄧的黨」哪裡是？我們黨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們沒有一個黨是不行的。關於青年團的問題究竟怎麼解決中央沒有最後決定。討論過，無非是幾種想法：一種是保留青年團，一種是用紅衛兵改造青年團，一種是用紅衛兵代表青年團。究竟用哪一個方針中央沒有定。當然，現在的團員還是團員，現在的黨員還是黨員，那些群眾大會上開除黨籍一律無效，群眾大會怎麼能開除共產黨的黨籍啊？有的強迫叫某一個組織把某一個黨員開除啦，那當然無效，有的非黨員接管黨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書記，這當然是無效的。有的新發展了非黨員自己封自己是黨員，又發展新黨員了，這個當然都不能承認的，我們認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權革命委員會奪了，新的市委還沒有建立，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向中央請示過，問過毛主席，這種情況之下，黨的問題怎麼辦？毛主席的意見這個問題先放一放，因為你們現在抽不出手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是把這個問題向同志們說一下，同時我們想說：希望所有黨員，不要忘記是一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任何時候都應該不愧於我們這個稱號，就是我們一個人，也應該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已經參加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共產黨員應該在裡面起模範作用。用這樣一種標準要求自己，那末等到黨中央對這個問題有了明確指示以後我們再詳細地討論這個事情，現在只能這樣說：應該做模範，應該像一個共產黨員的樣子，像一個共青團員的樣子來工作。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的黨員同志和團員同志，你們是不會忘記自己是黨員是團員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那就快點改，如同我們對別的人一樣，還是有錯誤就改，也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最後，我想說幾句這樣的話，就是我們上海（脫）……成為執行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模範，成為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的模範，成為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模範，成為反對小團體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經濟主義，反對自私自利的模範。我覺得這個話對我們上海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眾，所有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所有的紅衛兵，所

有的解放軍的戰士，指戰員，所有的幹部，都是非常適合的，我們應該盡一切的努力來成為這樣的模範，使我們上海不辜負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期望，不辜負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期望，使得上海成為無產階級最強大的堡壘，成為資產階級沒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們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是我們全國的模範。

我今天就講這些，完了。⁵¹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3.）（存目）

張春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4.）

【時間：下午】

我彙報一下上海的情況。

上海的形勢比較好。革命群眾的情緒很高，群眾的心情比較舒暢。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我們看，主要是靠兩條：一條是靠毛主席，再一條是靠群眾。

毛主席對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關心的。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眾每一個新的創造，每一個新的倡議，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援。《文匯報》的奪權，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

⁵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體育學院東方紅戰鬥隊寫的那篇《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也是毛主席先發現的，好多我們在上海還沒有注意的事情，還沒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說：我們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這樣一句話，我們反復的思索過，它包括的內容很豐富。這場大革命收穫這麼大，代價那麼小，重要的條件就是，它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有人說我們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只是講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覺得，這只能是證明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領導算作黨的領導，不把黨中央的決議算作黨的領導。十六條明確規定了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難道這也不算是黨的領導？他們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眾，更不懂得我們這場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領導，黨的領導，上海的群眾發動起來了。當然，還是不平衡的。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也不少。我們的臨時最高權力機關，曾經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條影響大的錯誤。這是群眾提出來的，我們同意了。毛主席發現以後，要我們重新考慮，建議把名字改一下，改為革命委員會。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對人民群眾，對幹部在革命過程中犯的錯誤，所採取的處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們。主席明確地指出這個名稱不妥當，又考慮到上海革命群眾的熱情，考慮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好。主席反復教育我們，又要改變名稱，又要不傷害群眾的熱情。由於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時主席講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說服力，我們回到上海很順利地解決了。群眾不但沒有波動，而且情緒很高，說毛主席對這件事情這樣關心，對群眾的熱情這樣愛護，非常感動。

如何對待群眾運動，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導我們的也是如何對待群眾問題。我想舉幾件事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件是對安亭事件的處理。

在上海一談到工人運動，就會談到安亭事件，去年11月初，革命工人起來成立革命組織，上海市委不批准，兩千多工人就上火車到北京告狀，開車不久，鐵道部命令，把他們甩在安亭、蘇州、南京幾個車站上，人數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幹，造成上海、南京一線火車全部停開。

對待這件事，實際上有兩條方針、兩條路線。一條是鎮壓，一條是支持。

主張壓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鑄和上海的陳丕顯、曹荻秋。11月11日，我去安亭處理這件事，陶鑄給的方針，就是把工人趕回上海，對他們的組織，不支援，不承認。我趕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談話，勸他們回上海，理由無非是生產要緊啦！鐵路不能斷啦！等等。這些大道理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用。我就平心靜氣的聽，聽他講，究竟是怎麼回事。天亮以前，接著開群眾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四點，幹了十六個鐘頭，工人才答應回上海。

從這個談判中，我才瞭解到。工廠裡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來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們為了造市委的反，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成立大會請市委參加，市委不參加，開完了大會，要求市委接見一下他們的主席團也不接見。實在無可奈何了，才上火車到北京告狀。而上火車之後，又把他們甩在這個小車站上，已經三天三夜了，市委一個人都不來。工人越來越憤怒。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按著陶鑄那個方針做，工人根本不會回上海。要趕回去就要鎮壓。這一批人，已經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這次「破壞了交通」，實行白色恐怖，實行鎮壓，不是理由很「充足」嗎？是工人群眾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導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關頭沒有犯大錯誤。我答應認真負責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說服了他們回上海。13日回到上海，同他們的代表繼續談。把情況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現象，是結果，工人起來鬧革命才是本質，才是根源。決定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合法的組織，只是勸他們，火車中斷是不好的，以後不要採取這種手段，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這樣處理，市委堅決反

對，說我沒有堅持原則。曹荻秋氣勢洶洶地給陶鑄打電話，陶鑄立刻支持他，我也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請中央指示。陳丕顯有了陶鑄的支持，也氣勢洶洶的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提出質問，為什麼這樣做？說中央不是規定工廠裡頭不成立造反組織，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組織，為什麼現在又承認了？你們給張春橋多大的權力？非常凶，接連問了好幾個為什麼？

陶、陳、曹等等，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對工人運動又是鎮壓。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無法理解：工人運動要起來，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學生運動起來，沒有工人運動起來，沒有農民運動起來，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過去歷次革命運動的規律。陶和陳、曹的方針當然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後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眾。

昨天看到一個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員同志，在當地談話，破口大罵革命派，說革命派連土匪都不如。說：「不管你有幾萬、幾十萬，我一個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勸這位同志注意，在我們處理安亭事件的時候，工人革命造反派連幾萬人也沒有，只有幾千人，要鎮壓是可以鎮壓下去的。但是工人還會起來，把壓他們的人打倒。我們絕不能因為我們手裡有權，就能壓服群眾。相反，我們共產黨員，只能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支持革命群眾的行動。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較穩定，安亭事件處理得比較妥當，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從安亭等地回去的這批人，已經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幹，主要領導人，就是這批人把上海的百萬工人組織起來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們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衛隊」。因為是官辦的，一個晚上就做了三十萬個袖章。很多黨團員參加進去了。到12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萬，「工人赤衛隊」也有五十萬，勢均力敵。但是，經過幾次大的較量，到今年1月初，「赤衛隊」就垮臺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

上海的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農民也開始起來了，他們在革命的鬥爭中，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12月25日，毛主

席談到這個形勢時就講：「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沒有幾天「一月革命」的風暴起來了。

全市的奪權，我們在精神上並沒有準備。我和姚文元同志1月4日到上海的時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調查員這樣的身分去的。不管同工人說話也好，同學生談話也好，別的什麼話也談不進去，就是談市委的經濟主義風刮得很凶。「赤衛隊」的頭頭吵著要停電、停水、停交通，給造反派壓力很大。這些情況我們來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聞不如一見。火車站搞得很徹底啊！整個火車站沒有人管了，車沒有人開，連售票員、檢票員都沒有了。港口從每天裝卸量十萬噸下降到三萬五千噸。外國輪船從平常停泊二十幾艘，擁擠到一百二十幾艘。有一些國家故意侮辱我們，把船上的中國國旗倒掛起來。工人也好，學生也好，談起這些事情來，就非常憤怒，但是不知怎麼辦。這時市委已經完全癱瘓了，沒有人管了。當時，我們就同車站、碼頭、水廠、電廠，還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門，例如電報局、郵政局、電話局等部門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負責人一塊商量，究竟該怎麼辦？最突出的問題是，造反派工人堅守崗位，有的已經兩三天沒有下班，實在支援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組織，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單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門，革命造反派很少，我們就商定重新調動隊伍，把工人、學生調到要害部門去。像火車站，就是由鐵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濟大學六百多學生，把車站管起來了。碼頭也是這樣，從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隊伍調到碼頭上去，把大、中學的學生動員到碼頭上去做裝卸工。開始有些人擔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們就鼓勵他們，大膽地把責任擔負起來。火車從來是你們開的，鐵路局長找不到了，那有什麼辦法，我們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階級表現得非常好，學生表現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們作的工作很少，只是開開座談會，給他們出一點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這樣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學生自己起草的，我們一個字都沒有給他們改。他們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當中央的賀電來了以後，「一月革命」的說法才出來了。

「一月革命」的奪權，開頭是這樣。後來各個工廠、機關、學校都奪了，有一些奪得不好，多數還是奪得好的。不過，那時候我們頭腦裡還沒有「三結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聯合。如果回過頭來看，那缺點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說碼頭上還有這個那個問題沒有解決，甚至責備工人們管得不好。我們向這些同志解釋，你要看到這些工人是在什麼情況下上馬的。鐵路局整個癱瘓了，就是九個工人組織了一個指揮部，抓起來的。他們本領夠大的了。就這麼九個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線的造反派代表會議，發動群眾，把整個鐵路線的秩序建立起來了。當然，你說這九個工人的水準有那麼高，也不見得，毛病也不少。特別是當了權以後，私心雜念也多了，但他們的功勳是不能抹殺的。應當受到譴責的是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是那些局長、黨委書記，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職責，造成了這樣大的損失。我們應當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組織犯錯誤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前夕，1月中旬，上海有個最大的紅衛兵組織，叫「紅革會」（即紅衛兵上海革命委員會）。突然發動了對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擊。他們提出了所謂「摘桃子」問題，他們不是從這個階級摘桃子，還是那個階級摘桃子，這個政權究竟屬於那個階級方面提出問題，而是從個人，從小團體方面提出問題。22日同各個革命組織負責人商量，請他們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單，第二天，街上就出現標語，反對成立上海市委，並指名攻擊我是陶鑄、王任重式的兩面派，是來摘桃子的。當時，我們商量過，讓他們鬧吧，不要管他。因為工人不支援他們，許多學生組織也不支援他們。鬧了幾天，越來越不像話。我和姚文元同志還是去參加他們的會，受了六個小時的圍攻，我們還是耐心地勸他們以大局為重，團結對敵。他們不聽，還要開「打倒張春橋」的群眾大會。中央文革小組才決定發個電報批評他們。發這個電報以前，我們還反復地考慮了兩天發不發？批評了他們以後，多數人接受了，少數人不接受，又鬧了幾天。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工人、學生組織要把「紅革會」的頭頭抓起來，我們勸阻了，一個人也沒抓。「紅革會」戰士起來造了他們頭頭的反，要

開萬人的請罪大會，我們明確表示不要開，戰士們是沒有罪的，頭頭們只要檢討了，把事實真相弄清楚了，也還是給他們出路。對「赤衛隊」那樣的保守組織，到現在革命委員會也沒宣佈它非法，也沒有取締，完全是靠群眾鬥爭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員會只抓了一個人，他是調度所的副主任，是「赤衛隊」的一個頭頭，他利用職權放一列車「赤衛隊」上北京，把整個鐵路秩序打亂了，這是犯法的。還有些「赤衛隊」頭頭，工人群眾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審查。

我們可能有另方面的問題，即對於真正的反革命，由於種種原因，必須抓的，該抓的，抓得太少，我們正注意解決。

再講一個對幹部的問題。

幹部問題比較大，幾乎所有的部長、局長統統靠邊了，甚至連處長，有些單位連科長在內。這當然是由於上海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的結果。市委在開頭就利用上海市委過去幾年工作的成績，利用毛主席領導批判《海瑞罷官》時造成的好影響，迷惑了群眾，迷惑了幹部。又強調「組織紀律性」啊，「內外有別」啊，害了好多幹部，好多黨團員。機關幹部到12月中旬才起來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層幹部，人數也不多，所以要實現「三結合」。我們就面臨著怎樣把大批幹部解放出來的問題。解放這批幹部的問題，是幹部問題也是群眾問題。究竟實行什麼路線呢？能包辦代替嗎？如果不走群眾路線，採取簡單化的方式，幾個人關在小房間裡搞「三結合」，即使把幹部搞出來，他們發號施令是沒人聽的。「三結合」，幹部亮相，絕不只是「表態」，而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過程，不搞觸及靈魂的自我革命，那種亮相是沒有用的。對群眾來說，是重新識別幹部，重新鑒定幹部的過程。「三結合」，是革命的「三結合」，是革命的過程、鬥爭的過程，不能隨隨便便把幹部拉在一塊就算「三結合」了。特別是有一些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比較嚴重的錯誤，不用革命的方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們發動群眾討論這個問題。大家排了隊，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還可以爭取。有的想爭取也很難。江青同志上次講話中說到陳丕顯，對陳丕顯的爭取實在很難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談到了，直到去年10月，中

央開工作會議的時候，江青同志把他找來，對他做了那樣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來。江青同志還誠懇地對他說，我和春橋同志給你當參謀，必要時，伯達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幫你。這不是對他的很大支持嗎？這個人現在才把他看透了。他當著我的面對江青同志說：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沒有告訴我啊！其實，上海市委幹的壞事，他沒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這個人搞兩面派，專學舊政客一套。有人說他完全是個饒漱石。（江青同志：所謂請這位老兄，我也是給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眾中去，說幾句就行了，說「我堅決站在你們那邊，同你們鬧革命」。本來這樣就沒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時候完全可以出來的，因為他一開始接受了我們的意見，堅決地處理了匡亞明問題嘛，他可以很主動，但後來越陷越深，沒辦法，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要幫也幫不上。陳丕顯也是這樣的。我1月份到上海，給他談話，而且把主席說他的話，都告訴了他。我說：「主席說可以火燒，燒一燒好嘛。希望他能經得住考驗。」但不行。他這個人，我們過去也瞭解一點，但沒有看到他的本質。他一直搞幕後操縱，從中央回去後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見革命派，明天接見保守派，後天接見革命派，再後天接見保守派，所以兩派都覺得他不錯，到最後一戳穿了，兩邊都反對他了。上海搞經濟主義，罪魁禍首還是他，但他到處推，說這個是馬天水搞的，那個是曹荻秋搞的。查來查去，還是他搞的。因為他有個基本的口號，就是：「經濟上放寬點。」慷國家之慨，而且死不糾正。1月9日，已經發表了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11日黨中央給上海的賀電發出來了，《緊急通告》寫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變，誰要違反要以反革命論處，但他在11日還簽字把老虎車改為國營。16日他還給「紅革會」簽發一萬塊錢的經費。高級幹部轉移財產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轉移了財產。把自己最心愛的錶、金子等轉移到主席住的那個地方去。這是犯罪行為。他到處藏，最後藏到那裡，我給他打了電話，這個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禍的。怕他不聽，又請總理給他打了電話，他才搬的。他們一家吃飯，要大飯店送，每天早點花樣不

同。他怕傳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裡去，包括我們在內，客人走了，門的把手要用紫外線消毒。這個人已經完全變了，完全資產階級化了，總覺得他過去是紅小鬼，是老同志，總想挽救他，對革命有利。但到現在毫無結果。

對能挽救的，我們儘量地做工作。比如像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補書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得很厲害，但是他態度還好，而且還做了一些比較好的事，一部分群眾對他還有好感。我們想從他這裡摸一點經驗，群眾也認為他這個人還能爭取，可以試一試看。

我們是這樣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給他開小會。因為以前都是開萬人、幾十萬人的大會，有用處，但是不能細緻。開小會，每一件都落實，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為什麼要這樣做？今天怎樣認錯？讓他在小會上檢查，造反派代表批評他，幫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點信心了，然後叫他到他犯錯誤的單位去檢討。但是，一個人去檢討的時候，他只進行自我批評，在檢討中不好揭發別人。因此群眾就懷疑他究竟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了沒有？再就是檢討的時候，情緒總是不會很高的，說話的聲調也比較低，群眾就覺得這個人沒有站出來。像他這個神氣來領導我們，同我們革命造反派距離太大，結合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這些幹部在鬥爭中亮相，不僅要進行自我批評，還要能夠揭發別人，同劉少奇、鄧小平、陳丕顯、曹荻秋劃清界限，應該使群眾、幹部都看得見。於是，由革命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兩百人左右的電視會，把上海所有的局長、部長、副部長，不管掛過牌子沒有，戴過帽子沒有，統統找來；工人、學生在家裡看電視，搞了好多部電話，你有意見就打電話來。這樣會場內外結合，成為一個揭發批判的會，也是陳丕顯、曹荻秋檢討的會。先是他們檢討，後是幹部揭發批判。這個會開得相當好，解決了好幾個問題，給他個機會。但是他們的檢討實在不像樣子，這就在全市群眾面前徹底地暴露了，群眾的電話就不斷地打來，會場上的幹部也批評他。同時給幹部一個亮相的機會。群眾就看到幹部面對面地同陳、曹進行鬥爭，看到他們在那裡同陳、曹作鬥爭中劃清了界限。開了

四個半天，群眾就給他們排隊，那個人表現好，那個人其次，那個人再其次，那個人表現最壞。排隊的結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馬天水。在這個基礎上，再開一次大會，王少庸再作一次檢討，然後由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工人、學生、機關幹部對他的檢討表示意見，最後由革命委員會宣佈，批准他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對他一個人，我們做了近兩個月的工作，比較細緻。這樣看起來好像很慢，但是有個最大的好處，是這種亮相比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觸及了靈魂，進行了自我革命，群眾在他的亮相過程中受到了教育，對他也進行了幫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來了。過了兩天，開群眾大會時，我們就試了一下，宣佈說，今天的大會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佈，全場一萬多人鼓掌，歡迎他主持大會。他現在說話群眾聽了，說明群眾承認了。馬天水現在也站出來了，群眾也批准了。將來會不會有反復，那是將來的事，但就這一段來看，這是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的比較好的一種辦法。不是和稀泥，不是湊合，不是關在小房間裡指定幾個人「三結合」，而是發動廣大群眾，發動了廣大幹部。

電視大會，我們準備將來一個月開那麼一兩次。每次都給陳丕顯、曹荻秋檢討的機會。這對他們有好處，對幹部亮相有好處，對群眾也有好處。這就是使他們不至於忘記了鬥爭的大方向，鬥爭劉、鄧，鬥爭陳、曹，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大方向。

看來上海的局面雖然比較好，我們在思想上還是準備有大的反復。奪權以後，也還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如何把這個革命造反派的隊伍帶好，是個大問題。這個隊伍是個好隊伍，是經過鬥爭考驗的。它裡邊的基本骨幹是左派，但是還有大量的中間派。隊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樣了，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很容易在隊伍內部滋長起來。裡邊也還有個別的壞人。如果不採取正確態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錯誤。需要認真地來引導他們，邊戰鬥，邊整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

要幫助他們，那就有一個感情問題，有一個對他們的態度問題。我和上海的警備部隊的一些戰士交換過意見。問他們，你們對造反派究竟

是討厭還是喜歡？他們說，從前是比較討厭的。因為他們長期不介入，紅衛兵的傳單不敢看，是上級規定的嘛，紅衛兵給他們一張傳單，回去馬上交給指導員。紅衛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搶啊，甚至發生武鬥啊，裡邊包含那些階級鬥爭的內容，他無法理解。上級也從來沒有進行教育啊！什麼時候才開始變的？他們說，是1月11日，中央不是給上海發了個賀電嗎？那個賀電是四個單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戰士們一看那中央軍委都署名了，中央軍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變了。感情變不變，確實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黨團員多，成份好，就是喜歡。弄清楚真相，看著造反派可愛了，許多事就好辦了。最大的問題還是到群眾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這是不太難的。我們自己也還要繼續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到群眾裡面去。改造自己。

最後，提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立或者將要成立革命委員會。軍管，也要準備為成立革命委員會創造條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員會真正成為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機關，需要我們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們。現在的革命委員會，他們的領導成員，一般的說原來的職位都是比較低的，在社會上原來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運動這麼蓬蓬勃勃，作為一個集體的力量，工人造反隊是非常厲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準比較高，工作能力比較強的領袖人物，還沒有。如何幫助他們提高政治思想水準，這是關係能不能培養出接班人的大問題。非常重要。一個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員會，這個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是革命委員會了。軍隊也好，外來的同志也好，上級也好，都要想辦法來支援它，樹立它的威信。這樣，它才能把革命抓起來，把生產抓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上海的工作沒有系統總結過，就我們碰到的問題中，主要講了一個對待群眾的問題，不對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⁵²

⁵²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1988年10月；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1967年12月5日。

張春橋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4.20.)

【張春橋同志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員會代表團講話】

革命的同志們、戰友們！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今天正式成立了。這是北京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盛大節日，也是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盛大節日。我們，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和上海五個省市的革命委員會代表團，應邀參加這個大會，感到非常高興。我們受這五個省市革命委員會和革命人民的委託，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北京市的革命戰友們，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同志們，戰友們，北京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走在戰鬥的最前列，對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建立了特殊的功勳。你們以無產階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向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發動猛烈進攻，取得了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第一個偉大勝利。你們貢獻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你們發起了震撼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你們熱情地接待了來北京串聯的一千多萬革命小將，你們還派出了成千成萬的紅衛兵戰士到全國各地，把毛主席的號召帶到全國各地，把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的作風帶到全國各地，同那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結合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燒遍全國。我們各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個勝利，都是同北京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全力支持，同首都紅衛兵小將們的英勇奮戰分不開的。在這裡，我們再一次向同志們、戰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鬥

爭高潮中。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國興起。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對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極大的鼓舞。我們深信，這個在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一定能夠領導首都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繼續走在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前列，對奪取北京市和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作出更出色的貢獻，一定能夠把我們偉大的首都，建設成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永不變色，成為全國的模範，世界的榜樣。

戰友們，我們都是毛主席的戰士，我們是在一條戰壕裡向共同的敵人作戰。我們各省市代表團在北京期間，學習到了很多很好的經驗。特別是你們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過程中所創造的新經驗，你們建立工代會、紅代會、貧下中農代表會的新經驗。今天我們又聽了謝富治同志的報告和各方面同志的講話。我們將繼續向你們學習。你們也一定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幫助我們。讓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指引下，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徹底勝利，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肩並肩地奮勇前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⁵³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舞蹈學校部分師生的講話 （1967.4.22）（存目）

⁵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張春橋講話

同志們，你們好！

我和姚文元同志這次到濟南來，剛才楊司令員講了，是毛主席決定的，是上個月，即4月29號，毛主席當時看到濟南軍區給中央的電報，講這裡有些問題要求中央能派人來。於是，毛主席就決定要姚文元同志和我兩個人來了。在決定這個問題的時候，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還有中央其他同志都在場，毛主席並指定我們，說你們到濟南後就住在部隊，住在濟南軍區，主要的是要幫助一下部隊同志。這樣一個事情，很能夠說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對山東的文化大革命，對濟南的部隊、對山東的部隊是非常失心、非常愛護的（掌聲，歡呼聲）。我們來到濟南以後，剛才楊得志同志已經講了，主要的是和軍區的同志開了三次座談會，聽他們的意見。到會的有幾十個人，另外，還找省革命委員會的八名常委，後未，又把部隊的同志和各革命群眾團體的負責人，以及參加革命委員會的革命領導幹部這三方面湊在一起，開過一次座談會，送一次會幹的時間很長，從下午二點半開到夜裡一成半。另外，我們還收到了很多信件、傳單、報紙、刊物，數量很大很大，我們盡一切可能看，但是隨看隨來，現在還沒有完全看完。在這些信件中，有的是直接要我們轉送北京的，要求我們送給毛主席、林副主席，江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其他同志的，我們準備凡是寫給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寫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和中央的，我們都負責的把它送到北京去。在這些座談會上，我們一開頭就講了，可以什麼話都講，各種意見都可以談，包括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批評，對中央的意見，也可以談。言者無罪嘛！但也只能限於在那小範圍裡談，有些話如果拿到大街上那就不妥當了。所以會上的談話都是比

較深入的，而且很坦率，什麼話都講了，只是最初的財候，談話都很激動，很多同志過去打仗的時候沒有流淚，而談起目前碰到的許多問題時就很傷心，哭了，後來慢慢地情緒也就平靜了些，我們也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才把軍隊、革命組織和革命領導幹部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決談話的。如果第一天就把這三方面找到一決。那很難談啊。到最後三方面在一塊談的時候，我們覺得整個會議的氣氛還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許多小將們，談的也很好，他們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部隊的同志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講了話，也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這樣對調整我們的內部關係，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好的開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時間很有限，本來想找更多的同志談談，但時間來不及了。因此，還沒有能夠聽更多同志的意見。我們現在瞭解的情況還很不夠，特別是你們在工作裡邊的成績，你們在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方面的經驗，都還沒有來得及談，幾乎都是談分歧，談對各小方面問題的意見。同時到現在的止，我們和各小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見了面的也只有兩三個人，其他的人都沒有談話，對他們的意見我們聽的還很少，聽的很不夠，再加上我們的水準很有限，經驗很少，因此，今天來講話感到有相當的困難，很可能講不好，而且，可能講的對你們沒有什麼幫助，或者還會講一些錯話，這都是可能的，不過我們是同志嘛，我們可以交換一些意見。我們聽了一些同志的意見以後，我們雖然還不可能對很多具體問題馬上發表意見，這個現在還不可能，不過我們想著就我們所知道的。在全國所碰到的一些和這些類似的問題，根據一般的經驗也根據我們在這裡聽到的一些情況，說一點意見，好在這些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在大的原則上都有明確的指示，如果講的不對，完全可以糾正。歸根結底，我們還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思想辦事，按照中央的指示辦事，因為據我瞭解，上一次中央軍級幹部會議的精神雖然你們已經傳達過了，但是學習的還不是很深入的，這一次軍委會議，也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詳細的傳達和討論，因此我們感覺到現在有些同志對目前的問題，思想一時搞不通甚至有一些看法不完全妥當，這也是沒有什麼奇怪，是很難避免的。

有的同志問現在形勢究竟怎麼樣？我們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不管是全國還是山東，以總的方面來看，都是好的，大好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估計。講它好，並不是說我們總是愛講好聽的，而是說我們應該看到形勢確實是大好的。形勢大好的主要標誌，就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廣大的革命群眾進一步地發動起來了。因為這個革命是個偉大的群眾運動，看這個運動的形勢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眾是不是發動起來了，特別是《紅旗》雜誌發表了清華大學的關於「保護一小撮、打擊一大片」那一個調查材料後，那個調查中間提出來批判《論修養》這本書，接著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發表以後，全國的形勢就更好了，群眾情緒很高，一個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但是這個運動還會進行很久，我們還需要進行很多很多的工作，不過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和這個時候差不多前後，4月6日軍委又發表了十條命令，這個命令發表以後，把我們前一段工作裡面所碰到的新問題恰當地解決了。這樣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就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當然，全國的發展很不平衡，各個地方面臨的問題也不一祥，說很不平衡，是說有的地方已經奪了權，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講省市一級，到現在是六個。奪了權的省市革命委員會那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他所面臨的問題和沒有奪權的不一樣，有很大的差別，但就是這六個省市發展也不平衡，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還有些地方是實行了軍管的，比如我們華東地區安徽、江蘇、浙江，已經軍管了，福建已經決定軍管，江西也軍管。這樣華東就只有山東、上海兩個革命委員會，其餘的都已實行了軍管。有的地區比如華北地區，北京和山西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其他的地方也還沒有軍管，也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還在那裡醞釀，有的地方也可能軍管，有的地方也可能成立革命委員會。有些地方在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後，關係處得一直比較好。比如像黑龍江省，那個地方的軍隊，省軍區他們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很早，可以說從去年8月就介入了。潘複生同志，就是他們現在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原來黑龍江省第一書記，他在保守組織攻擊他的時候，

他沒地方休息，就是到軍區去休息的，軍區支持了他，所以他們的大聯合，「三結合」，實際上是從去年8月就開始聯合、開始結合了的。因此，他們現在的關係，據我們瞭解，雙方相處一直是比較好的。也有些地方開始是比較好的，但最近一個時期出現了一些問題。問題大小不同。山東省的形勢，總的來看，也是好的，大好的。這一點，那天三個方面的同志在一塊談的時候，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山東也是奪權比較早的一個省，「二·三」奪權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同時是現在全國僅有六個省市革命委員會中的一個，所以有這樣一個好的形勢（我們在座談中間，同志們都談到），這是因為有毛主席的領導，有黨中央的支持，也是山東的革命群眾長時間的艱苦奮鬥所得到的結果。同時大家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都一致地、毫無分歧地認為山東的奪權，山東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駐在山東的部隊的積極的參加、積極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大家一致的認為，在奪權鬥爭中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在這裡的部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這個問題沒有任何分歧，都是一致的。因為確實是這樣嘛。任何一個革命，他都是圍繞著政權問題，而政權那是和武裝力量分不開的。我們1949年以前，中國無產階級，中國革命的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組織了自己的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這樣就奪取了全國的政權。十七年以來，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是有一部分政權，就是我們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中間，有那麼一部分被資產階級篡奪了，所以才有重新奪權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時候武裝部隊仍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道理在座的同志當然會很清楚的。我們也反復的向各個方面講過這個道理，就是說我們所以能夠開展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樣放手地來搞群眾運動，就是毛主席，也只有像毛主席這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他才有這樣的決心，有這樣的氣魄。這樣的搞法，全世界從來未有過。但是要有一個條件才敢這樣搞，就是我們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保衛著我們的國防，保衛著我們的祖國，不至於受到帝國主義的打擊。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能保證我們國內地、富、反、壞、右不敢那樣大規模地公開地破

壞文化大革命。沒有這樣一個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文化大革命哪敢這樣搞！在山東地區當然也是這樣。因為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而且在奪權的關鍵時刻，人民解放軍發揮了他們的作用，這也說明瞭因為我們有軍隊，在需要我們軍隊參加的時候，採取行動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的領導幹部，就能夠在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之下，從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裡，把權奪過來，恢復自己的權力，建立自己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在奪權以後，我們山東的部隊，在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五個方面，都是積極地參加了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像同志們所說的，大家去參加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的，非常熱情，非常願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確實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績。支工、支農這方面的成績沒有什麼爭論。大家現在爭論的就是在支左這一方面了。下面我再談。但是，就是在支左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績，這是主流方面。這一點我們和三個方面的代表同志一塊談話的時候，大家也是一致的，都認為這是主流，缺點錯誤那是支流。有沒有缺點錯誤呢？這個沒有人否認，我們部隊同志也都承認有缺點錯誤。如果說有一點分歧的話，就是那個缺點錯誤大呀，小呀，多呀，比如說十個單位是支援錯了一個呀，還是支持錯了兩個呀？有人說是三個，有人說是四個。反正是這樣的分歧，缺點錯誤總是有，主流是好的，這個沒有什麼分歧。那麼說到這裡好像就沒有什麼話好講啦，這不是意見比較一致了嗎？但是同志們一談到具體問題，那個分歧就相當大，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感情上的對立也確實相當厲害，我看我們說話說得坦率一點，談起問題來距離不小，不過這個距離不是越談越遠。好在我們畢竟都是革命的同志，我們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不管是紅衛兵小將，還是革命領導幹部，還是部隊的同志，這三個方面都是革命的，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這些問題上談的結果還是逐漸緩和，逐漸接近。今天是我們來了第五天了。從總的趨勢來看，形勢是在緩和的，不是越來越對立。我們來的當天夜裡，坐著車子出去到馬路上轉了一圈，那個時候馬路上還是相當緊張的，大標語很多很多。後來，第二天早上那些標語都沒有了，你看這還不是個好事嗎？！同志們，這正是

說明我們互相關係在向好的方面發展嘛。有的同志給我們送去了好多關於這方面的傳單，說是出現的這種現象是杜春勝同志在半夜裡去佈置的，我覺得他這樣連夜去佈置也是好的，是對的，應該這樣做，如果我們做了這樣的事，我們也應該連夜去佈置。因為應該正確處理我們的相互關係。現在有一個說法，說是我們革命委員會和部隊之間如何如何，我說這個提法本身不太妥當吧，大家考慮一下，這個省革命委員會，她是一個「三結合」的權力機關嘛，我們軍隊算一方嘛，不能說革命委員會不包括我們軍隊。同樣，我們軍隊談問題的時候也不能說我們不算在革命委員會裡。省革命委員會有我們的代表，是「三結合」嘛！如果不是「三結合」中央不批准的呀。現在各個方面都採取了措施，濟南軍區也採取了措施，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其他方面也都採取了措施，省軍區也採取了措施。濟南軍區黨委定了三條，這三條我們認為是很及時的，很好的。因為這樣就不至於使矛盾向更尖銳的方面發展。我們下面會講到，如果矛盾再向更尖銳方面發展，對我們的革命，對我們的人民是不利的。在革命過程裡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有敵我矛盾，有人民內部矛盾。剛才我們學習最高指示裡面念了一段嘛，遇到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理嘛！我們現在所碰到的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據我們觀察，濟南軍區的同志有參與奪權處理那樣局勢的經驗，還沒有學會處理這樣的發生在人民內部這種矛盾的經驗。這就要咱們在鬥爭中間，在實踐中間學會它。以後還會碰到的，因為人民內部矛盾永遠會存在的。遇到這樣的事情不要驚慌失措，我們有了經驗就好辦了。矛盾總是存在，舊的矛盾處理了，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現了，這樣，矛盾就成了我們事業發展的動力，會使得我們的革命向前進。現在我們所碰到的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處理好了，我們的革命一定會大大向前發展。現在大家還沒有經驗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才只有三個月，三個月的時間那是很短很短的。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著名文章的發表，到今年已經十年，十年我們還沒有完全學會。那一篇文章，我們現在很多同志，包括我們在內，也還並沒有完全懂，每次重讀，都覺得好像是針對著當前的問題說的，針對著我們的問題說的。

我們現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不過才有三個月，經驗還很少，出一些問題，甚至出一些亂子，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總結出經驗教訓來，那麼就會變成好事。在這裡我向同志們傳達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因為最近各個地方，軍隊在支左的過程中間，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央最近開了個會議，就是為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處理這些問題。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毛主席4月23號批了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據說已經向同志們講過了，我想還需要再講一下。一個就是陝西省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一個報告。毛主席作了批示。陝西省駐軍的工作還算做得好的，但是也有些問題，我們採取司令員、政治委員、還有野戰軍的軍長，一塊出面，連續召開了很多次座談會，聽工人、學生對部隊支左工作的意見和批評。在這些座談會中間，學生、工人都提出了很多批評，有些批評也很尖銳。毛主席看了這個材料以後，就建議把這個材料印給這次軍委會議。毛主席說：「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取此種做法。」這是從正面向我們推薦了一個榜樣，多次開各種座談會，聽取意見，聽取批評。所以毛主席說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取這種做法。主席在這個批件裡面，還加了很多注，就是在中間寫了一些話。在看到批評部隊這個、批評部隊那個的地方，毛主席就加了這麼幾句話：「不要怕批評，全軍在這種批評過程中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並改造世界。」毛主席強調不要怕批評，這個批評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好處。在這個過程裡面，在群眾批評我們的過程裡邊，我們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有各式各樣的意見會說明我們認識客觀世界並改造世界。因為我們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學生批評軍隊的好多意見，就是一個叫李世英的同學批評的。毛主席對這個人非常熟。他大概怕部隊的同志不熟悉，還在這裡特別加了一個注，說李世英同學是「交通大學學生領袖，曾經被打成反革命，並幾乎被迫死亡，後被救活者」。主席對全國這些人物非常熟。他在這個地方特別注明。這個同學對軍隊的意見很多，提出軍隊支左必須旗幟鮮明，態度要明朗等等。其中有一條，要部隊的同志相信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毛主席在這一條後面又加了一個注，說「這是最基本的一條」。後面還談到這位同學講的一

些意見，就是要搞一些談心會，開一些小組會，互相聯歡、談心，這樣增加互相的瞭解，增強團結，增強兩個大造反派之間的大聯合。西安地區有兩個大造反派，那個地方的保守派已經被搞得差不多了，垮了。現在這兩個大派都是造反派，但過去就是聯合不起來，團結不起來，所以就提出要部隊幫助他們開展談心的活動。毛主席說：「開展談心活動，這個方法很好。」就是贊成這種辦法。陝西地區他們準備不斷開這種會，因為這種方法把部隊和革命造反派之間的關係可以處理得更好。所以主席說這個辦法在全軍都應該採取。另外一個文件也是同一天批的，是講四川的。四川的問題，同志們大概也聽到一些，錯誤比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較多，而且還打死了人。對這樣一些情況，他們送來一個材料給中央，說他們原來抓了多少人，已經放了多少人，還有多少人沒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這個問題，他們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認為他們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對四川一面批評了他們，捉人太多，把一些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稱讚了他們，因為他們改正的快。在指出這些方面的問題以後，毛主席又說：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裡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毛主席說，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

遇到這樣的情況怎麼辦？就是要沉得住氣，聽取各種意見，然後實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開的向群眾承認錯誤，而且要立即改正，馬上改，像四川那樣。這樣就取得主動啦。另外要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進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確的軌道。毛主席說，我看現在這股風，（就是指上面說的一股風，說軍隊作的事情都錯了）不會有2月那樣嚴重。1月底2月初那股風全國也是相當嚴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組織犯了錯誤。起初是革命造反組織犯了錯誤，但是後來軍委八條一出來，部隊的同志在處理這個問題上，自己又犯了錯誤。先是學生犯錯誤，後是部隊犯錯

誤。現在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所以毛主席就認為這次不會像2月那麼嚴重。為什麼呢？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學生、群眾他們有了犯錯誤的經驗，上一次衝軍區不對，他知道了。軍隊在處理群眾衝軍區問題上又犯了錯誤，有的地方人家來請罪，請好幾次還不同意，檢討一次不行，再檢討還不行，把人家宣佈為反動組織。這樣的地方有那麼幾個。所以主席說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就不會像2月那麼嚴重了。最後這一句話毛主席是充分相信軍隊也相信群眾的。他說：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雖然現在有這麼一股風，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措施，沉住氣，實事求是地檢對，公開地承認錯誤，改正，並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這樣就可以走上正確的軌道。

毛主席的這兩個指示，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解決面對著的這些問題所應該遵循的方針、辦法，主席都講了。從這裡我們看山東的問題該怎麼辦，我們覺得主席都給講清楚了。比如說我們工作裡的一些缺點錯誤，毛主席就講了嘛，犯錯誤是難免的嘛。現在有一些群眾組織對我們提出批評，我們要沉得住氣嘛，不要一聽到批評就沉不住氣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辦法，沉住氣，沒有什麼了不起嘛。有些話說得過分了，過分的話經常會有的。誰說話能說的都是那麼準確呀！參加革命委員會的許多負責人，他們名義上是革命委員會的常委，實際上他還是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還是小將。當然裡面也有幾個不是小將，是中將，老將，但是他基本的情緒，那些小將最起作用了。據我看，同志們現在對小將接觸的比較少，我感覺到有些同志對他們不大理解，不大懂。他們對你們接觸也少，也不大懂。雙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評，像毛主席講的，要沉得住氣，不要怕批評。不但不要怕批評，還要像毛主席所推薦的，我們到處去開座談會，去徵求意見，徵求批評，聽他們的意見，包括那些非常尖銳的意見。很尖銳的意見都要聽，耐著心聽，同志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出來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評啦，那才不見得呢！這一方面，我們有一點經驗，我們挨攻呀，受批評呀，當然各派都有啦，我這裡講的不是壞人批評我們。壞人攻擊我們那是意想中的，他們不攻擊我們，我們就糟糕了。我

這裡講的是革命派，我在小會上和有些同志介紹過；我在這裡也可以和同志們說一下。比如去年11月我到上海去，處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狀的問題。我下了飛機就趕到火車站找工人代表談話。夜裡十二點到的，談到天亮，毫無結果。我勸他們回上海，我們一塊到上海去談。不行，達不成協議。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這些代表沒法談了，要他們把我的意見給群眾談談，他們說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眾見面給群眾談。在車站廣場上開萬人大會，從天亮一直開到下午四點，才把他們說服了。就這樣連著開了十六個小時的會，中間也沒吃飯，也沒喝水。工人那個罵起來可是凶呀，他們有好多人，我只有一個人，來的工人我一個人也不認得，在場的究竟張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時我就是聽哪。因為我出發以前，以陳伯達同志的名義發了個電報給他們，勸他們回上海，說我到上海去給他們談話。他們就在那個萬人大會上罵，說陳伯達這個電報是個大毒草，是修正主義，說我要把他們騙回上海，是個大陰謀，說我是和華東局、上海市委勾結好的，要騙他們回去。總而言之，整整在那裡攻了我十六小時就是了。我講話頂多一個多鐘頭，那就是攻了我十五個小時。你要惱火，那一下子就鬧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麼人，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腦子裡也確實考慮過。有時也覺得不對頭，怎麼罵起陳伯達來那麼凶，指著我的鼻子罵，我們又都是第一次見面，我是好心好意來的，而且我確實是中央派來的，為什麼那樣攻我。但是那一次我還是沉著，因為處理這樣的問題，還有一點經驗。我也沒有發火，沒有抓他們的人，也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聽了他們的意見，感覺他們講的有道理，承認了他們有些講的是有道理的，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決。這樣到了四點鐘才回去了。現在上海工人運動的基本領導骨幹和領導人，有很多的就是這些人。因為有那十六個小時，我就跟他們成了好朋友了。現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經常和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個工廠裡邊，總有人見了我說，唉呀，你好呀，我們在安亭見過面的呀（那個車站叫安亭車站）。這就建立了我們特殊友好關係。不打不成交嘛！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同志們，你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大概只有挨罵的

經驗，沒有挨過罵又變成好朋友的經驗。和革命造反派不打這個交道，我看我們的同志缺一課，這一課應該補上。你這一課如果過了關，以後的事就好辦了，日子就好過了。還有一次我和姚文元兩個，也是今年1月底嘛，我們到上海。在濟南我們看到楊得志、楊國夫的標語固然不少，不過我說你們兩個的標語沒有我的多，上海比濟南大，標語貼的也是滿城都是，而且貼了十幾天，不是那麼一天兩天，又沒有人去給他們說：你把它刷下來吧，你把它貼掉吧。沒有。造反派當然反對這些標語，因為那是一個造反派犯錯誤的組織幹的，其餘的造反派組織反對他們，就到處去貼，他貼了標語，給他再貼上，造反派也貼另外的標語，標語戰鬥了半個多月。那種日子我們過慣了，覺得沒有什麼，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也去看，看看貼了什麼，也就過去了，我們照常開會嘛！還照常找那些人談話。他們攻我們最厲害的時候，我們找他們談話，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罵了我們六個小時，什麼話都有，說我們是反革命兩面派。那個時候正在搞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因為陶鑄的問題剛剛揭開，因此到處流行著要抓什麼人，揪什麼人！什麼式的人物，他總要在式頭上安一個帽子的。那時我就是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那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聽一聽有什麼不好呀！聽一聽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頭兩天，忽然一個晚上就大整謝富治，謝富治同志現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奪權了，或者是在奪權以後，這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它是要在我們內部出一些事。遇到這種事，要沉著。謝富治同志他也有經驗了。也是造反派貼他的，不是壞人貼他的。謝富治他是公安部長，他也不抓人。他說，咳，讓他貼吧。別的造反派說，我們把它撕掉，他說不要撕，讓他貼在那裡好嘛！他態度很開朗，也不緊張，還是找那些人談話。談一兩次，彼此談通了。貼他標語的人，我不講他的名字，就是他們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麼關係呢？發生一些這樣的事不要緊，不要一時要沉不住氣了，一時就緊張了。多經歷幾次，再碰到這樣的事就好辦了。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有帶兵的經驗嘛，新兵第一次上戰場他就沒有經驗，老兵碰到打仗他有經驗，他不慌。我們在這

一方面，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間，有許多特殊的形式，我們許多同志沒有經驗。在這一方面，雖然是老將，可能像新兵。再多打幾仗，那就行了。這個本事是容易學的。只要記著毛主席的話，沉住氣，不要說，就有辦法。你們等到和這些小傢伙搞好了，你就會覺得他可愛了。你不要看他罵得你很厲害，他要是跟你好起來，那是非常好的。因為他還是青年嘛！昨天我們就談了，在座的許多同志都是久經戰場的，帶過各種部隊的，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以前帶的部隊是什麼樣的部隊呀，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剛拉起的遊擊隊是什麼樣子，就是那麼覺悟高，就那麼整齊，就那麼守紀律，就沒有打砸搶，我才不相信呢！都是些新兵新隊伍嘛！我們的紅衛兵，最老的紅衛兵，他們吹牛，我是老紅衛兵，老紅衛兵一年的年齡都沒有嘛，最老的紅衛兵到現在還不到一年嘛！一年的紅衛兵搞到這個樣子，就很不錯了。我們同志們想一下自己的經驗嘛，最初帶隊伍，你剛拉起遊擊隊，一年你能帶出什麼樣子。他們現在階級覺悟高啊！毛澤東思想學習的有時硬是比我們好。有些東西他不如我們，我們有經驗，我們懂的事多，但是有些事，你跟他辯論，你辨不讓他，最後是他對。我有這個經驗。你最初覺得他沒有什麼道理，後來聽聽他很有道理，真理在他那邊，你不要小看他。所以要沉住氣，不要怕批評，同時，要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快改，能夠馬上改的馬上改，千萬不要頂牛。我們總是要相信大多數，相信大多數的幹部，相信大多數的群眾。不要把群眾對我們的批評，或者人家說了幾句話，就說是矛頭指向解放軍；或者是我們說了革命委員會幾句話，就說你把矛頭指向革命委員會。或者說一批評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那就不允許。北京滿街上都是這個標語，「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這個標語出現了幾個月了。我們當然都向他們解釋過，我們說不能這樣提，有人反對中央文革，並不一定是反革命，裡面有反革命。可是沒用，他們一定要這樣貼，我們還是到處給他們講，中央文革是可以批評的。實際上，人家不管貼不貼，該批評還是批評，你說不準批評，人家照常批評，怎麼能不批評，不過是背後批評就是了。叫大家公開對我們講嘛，那關係就好了。所以主席的幾點指示，已起把問題都解決了。我就不要多說了。

有些同志寫信提了些問題，我想再談幾個具體的問題。我今天的講話，是和姚文元同志分了工的。今天我講，明天他去給群眾組織講。我們兩個講話的重點不同，我今天主要是講部隊自己的事。你們不要認為我老是說部隊的事，不公平呀。群眾團體的缺點他們的毛病，我今天不想在這個會上講，那一些話，我們在另外一個會上講。我們剛才念過語錄嘛！要各自進行自我批評，所以現在就光講咱們的事。他們那個會，我們另外開，這樣子，雙方才能更容易接近一些。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攻下面的革命，因為有這樣一個特點，所以軍隊的作用，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就連著發出幾個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月23日中央關於支左的決定，後來又有1月28日的八條，4月6日的十條，還有其他的一些具體規定。最主要的是這些。這幾個都是強調軍隊一定要支左。強調一定要站在左派這一邊。因為在奪權以前，左派的力量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從少從弱，到慢慢地發展起來，強大起來。在緊要關頭，如果軍隊不參加，這個權就奪不過來。這一方面，同志們有經驗了。這一點和山東的造反派談起來，他們對軍隊是非常有成情的呀！想起那一段，他們就說，那個時候和軍隊的關係多好呀！在奪權以前有一些同志遇到困難，去找部隊幫助，甚至在有被抓起來的危險的時候，跑到部隊來避難，他們回想起這些事情來，還都是非常感激部隊的。我們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工農的子弟兵，我們當然是站在左派一邊，也只能站在左派一邊。應該是只能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這個本來是不成為問題的。那麼，等到奪權以後，這個政權要鞏固，沒有部隊的支持可能不可能？也是不行的。因為這個政權現在還是臨時權力機構，她要完成很複雜的任務，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完成整個鬥批改的任務。還有很多很多的專案，將來，還要過渡到正式的權力機構，要建立省人民委員會，還要建立省委。現在是臨時性的。所以在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裡面，如果得不到解放軍的有力支持，是不行的。同志們，我們永遠記住這一點，我們是責無旁貸的。我們對革命委員會，只能夠支援它，不能夠採取別的態度。因為這是一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鞏固這

個革命委員會，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如果不支援這個革命委員會，它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對我們整個革命是不利的。特別是像山東和其他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省市，因為現在只建立幾個嘛！這幾個革命委員會我們只能把它搞好。如果搞不好，或者革命委員會垮了台，同志們哪，那我們臉上就無光。這個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山東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黨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人家外國通訊社天天在和我們算帳啊。同志們！他們用語就叫做毛林派，說毛林派現在僅僅是控制六個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當然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根本不符合事實。不讓他們是這樣看的。他們認為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表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如果我們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搞著搞著垮了，同志們想一下，那是個什麼問題呢？當然，如果個別的垮了，真的出現了那麼回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們總還是不希望出這種事。我們要想一切辦法來加強它、鞏固它。使它能夠站得住，能夠把工作做好，不但能夠奪權，而且能夠掌好權。用好權。這是我們的責任。當然這裡面也確實會有困難。主要的困難是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時間比較短，支持左派，那個是左派呀？不大容易搞清楚。不是那麼一眼就看準了的。有的一看就很容易看準了，很容易判準，沒有什麼爭論；有的就很不容易判斷。有的原來看他好像是個左派，以後看看又不是，這樣的事情我們碰到許多了。我們也有支持錯了的。在上海有個大廠子，六千多工人，分兩派，一派四千，一派兩千，兩派都互相說對方是保皇派，互相說對方是反革命。又都說自己是左派，經常武鬥。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分成兩派，到現在已經10個月了，還是兩派，還是武鬥，一打就可以去幾千八，從外面廠子調一些人，一方是兩萬人，一方是一萬人地幹。經常打。為了想識別一下究竟哪一個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幾個左派學生組織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組織，工人的，學生的，機關的，都介入了。結果，別的問題左派組織都很一致，就在這個問題上一分為二，兩派弄的誰也做不了結論。我們收到關於這一工廠的材料就一大堆，我們現在也判斷不清楚。不要以為一下子就能判斷清楚的，有些單位不大容易弄清楚。我們最近在北

京開會，各省去彙報，碰到了好多這樣的組織，各種說法不一樣，一時就是難以判斷清楚。大方向對不對，這是區別左派、中間派、保守派、右派、反動派的主要標誌，看他是不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他是執行資產階級路線，還是執行毛主席路線，這是主要的。但有一些組織也很難說他以前一段保過，後來又不保，後來又保；有的是在本單位保，在外邊不保；有的到了外邊，犯了個錯誤，在家裡還是很革命的，情況非常複雜。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有些同志，一口咬定我支援那個就是左派，我說你不要說得那麼死，還是得再分析分析，看一看。因為有些情況是不容易判斷的，腦子要靈活一點，要多聽各種不同意見，然後再仔細分析一下，有的一時判斷不清楚，再看一看，不要急。

有的同志覺得他打砸搶很厲害，就常常因為這一點說某一個組織不好。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分析。我們是不贊成打砸搶的，是反對武鬥的。但是，不要把這個問題一般地提，要作分析。因為這種打砸搶，有時候包括的內容不一樣。例如搶，有很多是得黑材料。那個事情完全應該由工作組，由原來的黨委負責。因為不按照規定把材料拿出來嘛！有時候弄點東西，地方過去山東省委或者其他一些黨組織對他那個保字型大小的，要什麼有什麼，而對其他組織，要一張紙都不給，人家沒有辦法就去搶一點。當然這個我們也不贊成。不過就因為這個說他不好，我看也不必去責難他們。不要脫離開階級鬥爭來談這個問題。有時候打傷了一些人，甚至打死了人，這當然是不好的。我們並不贊成打，不贊成武鬥。但是說歸說，他要打，你怎麼辦？又不是我們要他打。這種事情，不要怕，咱們只能想開一點。林彪同志在軍級幹部會議上對這個問題已經談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作了很多比喻嗎？這樣一個大的革命，沒有點傷亡，這是不可能的。同志們，不出一點事，不出一點亂子，那麼文雅，那麼細緻，一點紙漏都不出，世界上的革命不管哪個革命，都是沒有的事。資產階級革命也是這樣，封建階級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也是這樣，我們的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更不用講了。總會有犧牲，總會要付出代價的。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到現在，傷亡的人很少。比一個小小的戰鬥的傷亡都少，更不要談一個戰役了。淮海戰役死了多少人？解放

濟南死了多少人？那不過是解放一個濟南城。我給大家說個消息，最近流行性腦炎非常猖獗，發展很快，來得很猛，就這樣一個病全國死了十三萬人。山東省也死了一萬人。打砸搶是不是打死了一萬人？沒有，肯定沒有。大家想一想，這樣子大的一個革命，中間出一些亂子，打傷了人，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我們有的同志，看了很難讓，當然，看到好人挨打嘛是會難讓。不讓這些都是沒法避免的。你勸也沒有用。黨中央從來也沒有主張過打砸搶，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從來沒有主張過打砸搶，相反的總是講不要武鬥不要武鬥。十六條已經寫上了，林副主席在天安門講話，每一次都講不要武鬥。你講歸講，他說聽毛主席的話，其實寫在那兒他也不聽。他就在這個事上不聽，打完了以後他又聽了。他說，我還要聽毛主席的話，不要武鬥要文鬥。一碰到了事，他又要動拳頭。就是這樣。你說，中國人民愛好和平，那才不見得。有一些人就是想動拳頭。所以這個問題，不要看得太重，要從大局來看。

對於黨、團員問題，成分問題，同志們提了好多。我們對這個問題，態度向來是清楚的。成分好壞這個事是應該重視的，不重視成分是不對的。我們這個文化大革命就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嘛！但是，也不能一去就先看他的成分怎麼樣？一看成分好，就認為是革命組織，一看裡邊有一部分人、或者個別人成分不好，就說是牛鬼蛇神。我們還要看整個階級鬥爭中間，在兩條路線鬥爭中間的表現。就是對成分好的，對黨團員，也要看他在兩條路線鬥爭中間，究竟站在哪一邊。不是說我們的黨員團員不好。我們的黨員團員絕大多數是好的，這個中央一再講過了。但是，表現並不全一樣，有一些黨員表現很好，有一些黨員表現不好。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對我們整個黨來說，就是一個鍛鍊和考驗。如果有人說，我們所有黨員團員都是壞的，應該排擠掉，不要，都要打倒，那當然是錯誤的。不過我們的黨是都是在階級鬥爭裡面、在兩條路線鬥爭中間生活的，他總要站在這一面或者那一面。我們的黨今天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統一，不是鐵板一塊。劉少奇不是共產黨員嗎？鄧小平不是共產黨員嗎？陶鑄不是共產黨員嗎？你能說：一看他是黨員，我們就要依靠他，這樣那不就錯了嗎？而且我們有些黨員團員、積極分子、勞

動模範在這次文化大革命裡面，當保守派的。特別是在運動初期，成了保守派的，數量不是很少的。這沒有什麼奇怪。一個就是劉鄧路線的流毒，毒害很深，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我們黨裡面流傳了那樣久，二十多年了。多少共產黨員看了那本書，按照那個去修養的，這不是越修越糟糕嗎？劉少奇那一套什麼「馴服工具」等在我們黨內流毒很深。毛主席的思想，在有些黨員裡面並沒有紮根。再想想，我們有些黨員，包括老黨員，在入黨的時候，他並不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那個時候他並不想搞社會主義，或者口頭上搞社會主義，實際上想搞資本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這一關就是過不去。劉少奇這一些人就是這樣，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真的要搞社會主義了，他搞資本主義。有一些勞動模範，為什麼變得保守了呢？除了那些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地位變了。原來苦大仇深，階級感情非常深厚，但是後來呢，他地位變了，生活也好了，有了權，不受壓迫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不覺感到有革命的要求，別人感到受壓迫，要起來革命，他不感到受壓迫，反而覺得應該維持這個秩序，不要動。他就有一種保守傾向。所以要分析。我講的是一部分人，一部分黨團員，一部分原來的積極分子，一部分原來的勞模。他們為什麼變成保守的呢？是有原因的，沒有什麼奇怪。所以濟南的情況，據我看也可能是這樣。我在別的地方都碰到這樣一個情況。在平常，到那兒去工作，當然要先瞭解一下這個人的成分，是黨員還是團員，這是工作的習慣，而且也應該瞭解。但是這僅僅應該說是瞭解問題的第一步，不能到此為止。瞭解他是黨員，就覺得沒問題了，那不行，還要再瞭解他究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怎麼樣？他執行什麼路線？否則的話，他明明是個保守派，你就可能當革命派來支持他，當左派支持他。任這方面，我們同志可能吃了不少虧。就是因為這幾個概念有點模糊，對黨團員多呀，成分好呀，看到另外一些造反組織他們打砸搶啊，裡邊有壞人啊，有時候弄得自己支持錯了。我接觸到好多個單位。都有這樣的情況。在北京看到有這種情況，在上海

也有這種情況。在北京和外地來的同志交換意見也碰到這種情況。不從階級分析，不從兩條路線鬥爭觀察分析問題，有時候就支持錯了。人家說你支持錯了，還不願意。還有些老工人，他生產就是抓得緊，革命他就不帶勁，就是有保守傾向。當你啟發教育後，他也能幹革命，但是比起青年小夥子差勁。這一方面，我覺得不難，只要我們能夠多去接觸一下，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問題是我們不要老堅持著一種觀點不改變，說我這個觀點就對，那靠不住。如果要是搞不好呢？就會出現一種很不好的局面。一個內蒙古，一個四川，都可以提供這個經驗。內蒙古，就是我們的部隊支援了一兩個保守組織。這兩個保守組織的特點，大概也是這樣，黨團員多，成分比較好，比較講政策，但是這幾個組織，就是不肯狠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或者他鬥這一批，不鬥那一批。當權派裡面，有的好一些，有的最壞，他不鬥那個最壞的，甚至支援那個最壞的。這樣一搞，問題就發展得很嚴重。我們可是要當心啊！因為軍隊的態度，影響太大。我們一說支援那個組織，不用花很大的勁，這個組織很快就發展起來。內蒙古就是這樣，幾個保守組織很快就發展了。原來是很小的組織，自從部隊一介入，一直發展很快，發展到最後，那就大了，造反派和它雙方就武鬥，武鬥中間，部隊又支持了保守派，說它是造反派。到最嚴重的情況之下，後來就開槍，打死了一個造反派，這樣，中央才出來幹預，派人去調查。中央派人去調查，到那裡被保守派扣起來，那麼狂。因為他覺得部隊支持他。最後中央要雙方都派代表到北京來談話，部隊同志也來北京談話、開會，搞了兩個月，最後中央分析清楚了，作了決定。這個決定同志們會看到的。中央這個決定傳達到內蒙古，不承認。部隊的同志態度已經轉過來了，部隊的同志已經發現支持錯了，但是那些保守派呢？就是原來以為是造反派的，不聽部隊的話了。同時，我們有一部分戰士，思想上還轉不過來，戰士也跟保守派搞在一塊，帶著槍上街遊行，反對中央的決定，說中央的決定是假的，毛主席沒有看過，林彪同志沒有看過。後來，中央為了說服部隊一部分同志，派飛機去散發傳單，說明關於內蒙古的決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看過，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批准的。但他們還是不相信。搞了四五千

人，跑到北京來，跑到中南海靜坐示威。那天，中央決定由總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待他們，總理給他們講話，他們居然退出會場，說要見毛主席，只有毛主席的話才聽，並喊打倒周恩來。我講這一點，就是提醒同志們注意，開頭我們的錯誤不大，不改正，到最後大起來了，你覺悟了，你想改變這個局勢，那就難了。內蒙古就是這樣。就是這批保守派，四五千，最後，我們還是說服他們，你們還是坐下來，聽一聽我們講的到底有道理沒有，最初他們不願意聽，總理講話老打斷，最後還是多數人聽了總理的講說，說我們錯了，回到內蒙古再搞革命。但還有那麼幾百人，就是不走，還在北京。我離開北京那天還在那裡。你看，可以造成那樣局面。當然裡面可能有壞人。我講這樣一點就是請同志們頭腦一定要冷靜，處理原來這個局面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認為我支持過的不能改，一改就糟糕了，那可就要壞大事。如果自己支持的，表面上，或者你們認為是左派，實際上是個保守派，那如果搞錯了，將來你想要用這個包袱，你就甩不掉，變得他拉著你，你想前進也前進不了，他拉著你和中央處於對立的地位，同中央的路線處於對立地位，那樣就很不利了。昨天我上了一次街，今天又注意了一下街上的標語，有一種值得我們注意的傾向，有一些貼擁護解放軍的標語。這種標語，因為我沒有下車，不知道是哪些單位貼的。不讓我看他用的語言，根據我的政治經驗，我覺得這個味道不大對，我沒有看，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單位。我從那個標語上看，我感覺到那是保守派對著造反派的。這個對你們想一想，我完全是憑感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們就可能會很容易利用我們的情緒，利用我們現在這個局勢，希望把我們解放軍拉住，使解放軍和造反派之間的關係繼續緊張。那樣對革命不利。希望同志們冷靜地想一下這個事。我這裡沒有做任何結論，我只是一種感覺。我覺得要解決我們面前的問題，主席講了那樣許多方針，我們可以解決了。現在難一點的呢，我覺得還是感情問題，有些是認識問題。像剛才講的，對黨、團員多呀，這是認識問題。另外，我覺得同志們對造反派接觸太少，因為在一個廠裡，只有看到這麼一個局部，歷史知道的也不多，全域知道的也可能不多。現在我們可不能只聽到一點意見就相信，要多聽

一聽，各種意見都聽。中央解決各省問題都是這樣，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主席提出解決的問題是河南問題，主席說河南現在鬧的很厲害，要他們三方，各個方面的代表，到北京來談話，包括軍區認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來談話。實際上談一談，就清楚了，有些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顛倒了。所以後來又有軍委十條命令。我覺得我們同志們是否可以考慮，一個是根據中央關於支左的第一個指示的最後一條，要很好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批判劉、鄧。整個濟南，我們感覺到這一點，也給省革命委員會提了，他們也同意這個意見，雖然他們也抓了一下這個事，但抓得不緊，沒有花很大力量做。批判劉、鄧，我們部隊的情況怎麼樣？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們不管過去怎麼樣吧，現在都應該很好地來參加這個鬥爭。這個對於我們辨別左、中、右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我們看毛主席著作，要帶著這個問題，就是帶著劉、鄧路線這個問題來讀。過去你念過四本，和現在再讀，就不一樣。因為現在有個對立面，就是劉少奇。把劉少奇的著作和主席的著作一對照，你就看出來，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同時，劉少奇的影響在山東是相當深的。因為他做過新四軍的政治委員嘛！而且他幾次到過山東。全國都要批判，我們這裡也要批判，也要學習，在批判中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思想指導之下進行批判。這是一種大破大立。同時，我們要接近群眾。一個是學習，向毛主席學習，在批判劉、鄧中間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另外呢，接近群眾。我覺得我們和群眾，接觸得還是太少了。這次我們來還前，主席談到這個問題，談到我們的黨，談到我們的幹部，也包括軍隊。在49年、50年、51、52，這幾年，我們的黨員、幹部、軍隊和群眾的關係比密切，那時候群眾比較喜歡我們。後來，拿部隊來說，就逐漸地進了營房，和群眾就隔離了，不是住在一個院裡了，見群眾不多了。後來，我們軍隊一出來，不是就講嗎？老八路又回來了。可見我們離開得很久。我們現在就是要到、目前特別需要到那些工人的造反派裡邊去。那些有爭論的，暫時不去也可以。當然要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指揮部呀，工人指揮部呀，請他們給推薦一些單位，推薦一些人，和他交朋友，和經過鬥爭考驗的造反派

交交朋友看。懂得了這些人，你就懂得了整個造反派了。否則的話，我們這個感情上的距離，越是不能解決。千萬不要只聽一種意見。特別在目前，不要只聽人家說，哎呀，你們好呀！我看街上什麼「濟南部隊支左好得很」，「就是好得很」。那種話聽起來滿舒服，是嗎？那個不行啊！光聽那些話有危險！這是捧我們的，你當心點好了。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敏感。各種意見都要聽，也可能罵我們的，倒是罵對了。這個時候，所以會沉著，要很好分析這個形勢。

一方面可以去交朋友，一方面可以去請他們來做些報告。以前我們不是找老工人、貧農到我們連隊做報告嗎？現在可以找一些受過原山東省委迫害的，那些大家公認的造反派來給我們講一講，他們是怎麼樣鬥爭的。因為，我們不大感覺得到受到壓迫，他們受過壓迫。這個感情，要想達到一致，恐怕感覺得到受到壓迫，他們受過壓迫。這個感情，要想達到一致，恐怕是要多接近。我們每一個同志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在這個文化大革命裡邊，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裡邊，需要學會怎麼樣正確地來對待文化大革命中間出現的各種問題。這樣，有利於把我們的部隊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加以提高。這個文化大革命。它能夠改造整個世界，也包括改造我們自己。毛主席講的，在聽取批評的過程中間，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個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們自己。我們要虛心，不要看小傢伙，都是些毛孩子、娃娃，他們在某些方面，這個本領比我們大，需要承認。很多他們懂得的事情，我們不懂。你看嘛！讀毛主席語錄，這個辦法，就是紅衛兵沒有幾個月在全國變成制度。以前，你怎麼提倡都不行。就這些小傢伙，他就有這個辦法。好多解決不了的問題，你叫紅衛兵去幹，一定能夠給你解決。毛主席經常說，好多事，我們解決不了，只有紅衛兵可以解決。主席是那樣的喜歡紅衛兵呀！那樣愛護呀！從來主席不責備他們。有些事，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事幹得不好，主席總是說，有什麼關係呀！他不過是個別的現象，要看主流嘛！主席總是保護紅衛兵的。當然，他也不縱容他們，有缺點錯誤就給他們指出來。他們是聽話的，你們不要看他們不聽話，大的方向他們很聽話。所以現在我們要信任這些小將，他們對解放

軍非常熱愛的。因為他們從小孩子的時候就是叫解放軍叔叔嘛！剛剛不叫解放軍叔叔，沒有幾年，現在變成大人了，二十多歲，頭幾年還喊叔叔。是這樣一些人，非常可愛的下一代，很有希望的下一代。我們有責任和他們交朋友，信任他們。要相信他們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有缺點，他們可以改。領導幹部也是這樣，要相信他們。我今天在這個會議上就這樣講，要相信幹部和群眾的大多數。這是最根本的一條，我們部隊主要是解決這一條。我們到那邊去講，主要的是要他們相信解放軍。要信任我們濟南的部隊，山東的部隊，我們的缺點錯誤我們可以改，能夠改。建立這樣互相信任的空氣，才能夠坐下來好好地談。也包括王效禹同志嘛！王效禹同志應該說是個好同志，在去年，第一個向毛主席、向中央提出來不要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是他，這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樣一個局面之下。有一個人能夠察覺這個問題，而且向中央提出來，不是很容易的，而且後來受到打擊，仍然能堅持下來。他的困難很多，我們應該說明地，他有缺點，應該說明他，應該愛護他，熱情地幫助他。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這些幹部，他們有缺點、錯誤，也可以改。譬如說，我們有缺點錯誤，我們也在改嘛！大家都改，都採取這種態度，各自批評自己，不是指責對方。主席講，擁政愛民那一段，不是指責對方，而是首先批評自己，這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就是革命委員會裡邊，或者群眾團體裡邊有壞人，同志們也不要急，應該相信群眾，壞人總是隱藏不了很久的。劉少奇這樣大的壞人，最後還不是揭露出來了嗎？而且爬到那麼高了，還不是揭出來了嗎？因為有的人，你說他是壞人，大家不承認，看不清楚，也或者是我們看錯了。要相信群眾。所以現在整個的口號，主席提的是擁政愛民。對地方的同志我們著重給他們講要擁軍，向我們部隊方面，就是要強調愛民，強調支左，在支左當中執行十條，要支持革命委員會，支援那些革命造反組織，支援那些革命領導幹部，要真正地鞏固「三結合」。遇到分歧的意見要學會協商。那天我們開座談會，彼此都同意，就是過去商量不夠，互相不通氣。三個月了，像我們前天那種會，由三個方面坐在那裡談了十幾個鐘頭，還是頭一次。三個方面從來沒有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商量一些問題，分析形勢。我們都

是革命同志嘛！我們向三方建議，最好以後一個月三個方面的負責同志坐在一起研究研究問題。如果自己處理的事情，涉及到三方面的一方，譬如我們軍隊，要處理一個問題，涉及到了群眾團體，或者涉及到了革命領導幹部，我們一定要跟他商量，或者三方共同商量，這樣，把我們三方的力量真正結合起來，不叫「三結合」嗎？這三種力量如果結合起來了，那我們就變成無敵的，我們的力量就是強大的。如果三種力量不結合，那三種力量都沒有力。我們軍隊，不是要備戰嗎？備戰頭一條工作，就是要把群眾工作搞好嘛！這是林彪同志講到的，如果我們山東這個戰場，群眾條件沒有準備好，那將來打仗時候我們怎麼辦？所以，解決地方文化大革命，既是支持了地方，同時又是準備了戰爭。如果各級政權、各級權力機構，都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裡，掌握在和解放軍緊緊站在一起的組織手裡，那麼，將來打仗我們就要方便得多了。如果掌握在保守派手裡、壞人手裡，那就糟糕。所以同志們要學會協商，要善於協商，不要聽那些流言蜚語，更不要受一些壞人的挑動。我們要當心敵人會利用。江青同志在慶祝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講話裡面已經講了，那是給紅衛兵講的。要當心敵人利用我們。他故意挑撥我們這些關係，我們就要特別當心。現在，根據濟南軍區黨委的幾條決定，我們的支左宣傳隊撤回來了。撤回來，我們覺得是需要的。因為這個原來在北京就商量過，最近，各個大區，都需要把支左的隊伍，根據這一支軍委擴大會議的精神，進行教育。要把幾個月的工作總結一下。當然，這一次，事情比較急迫，因此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楊得志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呀，被迫的。我們感覺到這個措施還是正確的，需要這樣子，否則那兩天，可能發展得比較嚴重，那就更不利。現在已經回來了，我們就要抓緊這個機會，學習一下軍級幹部會議的文件，和這一次軍委擴大會議的精神。把我們的思想提高一下，統一一下。這樣並不是說我們以後不搞支左工作了，我們是要把支左工作搞得更好，提高到更高的水準。因為有了經驗了嘛！經驗雖然還不夠，但是畢竟比頭幾個月經驗多了些。所以會把它搞得更好的。因為我們在這裡時間很短，瞭解情況也不多，我講話開始時候談了。今天能夠講的嘛

只能夠說這麼一點點，我們有這樣的信心，因為現在有個好的開頭。三個方面都有這樣的願望，都想把關係搞好。這種願望是正確的，應該搞好，這樣就有可能像毛主席所說的，經過這樣一段工作以後，我們的整個文化大革命，包括部隊的支左工作就可以走上正軌。我們相信濟南部隊有這個能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來改正我們工作的缺點，發揚我們的成績，比較快地使我們的工作能夠提高一步，走上主席希望那樣的正確軌道。這樣，可以使得整個山東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地向前發展。因為山東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說還是走在靠前面的，我們希望它一直能夠走在前面，這個也要靠我們部隊的工作，我們希望並且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夠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夠在不久的時候，就能夠把你們總結工作的情況，把你們好的經驗也總結出來，把你們的缺點克服了。能夠把更好的成績，報告黨中央、報告毛主席和報告林彪同志，我想毛主席、林彪同志和黨中央都會很高興地在那裡等待著同志們會送去勝利的消息。我想今天就講這些話，講得錯了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完了。

張春橋在山東省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7.5.7.)

同志們，紅衛兵小將們：

我和姚文元同志到濟南來，已經一個星期了。我們這次來，是毛主席要我們來的，因為毛主席對山東文化大革命非常關心。所以在4月29日中央開會的時候，得到材料知道濟南的形勢比較緊張，所以，在會上毛主席就決定要我和姚文元到這裡來看一看。我倆到這裡以後，因為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主要的要我們幫助一下濟南和駐山東的部隊，使得他們接受過去的經驗，如果工作裡邊有缺點，能夠早一點改過來。所以我們到這裡以後，主要的時間是用在和部隊的同志談話，向部隊的幹部做報告，放在這方面。但是我們始終也沒有忘記紅衛兵小將們，我們原

來是很想找一個機會，和大家見面講話，但是，不是因為你們的錯誤，也不是因為我和姚文元的錯誤。我們就始終沒有開成會。這個事誰的責任？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們心裡總是很不安。如果到了濟南一次，又知道省的紅代會在這裡開會，我們居然不來看你們。那麼，我們怎麼能離開濟南呢？所以無論如何今天要來一趟。

我們有些話，昨天曾經找一部分同志講了。因為那個時候估計到也可能不來了，來不成了。把我們對濟南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問題的意見，包括對紅衛兵小將的意見，我們已經講了，他們會給你們讀，所以我們在這兒不準備多講話，主要是來跟大家見見面。我們來跟同志們見面，是表示我們對濟南的山東的紅衛兵小將們的支持，你們可以相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永遠會和紅衛兵小將們在一起，同時，我們也經過你們來表達我們對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支持，對王效禹同志的支持。因為山東革命委員會是山東省革命群眾，革命的領導幹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種革命力量加在一起。經過長時間的英勇鬥爭得來的勝利果實，這個勝利果實不應該被任何人所破壞。問時，我們昨天也和一些同志談了。我們希望大家能夠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就是對我們地方同志來講就是擁軍。對幹部隊來說就是愛民。這樣就是把擁軍愛民的旗幟大家高高舉起來。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的命根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依靠我們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奮鬥所得來的。我們最主要的是靠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著我們的祖國。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像現在這個樣子來搞。所以，我就這一點無論如何要記住。再呢，我們的革命委員會，我們的勝利果實也要靠解放軍來支援，來鞏固，沒有軍隊的政權，是不存在的，沒有人民解放軍的支援，我們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人民解放軍在工作裡邊，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做出了偉大的貢獻，這是主要的方面。（會場高呼：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熱愛解放軍！）

剛才喊得對！我們那天和部隊同志講過，我說：你們應該懂得，最熱愛解放軍的是紅衛兵小將，不要因為街上有那麼幾條標語，好像對你挺恭維，說你頂好，頂好，那個東西不可靠，最可靠的還是我們小將。

所以同志們，當然我們解放軍在工作裡面有缺點、有錯誤，這個是在任何一個工作中，任何人做事情都是難免的，都會有缺點有錯誤。所以現在我們一方面要使得別的人看我們紅衛兵小將的時候，我們要告訴他，你要看大方向，你要看主流。這個我們天天講，經常講。誰如果要是把我們紅衛兵小將們的缺點錯誤誇張起來，那我們是堅決反對的。那麼同樣的呢，如果我們對解放軍的工作，我們也是應該看他的大方向，看主流，不要把缺點錯誤誇張起來。有缺點，有錯誤，如同看到自己的缺點錯誤一樣，我們就會感到痛心。我們要想一切辦法，熱情地、誠懇地說明他們改正這些缺點錯誤。而且我們相信他們可以改正。我們覺得，我們國家所以有力量。就是經過這個文化大革命，把我們全國革命人民的積極性，充分發動起來了。人民覺悟越來越高。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越來越高。這是一個最根本的保證。那麼再加上我們有大批的領導幹部站到革命人民方面。這兩種力量還不夠，還要再加上人民解放軍，這三種力量缺一個不可。缺了一個，我們的革命就無法進行。只有群眾沒有領導幹部可以嗎？不可以。只有領導幹部沒有群眾他算什麼領導幹部呢？單單這兩個力量，沒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做我們的後盾，我們還不是有力量。這三個力量加起來，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就無敵於天下。

本來我不準備講話了，但是，好像見了面嘛，就有些話要說，所以就說了那麼多。最後我祝山東省大中學校紅代會開得完全成功！祝同志們，你們回到各個地區，回到本學校、本單位以後，能夠把你們那裡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讓我們大家共同地把文化大革命，經過我們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好！⁵⁴

⁵⁴ 紅代會北京化學纖維工學院紅旗動態組，1967.5.14；工代會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革命職工造反總部翻印，1967.5.19。

張春橋、姚文元、杜平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1967.5.14.）

【地點：南京；杜平：江蘇省軍管會主任】

張春橋講話

革命的同志們，親愛的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同志們好！（掌聲、口號聲）

我們這一次到南京來，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叫我們來的。（掌聲、口號聲）我們帶來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南京和江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無限的關懷。（掌聲、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早在2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彙報工作的時候，毛主席那個時候就指示我們，說你們回到上海，要關心一下江蘇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兩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們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們能夠關心這一方面的事情，能夠對江、浙兩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所幫助，對於這兩個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能夠有所幫助。我們接受這個任務以後，感到很光榮，應該來看望同志們，但是，那個時候上海的事情也確實忙亂一些，一直等到3月底，我們說再不來不行了，我們下決心到南京來了，火車票也買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電話來，要我們馬上到北京去。我們就估計到，江、浙兩省我們一次也沒有去呀！見到毛主席是沒法交帳的。果然不錯，我們到北京以後，第二天，向主席彙報工作，主席見我們的頭一句，就說：你們沒有到南京去呀？（掌聲、口號聲）這是毛主席對我們兩個人的批評，同樣，也就是毛主席對江蘇的關懷。（掌聲、口號聲）

這一次，我們要走了，我們就向主席請示，說我們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麼指示？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們不來吧！主席就把路線給我們劃清楚了。（掌聲）就說你們這一次回去，先到濟南，然後到南

京，然後到上海，然後到杭州。（掌聲）同志們，上次主席給我們的任務，我們沒有能夠及時地堅決地執行，犯了錯誤，這一次最高統帥的指示，我們就堅決執行，有錯誤就改麼！（掌聲）所以，我們這一次就完全按著毛主席指定的路線，到南京看望同志們了。（掌聲、口號聲）

我們到這兒來，是來向你們學習的，是來做同志們的小學生的。（掌聲）我們到這兒剛剛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這個七天裡面，我們和南京軍區的同志、省軍管會的同志見了面，談了話，交換了意見。但這個時間花的不多，我們主要的時間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組織的領導人談話、開會。同時，看材料，看信，看你們的傳單。我們的桌子上，從這裡算起，大概這麼一堆吧！我們看了，當然還沒看完，因為天天往這兒送來，剛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來了。我們也到街上去看了你們的大字報、標語，也參加了一點辯論會，不過他們不認得我們就是了。（掌聲）我們沒有參加，光聽了。也看了你們打架，打的挺熱鬧。你們武鬥這幾天可是帶勁哪！真是鬥得上勁啊！我們就是看了這麼許多，談了這麼許多。從這中間受到很多教育，學習到很多東西。不過，時間總是太短了，同時我們的水準實在很低，毛澤東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觸到的群眾也很少。一句話學習得不夠，調查研究還很不夠，還沒有發言權，或者只有很少的發言權。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見我們，要求跟我們談話。如果我們都接見呢，而且都要求單獨談，那我們時間實在安排不過來，最後也想啦，還是像今天現在這樣，大會上咱們見面談話吧！

我們到這兒，很多同志問我們，現在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怎麼樣？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象，總的來看，是大好的。特別是4月初開始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黑《修養》以來，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鬥意志更加旺盛了，鬥爭更加深入了。可以說現在這樣一個局面，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這樣一個大的批判，最大規模的批判，促進了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領會毛澤東思想，也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革命的大聯合。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

心。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新勝利。原來所預計的，2、3、4、5幾個月就可看出眉目，那麼這個眉目，現在我們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個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外，還有一些省市已經建立了籌備小組，他們現在接受了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的經驗，他們的工作現在做的細緻一些，準備得更充分一些。從報紙上看，好像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少哪！實際上都有進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經曲折比較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較大，那些地方現在的局勢也都在改變。所以，整個形勢是很好的。生產形勢，也是好的。全國的農業今年整個形勢都很好。北方，往年總是春早，今年，華北地區、濟南地區我們看了，山東地區我們也瞭解了一下，整個山東地區、華北地區、東北地區，今年春天都沒有發生旱，只有少數地方有旱，雨水比較好。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廣大的農村幹部，貧下中農，公社社員，他們的革命積極性更加高漲了。所以，今年農業形勢是好的。工業生產整個形勢也是好的。那麼這樣子，我們吃飽了飯，就可以放手鬧革命。當然，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各個地區所面臨的任務，所碰到的問題也不完全一樣。有的地方是發展的順利一些，往前走的遠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這個倒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事情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平衡。也可能現在發展得比較順利的地方，過一個時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難，發生反復；也有可能。這是講全國。

那麼江蘇省的形勢究竟怎麼樣？這個問題當然是應該你們答覆囉！是應該我們問你們的，你們知道的比我們清楚。我們從這幾天接觸中間，和根據我們過去的瞭解，我們覺得總的看，江蘇的形勢也是很好的嗎！生產的形勢也是好的。比如4月份的生產，3、4月份都好的，5月份有一點問題。革命的形勢呢？無產階級革命派在省軍管會的領導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軍駐江蘇的部隊，在南京軍區的領導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對於地方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應該說比起軍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掌聲、口號聲）

同志們要我們對這裡的工作發表一點意見，我們這個意見很難提，

因為事情還沒有完全瞭解清楚。不過我們也感覺到有些問題，想提出來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這樣的問題。關於工作，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前的任務、工作，這些，《人民日報》的社論、《紅旗》雜誌的社論，黨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都說得很清楚了，我們不想做全面的講解，我們只想說這麼幾個問題。我和姚文元同志有個分工，我說兩個問題，他說一個問題。（掌聲）因為剛才都是講的好聽的話，你們都鼓掌，我下邊的話有的不見得那麼好聽哪！（掌聲）不過我還是希望不管我說的你們願意聽還是不願意聽，希望你們還是耐著心聽一下。（掌聲）

同志們，你們看看我們這個主席臺，主席臺這兒為什麼都是當兵的呢？你們當然可以得出一個答案，因為是軍管會麼，所以都是當兵的。但事情不是這麼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給你們的各個組織的負責人談話的時候，他們都要我們跟大家見見面，講講話。我們就有一個建議，說這個會可否由你們雙方聯合召開。他們當時說可以，我們說到會場上會不會打架呀？他們說保證不打。那麼結果呢？一直協商啊，協商，沒達成協議。所以，最後由軍管會的同志來主持開會。那麼你看，又是好事由軍管會來主持開會，你們想鼓掌，但是，我舉這個例子並不認為這是個好事，就是革命群眾組織呀！這種對立呀！相當深了，同志們啊！就是都上一個主席臺都有點困難了。按這樣子搞啊，我看你們這裡成立革命委員會呀！那就要相當長了，就一直是當兵的坐在這兒了，就是我們這些穿軍裝的坐在這裡，那麼這個老百姓上不來。或者一上來麼就吵架！就從這兒說起吧，我的話就從這兒說起。

請同志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革命鬥爭的大方向問題。在江蘇地區，首先在南京，我們是不是緊緊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會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到會的，也希望你們散會以後，跟他們一塊，鄭重其事地來想一下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緊不緊？這是頭等的問題。什麼是我們的大方向呢？這個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講了，《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的社論也講了。就是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現在正處

在奪權的階段，全國還都是這樣，都是正在奪權，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權，現在是處在這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我們當前的大方向，就是要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開展革命的大批判。這個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區、本單位的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合起來。經過這個革命的大批判，來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這樣子來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就是我們當前的必須緊緊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簡單地說，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就是要掌握這幾個東西。那麼，我們來看一看這裡究竟怎麼樣，你們掌握的怎麼樣？我們問過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認說掌握的不算太好。我們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們街上的標語呀，大字報啊，真多呀！那倒不是冷冷清清，而是熱熱鬧鬧的。但是，這裡邊究竟那一方面多呢？批判劉鄧的有多少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不多。你們當然也可以批評我們啦，說我們有一些，你們沒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說一句，你們那些最重要的貼標語、寫大字報的地點，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們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幾乎都去麼，我們來到的當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報、大標語，因為這非常靈。到一個城市，你轉一圈就知道這個地方當前最關心的是什麼，我們一看，你們對劉鄧不大關心，你們關心的什麼？這一個派說那一個派某某人是罪魁禍首，某某人是罪責難逃啊！那個都是小廠，以廠為單位貼來貼去。當然一個廠的事情麼也是國家大事囉！但頭等的國家大事是什麼呢？是批判劉少奇麼，是批判劉鄧，這是總後台麼，如果把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地摧毀啦，你那個廠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啦。如果你那個廠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劉鄧上臺，同志們啊，你那個廠的天下就維持不住，那維持不住的。你們的廣播站我們也聽，一直到深夜，還在廣播，也都是兩派互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聽不到你們批判劉鄧。這個我覺得我不冤枉你們。這是講全國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你們這個批判究竟怎麼樣？我們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蘇省的。據說都進行了一些，前天還為了搶彭沖打了一架。說是進行了一些，但是，我們看不是那麼集中，就是全

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對劉鄧對舊省委，你們的精力呀相當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們看那些標語我們不知道，劉少奇這個我們知道的，你們那些標語上的那些人名啊，我們只有幾個人知道，文鳳來呀，曾邦元呀，這幾個人知道，其餘的都是一個廠裡邊的什麼某某人，那標語寫那麼大，比劉少奇的名字都大，是這樣的一個局面。這是講大批判。

那麼大聯合啦，同志們，我們在街上幾乎沒有找到一條，我到現在也沒找到一條，就是講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樣的標語。倒是這一種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麼反革命。這些你們大家都沒辦法來解釋吧，這個地方兩派都不能上臺，這是最現實的啦！今天開個會，希望你們兩派的負責人到臺上來主持會，那麼你不來主持會，如果說主持會還有個問題呀，誰來當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頭的，那麼要軍管會的同志來主持，你坐在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這個無產階級政治家都是這樣子的氣度，還叫無產階級革命派呀！你們看看五一天安門上那個名單，毛主席是什麼氣度，什麼樣的人都讓他上了天安門麼。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為我們大家的領袖啊！（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你們這個樣子，你說怎麼當權呀！同志們，奪了權掌權就是這樣子掌法呀？我看危險呀同志們。現在武鬥麼還是不斷，而且發展到絕食，不但發展到絕食，又看到一個傳單，要三絕，絕食、絕水、絕醫，就是不但吃飯，而且不喝水，那麼如果不吃飯不喝水不是身體就不行了麼，醫生要來給看病即絕醫，不准看病，這個傳單我想念，許多單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對這個傳單！（掌聲）同志們你們看，我為什麼要反對哪！我們毛主席率領我們紅軍，率領八路軍、新四軍，率領人民解放軍和敵人作鬥爭的時候，什麼時候要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絕食過哪！（掌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應該是吃飽了飯，睡好了覺，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敵人，咱們就和他鬥，拚死的鬥。（眾：對！）何況你們，我下面還要講，你們現在絕食已經發展到不是對敵人！（眾：對！）這樣一些現象能夠說我們江蘇的首先是南京的鬥爭符合黨中央所規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嗎？能夠說這是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前

進嗎！我們認為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軌道上的前進的。（掌聲、口號聲）同志們，革命的大方向，這不是我們自己隨隨便便來決定的，不是我認為這一個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認為這一個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確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據客觀的實際，根據社會的基本矛盾來決定的。

我們江蘇地區和全國一樣，江蘇的基本社會矛盾是什麼呢，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掌聲、口號聲）同志們，就是說這一個矛盾，我們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認這是基本的社會矛盾。江蘇並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這一個，新疆也是這一個，黑龍江也是這個矛盾，這是全國的共同的矛盾，江蘇難道說例外呀！說江蘇這裡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是什麼文鳳來同曾邦元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們能夠得出這個結論來嗎？（眾：不能！）這一個基本矛盾它就決定了，為瞭解決這個矛盾它本身就提出來究竟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是革命的對象，要打倒誰，要聯合誰。離開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沒辦法來分析問題，我們就不能確定正確的方向，就不能夠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就不能夠把我們的隊伍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現在看起來，你們這裡好像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頭腦裡邊淡薄啦，模糊啦，混亂啦，鬥爭的矛頭不是指向劉鄧，不是指向舊省委，而是兩方面互相指向。兩派交給我們那麼多材料，這些材料裡邊，揭發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發劉少奇在江蘇的罪惡的一本沒有。大家都知道麼，劉少奇在華東地區，首先是在江蘇地區，影響是很深的呀！同志們，他在江蘇工作了很久，在這個地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影響很深啊！可是我們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劉少奇你批你的，我的興趣不在劉少奇，我是在文鳳來，曾邦元。給我們絕大多數的材料，都是這一派揭發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們，我在這裡在我們同志之間我可以說，要是過去江渭清搞這麼多材料，哎呀可寶貴啦！他搞不到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搞你們的黑材料搞不到這麼多啊！但是，現在我們彼此之間就揭發，我說他背後有什麼

人是後臺，他說他後臺是誰，他幹了什麼壞事。

究竟那些事實是不是事實，老實說，我們兩個不願意查，我們不願意聽那些東西，因為我們覺得這離開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間，下面我還會講，就是對方犯了嚴重錯誤，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用這種辦法互相揭發，都弄到街上，貼到街上，究竟誰高興啊！老實說，我們開了幾天會，看了這幾天的材料，我們心裡很難過，我們心裡很痛心啊！怎麼兩個革命派會搞成這個樣子。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材料來看，我們根據這些材料還不能夠證明兩派中間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們認為3月5號中央在接見江蘇省兩個代表團的時候，那個時候所作的評價，就是兩派都是革命組織，這個結論仍然是正確的。（口號聲）當然，同志們，現在哪，我們當然也需要仔細的分析一下，特別是因為兩派的組織都不是原來最初那個時候啦，也甚至於不是後來在3月那個時候，因為後來都有些發展，在發展中間有沒有一些問題，那個需要具體的分析，但是，不能夠因為這一點，因為基層組織有了一個問題，或者某一個組織有了問題，甚至於說某一個大組織他的某一個負責人出了問題，那麼就得出一個結論說這一個組織整個是壞的。如果根據這樣的邏輯去推論，那麼一個外國人跑到中國一看，說你們中國共產黨出了那麼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且原來你們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就是個壞蛋，因此判斷中國共產黨是個壞的黨，那你們同意嗎？（眾：不同意！）所以不能夠這樣形而上學的不作階級分析，不作具體的分析，這樣子來判斷一個組織，以至於從這裡得出結論進行互相攻擊。根據你們給我們的材料，我們剛才說啦，我們的判斷是這樣，我們就不能認為現在兩派互相攻擊的作法是正確的，而是認為兩派應該根據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間，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眾：對）

同志們，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一段語錄，我們同志們大概在各種會場裡邊，或是在日常的學習裡邊念了至少幾十次，幾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體問題，就恰恰忘記了這是一個首要的問題，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在3月5號中央的同

志接見江蘇的兩個代表團的時候就已經很嚴肅的指出來了，那個時候我們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談話的要點告訴了我們。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狀揭發中間就把這個記錄，說這個本子和那個有什麼不同，說傳達的本子如何有差別，都給我們啦。那好吧，我們就把這個本子，也看一遍，那個本子也看一遍，我們看的結果，我們覺得大家爭論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問題，根本不需要爭論的問題。但是，中央所指出來的最關緊要的問題，你們都不爭論，都不重視，中央那講話裡邊最關緊要的東西，都丟在一邊啦，枝節問題爭的一塌糊塗，爭的面紅耳赤。總理也講啦，康生同志也講啦，其他同志也都講，裡邊著重的說過一個就是敵人朋友的問題，特別是康生同志講的時候，根據記錄上講，有的加了注解，說當時康生同志非常嚴肅地很生氣地講了這一段話。我和姚文元同志我們兩個說，要我們講話我們講什麼，我說就把過去總理和康生同志講的話再念一遍就夠啦！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同志們，我們希望今天這個會後，你們不管那個本子，你們把兩派自己的記錄本都拿出來看看，你們看一看中央同志講話的要點究竟在哪裡，是勸你們大聯合哩，還是勸你們大分裂，是勸你們回來要各自批評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哪，還是要你們各自攻擊對方。就是講要各自批評自己的缺點，自己批評自己，不要去批評對方，著重的要批評自己，這個是我們不但是對江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最近接見了十幾個省的代表團，統一的方針，話都是一樣的，就是那幾句話，都是要凡是發生這樣的兩個革命組織之間的問題，中央的方針，都是要他們回去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查自己的缺點錯誤，這是行之有效的。歷史的教訓，就是擁軍愛民。抗日戰爭時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個時候就規定啦，軍隊和地方發生了問題，怎麼辦？就是開這種會，軍隊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地方開會只批評自己，不批評軍隊，雙方進行自我批評，一個擁軍，一個愛民。現在我們解決當前，下邊我簡單的會說到，解決當前的擁軍愛民問題，也採取這個辦法，革命組織之間，革命人民之間，革命的同志之間，發生了問題，用這種辦法最好，中央給你們方針也是這樣啊！希望你們回來批評自己，中央給我們打的電報裡邊，同時也是給江蘇軍管會的電報，

也是這樣說的，這一段話我還可以再念一下，這個不是你們的記錄，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各自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在原則一致的基礎上，團結一致，枝節問題的分歧，應求大同存小異，原則分歧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討論，革命派團結起來，揭露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中央給我們的談話要點裡邊的第五點就是這一點。這個是中央正式通知我們的。也通知了江蘇。

但是，看起來，從北京回來以後，你們雙方恐怕都沒有堅決的按照中央的指示來作，相反的據說憋了一陣，不是進行自我批評，而是憋著，憋了一個月，到後來說是憋不住了，還是幹吧，這樣子搞來搞去，就把鬥爭的矛頭始終沒有能夠端正。在這裡我們就想說幾句，有這樣的意見，我們感覺到，本來江蘇的形勢是很好的。在某一種意義上來說，在1月3號事件以後，那個時候的形勢比上海還可能好一些，因為我們看一看歷史麼，你們南大在全國大學生站出來參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幾個學校中的一個吧。總理上一次接見你們的時候不是也講過嗎，那時候就是三個大學站出來最早啊！北京大學，南大，西安交大。你們南大比上海的大學生站出來早，南京、江蘇的工人建立大的組織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為早麼還是這裡先建立，建立啦江蘇沒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後來上海因為中央那時候派我們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後，江蘇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點，差一天的時間麼，但是，建立還是你們江蘇的早。江蘇工人、學生、機關幹部組織起來，發動起來的數量比上海不少，你們同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的鬥爭進行得也很英勇，很艱苦，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特別是在和赤衛隊作鬥爭的時候，那是一場非常大規模的戰役啦，幾乎是從杭州、上海、蘇州、無錫過來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個全線大戰，12月底1月初哇，那個時候是這樣一條鐵路線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衛隊同時進入了戰鬥，肩並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12月底我們還在北京，接到的電話，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給我們打電話、打電報、蘇州、無錫、南京，我們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

們就看到是那麼一個大規模的鬥爭，當時革命派團結得多好啊，多麼大規模的聯合啊！（掌聲、口號聲）

我希望同志們冷靜地聽聽我講的話。應該說，我有許多話是給你們的領導人都說了的，但是沒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這裡再一次講！那個時候，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肩並肩的在一塊兒鬥爭，我們腦子裡想的是什麼，我們是對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不管遇到多麼艱苦的環境，我們相信毛主席支持我們，我們任何困難都能夠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蘇的也好，只要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就能夠聯合起來，就能夠站在一條戰線上，進行共同的鬥爭。但是，這種形勢現在好像同志們都忘記了，為什麼不再回憶一下我們共同在一塊作戰的時候那種深厚的階級感情呢！為什麼會忘記了我們戰鬥的友誼哪！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眾：對！掌聲、口號聲）

同志們，在12月底，1月初，那個時候的形勢，我剛才講，老實說，南京的形勢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說我在上海工作就說上海的好話，同志們不是這樣，我現在也在江蘇工作，我沒有這個本位主義。（掌聲）但是，現在我們比一比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承認南京比上海落後了一些呀！（眾：對！口號聲）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比江蘇前進了一些，當然，我剛才講現在形勢比你們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驕傲啦，也可能出大紕漏，將來落後你們，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們再去算那個賬，今天在這裡不講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勢好一些，據我們看，就是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和赤衛隊作鬥爭中間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聯合沒有遭到破壞，相反的，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引導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關懷之下，鞏固和擴大了在戰鬥中間形成的革命的大聯合，而且他們實現了革命的聯合的奪權。在這個過程裡邊，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並不是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雖然也有幾個組織，個別的組織，有的是比較大的組織，曾經從他們小團體的利益出發，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鼓舞之下，他們幹了一些轉移鬥爭大方向這樣的事情，但是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

的捍衛了這個大聯合，使大聯合沒有遭受破壞。

上海的奪權，也不是那麼順利，同志們大概如果從報紙上看，好像上海一次就奪下來了，實際上我們算了一下，上海奪權，大概奪了五次，就這個中間，我們認為處理的比較正確，第一次兩個單位去奪的，兩個單位，一個工人組織，一個學生組織，他們兩家突然在一天晚上，1月14日，比你們早，到了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這幾個機關，宣佈奪權，他把華東局也奪了。我們發現了這個情況，我們就找了他們，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們，就說你們這樣子兩家奪不行吧，你能夠奪得下來呀，我們是勸了他們，他們這兩家說，那怎麼辦哪！他們一看是奪不下來，只佔領了幾個電話機子。第二次哪，又有四個組織，這四個組織都是大組織，四個最主要的組織，他們也是深更半夜，去奪啦，奪了以後呢，而且通告都準備好了，但是報社的同志打電話給我們，這些事情他們都沒有通知我們的，打電話給我們說要登這一個通告。我們就說，這樣不好，通告堅決不登，由我們來說服他們，我們就說服他們，說無論如何你們四個組織固然已經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數，按人數來說，但是你們這樣子，權奪不下來，奪下來以後也掌不了權，掌不好，要搞還是搞大聯合，還是把一切能夠參加奪權的單位都參加，這一些同志總算好，聽了我們的話，沒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兩個大一點的組織，還有五、六個小組織，他們又去奪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權，那當然還有幾十個組織去奪華東局的權，這些我們都說服啦，我們說只能大聯合奪權，不能夠一部分單位奪權。一直到2月2號，這一次總算是奪了，就是三十八個單位已經聯合了，三十八個單位聯合，他們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員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打電話給我和姚文元，說我們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們報喜。我們說你們怎麼來的這麼快呀，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他們說明天開成立大會，你們來參加，現在我們就向你們報喜。我說這個事情要報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們就給中央打電話，說上海三十八個組織今天晚上宣佈奪權，宣言、委員都弄好啦，要向我們報喜，我們準備到他們那裡去給他們談一談，去接受他們的報喜，同時請中央考慮還有什麼指示沒有。這個就是第四次啦，

我們到那裡當然大家很高興，我們也祝賀了他們，然後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電話給我們，說這樣子不好，就這樣子沒有「三結合」，他們搞得成啊？我們說「三結合」市委沒有人站出來啊！中央當時就做了一個臨時決定，張春橋、姚文元參加好了，為了支持革命群眾，因為我們原來也在上海工作嗎，也算上海的革命幹部。然後我們就馬上打電話通知三軍，請他們參加，由我們來邀請了。然後我們再把三十八個單位的負責人找來，跟他們協商說，請你們明天不要開大會。先通知他們，中央決定要我們參加，他們當然歡迎。我們說，既然你們要我們參加，宣言總要讓我們看一看吧！你們的委員咱們還可以協商一下吧！大會是不是明天不開，遲幾天。不過因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聯合沒有破壞，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決定推遲，我們就連忙連夜地忙著幾天，給他們搞宣言，搞委員名單，籌備新的成立大會。那個時候就發現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級的革命組織就有一百多個，那麼現在只有三十八個，其餘那些組織怎麼辦？而且已經有個消息，他們要成立第二個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嗎，那我們再成立一個公社，那就兩個政權怎麼辦呢？這個矛盾就很尖銳啦！我們當時是這樣處理的：一方面，說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個單位，說把你們這三十八個單位，不叫做組成單位，不是說我們三十八個單位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發起單位，其餘的各個革命組織，都可以參加，我們不過是發起。這樣子不就是處於主動地位了嗎！就不是我們獨佔了。他們就同意了。就是說：不是組成單位；另外，我們又去說服剩下的要組織第二個人民公社的幾十個單位，找他們代表來，就說：你們是不是不要另外組織一個了，因為已經有一個嗎，上海只能有一個政權，怎麼有兩個，他們那三十幾個單位。叫做發起單位，你們稍後參加，因為還有爭論嗎，有的說你是老保組織，有的說你是什麼大雜燴，那麼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討論一下。這個理由不能完全說服他們，他們就要求無任如何當時要參加。後來有兩條，他們在這兩條下同意了，一條我們就說，那你們要考慮一個問題，中央已經決定我和姚文元參加這個上海人民公社，我們不能參加兩個啊！我們參加這一個，你們再成立一個，我

們不參加，中央不批准，你們怎麼辦呢？你們不是很被動嗎？他們想一想這個是。第二嗎，我們這個成立大會你們都可以參加，成立大會都可以來嗎！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組織，我們說他們的群眾可以來參加慶祝會，有什麼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因為是慶祝嗎，所以，這樣子沒有再引起大的波動，還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聯合。所以說，上海的形勢為什麼比較穩定，發展的比較順利，不是波浪那麼多，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那裡的革命大聯合，是在不斷地鞏固和發展，雖然中間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點錯誤很多，但是因為革命的大聯合鞏固和擴大，所以形勢就比較好。這是在1月11號中央給上海各個革命組織的賀電裡面明確地講到的。我們上海就是根據中央這個賀電，1月11號的賀電，那是給我們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把一切能夠團結的人團結起來，這個賀電講了嘛，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所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各個革命組織的賀電，成為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整個革命行動裡面遵守的原則。

那麼，江蘇今天的形勢，我們覺得問題也就在這兒。就是因為沒有能夠鞏固這個大聯合，相反地你們的聯合發生了破裂，你們不是聯合奪權，而是一派奪權。在中央對這個問題上作了耐心幫助以後，在3月5號中央的同志講話以後，在實行了軍管以後，我們感覺到，你們沒有能夠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彎子轉過來，認真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把缺點和錯誤糾正了，走上正確的軌道。我們感覺到這個狀況是不好的，是相當危險的。所以，我們建議你們把中央的講話再好好地學一學。我們感覺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數同志，現在頭腦裡面敵人的觀點淡薄了，甚至忘記了，好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睡覺了。同志們，你們要知道他們沒有睡覺，他們是不甘心下臺的，他們還是想復辟的。我們不能夠對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抱有任何的幻想，不經過鬥爭，勝利果實到了手裡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們自己種出來的桃子吃起來也是不甜的。要經過艱

苦的鬥爭，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全國的頭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江蘇的、南京市的、無錫市的、蘇州市的……統統把它打倒，那樣子我們才能夠奪好權、掌好權、用好權。我們感覺到，在南京、江蘇，在我們面前有兩個方針，兩個前途，一個方針就是中央所規定的方針，就是要緊緊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江蘇省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促進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如果沿著這個方向前進，那麼我們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準備以後，我們就可以建立省一級、市一級和各個單位的「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那麼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一個方針，一個前途。

另外一種方針，一種前途，那就是違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辦，離開鬥爭的大方向，你打倒文鳳來，我打倒曾邦元，就這樣幹，不批判劉少奇，不批判江蘇省江渭清等等這些人，不去搞大聯合，不去經過鬥爭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就使得我們一天天在這裡兩派之間鬥來鬥去，不把對方打垮，不把對方打倒，就誓不甘休，那麼這樣子很可能兩敗俱傷。你們兩派，同志們我們想到的一點，這個話我們可以不说，但是我們為了請同志們清醒起來，我們跟你們講，有危險，搞的結果，你們兩派，如果那一派希望把對方打倒，我們的判斷是做不到的。（掌聲）但是，同志們，你們要看到，這樣的鬥爭中間，你們兩派鬥，保守勢力就要抬頭，就要利用這個形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要利用這個形勢，那麼，資本主義就可能復辟。我們相信，南京和江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你們兩派的同志，會選擇第一個方針而反對第二個方針的。（掌聲）我們相信，你們會選擇第一個前途（掌聲），而絕不會走第二個前途的。當然，你們已經選成今天這個局面，馬上解決相當困難，要想一致聯合起來不容易。那雙方就應該有誠意，有團結的願望，有聯合的願望，凡是對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對革命的大聯合不利的話不講，想一切辦法，促進雙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一次都解決嗎，先從局部解決也可以，或從一部分解決也可以啊。比方說，批判劉少奇，這一條我看沒有理由反對吧！打倒劉少奇，這個有什

麼能夠說不能聯合，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說我打劉少奇是為了另外的一個目的，沒有嘛！一千條理由，一萬條理由，我看都找不出來，只能找出一個，可以聯合起來批判劉少奇嘛！這個有什麼不能聯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聯合的吧？

我現在提一個問題，在這裡今天不要求你們馬上答覆，江渭清在北京，前天總理寫個信來，給我和姚文元，就問，你們這裡有些要求江渭清回來開鬥爭會。總理要我們在這裡看一看，現在回來，究竟是否適合時宜？我們兩個看一看，覺得不是時候，你把個江渭清搞來幹什麼呢？看你們打架啊！看你們在打架，他才高興呢！開個鬥爭會，也不是兩家開，一家開一個，開的時候說不定另外一派來了，要搶他走。那個，江渭清高興啦。我看，你們什麼時候聯合有點眉目，我們再考慮這個問題吧。這個事，不要你們馬上答覆，請你們想一想。我們現在也沒有答覆總理。還有嘛，比如說，在某些問題上，在這些大的問題上，可以完全採取聯合行動嘛，在一個單位裡面也可以嘛。一個工廠裡有兩派，我們共同來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們共同來批判劉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於在一個學校、一個工廠，兩個組織看來看去完全沒有理由分裂，而應該聯合。為什麼不可以聯合？如果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機關，原來屬於兩派的，或者屬於幾個組織的，現在要聯合在一起，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應該得到他們上級組織的支援。為什麼不支持呢？如果大家都主張大聯合，下面要求聯合了，我這個上面組織本來就應該促進你們聯合，而你們真的聯合了，我應該支持。我可以在這裡說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們的態度，我們支持你們各種形式聯合，包括你們基層自己的聯合。（掌聲、口號聲）因為只有這樣的聯合，你們才有希望開工代會，開紅代會。否則的話，那好，將來你看，大概是兩個或三個工代會，兩個或者三個紅代會。那最後怎麼辦呢？兩個三個革命委員會呀？省、市可以幾個政權嗎？我們建議你們考慮這些問題。為了創造聯合的氣氛，我們建議你們能夠首先停止武鬥，不要再打嘛！你們要想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用拳頭打倒啊？那個是打不倒的，他的影響，黑《修養》的影響是在人們的頭腦裡邊，你把人頭砸爛了，

影響在另外一個人頭腦裡還存在，這個只有經過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腦筋，就要動腦筋。現在同學們啦，我看你們也是這個神氣，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鬥，手就是癢，你要真批判一下劉鄧啊，就艱苦一點兒了，就要好好地看點兒東西，寫一點像樣的批判文章。

劉少奇上個月還說，現在發表的文章，一篇也沒有能夠駁倒他的。南京的同志們，你們聽到這個話，你們很高興啊？你們服氣啊？（口號聲：打倒劉少奇！）我們希望你們這裡寫幾篇能夠把他批倒的文章出來。你們南大是有名的大學嘛，為什麼不應該寫幾篇好文章啊？那個比拳頭困難噢，另外，我們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建議各個組織，都要警惕一個問題，或者說要正確處理和幹部的關係的問題。現在，我們發現這樣的現象，一是有些幹部，現在不敢站出來，說站出來，你們兩派，要站在那一邊呢？站在這一邊，那一邊就要揪。這個在別的地方我們也發現過。到你們這兒一看，你們這兒特別尖銳，這個問題非常突出，這個問題你們如果不大聯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幹部不好站出來，站出來日子也不好過。這個當然希望你們大聯合，同時現在你們如果有聯合的願望，就不要把某一個幹部拉在自己這一邊兒來，說只准他在我這邊，不准到那邊去。你們也不要希望哪一個幹部站在我這邊，給我撐撐腰，我就有力量了。那個不好，同志們，革命群眾組織最大的撐腰的是我們的毛主席！（掌聲、口號聲）我們也希望革命領導幹部，在這樣的一個比較複雜的局勢下邊，也要站出來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邊這個問題上，要十分謹慎。因為這裡面，我們看可能兩種或三種情況都有，有的確實是要站出來造反的，那麼，他要站在一邊，就要加深你們的分裂，這不是他原來的願望。但是，也可能有這樣的人，他稀裡糊塗就站在那一邊，造成你們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們的分裂，就宣佈站在那一邊。所以，我們希望所有革命的領導幹部，真正的革命領導幹部，要謹慎地處理這個問題。否則，就不能不使人懷疑，他還在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我們任何一個革命領導幹部，只有促進革命大聯合的義務，沒有破壞或妨礙革命大聯合的權利。（掌聲）

中央明確地規定過，不能夠在兩個革命組織之間，支援一個，排斥一個。有人想用這個方法來保護自己，那我們就明確地勸告這些人，這種辦法保護不住你的，最後革命的小將們會識破你們的面目的。（掌聲）我們希望南京和江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好地考慮一下中央3月5號給江蘇的那些指示，也參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這些建議，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靜下來，你們用那麼三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裡想想這些問題，好不好呢？（眾：好！）如果你們想的結果，說張春橋今天講的都是胡說八道，我們還是要幹，那我們沒有辦法，你們打你們的。這是關於大批判、大聯合和「三結合」的問題。

我再說一點，關於擁軍愛民的問題。這就很少了，因為這一方面報紙上的社論，江青同志的講話，說得很清楚了。擁軍愛民的問題，我們覺得南京部隊從老早，實際上不是現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創造了比較好的典型。（掌聲）他們是從左邊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吳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邊。（掌聲）而他們的這個行動得到許司令員、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軍區的支持。我們認為，這是南京部隊的光榮，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榮。（掌聲、口號聲：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以後，在林彪同志的堅決支援下，整個南京地區的部隊積極地參加了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主流。（掌聲）當然因為時間短，沒有經驗，也有缺點錯誤，有的地方出的錯誤也不小，也不少。但是這些缺點錯誤，我們看，應該像對待紅衛兵的缺點錯誤一樣。（掌聲）同志們，紅衛兵小將們，不是也常犯錯誤嗎？也有缺點錯誤。但是，我們的十六條是怎麼寫的呢？是說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為什麼對老紅衛兵就另外一個標準啦！我們應該是一個標準。（掌聲）咱們都是兵，老紅衛兵，小紅衛兵，都是一樣。錯誤有，下決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徹底越好。他們現在也在改，而且我們這一個時期和部隊的同志接觸，他們在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方面，還是像我們解放軍的樣子。

我們應該記得，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離開了人民解放軍，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聲）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在這裡安安穩穩地開會啊？包括你們武鬥吧！（掌聲）沒有人民解放軍保衛著祖國，你們怎麼能夠在這裡武鬥啊？！國民黨能給你們自由嗎？可以打呀、鬧呀，可帶勁兒啦！如果人民解放軍出來干涉，一個一個都抓起來，你們就沒有這樣自由了。因為現在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是毛主席講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是最重要的條件，一個是毛主席的領導，一個就是人民解放軍，保護著我們在這兒搞革命。這樣一個條件，我們無論如何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有缺點，我們應該像對待自己的缺點錯誤一樣，熱情地說明他們，幫助他們來改正，不要把這些東西弄到街上去。（掌聲）我不是不要你們批評，對解放軍有缺點有錯誤，你們盡可以批評，大字報、小字報，當面談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聲）還有對軍管會，既然是軍管了，同志們這就是個嚴肅的事情，軍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夠那樣隨便地衝了。因為那是軍管了嗎？它是帶強制性的，它是軍事管制，是強制性的，這一點希望小將們碰到實在忍不住的還是忍一下。忍住嘛，有意見還是要講，要批評，包括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你們也可以批評。你們這裡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個口號嘛，我們當然不能叫他取下來，不過我們一再聲明過的，對我們中央文革的全體成員都可以批評。今天我和姚文元在這兒講話你們也可以批評，歡迎你們批評。批評有好處，如果聽到你們批評，我們會高興的，不會不高興。

同志們，你們大家要知道，江蘇這個地方，特別是南京這個地方，是很複雜的呀，是蔣介石的老窩。同志們，這一點，頭腦裡不要忘記。你們剛剛紀念過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為十八年，這個地方就都是我們的啦！這個地方有壞人，有敵人，他們會利用我們的缺點，利用我們的錯誤，利用我們的不當心，利用我們的疏忽，來挑撥，來製造事件。我們無論如何要警惕！我們相信，不管道路怎樣曲折，你們中間對立多麼嚴重，我們看這都是暫時的現象，你們會好起來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澤東思想會把你們聯合起來的。（掌聲、口號聲）跟著毛主席

席的路線前進，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掌聲）我們希望整個江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掌聲）也希望你們和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掌聲）我們全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聯合起來。（掌聲）這樣子，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我們偉大的祖國真正變成按照毛澤東思想建設起來的最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掌聲）我就講這一些，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同志狠狠批評。（掌聲、口號聲）

姚文元講話（略）

杜平講話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小將們！同志們！

剛才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給我們做了十分重要的講話，我建議同志們很好的討論，認真的執行。

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這次來南京，是毛主席派來的。（掌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江蘇省、南京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關懷！（掌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掌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敬祝我們副統帥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掌聲、口號聲）

江蘇省和南京市實行軍管以來，得到了南京市、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這裡，我代表省、市軍管會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向江蘇省、南京市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表示衷心的感謝！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掌聲）同時，希望你們今後繼續的幫助我們！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及時的批評！同志的批評是最大的階級友愛，我們堅決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在批評的過程中間正確的認識世界，並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國是一樣的，是一派大好形勢。（掌聲）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更高地舉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口號

聲：毛主席萬歲！）在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批判、大鬥爭中，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掌聲）只有革命的大聯合，才能更好地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開省、市委的階級鬥爭蓋子，集中精力打擊敵人；只有革命的大聯合，才能在幹部問題上徹底批判「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確地貫徹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為幹部站出來革命創造條件；只有革命的大聯合，才能清除武鬥，才能消除無原則的「內戰」，促進生產大發展；只有革命的大聯合，才能實現革命的三結合，（掌聲）我們是相信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士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是堅決要求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是堅決反對武鬥的，是堅決反對無原則的「內戰」的。（掌聲）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小將們！同志們！我們一定要用最實際的行動，熱烈的響應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號召，關於擁軍愛民的號召，（掌聲）組織起浩浩蕩蕩的文化革命大軍，為徹底地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為奪取南京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而奮鬥！（掌聲）

最後讓我們高呼：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萬歲！

我們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講話（1967.5.24.）

【摘錄】

張春橋講話

有了權力機構就可以進行鬥批改，不破不立，以後就要在破中立起來，破字當頭，立就在其中。學制要縮短，縮短幾年，哪些課不要，歷史還要不要？（有同學說，不要）不要歷史，你們怎麼進行批判，不學近代史怎麼批判《清宮秘史》？教學方面也要改，以前學生跟老師轉，教師叫學生幹啥學生就幹啥，不這樣就要扣分，不是像主席所說：教師跟學生轉。現在沒有現成的，除了課程外，還要學些什麼？主席思想都提出來了，要從實踐中來解決。

大批判還要搞一個時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繼續發表，我們要好好學習。實際這些給教改打基礎，這個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陸定一的一套還沒有動呢。

學校總是要辦的，學校如果不要辦了，那就好辦了，鬥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廠或農村去，鬥批改不是鬥批散、鬥批砍、鬥批走。你們在學校學了幾年，初三學了幾年，對於中學和小學的教改你們最有發言權，畢業班的同學有特殊的任務，教改怎麼辦？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慮一下，這樣，全國匯總給中央，中央就好辦了。

姚文元講話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規。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是對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中學紅衛兵的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愛護。……你們這兒已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單位，希望你們不要自滿，也不要鬆懈，能夠繼續把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搞下去，搞到底。因為中學生人數很多，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學的紅衛兵能不能夠組織起來，聯合起來，按毛主席的路線前進，這是關係到我們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中學的鬥批改，就是說，教育改革，也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怎樣更好地成長的重大問題。……你們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們這兒的經驗，全國登報和廣播，希望你們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⁵⁵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6.2.)

【摘錄】

張春橋講話

現在紅衛兵的確面臨著新的任務，鬥批改的問題也是歷史上沒有解決過的。我們十七年來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政策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沒有在學校裡深入下去。我們在這一方面花的代價要大一些。有些學校有共同的任務，又有不同的任務。文科與理科不一樣，文科鬥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學校裡培養「文學家」、「藝術家」，但不等於不要學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辦學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學怎麼教，歷史怎麼教。需要一批紅衛兵包括青年教師，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價。要像江青同志搞樣板戲那樣，付出巨大的代價。

姚文元講話

大學的鬥批改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主席講：一種可能徹底翻身，一種可能走回頭路，一種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個階段搞好，要打硬仗

⁵⁵ 教育部革命聯合委員會（革聯）主辦，《紅色教育中央首長談教育革命（第16期）》，1967年7月25日，第11、13頁。

了。當然，有沒有反復，這也難說。上海是全國所一部分，還受全國的情況影響。當然如果有反復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個關鍵，下面連高中，初中，小學要與工農兵結合，怎麼結合法？在全國當前還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這一仗打好了，以下幾仗才能搞好，這一仗打不好，下面鬥批改就動力不足，鬥本單位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對劉鄧的批判是一致的。

張春橋關於上海高校運動的講話（1967.6.17.）

【摘錄】

現在你們就像我們去年搞文化革命初期那樣，不知怎麼搞下去，要在實踐中想問題，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眼睛要看到新的苗子要出來，不要只看到逍遙派，不要重複過去當權派不看主流的錯誤。像同濟、新師大大聯合，新的東西就會出來，目前處於兩個階段的過程中，將會出現大量的新生事物。主要的精力，發現新生事物，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找出鬥批改的道路。可以大鳴大放、大辯論，我們就靠群眾運動，靠群眾的智慧，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後邊的仗是持久一點，又不是幾個月就打下來了，比不得把常溪萍、楊西光拉下來，那麼容易。

主席在去年7月就講，大學怎麼改？還不是靠大學裡的人？主席當時指著到會的人說：「你去行嗎？你也不懂物理學，不懂……」

要依靠群眾，從不是當權到當權，可能我們的群眾觀點不當心也會出問題的，不注意群眾，總想我們是高明的。現在最明顯的，各個省市委癱瘓了，農業收成還是很好的，可見人民決定著歷史的命運。原來很多人擔心，會不會收成受影響，沒有估計到充分發動群眾的力量。我們自己實在不行，完全靠你們。

張春橋接見浙江省「聯總」代表時的講話 (1967.6.24.)

【1967年6月24日下午2：30~3：30，摘要】

主席為我們提供了多少豐富的經驗

毛主席就是比我們高明不知多少倍，北京「聯動」，就是主席說放掉。我們說研究一下，推遲了三天，後來主席說，今晚就放掉，結果放了後，「聯動」反而瓦解了。主席給我們提供了多少豐富的經驗。浙江的問題，主席是知道一些，浙江不搞好，主席很不安。我跟龍潛說，浙江不搞好，主席怎麼去，主席休息的地方總要搞好。

大方向要抓得很緊，很緊

你們要考慮到長遠一點，從現在準備奪權，到掌權，都要考慮。一個政權，總要大多數人擁護，即使對待暫時同盟者，都要照顧。毛主席在統一戰線問題中講得很清楚，毛主席講對待同盟者，一是要帶領同盟者取得勝利，一是要照顧到同盟者的利益。（注：大意，還沒有查原文）。

現在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時目標非常明確，再過一時期，奪權後，目標不明確，那就出現大問題。

上海一宣佈陳丕顯、曹荻秋打倒，有的群眾就認為沒有事了。現在上海每個月開一、二次鬥爭陳、曹大會，這樣使人明確不要忘記大方向，再是可以從鬥爭中解放幹部，又可以推動鬥、批、改。

現在是那方面需要就開會。例如工廠批工業七十條，就把批劉、鄧、陳、曹結合起來。奪權以後，還有一個大方向問題。任何時候大方向不要忽略，要抓得很緊，很緊。把批判劉、鄧，批判省委放在第一位，既能解放幹部，又能爭取同盟者。

權力機構要不斷完善

不要怕犯錯誤，有問題，多思索一下，積累一下。上海已經有20～30%的大工廠實行「三結合」，就是實行「三結合」也會有變化。總要有一個過程，不斷完善。到完善後，臨時權力機構已結束了。臨時機構不可能一下完善，包括人員調整，機構作風不斷的完善。將來還是要成立省人委、省委，這是過渡。政權機構、黨的機構，應該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的機關，機構精悍，不這樣龐大，密切聯繫群眾的，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現在「三結合」機構，除了部隊，幹部、群眾組織外，還要老、中、小，這樣可以交班。

《文匯報》是鍛鍊出來的

上海《文匯報》的確是鍛鍊出來的，造反派從多數變為少數，後來少數又變為多數。奪權以後，每天有二三千人到報社去辯論，《文匯報》的同志就放開門請他們進來辯論，一面報紙的鋒芒始終沒有打下去，他們寫的社論和文章我們一篇沒有看，我們看了錯誤可能少一點，但鋒芒沒有了。上海兩家報紙沒有封為上海革委會的機關報，還是造反派報紙。

張春橋談山東的形勢（1967.6.24.）

【摘錄】

從軍區到縣人武部，這裡有一個內部力量對比問題，搞不好出現四川局面，怎麼解決對我們有利，內蒙、四川大幹一場，最後還是解決，但是否還有另外辦法，我跟姚文元到濟南去，那時表面上看129個縣，只有7個縣未奪權，9個市只有棗莊一個市未奪。實際上奪權大部分是保

守勢力。山東省奪權是青島先奪權，王效禹是1月31日到濟南的，正是濟南軍區、省軍區、公安廳反擊所謂反革命逆流。把「工聯」、「山大主義兵」這二個大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把十幾個領導人抓起來，王效禹31日到，2月2日就宣佈奪權，在這樣形勢下奪權，最大的造反派組織被打下去，中間、保守勢力都有組織，這個掌權勢必掌握在中間偏保手裡。直到3月份發現問題，原來王效禹認為濟南市的市委書記楊××比較好。但他當了市革委會主任後，下了命令官復原職，這真是復辟。這樣情況下，部隊介入了。部隊宣傳隊一進入工廠、學校，他就支援了中間、保守組織。對「工聯」、「山大主義兵」的下屬組織他不會支援，而「工聯」、「山大主義兵」的下屬組織越整風越檢討越垮臺。所以整個省是中間派，保守派掌權。當時，王效禹同志要反擊逆流，勢必把矛頭針對軍隊。我們從北京到濟南去，一下飛機，還沒有到住的地方，就在機場休息室幹了起來。那時把記者都找來開會，連續開了三天，一天開到凌晨一時，我說我趁現在機會去看看大字報。一到街上，紅衛兵正在寫「打倒楊得志」的大字報，那時搞不好，就很快會變成四川、內蒙。中央有個同志說了一句「獨二師是羅瑞卿搞的部隊」，紅衛兵就把這上了街，傷了一些戰士的心，有的抱了槍哭，我是來當毛主席的兵，怎麼變成當羅瑞卿的兵。後來我跟王效禹商量，馬上把街上大字報、大標語改了一下。當時研究，一是放手鬧，一是爭取時間做工作。做部隊工作很難做，那麼多部隊負責人談話都對我們說我們好心好意支左，怎麼說犯了路線錯誤，當時四五十個部隊首長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犯了錯誤。他們希望我們支持他們，而我們不但沒有支持，反而批評了他們，支持了王效禹。經過五天工作，情緒才轉過來，三方面（指部隊、群眾組織、領導幹部）才在一塊開會，開始還是互相揭對方，機關幹部做了很多工作，山東幹部殺出來較遲，他們就談自己的體會，當時對造反怎麼看不慣，後來思想怎麼通的。有幾個工人也很會做工作，向部隊指出怎樣支持錯了，這些同志把部隊說動了心。那時給我們壓力非常重的，部隊給我們送來大量材料，都是攻擊造反派的，我和楊得志說：我不看了，完全是對我施加壓力。楊說，不是的。我說客觀上是如此。後

來同意開一次排以上幹部會，我去講話，做說服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會場還好，沒有大鬧，但會後提了大量條子，向我提意見。我們做了八天工作，僅僅創造了一個條件，在一起開會作自我批評。山東從大軍區到市軍區一直到人武部都一個觀點。八天后，首先是空軍貼出大標語，支持造反派。

中央決定有些同志擔任軍區政治委員，但部隊內還有人貼大標語「打倒王二麻子」，連名字都不點。我做了一些工作。要造反派首先舉起「擁軍愛民」的旗幟。那時，我們跟楊得志同志說，在工廠中的部隊先一律撤出，部隊宣傳車不要上街。但部隊內壓力很大。而保守派滿街貼大字報、標語「擁護解放軍」、「解放軍不能撤出」，部隊內還有群眾問題。所以我跟王效禹建議，無論如何要做擁軍愛民工作。經過二個月工作，先是省軍區發表了聲明，提出了四條，這四條實際上是楊得志同志提出的。當時他要司令部、政治部貼標語支持王效禹，但有的就是不聽。我跟楊得志同志說，你不能腳踩兩隻船，這樣四面八方都會壓你。

他們有一個樸素的階級感情，只知道工人、貧下中農，不知道工人、貧下中農中間有革命的，有保守的，有受蒙蔽的。

張春橋研究論文

1. 向弘.徹底剝開「四人幫」「一貫正確」的畫皮[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10）.
2. 金輝.皇帝夢的破產[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11）.
3.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批判張春橋的一個謬論[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12）.
4. 韋真.警惕革命隊伍裡的「蛀蟲」[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6，（Z1）.
5. 周培源.「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用心何在[J].物理，1977，（1）.
6. 廣西師院政治系大批判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不容篡改——徹底批判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7. 北京師大教育大批判組.搞教育革命是假篡黨奪權是真[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8. 王洪楚.歪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典型——評《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J].四川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9. 鐘問.「四人幫」是地地道道的假洋鬼子[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2）.
10. 廣西師院中文系大批判組.張春橋是貨真價實的老反革命[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2）.
11. 從炮製「白卷」假典型看「四人幫」破壞教育革命的罪行[J].廈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77，（1）.
12. 邱遠猷.批判「四人幫」以「儒法鬥爭史」代替階級鬥爭史的謬論和罪行[J].北京師院學報，1977，（1）.
13. 普日哇.張春橋三條提幹「標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組織路線[J].青海民族學院，1977，（1）.

14. 把《反擊》押上歷史的審判台[J].黑龍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Z1）.
15. 四平師院大批判組.「四人幫」是新老反革命之幫[J].四平師院，1977，（2）.
16. 王張江姚「四人幫」小史[J].四平師院，1977，（2）.
17. 本刊編輯部.目的是篡黨奪權——揭發批判「四人幫」和省委前主要領導人破壞教育革命的禍心[J].安徽教育，1977，（8）.
18. 新友.踐踏邏輯同一律的罪惡行徑——斥「四人幫」的偷換術[J].四平師院，1977，（3）.
19. 劉溶.不許歪曲毛主席的詞二首——評江天的一篇黑文[J].開封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5）.
20. 王予民，謝照明.「四人幫」的「蘭譜」[J].開封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5）.
21. 安徽師範大學體育系大批判組.揭批「四人幫」破壞學校體育工作的罪行[J].安徽教育，1977，（10）.
22. 青海民族學院政教系黨史教研組.「四人幫」同高饒反黨聯盟是一丘之貉[J].青海民族學院，1977，（4）.
23. 世鷹.實用主義是「四人邦」反動哲學的主要特徵[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3）.
24. 北京師院院理論組.一個鼓吹歷史唯心論的黑標本——評「四人幫」的「上層建築決定論」[J].北京師院學報，1978，（2）.
25. 羅徽武.巴黎公社原則與物質利益[J].四川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4）.
26. 王恩榮.直接經驗，認識論的基石——兼批「四人邦」大反經驗主義的反革命謬論[J].開封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4）.
27. 張顯揚，王貴秀.張春橋的「全面專政」必須徹底批判[J].哲學研究，1978，（9）.
28. 夏佑新.張春橋指手畫腳[J].黨史縱橫，1993，（10）.
29. 「四人幫」被收審小記[J].遼寧檔案，1994，（1）.

- 30.唐振南.1974—1975年毛澤東在長沙[J].黨的文獻，1994，（3）.
- 31.夏遠生.毛澤東在長沙的一一四天（一）[J].山西老年，1994，（5）.
- 32.狄翟.《海震》事件本末（下）[J].電影藝術，1994，（4）.
- 33.彭禮賢.陰謀文藝與陰謀政治——對「四人幫」陰謀文藝的剖析[J].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1994，（4）.
- 34.鐵驥.周恩來與「全面整頓」[J].黨員之友，1994，（8）.
- 35.安建設.「九·一三」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J].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1）.
- 36.鐵驥.生命最後時刻的光華——重病中的周恩來與「四人幫」鬥爭記略[J].黨的文獻，1996，（1）.
- 37.陳立旭.「九一三事件」後肯定與否定「文革」的鬥爭與毛澤東的心態[J].毛澤東思想研究，1996，（1）.
- 38.劉明綱.「四人幫」反「經驗主義」鬧劇的破產[J].黨史天地，1996，（5）.
- 39.李豔君，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J].黨史博采，1996，（6）.
- 40.金春明.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勝利[J].四川黨史，1996，（6）.
- 41.伍修權.對「四人幫」的量刑始末[J].黨史博采，1997，（6）.
- 42.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林彪急於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J].海內與海外，1997，（10）.
- 43.陳晉.「文革」前夕遠離北京的兩步棋[J].黨史博覽，1997，（12）.
- 44.雷炳炎，齊輝.從擇定到廢除——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J].黨史縱覽，1998，（1）.
- 45.範碩.力挽狂瀾——「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和葉劍英[J].黨史天地，1998，（3）.
- 46.遲礫.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前前後後[J].文史精華，1998，（11）.
- 47.王凡.誰為「四人幫」辯護——本刊首任主編張思之披露「兩案」辯護內幕（下）[J].中國律師，1998，（12）.
- 48.紀希晨.粉碎「四人幫」全景寫真（上）[J].炎黃春秋，2000，（10）.

49. 汪文風，王凡，劉東平. 隔離審查期間的「四人幫」主要成員[J]. 黨史博覽，2000，（12）.
50. 王安. 從狼狽為奸到勢不兩立——「文革」中的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J]. 黨史博采，2001，（1）.
51. 王永欽. 與「四人幫」鬥爭的勇士——周恩來與「反對經驗主義」[J]. 黨史縱橫，2001，（12）.
52. 張樹德. 「四人幫」「組閣」陰謀破產記[J]. 黨史博采，2003，（2）.
53. 斯夫，張樹成. 「批林批孔」運動始末[J]. 黨史博采，2003，（9）.
54. 斯夫. 「文革」中毛澤東提出「三要三不要」內情[J]. 黨史博覽，2003，（10）.
55. 木華. 解密：「四人幫」和他們的反鄧「陰謀電影」《反擊》[J]. 黨史文苑，2003，（6）.
56. 舒雲. 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J]. 黨史博覽，2004，（1）.
57. 巴圖. 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一）[J]. 黨史縱橫，2004，（3）.
58. 煥然. 上海安亭事件始末[J]. 黨史天地，2004，（9）.
59. 尹家民. 「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羅思鼎寫作組[J]. 黨史博覽，2004，（10）.
60. 煥然，趙煒. 「文化大革命」中的陶鑄[J]. 黨史博采，2004，（10）.
61. 煥然. 從工人到黨中央副主席躍變的「文革」神話序曲——「安亭事件」始末[J]. 黨史縱橫，2004，（10）.
62. 圖們. 昔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今何在？[J]. 黨史縱橫，2005，（1）.
63. 秦城預審張春橋[J]. 黨史博采（紀實），2005，（2）.
64. 汪文風. 中紀委對「四人幫」的審前調查[J]. 海內與海外，2005，（2）.
65. 北邙. 與張春橋對著幹的許世友[J]. 學習月刊，2005，（3）.
66. 陳永貴怒「頂」張春橋[J]. 黨史博采（紀實），2005，（5）.

67. 霞飛. 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J]. 黨史博采（紀實），2005，（6）.
68. 胡義成. 再評張春橋、姚文元反人道主義理論[C]. 馬克思主義探原——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文集. 2011.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48. 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4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50. 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51. 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52.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54.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55. 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56. 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57.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60.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6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2. 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80.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1.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2.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 83.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4.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5.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 8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 87.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 8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89.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 90.[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2.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3.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4.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5.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6.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112. 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113.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4.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115. 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116. 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117. 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118.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119. 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0.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 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22. 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123. 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124. 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25. 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7. 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12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29.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13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14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142.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 143.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 144.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 145.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 146.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 147.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 148.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49.「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 150.《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 151.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 152.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 153.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 楊健采寫, 《無罪流放: 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8。
158. 金沖及主編, 《周恩來傳(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
160. 定宜莊, 《中國知青史——初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161. 季羨林, 《牛棚雜憶》,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
162. 劉小萌, 《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163. 李輝編著, 《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 海天出版社, 1998年。
164. 徐彬編著, 《風雨福祿居: 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65. 曾繁正, 《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 紅旗出版社, 1998年。
166. 黃崢,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年。
167. 劉冰, 《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8年。
168. 韋君宜, 《思痛錄》,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t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 《「紅衛兵」與「嬉皮士」》, 明鏡出版社, 1998年。

- 174.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5.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 176.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 177.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 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1.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1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3. 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194. 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195. 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6. 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197.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198.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199. 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200. [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1. [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2. 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203. 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204. 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205. 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206. 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207.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208.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209.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0.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213. 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4. 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5. 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6. 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217. 王申西，《王申西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21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219. 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0. 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21.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2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223. 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224. 中嶋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225. 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2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2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2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29. 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231. 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32. 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33. 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234. 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5. 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6. 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237. 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238. 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239. 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275. 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276. 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277. 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278. 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279.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280. 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281.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282. 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3.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284.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5.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6.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287.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288. 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289.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0. 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91.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 298.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 299.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 300.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 301.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 302.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303.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 304.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05.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 306.[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7.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8.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9.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5. 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6. 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7. 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8. 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9. 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320.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21. 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322. 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324.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325.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326.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一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⁵⁶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⁵⁷他

⁵⁶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⁵⁷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檔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⁵⁸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⁵⁸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毛澤東的理論家：張春橋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5.12

冊：公分。-- (文革風雲叢書；5-6)

BOD版

ISBN 978-986-91545-3-6(上冊：平裝)。--

ISBN 978-986-91545-4-3(下冊：平裝)

1. 張春橋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4016731

文革風雲叢書05 PC0483

毛澤東的理論家： 張春橋與「文革」（上）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責任編輯 / 杜國維

圖文排版 / 周政緯

封面設計 / 楊廣榕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5年12月 BOD一版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5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要真正把革命擔子挑起來，使我們的生產事業得到發展，使我們上海二百萬工人階級更加革命化，在革命鬥爭中學會革命，學會管理工廠，學會管理企業，想出各種辦法，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工廠不會改變顏色。

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1966. 11. 16，摘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分為上下兩冊，詳細收錄文革的理論家——張春橋的現場講話四十餘萬字，時間跨度為1966~1976年，內容包括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座談會講話、大會發言、政論文章、內部指示等。透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張春橋推行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